

叶子龙

回顾给毛泽东做秘书的日子

叶子龙：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从事机要工作，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出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从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一九六二年调离中南海，前后达二十七年。一九四九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一九五三年，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一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成为“五大秘书”之一。

叶子龙
简历

——九五三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主席秘书的任命。当时被任命为主席秘书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时称“五大秘书”。弹指四十余年，五大秘书中有四人相继谢世，唯独叶子龙，硕果仅存。

数年前，他于内蒙古寻访时，突患重疾，还是曾主持过军队工作的老上级杨尚昆，急调军用直升飞机，把他从交通不便的赤峰接回北京抢救，否则他这仅存的硕果也将凋零。

大病愈后的叶子龙，头脑依然清晰，依然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浮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眼中的毛泽东……毕竟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六二年，他跟随毛泽东四分之一世纪强。

叶良和变成了叶子龙
黄公略“偏师”中的“娃娃兵”
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

湖南省的浏阳，自近代以来，人杰辈出。如为变法维新抛洒满腔热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推翻那拉氏统治策动起义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再往后，又有一首涉及浏阳的歌曲，唱遍了全国，唱的是距离浏阳不远的地方的又一位更为不朽的革命伟人。就是这一方孕育了近代富于革新精神的人杰的山水，也滋养了本文的主人翁。

在浏阳东乡平安洲，丘陵叠耸，浏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青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

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一九一六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

一九二六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十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八月二十三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十三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

“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四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

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吧？”

“是的，一九三二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一九三五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隊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八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

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一方面军，并一直随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毛泽东提议，机要股升格机要科
黄有凤不管转交电文了
我们那时用的密码称“豪密”
毛泽东批评一方面军的山头主义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三个月，歼灭国民党七个团，俘虏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红军扩军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

差错，所以他提议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做‘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

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

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是中共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秘书吴亮平给毛泽东当了一段秘书毛泽东又看中了他的
一位老乡

据叶子龙回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秘书。的确，笔者查阅了有关的资料，中共早期的秘书工作，是由中共领导人自己承担的。例如周恩来，就做过许多如今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记载里，“秘书”字样最早见于 1923 年 4 月，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到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了两个月，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又兼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处理文书、会议记录、保管档案等工作。

国共分裂后，武装斗争转为中共工作的中心。运筹指挥战

事，均由军队领导人当机决断，指挥部里只有个别领导有参谋，但参谋的职责只是发转电文，相当于后来的机要秘书。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领导者地位后，也没有配置秘书。

一九三六年夏秋，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在同他会面交谈时，一直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做翻译，兼干了一些秘书工作。但当斯诺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吴亮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几乎与此同时，和宋子文、陈立夫委派的代表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周小舟，从南京来根据地汇报情况。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老乡十分欣赏，随即要他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但不久就派他以毛泽东私人代表身分到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去了。一九三七年春他刚返回，旋即被毛泽东派往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上述几位短暂地居于秘书位置的人物，并不曾经常在毛泽东的身边。而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毛泽东拿着叶子龙看不懂的电报说：
要有好事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了张国焘
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十二月十二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十二月十一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离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两位女性。

肖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到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

《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传说在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

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芷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共产国际给毛泽东派来了一位参谋
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
王若飞一个劲地骂机会主义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便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时间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项英从江苏发来电报，涉及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
毛泽东说：有问题康生会告诉我，不必大惊小怪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

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

一九三九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一九三九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

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正式提出设秘书 任弼时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办的第一件事 后来的五大秘书，都到了毛泽东身边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三九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约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

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来也是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文章外，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

时至到陕北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很快的发展。党员从四万增加到八十万，军队从四万扩充到五十万，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且日趋庞大。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才干，并为各单位熟悉、尊重的干部，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

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他和毛泽东商议后，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处，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

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那以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叶子龙回忆说：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报告，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等等，此

外他们还负责部分理论和宣传工作，所以并非总在毛泽东身边。但从胡乔木本人或其他人的回忆看，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住得很近，许多会议的记录，也是由他做的。

了解放战争时期，田家英经胡乔木的推荐，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至此，后来的所谓五大秘书，都到毛泽东身边了。

其他中央领导人有秘书吗
大叶参谋长和小叶参谋长
毛泽东说：软禁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
办点事

在笔者向叶子龙问起他刚当毛泽东秘书时，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叶子龙说：“哦，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是廖鲁言，我们打过多次交道。”

“周恩来呢？后来的五大书记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笔者又问道。“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就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不过那时都叫参谋。我还被称过参谋长。噢，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小叶参谋长就是我。”

当笔者询问叶子龙，在那一段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事情，能否讲一两件事时，叶子龙说：“刚到陕北时，战事频仍，整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但我们跟着毛泽东，就仿佛感觉不到危险，从未想过革命会失败。毛泽东的乐观、幽默、大智大勇，感染着我们。正像我前面讲过的，从山西回陕西渡黄河时，我们说，得到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护。”

记得知名人士柳亚子在一首词中，曾称颂毛泽东的胆略为弥

天大勇。叶子龙说要谈弥天大勇，就不能不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当时解放区的干部战士，叶子龙也一样，都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事变我们都经历过，记忆犹新，谁能保证蒋介石不像当年扣张学良那样，把毛泽东扣下呢？”

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去重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们说，去可以争取主动，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签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不签字在我。在不伤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让步，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如果这还不行，就城下不盟了，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提到的何鸣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当时中共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 175 师包围缴械。

赴重庆前，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可根据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悬了很久的心，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叶子龙说他悬着的心才放下。

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

毛泽东不悦地说：我根本就沒看过

叶子龙发明了画圈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与陕北、山西之敌周旋，并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战事，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叶子龙说：“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而

且由于当时电报、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我们设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他说：“我就给你讲讲电稿、文件传阅过程中，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

自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随着战事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巩固后方，对旧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日显紧迫。进入晋绥解放区的那段时期，整个战局趋于平稳，因此，毛泽东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土改问题。

还在从陕北至晋绥的途中，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沿途了解土改的情况。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解放区，支援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在此后不久，却产生了“左”的偏颇，中农的利益受到侵害，中小商业遭到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

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当年中央十二月会议上，他强调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对“左的浪花”。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

三月里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

这时，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深究。

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姓名，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
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克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陆续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第一任主任，叶子龙却记不太清楚机要室是什么时候组建起来的了，他说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至向北平进发期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机关和军委的机关都很难截然分清，因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军事的

最高指挥者。军委有机要部门，中央书记处也有机要部门，这两个机要部门都为中央书记处服务。

据部分老机要人员回忆，原延安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一是中央机要科，一是军委机要处，一是中央情报部的机要科。一九四三年，中央机构精简，三个部门合并为中央机要科。科长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协理员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后来，这个机要科又提升为机要处。

转战陕北时，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机要处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机要人员组成临时机要科，科长辛心宽，由叶子龙负责，跟随毛泽东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机要处的大部分人员，都与后委、工委先行离开了陕北。

当时前委的全班人马统称“三支队”，后变更为“九支队”，“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下设四个大队，临时机要科属第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最初是龙飞虎，后来归纵队参谋长叶子龙直接领导。

一九四八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合后随之合并。四五月间，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伍云甫，也就是现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任处长；叶子龙任副处长，兼机要科科长；副科长是李金德。

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中央领导服务机关的扩大、细化、规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从西柏坡到北京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

“当时的办公厅下设机要室、警卫处、特会室、行政处等单位。”笔者向叶子龙问道：“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难道不是同时

成立，也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吗？”这我就没印象了。”

“此时的机要室人员开始多起来了吧？”是的，当初我在一方面军、在军委当机要科长时，手下也就两三个人，后来增至十来个人。后来，直至来到河北的中央前、后、工委合并，中央机关重新调整后，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也开始有了分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克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等都是那时候来的吧？”“他们是陆陆续续到机要室的。加上原来的赖奎、徐业夫、罗光禄等，和新调来的年轻点的机要人员，一下子像个大机关了。”

初到北京，毛泽东发火 中央领导都住进了香山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叶子龙跟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途中关于赴京赶考的对话，至今已广为流传。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曾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做李自成，要适应新的情况和环境，要谨防糖衣炮弹的袭击，叶子龙还都记得。

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先到预先安排的颐和园。谁知一到颐和园，园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来是因为怕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社会部长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结果已过午饭时间，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而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你们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把水全排干了，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

那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毛泽东发那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赶快和社会部的人到颐和园外面，四处寻觅，总算找到了个小饭馆，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对付了一顿。

饭后，叶子龙他们陪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余人见面。接着，又检阅了部队。这时，毛泽东午饭时的怒气全消，显得十分兴奋。他就是这样，不太掩饰自己的情绪，日常偶遇不满，有脾气就发泄出来，然而，发完就完了，并不耿耿于怀。

晚上，毛泽东和叶子龙他们没有再回颐和园，而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与毛泽东同住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双清别墅北边，有个较大的院子，房子很多，所以他们都集中住在那里。由于毛泽东住在香山，因此为他服务的机关也在香山，如机要室和新组建的政治秘书室等，在那里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新的人民政权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被邀请到北京。他们都住在城里，同这些人会面交换意见，是毛泽东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他通常在下午进城，半夜以后方回双清别墅就寝。周恩来等人则整个白天都在城里办公。

有一次，毛泽东等人进城办完公回香山，汽车在途中突然停

了下来。传来话说是行驶在前面的周恩来的轿车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叶子龙说他也不知道是如何排除的，反正过了一会车子又开动了。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毛泽东每次出行，车队前便增加了“开道车”。

一九四九年入夏以后，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工作的方便，经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劝说，最后通过组织决定，毛泽东才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叶子龙随之搬进了丰泽园西北侧的静谷。叶子龙住的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办公室。当时在静谷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毛泽东进中南海后，中央办公厅的几个主要部门也陆续搬进了中南海，机要室是分批几次才全部搬进中南海的。当时中南海在腾房子，清理房子，弄好一部分，就搬进一部分。最初进中南海的，在西八所办公。后来静谷附近又腾出几间房子，又有人搬到那里办公。约莫在一九五一年初，机要室才全部搬进西楼。

进中南海前前后后那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协会议服务。收发转送电文，准备文件，做会议记录，超出了过去机要科所承担的工作范围，而此后机要室的基本工作，就是这些内容。但当时中央机关有些重叠，工作亦有交叉的情况，从事这些工作的不光是机要室一家，还有曾三领导的中央秘书处。这种情况又延续了几年才理顺。后来，上述工作全归属机要室统管。

赴苏前，叶子龙负责购买礼品
陈伯达“绝食”
《为人民服务》一文的诞生
胡乔木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几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毛泽东就向有关人员布置了

准备出访苏联的任务。因此次出访恰在斯大林寿辰期间，所以要带些贺礼，从延安时起就兼管毛泽东生活的叶子龙，也就承担起了采购礼品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赴苏的火车，同行的人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等。

当叶子龙说到苏联之行时，笔者突然想到前些时候出的《汪东兴日记》，其中十二月十七日记有“晚饭前，毛主席召集陈伯达、叶子龙和我等开会。毛主席首先批评了陈伯达今天外出一天未请假……”等语；另外叶永烈《陈伯达传》中也记载了陈伯达为看儿子，擅自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住，挨毛泽东批评一事，就问他是否记得当时详情。

叶子龙说陈伯达外出一天未请假挨批一事倒记不太清了，然而此次赴苏毛泽东曾狠狠地批评过陈伯达一通，他却记得十分清楚，但不是因为外出或搬出去住宿。

具体是哪一天叶子龙记不准了，苏联方面邀请代表团的人去看舞剧，毛泽东等没有去，陈伯达却去了。这部舞剧叫《红罌粟》，编剧对中国人显然怀有某些偏见，因而戏中的中国人，不是嫖娼就是抽大烟，没有什么太佳的形象。陈伯达看后对此戏非常不满，据陪同的苏联人费德林《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追溯，陈伯达当时就对该剧提出了批评。

回到寓所吃饭时，陈伯达又把看剧的事告诉了毛泽东，并忿忿不平地对该戏批判了一通。他也许想借此赢得毛泽东的赞许，不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说：《红罌粟》本来就不是部好剧，你为什么要去看不好的剧？你是自取其辱！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陈伯达感到很委屈，面子上也很难堪，便赌气地声称要绝食。可毛泽东并未对此在意，以为他闹一下情绪就完了，谁知他第二天果然不来吃饭了。过了一天，毛泽东要叶子龙去看看他，叶子龙到他的房间，看到他的床单上洒了许多饼干渣，顿时明白了他的所谓“绝食”是怎么回事，也就没多劝他。三天后，他自己又回来吃饭了。

由此说到了陈伯达，笔者问叶子龙：“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的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笔者穷追不舍。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打交道的感觉是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

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像前面说的关于电文的事，胡乔木还帮我做了解释。”

叶子龙还记起，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在黄河边，毛泽东和任弼时就过不过黄河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刘戡的七个旅，紧逼着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形势十分危急。任弼时主张过黄河，毛泽东坚决不过。他要通过中央依然在陕北使人民建立必胜的信念，而任弼时则从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本人的安全考虑，力主过黄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乔木住的窑洞塌毁了，幸亏他当时不在窑洞里。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

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叶子龙还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没有稿子，后来为了向下面传达，急需把讲话整理出来。可当时谁也没做记录，结果胡乔木凭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和他对讲话的记忆理解，把这篇重要讲话整理成文字。

但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那次会议期间就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次是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经过了反复征求意见才定的稿；而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是江青的详细记录。因此叶子龙的记忆可能有误。

但这样的事显然还有过，叶子龙说正是因此而很钦佩胡乔木。他说：“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朝鲜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
毛岸英在志愿军中的角色和当年的叶子
龙差不多
周恩来说：这份电报的内容暂时不要告诉
毛主席
江青掉眼泪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九月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外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出兵朝鲜，意味着直接同美军对垒，事关千百万人生命。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会丢了江山。斯大林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出兵的能力。中共高层对是否出兵也有分歧。

十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十一月八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毛泽东把他寄以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练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有近二十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枝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

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毛泽东最初只提出四个秘书结果却出了“五大秘书”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是何时生出的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一九五三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一九五三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四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

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五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二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

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一九五三年。这一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要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一九五六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毛泽东本想还让高岗当个省委
副书记，可一开枪，性质变了
毛泽东给了叶子龙三百元钱

一九五五，叶子龙在离家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联盟。

早在一九五三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

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十二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前些时候笔者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八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三百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穡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

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六十七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亲眼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的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

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三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三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个眼，差不多有五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陪同出行的官员一次次降格
南宁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气氛紧张得没人去跳舞了
录音风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

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一九五八年一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一九五七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一九五六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十二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二十二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

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

大怒：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一九五〇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一九五九年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

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在毛泽东发表自己的意见后，一般没有人提出相左的意见
几次勾掉聂荣臻的名字
跟罗瑞卿怄气
“叶子龙 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 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一九六〇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

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天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五十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一九五六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漩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

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二十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京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 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 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毛泽东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是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历史功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冲刷而消逝，也不会因他曾有缺点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误而褪色，这就是人们至今仍然缅怀和纪念他的深层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过失的深刻反省。

于光远

我所接触的中共领袖和中共秀才

于光远：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投身革命，在延安毛泽东和他一接触就对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造诣印象深刻。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涉猎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皆成就卓然，并参与过一些中共重要文献的起草，发表文字直达三千万。

于
光
远
简
历

和于光远前辈的相识相交，颇不同于与通常人结识的过程。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的《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之一出版后，《中华读书报》转摘了部分篇章和段落，其中有一段内容为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政治秘书、毛泽东的英语“老师”林克，回忆毛泽东关注基本粒子研究的情形，叙述了毛泽东邀请于光远，周培源到家中漫谈一事。

漫谈那天，林克代毛泽东把于、周迎进菊香书屋后，就离开了，并没有参与交谈，所以相关的内容，大概是毛泽东在事后同林克闲谈时吐露的。在那次交谈中，于光远曾就“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做为认识主体，而在人类社会，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好？”向毛泽东请教。但不知是毛泽东在闲谈时没说清楚，还是林克记差了，在追忆时林克将那句话说成是出自另外一个人之口。

于是，做为当事人的于光远写了一篇短文，也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追记那次谈话的细节，说明提出问题的是他而非其它人。

对于中共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前辈，我是久仰大名，二十多年前在干校当年轻的五七战士时，就读过他的书，但一直无由同他过往。他的文章给了我一个登门拜谒的借口和机会。

就在我寻觅于先生的家门时，我和他又添了一层文字交道。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于先生看到了文章，又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我在托人两度打招呼后，才毕恭毕敬地踏进于光远前辈的寓

所。刚刚自报罢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

“是那篇关于基本粒子的吗？”我问道。

“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对你那篇文章很有兴趣地读了。凭我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体会，觉得你的叙述是可信的，且引起了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又成一文。”

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不太像通常人们的第一次见面，减免了许多寒暄和自我介绍。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田老子”和“田儿子”

田家英的性格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黏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他后来

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 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 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表情，逗得我哈哈大笑，而此后很久他都不理曹。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 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在中南海时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 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 他并不生气。”

后来，当我将于先生的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于先生对田家英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跟陈友群在一起就打闹 玩笑开得没边没檐。”父亲说：“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会悔棋，对一子得失叫真儿，甚至在难以挽回败局时掀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是真正的田家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

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前辈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摘田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从田家英说到了陈伯达

陈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后的批判印迹。”

顺着田家英是否适合作秘书的话题，自然地就送到了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田和陈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笔抹杀。

于光远前辈对我说，田家英的确和他一起议论过陈伯达，田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他曾向于光远介绍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搞调研标榜，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随后装模作样地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后来我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做调查，亲眼目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说的无二致。陈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听汇报。我去时他正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佛’，而没有言及自己调查后的思索。”

“其实，我对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闻名而钦佩，由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构成的过程。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后的批判印迹。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对您说的这个过程愿闻其详。”

“我加入革命行列，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一二·九宣言》中有一让人闻之难忘的警句，叫作‘华北之大，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传闻（不知准不准）此语出自陈伯达手笔，当时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且负责宣传工作。这是最早的闻陈伯达名，印象很好。”

一九三六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由

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册子。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后一版再版，陈伯达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 并在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然是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

一九三九年于光远到了延安，经何思敬介绍，参加了在毛泽东提示下成立的延安新哲学学会。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新哲学学会在延安文化沟内新建的“文化俱乐部”开年会，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到场了，同时作为新哲学学会发起人之一的陈伯达也到场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伯达。这次会上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作为新哲学学会两负责人之一的何思敬，在总结新哲学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时，把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也算在新哲学学会的工作内。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滑稽，禁不住笑起来 毛泽东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这次新哲学年会上，于光远算是和陈伯达谋了一面，但此后未同陈伯达有什么过往，直至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著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

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辑录的是封建社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有两二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中的

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到他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论》某面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之不符的。

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故而面对陈伯达这种虚心纳谏的态度，更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改，原封不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于先生对此事的叙述划上了句号。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否又有什么变化

按领袖的意志，澄清不合时宜的观点

陈伯达又和于光远过不去了一回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于先生第一

次同他过往，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实在是一种“殊荣”。这笔老账，在文革中又被陈伯达翻出来了，又让于光远领会了“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中央党校）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同时，他还兼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成了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有更多的机会领教其为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自第二期以后，于光远出任该刊总编辑。在“三反”、“五反”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向王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对于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结果，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于光远各写了一篇。

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又有什么变化？

“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学习》提出了批评。我这样估计，是因为一九五五年我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一九五二年写给路翎的信，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而我正是在中海边陈伯达的寓所附近，听了由他传达的毛泽东的批评：《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幼稚的，中了托洛斯基左倾思想的毒。”

如今回溯此事，于光远说：“那时不可能去琢磨，从来就没读过托洛斯基的什么左倾言论，怎么会中他的毒。但领袖要求杂志

做澄清思想的工作，我们便马上检讨自己，并组织批评自己观点的文章。”

“当时，来了一篇冯定的稿子，文章的观点和我们的很近似，由于时间来不及了，便突击将冯的观点改成对我们持批评态度的。把赞同一种观点的文章，改成批评一种观点的文章，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真费了不少力气，稿子搞成了个大花脸。改完了，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改了篇名，内容没怎么动，通过了。

“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 所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此做了检查，但部里并没对出题组稿的于光远和王惠德做什么处理；团中央的许立群也没受批评；华北局的吴江也没挨批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被整得够呛。陈伯达，是热衷于整艾的人之一。”

“听说五十年代后期 陈伯达又和您过不去了一回？”

“呵，那是中宣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陈伯达讲话，又反复念叨他是‘小学生’、‘小小老百姓’。和我坐在一起的王惠德忍不住说：‘你听 他又来这一套了 真虚伪！’不想这话被坐在我们前排的陈的秘书听到了，但他错以为说话的人是我。陈听了秘书汇报很生气，要当时负责中宣部常务工作的胡乔木批评我，可胡没有那样做。当时陈的秘书是听错了，但他并没有冤枉我 因为我内心也是那样想的。”

虽然于光远先生对陈伯达的批评是颇不留情的，但他在评价毛泽东的几位大秘书时，认为“陈伯达有许多比较系统的论著，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过了胡乔木。”这一见解很别致，因为我听许多人都说胡乔木的作用大，我想对此细细推敲或许很有意思。

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记忆中也就四五次。于光远带着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叩开了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不知为何，于光远他们第一次见毛泽东，缺了一项传统节目。

从田家英说到陈伯达，又联系到了胡乔木，他们三位，都是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于是话题又自然而然地说到了毛泽东。

“您也属于为党中央和最高领袖写文章的‘秀才’圈子，同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打过不少交道吧？”

“见面不算少，在延安，开会、看演出，领袖和群众在一起的情况还是时有的。但我近距离地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次数不多，记忆中也就那么四五次。”接着，于先生在我的询问下，追溯了起来。

第一次与毛泽东坐在一起，是于光远刚到延安不久。一九三九年末一九四〇年初，延安在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作为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的于光远，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我在同于先生有了几次接触交谈之后，他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与一个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在我们思维中的定格形象，有很大差异。

他并不像多数理论家那样，喜欢伏案或坐在书斋里，让思维在意识的空间驰骋；仅仅把在演绎和逻辑推理中获取新认识，当作最大的乐趣。

而他总爱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一旦产生新的想法，就急于亲自动手试验去加以证实；他喜欢观察别人操作，并在观察中思考如何利用科学的原理去阐释甚至变革操作，然后试验出一种更科学的操作方法。他是一个既长于深思，又对参与实践乐此不疲

的理论工作者。

这种印象，是我从他少年时曾梦想做一个行侠仗义的武侠；在自己伯父的亲着开办的作坊里当技师，试制日用化工产品；到参加“民先”后，到各地发展组织，直接领导和参与抗日宣传活动的历史；以及他给我讲的许多在这以后发生的故事中，感觉体会到的。

一九四〇年一月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于光远，带着另一个研究会的主要筹备者，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曲柏俊（后来更名曲柏川）叩开了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

他们是来向毛泽东汇报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备情况的，同时邀请毛泽东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到会上讲讲话。

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一些与研究会筹备、设想和宗旨相关的问题。在张建伟、张琼琮合著的《中国院士》一书中，对他们的谈话做了如下描述：

“毛泽东在他那间陈设简单的窑洞里，一边喝着茶一边问：‘研究会有好多人呐？’

‘陕甘宁边区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不过，研究会成立后，情况会好些。’

‘呃 说来听听。’

‘延安现在虽然懂得科学研究的人不多，但喜欢的人不少，尤其是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研究会的牌子旨要一挂出去，肯定会有大批人响应。’两个年轻人信心十足。”

但于光远记忆，毛泽东关于研究会所谈的话不多，更多的是问了一系列国统区的情况。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于、曲都是刚刚从国统区到延安的缘故吧。于光远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毛泽东向曲

问了好多有关电影《渔光曲》的女主角王人美的事，好像毛和王人美的父亲是湖南老乡。

许多人回忆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都被问了一些个人问题，如姓甚名何，拉拉家常。但不知为何于光远他们第一次见毛泽东缺了这一节目。“从第二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的情况看，我这次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二月五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果然到会并讲了话，这篇讲话曾在《新中华报》上刊载，后《毛主席语录》收有节选。

毛泽东在会上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开会那天，于光远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许多人，刚到延安不久的于光远不认识，就让身边的人指认，其中有一人就是周扬。于光远说他就是在那次会上，初识了他后来的老领导、再后来的老朋友周扬。

于光远用自然辩证法评议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

于光远和毛泽东恰巧被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

毛泽东说：自然发展史的课，可以让于光远讲

第二次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是在到毛泽东窑洞的五个月后，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新哲学学会的年会上。

在那次年会上，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都讲了话，刚刚入会的于光远亦做了发言，内容是用自然辩证法评议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这就是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

一九三九年，《新中华报》、武汉的《新华日报》都发表文章，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其中有一篇社论，将相持阶段称为“过渡阶段”。而且当时有些人认为：过渡阶段，就是我们的力量和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旗鼓相当、故而相持的阶段。

“我觉得这种认识是于事实不符的，就专门谈了有关过渡的问题，即什么情况下有过渡阶段，什么情况下没有过渡阶段。我先举了冰和水的例子：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水变成的。但冰就是冰，水就是水，没有既是水又是冰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之间没有过渡阶段。”

接着，于光远又举了玻璃的例子：“玻璃是固体的、硬的，但当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便转变成软的、液体状态了，这就是有过渡阶段。”

因此，于光远归纳说：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如果在某事物中，只存在一对矛盾，非此即彼，其中间就不存在过渡阶段；如果在某事物中存在着许多对矛盾，一对矛盾解决了，而其他的矛盾却尚未解决，得一对一对地解决，那么就存在过渡阶段。

于光远运用自然辩证法的法则和生动的语言，对毛泽东关于相持阶段并非是敌我力量相当阶段，而是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止

……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 中国很痛苦的时期”从哲学上给予了解说。

年会结束吃饭的时候，于光远和毛泽东恰巧被安排在同一张桌子。“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和毛泽东在一起，我就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边。”

也许正是于光远那番有特色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毛泽东问起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叫于光远。他又问我在哪上的学，是学什么的。我说上的是清华，学的是物理学。从那以后，他记住了我，特别是记住了我对自然辩证法有研究。”

我思忖毛泽东为何这次对于光远留下深刻的记忆，大概和毛泽东在那一阶段对哲学非常感兴趣有关。以写《大众哲学》成名的艾思奇一到延安，毛泽东即与之晤谈，并生出让艾做自己秘书的考虑，想必也是出于这一点吧。

于光远是搞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记忆中，每到他思考相关的问题时，就会想到于光远。

一九四四年，延安大学重建，毛泽东很关心此事，专门把出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叫去谈课程设置问题。毛泽东说：“要开一门大课，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自然发展史的课可以让于光远讲。”

周扬回到延大，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于光远，自然发展史的课也就由于光远讲了；讲社会发展史课的，是延大的副校长张如心；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由周扬自己讲。

在菊香书屋和毛泽东谈哲学

毛泽东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水压机的图

毛泽东睡衣上缝得平整的补丁，引起于光远的注意和想象

显然，于光远擅长自然辩证法研究，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记忆中，每到他思考相关的问题时，就会想到于光远。延安大学创办时提名于光远开课，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例，后来六十年代召于光远到寓所畅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例。

一九六三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时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的于光远，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座谈。

“毛泽东习惯倚在床上看书。也许是我们到之前，他一直倚在床上看书的缘故吧，所以我们到时他也没改变姿势，只是不再看书 转过脸和我们交谈。”

那次主要是谈的哲学包括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因为话题是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新概念”说开的，毛泽东谈了他关于宇宙的无限和物质的无限可分的见解，引出人类对客观的认知也无穷无尽的结论。

“我们说的不多，我也谈了一些有关认识论的见解，主要是毛泽东在谈，从理论到现实，思绪跳荡，毫无拘羁。他还谈到了杨献珍以‘合二为一’论，反对他的‘一分为二’。这次谈话是我整理的，但我没把有关‘合二为一’的内容放进去。”

“您还保存有原稿吗？”

“没有，整理完了，就交上去了。这份整理稿没有公开发表，但文革中间被印在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小

册子中，我看见过，基本上和我整理的内容相符，也不知这些红卫兵是从哪里弄到的稿子。”

既然于光远先生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毛泽东的近距离接触，我便希望他再多做些回忆，于先生说：“到毛泽东的寓所，除谈自然辩证法这次外，还有一次，但不是在菊香书屋，而是在游泳池那边。”

那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是聂荣臻带于光远去的，同去的还有张劲夫。近代史上有个‘五口通商’，当时则有个‘六口通商’，中央工作分六个口，六位政治局委员各管一口：彭真管政法，彭德怀管军事，陈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业，谭震林管农业。聂荣臻是主管科学口的，所以他带着于光远、张劲夫，向毛泽东汇报大跃进中全国的科学界的情况。

“那次一到毛泽东那儿，就对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的水压机的图。谈话中，毛泽东一再为钢铁生产的产量压不下来感到奇怪。”

“毛泽东这次和我们见面时，穿的是睡衣。睡衣已经很旧了，在睡衣的膝盖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补丁。这块补丁缝得非常平整，因而引起我的注意和想象，这块补丁是谁给补的？江青能补得这样平整吗？”

听于先生说到此，我告诉他：“我听‘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说：江青的姐姐孤身一人，江青就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中，毛泽东的衣服破了，都是江青的姐姐给补的。”

“怪不得呢，我总觉得江青不会有那么好的缝补手艺。”

当我问到他们那次见毛泽东谈的具体内容时，于先生说：“张劲夫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则汇报了全国各地科研院所的

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在讲完这些内容后，于先生紧接着感叹说：“我把那次向毛泽东的汇报称作‘于光远丢脸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当时汇报的内容并不是我到各地调查看到的，而是靠各地上报的文件报告汇总的。其中有一份来自山东省的正式文件，说他们那里某地研究出一种嫁接法，把苹果和南瓜相互嫁接，结果南瓜有了苹果的味道，苹果能长得南瓜那么大。我堂堂一个搞科学研究的、被称为学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据汇报材料，将这些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不是大大的丢脸吗？”

这件事在于光远心中沉积了很久，直到文革以后他仍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我突然想到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科学检查监督机构，任何事物、任何观念一出现，都应该先放在科学的尺度上衡量一下。我的科学第一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在和许多前辈的交谈中，他们对往昔经历的诚恳反思时有所闻，但像这样细致地叙述自己的“丢脸史”，并在检讨之后，引出令人深省的灼见的，于光远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

从理论上解说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除了标点符号可能有改动外，文字都是我们的。”

“听到要您写处理高、饶的决议时，您感到突然吗？”

“还是说说‘秀才’们的分内事吧。据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唯一一份对过渡时期作系统理论阐释的中央文件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是您和许立群执笔的，这个文件的起草是如何布置下来的，拟制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

于光远说：“当时好像是胡乔木病了，所以向我们布置写作任务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因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学习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总路线也需要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利于贯彻，这就需要对总路线做理论阐释。我们的工作就是从马列经典论著中寻找论据，结合中央的提法加以解说。”

“宣传提纲的理论部分，是于光远写的；比重较大的政策部分，是许立群写的。整个两万余字的文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稿了。胡乔木等参与了讨论和修改，毛泽东亲自定的稿。

“但说起此事，如今我一点也得意不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新中国社会发展究竟怎么走的认识从正确转向偏差的文件。”于先生又做起了检讨，“毛泽东定稿时，对我们的成稿基本上没做什么修改，在理论部分好像只加了一段话，大约四五百字。那时我们开玩笑说：‘除了标点符号可能有改动外，文字都是我们的。’”

“我听说就在此后，您又奉命起草一个文件，结果‘除了标点符号是您的 文字全不是您的’。”

“是有那么回事，那是要我起草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个决议的任务会落到我头上，唯一可能的原因是我起草了宣传提纲，中央觉得我能写文章。可惜这次我没能胜任，最后决议公布时我一看，除了标点符号外，没有一点我的文字的影子。”

“这次是谁向您布置的任务呢？”我问道。

“还是凯丰找的我，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也被认为和

高、饶有点瓜葛，被撤职了，但他没有被列为主要人物。”

“那么当时写决议时 你是怎么定的调子呢？”

“当然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定的。”

“当时就已经定了反党联盟这个性了吗 当时您听到要您这样写处理高、饶的决议时，您感到突然吗？”

“已经定了 而且我对处理高、饶并不感到突然。但在这之前，高岗在一段时间里，再三攻讦刘少奇，而且语言那么尖锐严厉激烈，倒让我感觉过惊异。高岗那时的地位威望并不很高，他怎么能用那么肆无忌惮的语言指摘党内第二号人物呢？”

于光远把自己归为“二流秀才”

凯丰是与新的中央极度抵触的人，却被任命为中央的宣传部长

毛泽东内心并未彻底认错，且已不太听得进批评意见

由于于光远先生说的这两件事，都和凯丰有关，而凯丰又从延安时期起，就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在他之后出任中宣部部长、副部长的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都是中共的秀才，那么凯丰能不能算是个中共的大“秀才”呢？

于先生的见解是：不能以担任没担任中宣部长或副部长来判定是否中共秀才，秀才是指长于理论，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报告和写文章的人。凯丰并没有在理论领域显示出才华和特长，故而不能算。

接着，于先生跟我归算起中共的“秀才”来：“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杨献珍，可以说是中共的大秀才。康生参与

了组织毛选编纂和‘九评’，也应算一个；其他一些和我年纪、资格差不多的人，就算是二流秀才吧，如吴冷西、胡绳、姚溱、许立群、熊复、邓力群、田家英、王惠德等等。”

“我觉得对凯丰的任用，有些悖于常理。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上，依正规说法叫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前处于领导和指挥地位的博古、李德，在会上不过极力为自己做辩解，唯独凯丰激烈地反对毛泽东进入最高领导层。这样一位与新的中央极度抵触的人，却被任命为中央的宣传部长，我至今还不曾看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我很希望于先生能露些秘辛。

“在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时，他还是领导班子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五成员之一，‘抢救’别人呢！”于先生没做正面的回答，但言下有他不但未如何……反而如何……之意。他接着说：“我一生在两次大会上，亲见毛泽东当众承担错误的责任，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抢救’运动。”

于先生问我不知道陈纳德给宋美龄敬礼的故事。我说我听过传说：陈纳德给宋美龄敬礼，宋美龄不懂还礼的军中规矩，结果陈纳德一直举着敬礼的手。于先生说：“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向所有在‘抢救’运动中受冤屈的人道歉，他一边举手敬礼，一边说如果大家不原谅他，他的手就要像陈纳德给宋美龄敬礼一样放不下来了。”

“我想，您说的两次中的另一次，一定是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那一次，毛泽东曾号召与会者提意见，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两千一稀 大家满意’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是的，就在那次会上，刘少奇借农民的话将大跃进概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毛泽东虽然在会上说错误的主要责

任应由他负，可内心并未彻底认错，且已不太听得进批评意见。从那以后，毛和刘的分野反而愈深了。”

刘少奇的地位比周恩来重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独创的
崭新的观点

首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赎买民族资产阶
级的，是刘少奇

因为说到了刘少奇，笔者忽然想到：今年是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记得《刘少奇年谱》刚出版时，我翻了翻，里面有些刘少奇与“秀才”们的交往。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就记有如下文字：

“召集康生、陆定一、胡乔木，以及理论宣传工作者熊复、姚溱、许立群、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王力、范若愚等，座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

于是，我问于光远先生，是否在刘少奇百年诞辰期间，写点纪念文章。于先生说当然要写，而且要认认真真地写。我见他的书橱中有《刘少奇年谱》，就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那段文字翻给他看，问他是否还记得那次详谈了些什么。

“这和毛泽东不同，我和刘少奇的交往比较多，类似的情况也有好几次，这里记载的这一次倒没什么印象了。”

或许是毛泽东太特立独行气宇浩然的缘故，处于他副手地位的人，就显得比较谨小慎微，不太能凸现个人的风格和特色。特

别是我对刘少奇缺乏深入的研究，仅从表面感觉刘少奇的个性不明显，他的言论也似乎有点摇摆，他给人的印象还不如周恩来深。

于光远先生不同意我的这种感觉：“刘少奇的地位比周恩来重要。我们党的高层领袖中，思想深邃、有理论探索精神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敢于和毛泽东争辩，可惜他去世的太早了。他病逝后，刘少奇的理论地位更显示了出来。周恩来、朱德则属将构想变为现实的大干才。”

“我的一本书，《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你看过吗？”他问道。

得知我没看过，他说：“在毛泽东著作中，有一个在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从未言及的重要观点，那就是他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崭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能说完全是毛泽东创造的；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完全属于毛泽东。”

于先生接着说：“最早认识到毛泽东这一理论贡献价值，并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探索，并加以阐发，制定出一些具体政策的，就是刘少奇。”

我被他的分析和叙述吸引了。

“刘少奇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撰写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我认为是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问题的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后来也是他强调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另外，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主张。虽说这一思想马克思早就讲过，列宁、布哈

林也讲过，但在中国，首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把民族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来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对透露与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的分歧已不太避讳

“于光远 你这样游不对嘛 太紧张了 要放松”

“‘揪人’这个词儿 我在‘四清’时就发明了”

然而，自一九五一年秋季始，毛泽东萌生了急于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开始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渐放弃了他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刘少奇并没随着毛泽东的转变而转变。

“从中共‘七大’之前，到一九五二年三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蜜月’时期。一九五二年三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 此后便开始敲打刘少奇。”

到了一九五二年六月以后，毛泽东对透露与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的分歧已不太避讳。他公开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有人”很大程度上是指刘少奇。

因为事先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的最初分歧等严肃的话题没有准备，特别是当于先生提起他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后，我很希望在阅读了他的著作后，再和他探讨，便重提

他个人和刘少奇的交往。

于先生回忆了几件小事，话题又轻松了。

“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的时候，夏季来临，我也会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去游游泳。当然，我的泳技实在上不得台面，手划拉半天，身子却浮不起来。一次，刘少奇也来游泳。因为我和他已经很熟了，他看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就走到跟前教我。他说：‘于光远，你这样游不对嘛，太紧张了，要放松，放松才能浮起来嘛。’于是，于光远照着刘少奇教的要领练了起来。”

两个礼拜后，于光远在游泳时，又碰上了刘少奇。一见面，刘少奇就对于光远说：“呵，于光远，你又来啦。来，来，来，我看看你游得怎么样了。”于光远奋力游了两下。刘少奇看罢，哈哈大笑了几声，走了。

“显然，他对我的游泳长进大失所望。我想：完了，这一辈子学会游泳是没有希望了，连共和国主席亲自教我，我都学不会，还让谁来教呢？”

讲完这段故事，于光远说：“说来也有点奇怪，我跟刘少奇关系这么好，文革中却没因此整我，也没要我交代刘少奇的‘罪行’我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谈说刘少奇，自然而然就联系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小时候在中南海里，就对王光美阿姨有印象。在西楼的电影放映室看电影，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可最前面的大沙发又不敢坐，我们小孩就常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一次王光美来看电影，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虽然我们还是没有坐，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待小孩真好。

我告诉于光远先生，有些报刊约我写王光美的访谈，我想如果能和王光美阿姨谈的话，很想听听她谈当年在桃园搞“四清”

的详细情况，谈谈对当年“四清”的思考。

“王光美在桃园蹲点的时候，我恰好也在河北搞‘四清’，离桃园大队不远，有时我们还通电话。对了，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老‘揪人’，其实‘揪人’这个词儿，我在‘四清’时就发明了。当时我们要审查一位公社书记，可他离开公社了，商量怎么办的时候，我提出能否把他‘揪’回来，还马上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问她在桃园有没有‘揪人’的经验。”

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渊源和差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是我和胡乔木在争执中争出来的。”

胡耀邦听了，马上表态说：“写上，写上。”

在我于光远先生说到刘少奇的那次交谈分手时，于先生送给了我一本他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回到家中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书中根据翔实资料的排比，叙述了毛泽东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放弃他的创造；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又没有界定过渡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到强化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发展脉络。

书中还剖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领袖，对中国发展道路、进程划分由一致到分歧到矛盾日深的历程。并检讨了整个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和准备不足。

书中还就针对中国这样的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理论探讨；今天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渊源和差异。

这些问题，都是必须加以阐释的，也是人们关心的。但是多数人往往习惯于认可某个权威的某种简单的结论，便不再思索。而于光远先生此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等待别人的结论，而是自己做认真地辨析。他能这样，我想是同他既是一个长期置身于实践的资深革命者，又是一个有着扎实理论修养的学者这种特殊身份，很有关系的。

当我再次和于先生交谈时，我向他简捷地讲了我的感受。

在我谈到书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渊源差异时，于先生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还是我和胡乔木在一次争执中，首先提出的呢。”

“这个典故我还真没听谁说过。”我说道。

“在理论务虚会上，有人提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形态。胡乔木认为这种观点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我说人家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只是说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和他争执起来。最后我说：最低限度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从这低级阶段演变来的，在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写进了第三十三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十三条是这样写的：“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初级阶段的说法还处在陪衬的地位，但概念是明确的。在起草讨论党的十二大报告时，于光远又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胡耀邦听了，马上表态说：“写上，写上。”

于是，十二大报告中，有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的正面论述。直到一九八六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得到初步的阐发，这个说法才立住脚。

胡乔木起草讲话稿，邓小平不太满意
于先生找出了一份邓小平亲自拟写的提纲的影印件
“胡耀邦和我坐在邓小平的对面，几位执笔的同志坐在边上。”

“如果理论家们不争吵，那不单单是理论讲坛的寂寞问题，很多理论是无由问世了，因此‘秀才’们争吵，实在是件大好事啊。”我心里想。

我们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终于又转回到“秀才”的话题上来了。

“我听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与您和胡乔木有关系？那可是一份涉及中共由此开始的重点工作转移的关键性文献，它被称为‘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体报告’。”

“大致可以这么说吧。中共工作会议时邓小平准备讲话，要胡乔木起草讲话稿，胡乔木也写出来了，但邓小平不满意，又亲自拟了一份讲话提纲，要重新准备讲话稿。”

我说：“据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上》一文载：邓小平不满意的原因是，中央工作会议开起来后，形势出现了较大变化，已经写好的讲话稿，就‘显得不适用了’。”

朱的文章还说：“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于光远先生说：“这种记述与事实不符。邓小平就重新写讲话稿的事，找了胡耀邦和我等人。他把提纲交给我们，要我们负责重新起草，随后谈了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十分具体。但是，邓小平当时讲的不是四个问题，而是七个问题，这个在当时他交给我的讲话提纲中，也写得清清楚楚。”

说着，于先生给我找出了一份邓小平亲自拟写的提纲的影印件，并告诉我原件也一直珍藏在他手中。

我看了这三页影印件，的确是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个定；七、新的问题。在七个问

题前，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语，总共约五百字。

当我问起怎么后来讲话时变成四点时，于先生回答说：“那是我们在写作时归纳的。我们感觉第四、五、六、七个问题，都可归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大题目中，邓小平认可了。”

胡耀邦、于光远在邓小平谈话后，立即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执笔。由于邓小平对讲话的内容交代的十分清楚详尽，所以初稿两天内就弄出来了。

于光远说是在邓小平家中定的稿。“胡耀邦和我坐在邓小平的对面，几位执笔的同志坐在边上。我们逐字逐句地一面念，一面定，又搞了两天。最后，邓小平说，就这样定了。题目也是邓小平自己想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他问我们好不好 我们觉得既鲜明又切题 都说好。”

对起草讲话稿的问题，于光远先生看得很淡，“没什么值得强调的，思路、观点都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把思考条理化，变成文字，找找理论依据，润色加工一番罢了，是遵命文章，不是自己的研究思考。”

周扬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但胡乔木的观点，于光远更不同意
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提法，是在周扬的报告中见诸文字的
周扬二十余年后重提人道主义和“异化”命题的隐约前因

在讲完起草邓小平讲话稿后，于光远先生继续着有关胡乔木

的话题，并引出了另外两个中共大“秀才”，周扬和陆定一。

他首先说起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于“异化”问题上，胡乔木与周扬的争论。他说他虽然觉得周扬的观点并非善尽美，但他不同意胡乔木的观点。我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毫无发言权，便希望于先生多谈谈他与周扬、陆定一等的交往旧事。

于光远说他和周扬初识不算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上就见面了，但真正成为同事，相互知道，是一九四四年到延安大学以后。于光远当年除了因毛泽东提名讲大课外，还担任教务科的副科长，是周扬的部下。

在那段时间里，他听过周扬讲课，感觉周口才很好，并对周的学识和水平很佩服，认为他“是个思想开阔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担任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又是他的下级。于光远在同周扬的交往中，感觉到周扬对科学工作是有兴趣的，但当时管得并不多。

“尽管如此，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还是周扬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最早提出来的。”接着，他追溯了一件事，发生的周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中。

一九六一年聂荣臻宣布《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作一九六一—一九七二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于光远遂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对他负责拟制的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执行状况，做一个检查，并考虑该领域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于光远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

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

周扬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

周扬在讲话前作了充分准备，在报告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于光远主管的科学处的人员，参与一些文字工作。于光远知道，周扬对讲稿做了一遍一遍的修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而且加上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述。例如“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泽东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

在准备这个报告时，周扬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正有着很浓的兴趣，便在讲稿中做了论述。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些文字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此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在二十余年后重提这一命题，想是与这一前因有关。

陆定一细说自己‘贻误国家大事’的罪名
秀才里面，最难写的是康生
为薄一波等人的平反助一臂之力

文革结束后，于光远和周扬在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同事，交往比以往才“频繁”了起来。他好几次到周扬在安儿胡同的住所倾谈，反思以往，议论新问题。

一次，于光远同周扬交谈，提起在医院看陆定一时，陆定一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对作为中宣部主要负责人的陆，能做如此反思，于光远感

到很钦佩。周扬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当时周扬在许多场合，反省自己，并向文艺工作者道歉。有人认为决定是中央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周扬还是做了反省，表示歉意，于光远更觉得周扬是“一个正直的人”。

因为牵扯出了陆定一，我提请于先生谈谈对陆定一的感知。

“我和陆定一第一次见面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在中宣部的历史，我比陆定一还长呢，他只呆了十八年，我呆了二十七年。”于先生接过头。

“也是那次在医院里见面时，陆定一还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我都写在一篇文章里了，你可以去看。”

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文中关于陆定一的放是这样写的：“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极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

这段文字，读来的确是颇耐人寻味的。

“秀才”的话题还在继续，我们又从陆定一，一下子跳跃到了康生，于光远说“秀才”里面，最难写的是康生。

“的确，康生这个人很复杂，评说起来难度很大。这些年我

接触了许多老人，谈起康生则月旦纷纭。有的人恨透了他，但也有人认为当今把一切罪名往康生身上堆，与事实不符。我记得黎澍先生曾告诉田家英的女儿，说她父亲对他说：康生和胡乔木是好人。但黎澍通过自己的观察，不同意田的判断，他对这两个人另有褒贬。

“你所说的黎澍讲的那句话准确吗 有根据吗？”

“是田家英的女儿亲口对我讲的，她说是黎澍对她讲的，应该是准确的吧。”

于光远停顿有顷，告诉我有人想请他写写中共的“秀才”们，他以往零星写过几篇回忆文章，最近他排列了一下“秀才”的名单，觉得康生应该算一个，但这个人比较复杂，所以对是否写他，有些游移。

“反正是就您所知 只述不作呗。我是希望能从他这里多知道些事情。”

“我和康生接触较多是在一九四七年后，我随他带队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去了好几个解放区。这个工作团里有不少老资格，除了康生外，还有抗战初期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有为数不多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张琴秋等。”

“两三年前，我与人合作写过一篇有关毛岸英的文章，所以我知道你们那个团还有几位年轻人，史敬棠、曾彦修，还有你们的‘学生’的毛岸英。有的文章说，毛岸英是毛泽东让他随团去锻炼的。但我听师哲前辈说是康生有意带他去的，康经常鼓动毛岸英给毛泽东写信，以便经常能从毛泽东的回信中滤出对他有用的信息。”

在我们的文章中，还记述了“土改工作团”在山东渤海解放区时，率直的毛岸英，对康生的一次不太客气的批评：

一次，山东当地干部向康生汇报，有个村子反动武装负隅顽抗，由于壁高垒厚，我方军队久攻不下，而且还有两个打入的侦察人员，被村里的反动分子杀了。康生听到此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我们部队的干部都在干什么 调一个炮兵团来给我把这个村子轰平了！”

毛岸英听说此事后 评议说：“康生这样讲是错误的 村里还有老百姓，怎么能用炮轰呢？”几位年轻的“老师”向毛岸英解释：康生说的是气话，并非真要轰这个村子。可毛岸英认真地说：“气话也不能这样讲，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讲这种没原则的话呢？”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在场，而且是解释者之一。但事后我们一思量，都觉得毛岸英说得对，而我们的解释却是不对的。”我又一次领略了于先生的自我批评。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后来成为平反康生在‘文革’中制造的一桩大冤案的证人。”

“是不是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等六十人叛徒集团案’？因为我也听说过，在山东时与此案相关的刘格平，当时正任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 他曾请土改工作团吃过饭。”

“正是。那是一九四八年旧历春节，吃饭后，大家在何家湾村边散步。康生向我们介绍刘格平的情况。他说：“刘格平这个人哪，不能同他谈民族问题，一谈民族问题，他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他还说刘格平这个人太古板，抗战前夕，包括刘在内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央考虑日军可能将对华北大举进攻，占领平津；而党又急需这批干部出来工作，就指示他们办理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但薄一波他们不肯，后以组织纪律相绳，他们才办理。唯独这个刘格平坚持不办，结果比

别人多坐了八年牢。康生讲此事，讽刺刘格平，说明他对薄一波等六十人，是根据中央指示出的狱很清楚，可‘文革’中却又一手制造了这一大冤案。”

“我听知情人说，刘格平本人的品质也不太好，‘文革’揪六十人叛徒集团时，明明是他不遵照中央指示办手续出狱，但他不作证，还指摘其他出狱的人变节。”

“后来平反冤案时，我将此事告诉了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很重视，立即要我找有关人员写一个证明材料，我随即和当时也在场听到康生那番话的曾彦修，一起赶了个材料，也算是为薄一波等人的平反助了一臂之力。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最初接触康生时，还是觉得他讲话很生动，很有风趣。”

有关于光远先生眼中的中共领袖和秀才的故事，他还能讲很多，特别是已有人约他就此做文章，他又是位极其勤于笔耕的学者，我想他可能会呈给人们更精彩的读本。

其实，于先生本人也是中共秀才，他本人就因经历丰富而别具风格，而为世人关注，只是我的这篇文章的题目限定了是他讲别人，请稍与时日，我想我会再接再厉，奉献给读者一篇于光远印象。

林 克

潇洒莫如毛泽东

林克：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进入新华通讯社工作。自一九五四年起，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秘书，最初侧重国际问题，后兼顾国内问题，同时教授毛泽东英语。在一九六六年离开毛泽东前，他先是住静谷，不久就搬进丰泽园，几乎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十二年。

林克
简历

林克，从一九五四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后兼顾国内问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二年之久。

初入中南海，住在有些空荡的静谷
田家英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坐冷板凳”
在沙皇的寝宫教毛泽东读英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结构重新整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这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面临兵燹后国内百废待兴的艰巨使命。但他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居于有利地位，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

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一九五四年十月，林克住进了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住在一起的还有逢先知。“庭院古老，一个人住在里面空荡荡的。”林克在回溯初入中南海的感觉时说道。当时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人田家英，就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四合院内。走出小院，毛泽东居所丰泽园的尖尖屋脊，尽在视野之内。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搬进丰泽园，与毛泽东的寓所相邻，院内是个小花园，毛泽东经常在这里散散步。

多少年来，毛泽东在林克的心目中，是中国人民谋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的象征。他最初是通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手抄本，在地下斗争的磨炼中，来认识并追随

这位理论导师的；后来又习惯于在记者工作中，通过人民解放军进京的入城式、开国大典，从如歌如潮的欢呼，从冉冉升起的国旗，从阅兵式庄严的敬礼，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平民乃至商贩扬眉吐气的笑靥上，来感受新中国缔造者的风采的。而如今，往昔远远眺望、目追神随的距离蓦然消逝，自己一下走进陌生的、只在理念中熟悉的领袖的生活，不觉心潮起伏。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林克。“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林克由此而知毛泽东对秘书要求较高，不免对自己能否胜任生出一丝疑虑，但党交给的工作就要尽全力做好，是林克的信条。

担任秘书工作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在此之前，林克做为记者曾在一次采访时到过香山双清别墅，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林克心中的忐忑。刚刚在池中舒展罢的毛泽东，情绪颇佳，微笑着让林克坐到身边的藤椅上，工作人员已为他们斟好了茶。

“什么地方人哟 好大年纪？”毛泽东乡音难改。

“籍贯江苏。二十九岁。”未脱拘谨的林克 出语捷简而规范。

“口音不大像么。”

“是的，我小时候在保定读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往北京，后来上了燕京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

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林克提到保定，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谈兴。

“保定很有名喽。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

触及到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可毛泽东却能信手拈出与话题相关的一段。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林克发现，毛泽东每每论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样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雄浑气魄。

“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么？”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林克回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无忌地大笑起来。

林克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语一项。他从有关人员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入手尚无头绪。于是他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

从那天起，林克开始了给毛泽东当英语先生的生涯。可今天林克回顾这段往事，却深怀感慨：哪里是我这个当英语“先生”的生涯开始了，而是我接受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人格、学识等各方面熏陶的“学生”生涯开始了。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兴致高时，最长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

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不间断。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在公开发表时被称作是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后来听说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而实际上并非毛泽东的工作照，而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习英语的照片。

“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林克讲道：“那是一九五七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候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我的日记上有记载。”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会谈，并参与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泽东还做了多次讲话，并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都非常紧张繁忙。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学习却始终未尝中辍，“每每在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的寝室——原俄国沙皇的寝宫去领读。”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林克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 请你找两本来 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

林克还谈及毛泽东学英语的一些往事，听之觉得有趣，思之可感其独特的性格。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我的领读，反复习练。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和毛泽东一起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戴高乐出将入相，毛泽东力排众议“三个世界”观点的雏形

然而一脱离开英语学习，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仿佛颠了个个。毛泽东要求他的秘书创造性地工作，从不硬性规定一、二、三，指示如何去做，不画任何框框。林克回忆说：他让我看材料选材料，不仅要求我能够分析，能够综合，能够一般地反映情况。他在谈话中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商量问题，讨论问题，因此要求我能把看过的材料，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从战略上看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

要适应主席的这些要求，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于是，我又收到主席如下短笺：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

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毛泽东八月四日。”

《做什么》今译《怎么办》，是列宁写于一九〇七年的一部著作。文中特别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吗？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毛泽东十月二日。”

正是在毛泽东的敦促诱导影响下，林克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为我后来从事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参与《二千年的中国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克印象极深的，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读书活动。五十年代后期，何以出现大跃进等灾难性的挫折，显然与毛泽东对形势分析过于乐观，急于过渡的主观倾向直接相关。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和基层领导的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识匮乏，以浮夸和作假迷乱了毛泽东的视听，亦是他在大政方针的决断上出现偏颇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所以尽管庐山会议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悲剧结束（也许这一结局非其初衷），但从那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形式逻辑、学习马列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九五九年仲秋，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

《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半年内读完。十二月九日下午五点,毛泽东便带头实施由他制定的读书计划。读书活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应邀参加的有邓力群、田家英、胡绳和陈伯达。

“读书活动的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总共学习了近三十次,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在广州结束。主要是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次读十余页,并联系我国经济建设实际,边读边讨论。”

“每逢这类小规模座谈,毛主席总是特别幽默健谈,纵横捭阖,甚至屡从文学作品中拎出生动的事例和语言,寓庄于谐。在谈到我国土地所有权转换及农民的恋土心理时,主席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隔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在谈及家长制的中衰时,主席又一次举了《红楼梦》的例子。‘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由于林克最初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洞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味不到的感受。

“许多人谈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一九五三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出将入相,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

的总统。在此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而且给人印象颇为强烈。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记得一家有影响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

“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人言弥蜚的左右，他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由此可以使人看到，在国际斗争中，把浑沌一团的世界，分为若干层次，构成一股中间势力，使之游离大国霸权的控制，于弱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毛泽东七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新鲜理论，有一个过程，应该说从五十年代末就已经萌芽。

虽说每临“雪压冬云”“高天滚滚”等难以把握的局势，每临令人恐惧的险恶境地，与毛泽东生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那胆识过人，特立独行的浩然之气，并为之震撼。但我们在聆听了作为毛泽东秘书、并跟随他十二年的林克的回忆，就会感到那正是毛泽东内在的伟人性格，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反映。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早晨，毛主席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

的，快煮饭吧！可他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

“讲罢这则典故，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靠自己艰苦创业。”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毛泽东
背诵得一字不差

“佛学革命”与毛泽东

毛泽东比较喜欢读列宁的著作

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

“毛主席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因我对佛没有什么研究，主席对我讲解的就特别详细。”

“主席最先说到的，是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年）三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以卖柴养母。皈依佛门后，一直没有显山露水。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个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而时为舂米下等僧的慧能，反神秀义做一法偈，却深得弘忍赏识。

“这时主席一字不差地背出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席讲解说：后一首是慧能所

做，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静
的，也不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
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到慧能舂米的小屋，用禅
杖在舂碓上敲了三下，慧能心领神会，于半夜三更到弘忍丈房，
弘忍将传世袈裟交给慧能，他遂成六世禅宗。

“在这以后，主席又讲了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
地位。他告诉我，慧能受袈裟后南下，在岭南曹溪落脚。他主
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
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
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
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后世将他
的创树称为‘佛学革命’。”

林克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
心。直到他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加以梳扒整理，翻
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
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
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
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
征，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同时毛泽东言谈幽
默含蓄，寓意颇深，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熟悉禅宗有关。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主席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
宣言》，其中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
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
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主席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
这个道理。’

“毛主席反对将马列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主席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断；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一九五八年夏毛主席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不因人热，敢向权威挑战，不让僵死的教条捆住自己的手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自己的实践中，创立适应本国国情的新鲜理论，正是毛泽东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所必不可缺的伟人性格和独特魅力。

毛泽东评点旧时英雄 潇洒莫如毛泽东

想象力和超越常人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胜任愉快的潇洒。当林克从他记忆的长河中，拣出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我们顿时感到，他所叙说的人物，正与我们想象中那渊博睿智、胜任愉快的政治家形象重叠。

在林克的寓所，我们有幸看到大量毛泽东手迹的复制件，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抄在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报刊边角空白处。显然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然有感，随即下笔的产物。

在一部书的边角处，毛泽东用雄浑苍劲的字写道：

“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雅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这是元朝人萨都刺的《木兰花慢·徐州怀古》，我问林克是否还记得毛泽东书写时的情景。林克说：当时主席兴致盎然，说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故记忆犹新。

“那是一九五七年春季，毛主席四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主席每到一地，都要会见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并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主席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

“三月十九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主席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读没读过萨都刺的徐州怀古，我回答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整篇词。并告诉我萨都刺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八百岁的彭祖的家乡。’

“接着主席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雅，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玉帐连空’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主席思如泉涌，又在我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随后，主席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阙。‘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愔所建。张愔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入长’。

“讲解完毕，主席对我说：萨都刺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林克又从手迹中拣出一份，是毛泽东书写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宋人辛弃疾的这首词，是豪放激越的隽永之作：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是在三月二十日的下午，我随毛主席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主席触景生情写下的。写完后，主席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言语。主席讲起《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一节，当曹操述说了自己的英雄观后，刘备问谁是当今英雄，曹操说唯使君与操耳。接着，主席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毛泽东给林克写诗讲词的那段日子，正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波及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中央又决定开展整风的多事之秋。几日之间，毛泽东往返于华东数城，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务繁忙。

然而就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下，毛泽东却精鹜八极，跨越时空，数典品词，谈笑自若，由景而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词章中，随心所欲地抽出精彩的一段，即兴发挥。他一再借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致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能成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词谈典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

扣住时代脉搏，驾驭政治风云，却不误赏景、论词、温史，并从中获取借鉴，得到启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怀，人间潇洒，其谁能比毛泽东？

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事
江青拿走了《书道集成》借书生事

毛泽东与钱三强辩论 毛泽东粒子

“许多来采访我的人，大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毛泽东身边约一旬（十二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兴趣而言，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想恰恰是由于时间长，从接近‘而立’到‘不惑’之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一个恢弘的世界，一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他的小我深深地融铸进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所以很难用几句话说明。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毛泽东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

“至于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或说兴趣最大的是什么，我一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因为他兴趣太广泛了，很难说对某一项情有独钟，所以过去对人讲，只能讲主席比较喜欢什么，对某某兴趣比较高。最近，由于准备写一部比较详细的回忆，重新翻阅了大量的日记、笔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我感到可以这样说了，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经开放过一段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甚至满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从无止境；而领导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这一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连广宇，鹜精八极。他要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经验，他要集世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用，如若读书不成其极大之乐趣，反倒不可想象。

“我手头留存的主席给我的信件短函，大多与找书、查书、

读书有关。主席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感到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要某几本书，就会立即通知田家英或大逢（即逢先知）同志到他书房寻找，送交给他。这找书拿书中间，还有些轶事。

“一次，主席放在卧室的《书道集成》找不到了，当时主席正看在兴头上，颇觉悻悻。问我是否见到时，面露几分不悦。我也对主席卧室内的书不翼而飞感到奇怪，十分不安。后来我在江青那儿看到了此书，便请江青处的服务员转告她，主席正在找《书道集成》她送了回去此事方了。

“正由于主席爱书，江青后来几次借书生事，使我在对待主席的书一事上，格外谨慎。我还悄悄告诉大逢同志，进主席寓所找书和整理图书，尽可能与主席寓所的工作人员相伴，以免有些事情说不清。

“从我前面讲述以及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中，人们可以感到主席意溢于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是他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的结果。但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尽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林克：“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鼓励，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林克，却被这个与他本人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

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余种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

出孩子般的得意。

“对这类书主席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反复咀嚼琢磨，因此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感知的超人悟性。”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主席浏览自然科学的精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一九六三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主席一九五五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制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于光远问主席：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纯看作是认识的工具？毛主席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镞

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李四光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做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主席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后来，毛泽东又一次召集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基本粒子的问题。他说近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正所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

当时北京正在举行一个科学讨论会，《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作者坂田昌一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者时，告诉坂田昌一曾拜读过他的大作，使他十分惊异和喜悦。于光远还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有关基本粒子的见解，讲给坂田昌一听，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回日本后，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毛泽东的见解。

基本粒子可分思想，本是毛泽东从物理学家那里接受的，可反过来又用它影响着物理学家们，使他们站在了这方面研究的前沿。

一九七七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泽东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具体意见，它表达了一

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映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林克深有感触地说：“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我至今言犹在耳。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毛泽东的胸襟，是无比广阔的宇宙。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
“世界是你们的”
甘罗才是个红领巾、童子军
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

林克初到毛泽东身边时，年仅二十八岁，在毛泽东身边被称作秘书的圈子中，差不多是最年轻的了。因此他对毛泽东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关心爱护青年人，注意培养青年人，希望青年人努力成材，印象很深。

在住进与菊香书屋相邻的院子后，林克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在例行的汇报每日国际国内情况动向，或学习英文之余，毛泽东有时会随兴致所至，说些工作以外的话题，甚至拉拉家常。

有一次，林克在毛泽东的询问下，讲了自己童年、少年、青

年及后来加入中共地下党参加革命的经历，毛泽东听后说：“哦，看来你也是被‘逼上梁山’啊！”这时，毛泽东也会对林克讲讲自己的身世，自己是如何追寻救国救民之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讲述那个时代国家贫弱、政治腐败、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情形。

林克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一次在叙说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如果哭，则一巴掌打过来。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他们（指青年人）设想。他由衷地希望后来的青年人“应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后来居上。”

还是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接连到华北、华东数个城市做报告那次，毛泽东给林克抄录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后，又详细地讲解了其中的几个典故。他将三国故事中的英雄观背诵了一遍后，对曹操、刘备、孙权等变乱时期的英杰，魏、蜀、吴创始肇基的人物评说了一番，继而说道：这些人在初创基业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孙权初登王位时，也不过二十多岁。

那一年深秋，毛泽东应邀赴苏，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首脑会议。当时中苏在某些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分歧，但为了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是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说服他们承认和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现实，活动紧张而繁忙。尽管如此，他仍抽出时间，在十一月十七日前往列宁山，接见了在莫斯科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在留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他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看到你们年轻人很高兴，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但毛泽东绝不是个机械的进化论者，他也并不认为只要有年轻的优势，世界就自然地属于年轻人了；而是明确地告诫青年人，只有奋发振作，有所作为，世界才属于青年。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古往今来有作为青年的例子，以激励新中国的一代年轻人。

“我多次听毛主席对我说过：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人。青年人最初是学问少一点，但青年人打倒老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毛泽东曾掰着指头跟我数说道：中国战国时候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十二岁当丞相，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在关键时刻没了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并自己出马到赵国去纵横捭阖，结果出使成功，当上了丞相。汉朝有个贾谊，十七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鹏鸟赋》还写了两本书《治安篇》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当时的秦汉史专家，接着，毛泽东又说到了项羽。说项羽二十出头起兵，五年即为诸侯，二十四岁时自立为西楚霸王，死时才三十二岁。霸王别姬应当还是青年时候，现在唱戏扮相不对，给霸王挂胡须，我看不对，应该扮小生。”

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了很长的篇幅，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讲古今中外有为青年胜过前辈人的事例，他点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说道：“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列宁在一九〇三年三十一岁时，就创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同年九月九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起青年人后来居上的话题；青年人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

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但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也是在那一年，毛泽东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会面。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著，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六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得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流露了他对求新进取，保持青春的渴望，和对老年迟暮心态的批评。

为了使他开创和投身的事业后继有人，使新一代青年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几次表示过要写一些文章，特别是要为青年人写些文章。但由于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的曲折复杂，由于毛泽东某些设计与现实的冲突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终于没能将他的这些意念付诸实现。

“我们同毛泽东相处的时间，甚至多于他的家人”

毛泽东作为严师的一面

在一般人看来，走近伟人，总免不了被一种敬畏感笼罩，总有些局促不安。当我问及林克与毛泽东相随十二载的感觉时，他回答说：大多数时候相处得是比较融洽的。

“我们与毛泽东相处的时候，甚至多于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我在毛泽东身边的那段时期，他每年有多半时间在外地巡视、开会、办公，他的家人并不能与之相随，朝夕相处的是我们这些工

作人员。在工作和人格修养方面，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并非因此总板着脸孔，相反他乐于同我们谈心、交流思想。他谈起话来，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既幽默风趣，又充满智慧，引人入胜，并富于人情味，他的喜、怒、哀、乐，常常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我当时感觉：“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最多时也不过三人，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政治秘书。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登记、保管，会议的通知，外宾、来客的接待等等。政治秘书主要负责筛选文件，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林克属于后一种。

“因为工作，我每天都需要阅读大量文件和报刊，平时注意情况和动向较多，从宏观上综合、从理论深度分析问题，有些欠缺。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要站在战略和理论高度，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如果我能从宏观综合理论归纳上做出分析，提出看法，就更便于协助他的工作，所以他常常督促我学习理论，提高能力。”

“毛泽东经常就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国内外形势和世界主要矛盾、各国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等，提出问题，同我讨论。我当时的理论素养不够，发表意见时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毛泽东就会阐明他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言人所未能言，富有创见，使我受益匪浅。同时，他还会建议我去读哪些书。”

“我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教毛泽东英文。我和他一起读过英文本的《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书籍，在学英文之余，他有时会阐释书中的某些观点，有时则畅谈他的体会。他那引人入胜的言谈，激发了我对理论的兴趣，

培养了我学习理论，研究思考问题的习惯，这让我受益终生。”

作为严师，毛泽东严厉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他对缺点和错误从不姑息，总是直截了当地加以批评。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我们到上海。一个卫士擅离职守，毛泽东恰有急事，寻人不见，不禁变色，当着上海市和其他省市领导的面，严厉批评刚刚返回的卫士 因私误公。”

还有一次，一个卫士在定级调工资时，要求提升两级，愿望没有满足，就闹情绪，甚至哭鼻子，毛泽东得知后，批评他说：不能因为在我身边工作，就提非分要求。还说他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提级时。”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发现身边某些人员有贪污行为，并利用特殊身分，向地方索要各种物品。他非常生气，立即指示处理此事，把一些人调离中南海。其中有的人跟他许多年了，做了不少工作，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宽容他们。事后为了挽回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又用自己的稿费一路退赔。“此事当时对我们教育极深。”

毛泽东在自己六十七岁寿宴上侃侃而谈
“你们六人都下去……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
毛泽东要大家读无字

毛泽东爱读书，并诱导身边的人读书，已经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鼓励人们读有字之书的同时，他还很注重要人们去“读无字之书，从实际中学习”。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林克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

中午，毛泽东将在自己身边的九位工作人员，请到家中聚餐，同时聚餐的还有他的五位家人亲戚。第二天，是毛泽东六十七岁寿辰，就餐时，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毛泽东兴致盎然，侃侃而谈。

当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刚刚经过小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毛泽东的话题从小整风引出，讲到接受批评与检讨自身对人生的意义。他讲了战国时苏秦对张仪的批评，张仪的自我反思；然后讲了自身的经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批判和压制，反而系统地学习了经典理论，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得出“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人就是要锻炼”的结论。

于是毛泽东提出让林克等人下放锻炼的想法：“林克、高智（毛泽东办公室机要秘书）、小封、封耀松、毛泽东的卫士、筹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你们看怎么样？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他还说：“现在下去苦得很啊，一天只有很少几两粮食吃。你们受得了吗？不怕就去。下去以后，一个礼拜来个汇报，直接写给我。三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工作。”

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使林克他们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要林克等下放锻炼，参加当时地方正在开展的整风整社，并调查和汇报地方的情况，就是要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去读社会实践这部无字之书。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又给林克他们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因汪东兴刚从江西省回中央办公厅，他奉毛泽东的指示在江西省工作了两年多。笔者注），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

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准备……”在署名和日期的下面，毛泽东又写道：“明天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临行前，毛泽东再一次嘱咐林克他们，下去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正正确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调查研究。

“我那次一下去就是七个月，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下到基层后，就实行‘三同’，一个月的口粮不足十三斤，颠顿喝稀粥。喝时满头大汗，撑个‘水饱’，但刚走出几里地，就饿得两腿软绵绵的了。后来，我胸口以下都浮肿了。”

一九六四年冬季，林克到河北新城“四清”，临走时，毛泽东像前一次一样，又对林克提出三条要求：一、化个假名；二、不要当官；三、深入群众。几个月后，毛泽东再次给林克指示说：一、“四清”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大多数；二、要依靠干部，团结干部大多数；三、要自始至终抓生产。

经过这几次下放锻炼，林克感到收获很大。他学会了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何做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这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在下放的过程中，面对许多实际问题，又敦促他加强理论学习，并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此时此刻，林克才对毛泽东在那顿聚餐上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说：他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挨整受压制，“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

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 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我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这些话，都是在讲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意义。只有结合实践，读无字之书，才能深刻领会理论、有字之书，使理论和有字之书发挥作用，也才能根据客观情况、环境、时间的变异，去修订、去补充理论、有字之书。不参与实践，不去读无字之书，理论和有字之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关于毛泽东的故事，林克还有许许多多，他已经开始了对那段难忘的岁月回顾梳理形成文字的工作，并邀我做他的助手。虽然目前语涉毛泽东的读物大有更仆难数之势，但林克的回忆，定会我们对这一代伟人，产生许多新的认识。

张 铸

周恩来指导我们建人民大会堂

张铸：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进入国内最有名望的基泰设计事务所。抗战期间曾领导故宫建筑群的测绘工程。一九五二年放弃在香港的优裕生活回大陆，成为北京建筑设计院初创时的八大总工之一。在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筑中，由他任设计总工程师的有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北京的著名建筑，如友谊宾馆、北京饭店东楼、新北京图书馆、贵宾楼等的设计，他均有参与和指导之功。

张
铸
简
历

在欧洲，建筑被视为艺术，并为圣哲、文豪们关注，乃至有关建筑记述中流传悠久影响遐迩的隽语，多出他们口笔。如建筑是“一门最早的艺术”；是人类思想的纪念碑”出自黑格尔 歌德、谢林曾讲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建筑是石头的历史”如是说者更有雨果、果戈理等。

此外，歌德对斯特拉斯堡哥特教堂的勾勒，欧文对西班牙阿尔布拉宫描绘，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叙述，点石成金的重彩，让建筑审美陶醉了社会。

然而，在不乏令世人赞叹的建筑杰作的中国，建筑构造，却难引起圣贤及以文字擅长的骚人墨客们的垂青。临阿房宫，思忖的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登岳阳楼，慨叹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境界不能说不高远，但曲尽其妙的构想、镂月裁云的营造却被忽略了。以致长久以来，在建筑圈外，众生难得一阅弘扬激励中国建筑艺术的文字；除了一个匠人鲁班的传说外，有谁说得出一位令世人闻名即生景仰的建筑设计大师，悲夫！

因此，当友人让我考虑写写张铸，这位北京新、老十大建筑中三座出自其主持设计的大师时，我便无法抗拒这一建议的诱惑。虽然，有关建筑艺术，此时的我仅于《世界艺术鉴赏译丛》中管窥一斑。

末代簪缨之族的后裔

高中毕业后，他投考了张学良任校长的
东北大学

进入中国最大最著名的设计事务所

张镛出生在簪纓之族，其父张鸣岐是清末两广总督、正一品封疆大吏。然而他生不逢时，正赶上中国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在他呱呱坠地的四月十二日前数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刚刺杀了清政府广州将军孚琦，这导致了张镛父亲肩上平添一个将军头衔，而神魂却更加黯然。

时隔不出半月，旨在推翻清帝、建立共和的同盟会在广州举义，黄兴率百余选锋队员攻占了总督衙门，张鸣岐若不是逃得快，想必难脱孚琦第二的下场。

就在张镛将除襁褓的半岁之际，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崩塌了。也许应该反过来说，他生正逢时，他因此而经历了华夏变革最繁复急遽的幕幕场景，也促他成就了多数显宦纨绔所难拓展的事业。

关于父亲的影响，张镛似乎没有太多的记忆。因为张镛是庶出，他说他从小就被浓郁的自卑感笼罩，和父亲不是很亲近。而张鸣岐其人在为宦从政方面，也几乎无可称道，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口，他都做了错误的选择。

或许正是这番经历，张鸣岐郁积的懊恼和苦涩也多些，以致由衷慨叹：“官海沉浮，为官不义，不易！改朝换代，必受牵连……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而留驻张镛心头最深的，恰恰是父亲这失败人生的感叹，因此当他步入青年做人生选择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学一门不依附于人的薄技。

并非所有终成大器者，在幼年期间的行止，即堪为他人效仿的楷模。“我少年时真不是个好孩子，十一岁就学抽烟。那是在台球房打台球，别人抽，我也模仿。”张镛先生的率直，始一接触

就给人极深的印象。

因家庭常往来于津、沪之间，张锬学无定校，时而南开中学，时而汇文中学，时而天津新学书院，时而复旦高中，学校皆是一流的，然而他的“学业平平，成绩不佳”，几何、代数仅及格而已，亦无兴趣。也就是自幼喜爱的绘画、音乐，对最终成为建筑大师的张锬来说，还能算是点必要的铺垫。

张锬萌生选学建筑专业的念头，还是一九二七年在美国获哈佛大学市政管理学士学位的大哥张锐归国后的事。作为张家长子的张锐，比张锬年长很多，也是张家第一个受现代教育，拿到洋学位的人，他的言谈自然是颇具权威的。

他告诉张锬，建筑学是集艺术和技术的双重学问；在西方，建筑师和医师、律师一样，是自食其力，不依附于人自由职业；他还介绍了与张家有旧谊的梁思成的成就。父亲的感叹，兄长的叙说，使张锬暗暗生出了当建筑师的意念，并开始为之努力。

一九三〇年，张锬高中毕业，投考了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

张锬之所以这样择校，是因为他心仪已久的名师梁思成，当时正在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而梁与张锬长兄张锐曾是清华校友，还在哈佛一起学习过，且两家有旧谊。此外校长张学良妹丈之弟，与张锬兄弟自幼交好，有这诸多的关系，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关照。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如国民党当局，有时会给张鸣岐这位镇压过民国先驱黄花冈起义的清末封疆找些麻烦，因此张锬想离国民党控制中心远一点。

当时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执教鞭的，有梁思成、董嵩、陈植等教授，均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他们渊深的学识，一丝不苟的严谨执教，使张锬在初迈建筑学门槛之际，就打

下坚实的基础。

在近七十年后，张镈回忆说：“就建筑艺术而言，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梁师思成，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修养方面。”自东北大学与梁思成建立师生之谊后，张镈在建筑生涯中屡屡得到梁思成的耳提面示。

如若仅仅精于计算和结构，而欠缺艺术审美鉴赏力，不具绘画灵性，那你就只能与建筑设计大师的境界隔岸兴叹。然而，恰在这后一方面，张镈有幸得到了审美情趣超凡脱俗的梁思成夫人林徽茵的悉心启蒙，她是张镈这班学生的美术教师。

名师点化，静心攻读的光景，令张镈陶醉。可不过春秋一度，即逢“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日子，东北疆土一夜尽失，给张镈走向建筑师的路途上，添置了一道坎坷。

原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被迫转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土木系继续学业。张镈读了几天，感觉与原本所学大异其趣，遂无心学习。直到一九三二年，他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才续上了建筑学的课程。

毕业前夕，张镈曾到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名望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基泰建筑事务所的天津事务所参观。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对其建筑生涯影响最大的另外一人——杨廷宝，“杨师对我的影响，主要是设计实践方面的，正与梁师相辅相成。”

在杨廷宝的工作室，他看见杨廷宝面对图板做细图，时有人来请示问询，其眼不离图板，对答如流，可见对工程业务了如指掌。这当即给张镈留下极深的印象，暗中已将杨廷宝视为建筑师的楷模。

一九三四年，完成了大学建筑系学业的张镈，经考试进入了建筑系学生渴望的基泰设计事务所的天津事务所，并被安排与杨

廷宝在同一间工作室里。天津事务所的老板关颂坚，是基泰大老板关颂声的弟弟。

因同处一室工作，张镛对杨廷宝的了解日深。他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思成还早三四届，故而曾辅导过梁思成。他在求学期间，曾在美国的全国性设计竞赛中五次获得金质大奖，这更令张镛钦佩不已。

随着接触的天长日久，张镛断续了解到杨廷宝五次获奖的情形，杨亦将其中诀窍和盘托出：

“参加评奖有法定的交图时间，超越时间则设计再优秀亦不能获奖。美国学生上设计课，普遍有前松后紧的习惯。他们多数人是临渴掘井，而不是将最后阶段的繁重工作均匀分布。直到交图期限临近，裱纸上板，墨线绘图，作水墨或水彩渲染，费时费力的工作集中到一起，往往加班加点彻夜赶制，结果疲惫不堪。一旦交图后，他们便去休整、外游、狂欢，新题发下来时，仍不到班工作。

“而我每次一发新题，即时上板，按部就班，进度有序，不会有过度的疲劳，也不过分松懈。因此每发新题时，只有我一人 在班上作业。于是无学生可指点的各组老师，均会到我这里看我作图，给予评判指点，无形中学到了各位老师之长，既得兼容并蓄，又及时修正缺陷，设计就更周密成熟。评图时对立面少，设计几乎无懈可击，故而屡次拔得头筹。”

杨廷宝说得轻描淡写，而张镛却感觉能从中悟出些许治学及为人的态度和道理。

令人尊敬的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约张镛
去叙谈

承接一项于国、于己都十分有益的工程

在基泰工作不满半年，张镛即因工作出色而富于进取精神，深得老板的赏识，薪水接连提升了三级，从六十元到了一百元。张镛因此“不免飘飘然，以为有了看家本领，不愁没饭吃了。”

此时张镛虽说家道中落，但仍住着大洋房，家中时有高朋往来，有私人轿车。家里允许他以车代步，又有了百元的薪水，生活逐渐由俭入奢，频与至亲好友流连舞榭歌台，甚至一度颓废酗酒。

他之所以为放浪生活情绪笼罩，主要原因在于他已订婚多年，且对出身大家的未婚妻很满意，可因自家败落，摆不出奢华迎娶的贵族谱，故而迟迟不能成婚，从订婚始，一拖七载。后来，还是由时任天津市长的抗日名将张自忠为他们证婚合卺。

再一个原因是张鸣岐元配夫人去世，张镛生母被扶为正室，可婆媳关系反不如前，越闹越僵，后竟然被逐出家门，从此结怨不解，使夹在中间的张镛十分为难。这种颓唐的情绪不仅影响着他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他的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杨廷宝受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之聘，主持天坛祈年殿及故宫东南角楼的修缮、加固和重建工程。后来，老板关颂坚又派张镛去北平。他让张给杨廷宝带去一封英文信，内容是要杨对张严加鞭策，说张已远不如刚进基泰时情景，无进取心、闯劲、干劲和魄力。

杨廷宝出于对张镛成长的关切和爱护，把信中的内容告诉了张镛。张镛后来回忆此事说：“猛然听到如此直截了当的批评，仿佛迎头棒喝，不寒而栗，这才及时从纸醉金迷的沉湎中猛醒过来，更专注于建筑事业。”

一九四一年初，关颂声、关颂坚兄弟散伙、分手。基泰大老

板关颂声决定，由张镛出任平津事务所主任设计师。此时，张镛已应聘在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执教，讲授建筑理论；中、西建筑史和中国建筑构造；建筑设计主课的图案指导三门课程。也是这时，董伯川、马增新两位建筑设计师，约张镛去北平商谈合立门户事宜。

在北平之际，马增新告张镛，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铃想约他前去叙谈。张镛的几位恩师，如杨廷宝、梁思成，均是营造学社的成员，他自己对中国现代建筑学会的创始人朱启铃，也仰慕已久，闻言即随马往拜。

寒暄之后，朱启铃深怀忧虑地对张镛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五百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接着，朱启铃向张镛讲述了他对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的珍惜情愫，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瑰宝。“于今当务之急时是对之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否则，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日寇蹂躏或反攻时的兵燹之灾。”

自从置身建筑领域后，张镛就对中国的传统古建筑艺术和规划布局，渐渐生出了酷爱之情。因此朱启铃的话，句句都打动着。但现场实测，既需人力，又要经费，且故宫内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的，总得有个名目，有相关部门的许可。

听了张镛的耽忧，朱启铃说：“对此我已有考虑。营造学社社员林是镇，现任伪政权的都市局长，伪建设总署的署长殷同，和我也相识。我可以向他们推荐，而你能否以基泰的名义，与之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上古建筑的合同？”

张镛认为这是一件于国、于己都有益的工程，便慨然接受推荐，并与林、殷联系定约。恰于此时，关颂声约张到上海，张就

承揽故宫中轴线及其周围古建筑测绘事，向关做了说明，关对此表示理解支持，同时明确由张全权负责基泰平、津两地业务。

因测绘一事系与伪政权约定，为不使身在重庆的关难堪，他嘱咐张锜暗用基泰，明用“建筑师张叔农”与对方签约。同时从一九四一年初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张成为华北基泰主持人，全面负责事务所行政技术工作。

在张锜的带领下，以一九四一年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毕业生和土木系毕业生为主的中轴线古建实测开始了。这项工程包括左祖（庙）、右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重点在紫禁城内建筑。

当时的平、津还在日寇的统治下，因此这批刚毕业的青年人，既不愿作伪官，也无心经商，情愿跟随张搞勘测。他们不畏寒暑，不避艰辛，在里、外脚手架上，量取每个构件的实测资料；在栏杆、平台的台阶作每步实测；对御道雕刻，写生留存真迹，并附以照片。还将平、立、剖面，按不小于一比五十的比例，用墨线或彩色渲染在六十英寸乘四十二英寸的厚橡皮纸上。

这次工程，因工作认真，参与者功底深厚，测量翔实，绘制精细，为古都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可谓劳苦功高。全部工程分三期，历时约三年半完成，得图三百六十余张，内外照片多帧及手稿，其中尤以渲染图最为宝贵。这批珍贵资料于一九九〇年，由张锜交给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放弃了每月十两黄金的薪水，六百黄金
的股份，回归大陆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张锜一起来到
景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解放在即，张铸应大老板关颂声的招呼，匆匆前往上海。当时有人建议张铸留下，虽说张铸对国民党腐朽统治，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弊端已露不满，但想到自己封建大吏的出身，想到曾被人指斥为剥削者，加之国民党报刊上对中共的诬蔑性描述，使张铸对中共怀有恐惧心理，未敢做逗留的选择。

不久，上海时局也显不稳，张铸又随事务所转赴广州。在广州，他目睹了兴建中央银行二十万平米宿舍小区招标过程，再次领略了国民党官僚贪贿的行径。据张铸估算，中央银行宿舍小区，造价也就六七百万港币，最多不过一千万港币，可投标商却以三千万中标，业内人一看便知其间有肮脏交易。

此后，美驻广州沙面总领事馆亦招标建造，张铸对领事馆造价估算不出三十五万美元，结果建筑商又以七十万美元得标，张铸由事得知美国官员也受贿。这类事情看得多了，连他初进建筑领域时无比敬重的尊师，也难濯污染，偶像失色了，张铸不由生出“我深爱建筑专业，但讨厌这个职业”感叹。

一九四九年六月，对中国共产党依然没有什么了解的张铸，到香港定居。他的生活待遇相当优厚，月薪十两黄金，住在豪华的寓所。然而，他的心境，却不那么舒畅。香港是英国的租借地，在这里上流人物聚汇的场所，都操着英语；基泰的业务，还是满红火的，张铸也颇忙碌，可他总有一种难以尽情施展的抑郁和空虚。

一向不太关注外界，不太与闻时势的张铸，开始观望起建筑以外的事务：

他看到新中国政府派出志愿军，援朝抗美，不禁暗想：美国是二战后无可匹敌的霸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最终的情形

是，美军不仅没能如愿打到鸭绿江边过圣诞，却在一连串败绩后，向朝、中方面发出停火祈请。

他还看到，新中国的代表伍修全出席联合国大会，用中文发言，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的霸权行径。而以往国民党的代表在联合国，都是用英语发言，而且对美国唯唯诺诺。

这些见闻，使张铸的心再难平静，他感到是在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才真正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了不被歧视的、平等的一席之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是建筑设计师施展才华的辽阔广宇，而中华民族灿烂的建筑艺术传统，也只有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得以弘扬光大。

张铸萌动了回归的心思，他先给留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了解国内的情况。朋友的回信说：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新世界，并愿意去港接他，撩拨得张铸更是归心似箭。

他向老板提出了辞呈，关颂声对他一再挽留，并说他积蓄在事务所的六百两黄金，已在美国换成了 DATT 股票，拿不出来。张铸说：“那时我一门心思回来，而且怕生变故，所以优厚的待遇，私人的积蓄，都顾不得了，当夜就踏上了回归路。如今追溯起来，我做到了祖国至上、专业至上，可说是今生无憾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张铸回到北京，受到了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的接见，随即被安排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身永茂建筑公司担任总工程师。

当时由刘仁主持，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兼任第一副主任，梁思成任副主任的首都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正在搞城市建设规划设计，他们对刚刚从香港归来的张铸很重视，经常找他听取意见。

张锬刚到北京时，正赶上拟定新首都建设的方案。当时有两种设想：

一种是以旧城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理由是旧城到原护城河约有六十五平方公里，地处行政区中心。从地形地貌看，旧城作为首都是恰当的。特别是要考虑在近十余年间，连续经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需要休养生息。旧城约有两千零五十万平方米的建筑，经过修旧利废，尚可维持，不必马上搞耗资巨大的土木兴建。

而另一种设想是保留旧城，不拆不动文物古迹。在西郊公主坟一带，另辟新的首都中轴线，先建少量为中央服务的建筑，比在旧城区拆旧建筑节省开支，也可展示出新首都的气象。

最后，另辟新首都中轴线的设想，被否决了，继而开始了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工作。这项工作由市委书记郑天翔挂帅，改旧“都委会”而新组“规划委员会”。这项工作进行得很机密，成员均为中共党员。张锬既不是中共党员，也非“规划委员会”成员，但他依然是被咨询的座上客。

“规划委员会”成立了总图室，最初在动物园内的鸮观楼和御河桥交际处办公，开始考虑总图的规划结构。明确市区部分以旧城为中心，逐步用四条环路和四个斜角的放射路向外发展，以五环的铁路为界。

一天，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偕张锬，来到景山，登上万春亭。在这可鸟瞰古都全貌的最高点放眼眺望，皇城根内，四合院落，树冠覆盖，呈现一片灰绿色海洋，强烈地衬托出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古建筑、王府庭园麇集，是北京非常突出的特点。彭真说：“北京新城区改建后要不失古都特色才好。”张锬感到彭所言极是。

回想起四十年代初，朱启钤先生要他承揽古建筑实测；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一方面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使古城免遭炮火损毁，一方面请梁思成先生绘制北平重点文物图，以便一旦不得不攻城作战，尽量避开古迹。

正是由于这些有心人的全力保护，古都的文化遗产和风貌，才能经十余年战乱而未毁。倘若我们在如今和平建设时期忽略了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的维护和保持，岂不枉对先人的一片苦心。也许就是从这次与彭真登景山的远眺，使张镠心中树起了保持和弘扬中国建筑艺术传统的牢固意识。

在与“规划委员会”往来的日子，张镠在和尊师梁思成分别多年后，又有了较多的接触，再度聆听了他有关建筑艺术的成熟理论。张镠回忆说，在这一时期收益最大的，是梁思成向他详细解析了其“建筑词汇论”和“建筑可译论”。

建筑学也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由专门的词汇构成，梁思成从语言和词汇可译性引申，提出建筑的形式艺术风格，也可依据中西手法不同，将西洋式译成中国式，达到风格迥异的效果。

梁思成一面向张镠讲解他的理论，一面画出圣彼得大教堂轮廓图。他先把教堂中间圆顶（DOME）改成祈年殿的三重檐。第二步把四角小圆顶改成方形、重檐、钻尖亭子。第三步，把入口山墙（PEDIMENT）朝前的西洋传统做法彻底铲除，因为中国传统建筑从来不用硬山、悬山或歇山作为正门。把它改成重檐歇山横摆，使小山花朝向两侧。第四步，把上主门廊的高台上的西女儿墙的酒瓶子栏杆，改为汉白玉栏板，上有望柱，下有须弥座。甚至把上平台的大石阶，也按两侧走人，中留御道的形式。第五步，把环抱前庭广场的回廊和端亭，也按颐和园长廊式改装，端头用重檐方亭。

当梁思成讲毕画毕，张镈已心悦诚服：即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也可改成适合中华民族艺术爱好的作品，“梁师的建筑可译论，使我深受启发，获益无穷。”张镈对我说。

“共产党不信佛 为什么你们盖大庙？”
张行严戏说“肾脏病”、“肠胃病”
“精神病”、“心脏病”
十五号方案转报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永茂公司更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张镈为八大总工之一。也是这一年，他承担了友谊宾馆一期工程的主设计任务。“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较大的工程，也是使我成为批判焦点的工程。”谈及这项工程，张镈作如是开场白。

兴建友谊宾馆时，张镈经常能同苏联专家们打交道。他对一位叫安德烈、一位叫穆欣的专家印象颇深，安德烈是莫斯科的总建筑师，功力深厚，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都是他的杰作，张镈对他很钦佩。

而穆欣则经常否定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似乎特别强调创新，鄙薄古典建筑艺术，当张镈请他详细讲解创新的思路，并介绍一些创新的范例时，穆欣借给了张镈一些书籍。但张镈翻阅时发现，这些书籍中的理论都是他以往学过的，其中列举的范例，均为古典建筑的经典之作，这让他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也许是民族传统和保持古都风貌的意识过于强化了，张镈对友谊宾馆的设计，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大屋顶，琉璃瓦。

一九五五年初，二期工程的主体结构到顶，盪顶底胎打完混

凝土板，加工的琉璃瓦件已到工地。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对友谊宾馆的建筑，提出严肃批评。文章认为该建筑是“华而不实，复古主义”的典型，列举了只顾形式，不顾适用的例子；还以工人的口吻说：“共产党，不信佛，为什么你们盖大庙？”

宾馆建成后，在建筑过程中同张镈结下友谊的外专局张行严副局长说：“咱们是朋友了，我也不跟你客套了。友谊设计优秀的方面我就不谈了，单和你说说问题，对以后也是个借鉴。”

张行严将宾馆的问题概括为四病：上水不灵，下水不畅，是肾脏病；暗浴厕通风排气不畅，空气污浊，臭气难除，燃香则又成怪味，是肠胃病；强电、弱电互相干扰，暖气南热北冷，室温如春夏秋冬忽冷忽热，是精神病；动力中心、变电间、锅炉房环境不良，供热、供电时出问题，是心脏病。

“四病说”使张镈深受刺痛：一个外表健美的人，内部若染此四病，将难葆青春。一座建筑若有这四病，何堪称道？这是张镈从事建筑设计以来，受批评最重的一个工程。

然而，张镈并未因此生抵触情绪，他觉得话越难听，记得越牢，以后设计就会考虑得更周全，这并非坏事。但他对批评也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接受，他认为“华而不实”是中肯的，可对复古主义持保留态度。

其实，对友谊宾馆的评价，并非只有一面之词。尊师梁思成看到张镈的设计时，即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外国建筑权威亦有文字评论：“北京友谊宾馆是公认的中国五十年代最早的新民族风格的成功尝试”，还将他列为中国现代十六位著名建筑师的榜首。显然，此建筑带给张镈的不光是批判，还有荣誉，只是后者他自己没说。

一度寒暑后的一九五六年，张镈接受了设计民族文化宫的任务。当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派人谈选址和设计诸事宜时，张镈觉得长安街上划出的地盘过于狭促，故而建议在新开发的陶然亭公园附近兴建。但国家民委方面担心文化娱乐场所不建在城区，容易引起少数民族反感，还是决定在民族文化宫如今所在的地方兴建。

开始具体规划设计的时候，恰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期，张镈先后提出了十六个方案。十二月中，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班，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实习，也参与了民族宫方案设计。

受反右斗争向教授权威发动“拔白旗”运动影响，血气方刚的学子们认为，张镈吸取传统重檐方亭为主的方案，是复古主义反水，对之大张挞伐，并提出一个新的集体修改方案。

学生们的方案，在平面功能分区和总体布置上，没大动原有的骨架，仅在屋顶和玉石栏杆上做了简化，压低了主塔钻尖重檐屋顶，简化了经堂和龕顶的做法，改栏板为女儿墙。张镈认为他们的渲染图画得很好，但设计比原方案稍显逊色。

一九五八年初，国务院发出严禁兴建“楼堂馆所”通知，因而在方案送审时，张镈忍痛舍弃了自己最欣赏的十六号方案，而将大加压缩的十五号方案送交郑天翔，同时送审的还有学生们的修改方案。

为慎重起见，时兼国家民委主任的乌兰夫副总理，要汪锋主持，邀请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习仲勋等十二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北京饭店七楼听汇报，拍板定案。张镈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十五号方案，结果获一致同意通过，并转报周恩来。

民族文化宫动工未及三个月，就被列入中央决定兴建的“十大建筑”。“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张镈说道，“中国的‘大

跃进’之风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个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十大建筑’的兴建就这样被提出了并被放置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基于这样的背景，民委个别领导在强调建筑的高艺术、高质量、高速度同时，希望锦上添花，建议在俱乐部和礼堂入口，添加重檐八角亭子。

张锬本着少做无功能内容的纯装饰性建筑的原则，未予采纳。结果民族文化宫，成为面积小，空间利用充分，结构最省，内部适用功能最多的综合性俱乐部。

对于民族文化宫的设计，三十七年后，一位久居北京的作家评论道：“这是一件杰作。”除了其造型象征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非常切题外，还在于“亭子顶一点也不勉强，而且在形态、体量以及颜色上，对整个建筑群起到了视觉上的统率作用。它的墙面上的窗户数量也比例得宜，特别是整栋建筑所采用的装饰性配件，既不显得繁琐‘抢戏’；也不会令人感到疏落沉闷。”

这位作家还说民族文化宫，“采用了蓝色和绿色等冷色调的配置，营造出了一一种宁静安谧的和谐氛围，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宣谕出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热爱和平的可贵性格。”

当我问及张锬如何看待这些评论时，他说：“作家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的有些推测，是我当初构思中并不存在的，但经历了数十年，人们仍能从这一建筑引发如此美好的遐想，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给予肯定，这是令我分外欣慰的。”

为了包括中国第一号政治性建筑在内的“十大建筑”设计，十七个省、市及高等院校的建筑专家、学者云集北京从设计、评图一开始，周恩来就介入了工程的指导和评定

与民族文化宫同被列入“十大建筑”，堪称中国第一号政治性建筑的工程，是万人大会堂。万人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是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同步进行的。

其实，早在张镈刚回北京时，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设计就拉开了序幕。至一九五八年前，先后共拟出过十二个方案，也许因为相关的建筑需一并考虑吧，一直未能最终定案，可这些旧方案为此刻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参考。

在以往的十二个方案中，一号方案为苏联专家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九百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六百米。一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三十八米至六十米的车道，东面建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六方案都在南长街南侧对景安排万人大礼堂，留出约七万平方米的空间。此刻作参考时，多数人认为八、十两方案较好。

“十大建筑”的立项，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其中万人大会堂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场所，是国家第一号政治性建筑，因此该建筑设计，必须是既庄严肃穆又典雅富丽。世界各国对这类建筑的设计方案，都是采取公开竞赛的方式，例如苏联早期列宁墓的设计。因此“十大建筑”设计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均采用公开竞赛的方式。

依照惯例，征集前一般都有明确的计划任务书，规定建筑性质、规模和质量、标准，为横向评比标准，基本上是一次定标。而拟制万人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方案，只提出革博、历博在东和大会堂在西的两座建筑，甚至未拟定规模和用地范围。

规划设计竞赛是由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出面，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来自国内十七个省市的，包括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广东华南工学院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到京。而在此前三天，万里已在北京音乐厅，主持召开了“十大建筑”兴建的动员誓师大会，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三高(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的建设原则。

“听说最初建筑的项目好像不止十项？”我问张铸。

“是的，还有一些，如科技馆，国家歌剧院等，国家歌剧院原定的建址在如今人民大会堂的西南边。后来考虑到国力和时间等方面的因素，才精简到十项，而且十项中的美术馆的建筑也往后推了。”

设计人员到京随即投入工作，根据不同的项目，划分了几个组，日夜加班设计，然后通过反复评比，连续审查，筛选评议最佳方案。参加天安门规划和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是：同济、南工、天大、华南、北京规划局、北京建筑设计院。

从设计、评图一开始，周恩来就介入了工程的指导和评定工作，他经常深入现场，看第一手图纸资料，耐心听取汇报，并对每个方案都提出具体意见。尽管当时国事、外事活动纷繁，但他对此事从未间断过问或掉以轻心。

在方案拟制、评定的三十五天里，周恩来参加了所有七轮的

评比论证会。因市规划局尚未定天安门广场形式、未划定两侧建设用地规模，陆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方案：第一轮，只考虑一个万人大礼堂，二、三、四、六组设计图出来后，评看的感觉是形不成广场气势。

第二轮设计时，又增加了一个五千座的宴会厅。设计者们提出东西对口相接，南北相连两种设想。

周恩来发现，如果天安门广场不能基本定型，直接影响到广场两侧建筑的设计，因此他希望在第三轮设计时，拿出一个基本定型的广场规划。

于是，北京市委国庆、五一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辛毅，参加了第三轮设计的讨论。他提议革博、历博和万人大会堂两组建筑间，应有五百米的距离，才足够游行站队。北京规划局初定革博、历博的建筑宽度为一百四十米，为求对称，建议大会堂亦宽一百四十米，南北长则为二百七十米（三万七千八百平方米），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张苏、连贯也于此时提议，把人大常委办公楼也纳入大会堂建筑，这就使大会堂整体包括了大会厅、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个部分。

在布置设计时，万里要求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不得超出七万平方米。参与拟方案的人员认为：即便是将这七万平方米全用来做大会厅，也只能平均每座七平方米，这只是一般剧场水准，比每座十三平方米的首都剧场小了几几乎一倍，与国家最高规格的会议大厅不相符；何况现在要包容三组建筑。大家希望突破七万的限制，但这希望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为了大会堂的设计，兼任人大常委秘书长的彭真，让他的助手张苏、连贯、武新宇，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对方案提出具体要求，他们指出全国人大正式代表在三千三百一三千五百之间，

因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每项决议必须要全体会议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他们全要坐在头层池座之中；代表席应有桌子或放文件的设施，这是大会厅的基本要求。

此外，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构，还要设常委开会的大、中、小会议室，以及民族、华侨、宗教、财经、法制等七、八个专门委员会办公的场所。再就是办公机构有三百人的编制，除办公用房外，要有图书馆、印刷厂、食堂等设施，面积也不能太小。

关于宴会厅，周恩来提出要有一个五千座的大宴会厅，若干个中型宴会厅，按每座一点四平方米计算，大宴会厅至少要在七千平方米以上。

受制于七万平方米极限，要容纳三组相对独立的国家最高级别的建筑，张钫感到非常为难，只得千方百计压缩空间，作出宴会厅部分二万三千五百平方米；礼堂部分二万八千平方米；办公楼兼小组会场一万九千五百平方米的布局分配方案。

周恩来对总布局给予了肯定，但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太小气寒酸：大礼堂狭窄而不尽如人意；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

根据各方面意见，张钫在第四轮搞了个十万平方米的设计。为此，他踟躇了很久，耽心通不过。果然，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看罢，不同意将这个有突破的方案送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七万平方米的限制，框囿死了思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赵冬日，一再提出限制的面积与应具的规格、规模，差距太大，必须突破。他的意见，引起曾经负责过城建规划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重视。

刘仁通过对大会堂建筑的性质、要求、内容及相应规模的综

合权衡，认为可以做突破的尝试；且由赵冬日与沈其合作设计的北京市委新楼，给刘仁留下很好的印象，因此他示意赵、沈二人在敢想、敢说、敢干与严肃、严密、严格结合的基础上，突破限制，另起炉灶。

赵冬日是沈阳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一九五三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初创时，他是八大总工之一。他对礼堂和医院的设计经验丰富，其杰作之一，就是政协礼堂。沈其毕业于老北京工业大学，解放前夕加入共产党，是党内不多的专业人才。

在第七轮讨论时，赵、沈二人搞出了个大大超越限制的方案。首先突破宽一百四十米，长二百七米的占地，放大到宽二百一十米，长三百四十米，为原占地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八点八九。在建筑作成凸形，礼堂后移，估算建筑面积达十五万八千平方米，为原限制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五点七一。

上级要求张铸他们五天内拿出初步设计，十天内拿出大会堂基础施工图
消息反馈回来，不再考虑最初不得超过七万平方米的限制
大会堂的大会议厅差点被设计成四层

方案送周恩来审看，随即被认可，他尤其对高台的透视表示满意。周恩来已经首肯，有关方面仅对此方案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没有再提原定的限制。

刘仁得知周恩来于十月十四日同意采纳此方案后，立即指示赵、沈根据意见对方案做修改，增加了中型餐厅，紧接着送市设计院赶制施工图。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规划局兼市建筑设计院书记李正冠，在接到上级的指示后，随即找来总工张镛和第一设计室书记宋继文，告诉他们周总理已经选定赵、沈设计的大会堂方案，现决定由建筑设计院承担全部设计。

接着，李正冠宣布由张镛任设计总工程师，统管总体设计工作。同时布置了各专项设计的负责人：朱兆雪负责结构，结构组负责人有郁彦、张浩、李国胜；阮志大、姚丽生主持工程；那景成负责设备；王时熙负责电气。

“选中的方案是赵冬日和沈其的，可总设计却由您担任，您想过没有，工程领导者为什么做出这一决定？”笔者问。

“方案是建筑的整体构思，但把构思变成建筑的施工图，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没细想过为什么会选中我做设计总工程师，也许是因为我工作比较踏实，历来服从组织，所以领导比较放心吧。”张镛先生特谦虚。

此时，现场拆迁已经开始，义务劳动大军已经进场，建筑公司的工人也做好动工的准备。因此后李正冠要求张镛五天内拿出初步设计，确定柱网层高；五天后即十月二十六日，拿出基础施工图。前期工作在设计院完成后，立即到施工现场进行设计。

张镛听到如此决定后，惊异和兴奋齐集。他最希望的固然是自己的总体方案中选，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别人的方案中选后，竟会让他主持具体的设计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简直有点“受宠若惊”。

在观看赵、沈方案的柱网平面图和东立面透视图时，张镛感到方案的功能区分十分清楚、通畅、明确，三个组成部分有分有合，跟我在作十万平方米方案时类似，但规模更大，项目更全，令我敬佩、喜爱。张镛如是追溯了读图的感觉。

习惯于计算的张镛，对方案做了详细计算，得出准确的建筑面积为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虽然他个人以为，作为天安门广场的主体建筑之一，作为最高规格的会议厅和宴会厅，应该有如此规模，但毕竟比原限制翻了一番还多许多。他不知周恩来和设计组委会是否已了解此情况，了解后是否还能批准照此规模施工，便立即向李正冠汇报，请他逐级上报，以便上面最后决断。消息反馈回来，不再考虑最初不得超过七万平方米的限制。

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张镛感到由于面积得到大大的扩展，有了充分的回旋空间，在多种厅室的处理上也大有文章可作。方案立面的处理，基本上是脱胎于学院派手法，可通过“可译论”，予以融会贯通。

但张镛还有一重耽忧，即如果仅仅将原压缩的方案简单放大一倍，可能会出现圣彼得大教堂似的智者千虑一失，即没有对过于高大的建筑进行适当的处理，突然进入其间，有了大人国的感觉。

此外，因设计者非方案提出者，在一些具体处置上，难免出现分歧。如进行大礼堂座席设计时，张镛发现按赵、沈的方案，池座内不能达到三千五百座位的要求，同时无法在三层内容纳一万个座位。

张镛建议赵冬日放弃过道，以扩张池座，但赵坚决不同意，提出做三层挑台，共四层座席。张镛以为三层挑台四层座席，国外称为飞机座，能听声音，但影响观看。

然而，为了尊重原方案设计者，张镛与有关设计人员在设计中进行了反复研究，但设计到第四层时，感到问题严重，俯角已达三十度，太高太陡了，不改不行。可赵强调说方案是周总理亲自定的，一点都不能更改。

大礼堂施工迫在眉睫，设计不容等待，正在张镈左右为难之际，西南角工地地基挖掘挖到了辽、金时代的旧河床，必须进行特殊加固，以防止沉降，故而有了一点缓冲时间。

恰在这时，陪同彭真外出的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回到北京，张镈将问题向沈做了汇报。沈听言挑台俯角到了三十度，也觉得很不合适，体育场看台的俯角是二十七度，已嫌过陡，观众已感不安全。

同时，曾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所有指示的沈仔细回忆了一下，不记得周说过要建圆形剧场式大会议厅的话，只记得周说过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于是，沈又将赵冬日找来，一起商量修改方案。经商议，赵不再坚持原方案，新设计取消了过道，把池座放宽到七十六米，挑台两层，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施工图已在赶制中，各方面对中选方案的意见纷纷呈送到周恩来案头 周恩来的长篇发言

就在张镈他们为赶制设计施工图时，参与方案竞选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大大超过限制的方案中选的怨言多了起来，都将落选原因归结为在限制面积内设计方案，如都同等地不受束缚，可能还会产生更优秀的方案，持类似观点的包括张镈的老师杨廷宝、来自广东的建筑师林克明等老资格。

各地的专家、学者在看到中选方案后，也纷纷对之提出意见，这一切都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呈递到周恩来办公室的案头。

梁思成提出：人民大会堂建筑在艺术风格定选择的顺序应是中而新 西而新 中而古 西而古。现在中选的方案 是师法文艺复

兴时期建筑经典圣彼得大教堂的，是排列在最不可取的西而古。

他认为圣彼得大教堂是文艺复兴建筑艺术的高峰，比例、权衡极佳，是学院派的典型。然其有缺陷，即为追求伟大、庄严、隆重，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一倍，甚至门、窗、户、壁同样放大一倍，使得人一进去，顿时感到自己变得非常矮小。

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的总建筑师王华彬则认为：中选方案面积、体积过大，空间浪费；暗室较多，采光不够，必须倚靠人为采光、通风，标准过高，脱离实际。

上海六专家学者联名提出的意见有二：一是中选方案使大会堂，与五百米宽的广场比例失调，会产生旷野的视觉效果。欧洲名城广场建筑高度与广场深度习惯比例是一比四或一比六，按一比六，建筑高应在八十三米以上，而方案东门高四十米，比例为一比十二点五，这已超过天安门三十三点七米的吻高。二是中选方案立面类似当年日内瓦联合国设计竞赛的中选方案，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而人民大会堂建筑应突出现代风格。

鉴于此，周恩来在到施工现场巡视了一番后，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扩大的专家会议，地点在御河桥交际处，即日本强迫袁世凯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旧址。参加的人有冶金部钢铁专家邓恩诚、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师汪菊潜及老专家茅以升、梁思成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专家等四十余位，方案提出者赵、沈二人回避。

周恩来在开场白中简介了他陆续收到、看到的有关大会堂建设的意见，指出虽然工期很紧，但仍然要力争集中优点，克服缺点，亡羊补牢，尽善尽美，把大会堂建好，以对国人。

梁思成、王华彬及上海的代表们重复了各自的意见。结构和桥梁专家们对挑台的制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二层悬挑十六

米，三层挑十四米难度并不大，并论证端头应允许颤动。

但周恩来立即予以否定说：大会堂应该安全第一，不能在这儿试验新结构，颤动一定要防止，而且要考虑会出现挑台观众拥至前台欢呼的场面。周恩来还提请设计人员考虑万人大会议厅、五千座宴会厅的紧急疏散问题，必须认真计算，要门多、路畅，保证在短暂时间内清场。张镈听了，感到周恩来考虑的非常细致。

在听取了与会者们的意见后，周恩来做了个长篇的发言，谈了有关大会堂建设各方面问题。

首先，他谈了建筑是否过大的问题，指出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但同时要贯彻党提出的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要大而有当。

第二，要以以人为本，物为人用的观念去处理细节。他分析说彼得大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内含有意识使教徒进入后，感到天主的伟大深远，而自己十分渺小的用意。“而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进入建筑应有我们是主人，而不是物体的奴隶的自豪。”因此不要故弄玄虚，而要做到有平易近人之感。

第三，周恩来谈了艺术风格问题。他的见解十分恢宏大气和开明洒脱：“中外古今的经典建筑，无论是在东方或是在西方；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宫殿庙宇或是为平民百姓居住的住宅，都是历代劳动祖先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

他接着说：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本土的文化就已与国外的文化有了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融汇和变异。印度的塔，传到中国，形、神都有所变化发展，但变幻并未远离其宗。中国幅员广大，四梁八柱的民居，在山寨水乡，骨架不变，而形、神迥异

……所有出自劳动人民之手的建筑艺术硕果，我们都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胸怀，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不能囿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圈子。

周恩来最后说到这次方案的确定：有人认为可能还会设计出更佳的方案，这并非不可能，中国今后的建设会越来越宏大，采纳优秀方案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多，不愁没英雄用武之地。此次的方案已定，就不再大动了。

张镈还清晰地记得，周恩来还在会上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这故事彭真讲过，周恩来是复述：最初菩萨像是印度人的形象，有两撇胡子，中国人看着不习惯。有画家另画了一幅菩萨像，张之于市，听取世人议论，后经反复修改，终成现在这种似男似女神态，并为民众所接受。以此告诫设计人员，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经周恩来这么一讲，与会者基本心悦诚服，张镈也感到大原则更明确了，有了主心骨。

张镈说：周恩来真是“周”总理，
周恩来行事一向谨慎，要求做大模型看
效果

毛泽东在凌晨三点来到工地

大会堂的工程启动了。“刘仁坐镇施工现场，充分展示了他既善于把中央意图贯彻于工程之中，又从容有致调度千军的大将风采。他的得力助手是赵鹏飞。赵曾任彭真秘书，也是建设局局长，熟悉城建工作。他精明能干，知人善任，计划性强，且事必躬亲 办事从不仅留于口头。”

先把两位施工组织者赞美了一番，张镛才谈起动工后的具体情形：大会堂面积为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合一百六十万立方米，共需四百万工日。而建设者们仅仅在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中的二百八十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在高峰期，施工现场的工人超过了一万五千人。

如此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场面，是张镛建筑生涯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场面。能在如此庄严，如此兴师动众的工程中，充当总设计师的重要角色，张镛既感到光荣，亦感到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

虽说自己在施工设计中呕心沥血是不言而喻的，但张镛一再强调“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的头衔，应该归于周恩来总理。他的整个建筑设计的指示不光是宏观的，而是涉及到几乎所有的细节。”

在对大会堂的东、西、南、北四个正门台阶、坡道设计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不仅认真审看设计图纸，还亲自到御河桥交际处大门厅的大楼梯步登步测，先行感受一番，再与设计的阶高和阶宽尺寸加以比较。最后，与张镛等一起定下了坡度缓、分两段的设计。这样的处理，使登行的人既不致过劳，中途可稍事休息；又烘托出雍容大雅、隆重肃穆的气氛。

人大开会时，担任主席团成员的有不少老年代表。周恩来考虑到他们进出上下要坐轮椅，因而提出在西大门的南北两侧庭院内，铺设可以直达入口的车道。张镛说：“周恩来总理是名符其实的‘周’总理，事事都想得那样周全。”

当勾画宴会厅蓝图时，周恩来更详尽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要设计者参考他比较欣赏的北京饭店中楼迎宾路线：

“站在中楼西侧台阶上，面向东侧入口大门，可遥见来宾人

门。来宾先东折赴存衣服处、洗手间，方便、整容后，通过高大拱廊向西徐行，宾主已可对面相望，招手致意。握手后，多数来宾可到主人身后舞厅参加宴前酒会，贵宾可请至主人身旁的贵宾室。届时，宾主齐集舞厅相互寒暄，通过三门进入宴会大厅，这种流线安排，对宾主相见的程式、气氛十分相宜。”

周恩来特意点了北京饭店新西楼“虽富丽堂皇 但主人要站在风门迎宾，无回旋余地。宾主仓促相遇，显得窘促；且先握手，后存衣，与礼仪程式不合。另外厨房的油气，散漫渗进宴会厅，是大败笔。”要设计者们引以为戒。

张镈聆听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后，亲往北京饭店调查观看，恰逢杨勇上将在此宴请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将士，使他得着真实感受的机会，由此对保持厨房负压，防止厨房油烟散漫形成深刻意识。

对五千座宴会厅的厅内设计，周恩来还要求要设法处理得浑然一体，不能让距主席台稍远的宾客产生敬陪末座心理。张镈据此将宴会厅顶棚设计成中高、次降、旁低，形成起伏，以消除遥远感；同时设多个厅门，宾客可从各门堂皇地入席，不会有从前台走向末尾席位的感觉。

在对万人大会堂厅内的设计动了几番心思后，张镈他们仍感到总体看上去宽、深、高的问题比较突出，陷于苦思冥想中的张镈一时想不出理想的解决良策。周恩来得知后，召张镈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办公室当面汇报。

听毕汇报，看罢图纸，周恩来说：“会议大厅是议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应该庄严、朴素、明朗、大方，不能按歌舞剧院的模式处理。在形式和内容上，应该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观感、舒适、卫生、安全出发，以简洁、干净为宜，对整体的艺术构思定

下基调。”

当张镈提出如何淡化宽、深、远的感觉时，周恩来思忖有顷说道：

“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很遥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的描写，应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周恩来继续一边打着手势，一边不时用铅笔做着勾画，一边做着解释：“扁圆卵形的会议大厅，后边的圆角大，前边浅弧线夹角小，都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缘。上边的顶棚可以作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的空间。顶棚与墙身交接处如果作成大圆角形，就可能把顶棚的大弧线与墙身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缘，没有角，就可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可能会冲淡一般深、宽、高集合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感觉。”

张镈听到此，仿佛在山重水复的逆旅中，忽遇豁然开朗的桃花源；面前的周恩来，不像国务缠身的政治家，更似一个稔熟建筑韵律而创见迭出的设计师，他感到大会议厅内处理的难题已然消逝了。

在商讨完大会议厅设计后，周恩来又对几面正门柱廊柱子用料的质地、色彩，以及高柱如何作矮化处理等问题，一一发表了意见。

从中南海出来后，张镈立即带领有关设计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启迪展开设计。在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他们更品嚼出周恩来的思路脱俗、新颖，富有诗意的内涵。沿着这一思路，不仅理出了建筑艺术形式设计的头绪，还使人工采光、通风均匀分布等问题便于处理了。

为了打破穹隆顶的单调，张镈作了三圈水波纹暗槽灯，中心镶嵌直径五米的五角星灯，围以一圈镏金葵花瓣花饰。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葵花瓣象征心向共产党的各族人民，三圈水波纹象征在党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天，图刚绘就，张镈即亲自送到周恩来面前，询问是否符合要求。周恩来笑着说：“你自己怎么看，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嘛！”他凝神看了一阵，说道：“这个葵花向阳的五角星和三圈水波纹 象征着大海的后浪推前浪的气势 很好！”但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并没有让立即照图施工，而是提议先做个大模型看效果。

模型做好后，周恩来又亲莅现场，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听着周恩来的分析和指点，张镈忽有所悟：自己为什么会时常陷入误区的一个根由，这就是自己习惯于从数字运算和图纸线条上思考问题；而周恩来则总是从人的实际观感是否适度出发，把人放在首位 依实际观感延伸分析判断 因而常能打破僵滞 柳暗花明。

在大会堂的建设过程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来到施工现场，工地上亦多次因为他们的到来，响起阵阵欢呼声。

有一天早晨，张镈一到工地，就有人告诉他，今日凌晨三点，毛泽东也来到了大会堂工地，他在刚刚建好的北门内进入大宴会厅的汉白玉楼梯前，伫立良久，连声称好。这个分为四层，高八点五米，宽八米，行程二十四米的楼梯设计，也是经周恩来反复比较、感受，最后定案的，它比彼得堡冬宫的直跑楼梯，平缓宽畅，更具气派。

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季，时刻掌握着大会堂建筑进程的周恩来，又来到设计和施工指挥者中间。他说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规模的建筑，难度很大。因此先保障万人大会议厅能开会，五千座宴会厅能开宴。

“要留有余地，不必力求一次把文章作绝。部分工程，如部分小会议厅、人大常委办公楼的部分设施，拖后些也无妨。整体建筑一年建成，五年修好就行了。”周恩来说得很轻松，张镈他们也感到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

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夕，人民大会堂如期完工。大约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主持了庆功宴会。张镈代表设计集体出席，并有幸被安排在周恩来就座的主宾席上。

席间，周恩来举杯来到张镈身边，一边给他敬酒，一边告诉张镈，他对大会堂的设计很满意，“给你们打五分。”张镈闻言，如沐春风。

回溯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张镈感慨万千：建筑施工的具体工作，应该是建筑业内技术人员的事情，总理宵衣旰食为国事操劳，即便过问，定个基调，宏观指点足矣，可实际上每一处细节的构思和处理，都浸透了周恩来的才智和心血。

“在大会堂建设中，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很专业的建筑设计师，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造，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神来构想，拍板定案，是不可想象的。你写这段历史，应记下这一笔。

“我记不得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哪一位桥梁大师说过的话了，他说他设计的桥造好以后，就不会再去看，再去想它。我想大概建筑艺术也是门遗憾的艺术，如果再看，再琢磨就会生出某种缺憾。大会堂建成至今已过去三十八年了，站在今天评判这座建筑，您是否也会有些觉得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大会堂的建筑，有它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它基本上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当然如果当时不是工期那样紧迫，有些方面是能处理的更臻完美。例如空间还能利用得更合理和经

济；大会堂外墙理当用白虎涧淡赭色花岗石，可因石料供应赶不上工期，我提议先用预制剁斧假石，但有人认为还是影响工期，决定直接抹假石材料，结果时间一久，出现裂缝、渗雨、掉皮……这几年，我反复向中央提出，剔除假材料，换上真石料，听说中央已经将此排上日程，也许不要太久，我们就能看到焕然一新的人民大会堂。”

李先念说：北京饭店这块宝地，应该利用率高一些，楼可以盖高点
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突然到来
万里的意见

在人民大会堂建设完毕后，张镛又参与了《光明日报》社、科学会堂等建筑的设计工作。虽然忙碌，但他感到生活的充实、舒畅。直到“文革”浪潮掀起，他受到冲击，被中止了设计工作，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是五十五岁的年纪。

也许恰因想到老之将至这一层，张镛更冀望能将自己更成熟的建筑艺术造诣，奉献于一些大而精的建筑项目。然而在“文革”初期，人们似乎更热衷于“不破不立”说，炉火纯青的技艺无处施展，让张镛极苦闷，却又不能稍有表露。

机遇还是来了，张镛是幸运的，“文革”中难得的重要建筑项目，竟能由他主持设计，但他没想到这其间会生出一连串麻烦，又偏偏福祸相倚，因为出了麻烦，他又得重温兴建人民大会堂那番同周恩来的过往。

那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时局比之前四五年，稍露几分宽松，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渐有起色，尼克松来

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国内的外事活动，随着外交战线的拓展而趋于频繁。

宾客多了，旧的宾馆开始吃紧，据说北京饭店的住房率几度出现超过百分之百，有的客房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三百五十一三百七十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一千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二千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

领受了任务的北京饭店军管会宋主任，首先向国务院上报了个扩建四万二千平方米，按当时住宅六十元一平方米造价乘十，共需投资二千五百二十万元的概算。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基建工程经常出现在建设中不断追加投资的“钓鱼工程”的情况，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必须周到详尽，尽量不漏项，以免又成“钓鱼工程”

宋主任找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向承担设计任务的张镛和他的弟子成德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言谈中，宋说到周恩来曾询问建筑预计周期，宋答约两三年，但周恩来嫌太慢，说人民大会堂那么大才用了不到十个月，还说时间太长了就等不及了。张镛对周恩来“等不及”一语感到非常费解。

北京饭店扩建东楼的方案设计，是张镛带领数名年轻人拟制的。其间他突然患病，但他还是扶病搞出了二十个方案。因为北京饭店的旧东楼和中楼，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艺术风格都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常见的摩登古典派，张镛有个萦绕于心的意念，就是对之加以改造。

周恩来在对二十个方案观看比较时，流露了对二十号方案的欣赏，他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和有关部门，共同对二十

号方案作具体推敲，定案后作出模型。

模型作好，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各级领导审看提意见。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掌管财权的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专门往观模型。

当李先念得知新扩建的东楼仅高五十米左右，只有十四层时，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

虽说张镈是设计主持，但因自己在运动中受过冲击，说话也不硬气。他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

一个一百三十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李认为以一百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一百点二五米高的方案。

工程于一九七三年春季启动，由北京建工局长伍子玉亲自坐镇。当时正逢北京的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相继上马，建国门外、首都机场均在施工，但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首要重点。

施工队伍日以继夜奋战，新东楼以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增高，国庆节后，开始了第十二、十三层的施工。这时，一位工程人员在闲聊时问张镈，新东楼哪个方向的房间好，然后自答说西向的好，因为在晴霁天气，凭窗眺望景致最美，远可见西山透

迤，近可览故宫巍峨。

说者无心，可张锬闻言不由心头一悸：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块——中南海。

张锬听说，当时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有一幢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五层十八米高，就被要求工作人员不得在楼顶做工间操。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就会立即打电话质询。

于是，张锬随即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虽说想了如此的补救方法，但张锬心中却多了一重隐忧。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副团长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锬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张锬说他后来才知道，汪东兴因此对周恩来批准建高层的北京饭店新东楼，提出了丝毫不留情面的指责。

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十月二十九日，北京饭店齐主任通知张锬开会。张锬刚刚到会议室坐下，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赵鹏飞也到了，此时他们虽然尚未复职，但张锬已从中意识到楼层的问题非同小可。果然，杨德中到场即挑明，开会的议题是解决楼层过高威胁

中南海的问题。

因万里、赵鹏飞还没看过现场，他们一起来到高六十八点八米，刚刚支模的第十五层地板面，杨德中用望远镜做了一番观察。

快人快语的万里在稍作观察后即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

杨德中大概觉得截止在十四层依然有威胁，所以说：“在第十个标准层，已经能看到中南海全景的上部，由于有树木遮挡，还较模糊，但再往上就挡不住了。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午夜零点，万里、赵鹏飞、张镛突然被
召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希望活到八十岁……”

总理同意万里的观点。我们不能大国小
馆

继续讨论时，张镛得知在十五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毛泽东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窥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象，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

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十五标准层。

但设计院和施工方面的部分人认为：取消十五层以上的建

筑，在十四层上匆忙做顶，影响整体建筑的原设计审美，并造成已加工构配件的浪费。建议维持原来顶部比较隆重、恰当的体型，只要加强高层设施使用的控制就可以了。

当天晚上，张铸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主设计人员。午夜零点，张铸同万里、赵鹏飞到了大会堂西大厅。一进大厅，张铸就见周恩来笑着朝自己走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张铸同志从建好大会堂以后我们差不多有十四年没见面了吧？”

周恩来让张铸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并没有马上谈新东楼的处理问题，而是同张铸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其父亲清末两广总督张鸣歧说起，一一询问了张家所有后人的境况。

原来，他今天刚接见了美籍华人关颂韬。张铸说关是自己原来的大老板关颂声的三弟，关颂声五弟关颂坚曾是自己的直接老板。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关颂坚是我南开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校友哪。”

接着，周恩来又问起张铸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张铸说受了很深刻的教育，被关了七个月，读了毛主席的书，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过去受家庭和旧环境的影响，有许多陈旧的观念，继而检讨起友谊宾馆“华而不实”的问题。

“友谊宾馆的外表是好的，只是不好用。”周恩来又说，“你的老师梁思成教授可对‘改造’二字很反感，大有其父梁启超的遗风。”张铸说：“我没有怨言，我是通过触及灵魂的批判，才学会三个正确对待的，这对人生是有益的。”

就这样寒暄了近半小时，话题才转到新东楼上，周恩来指着新东楼模型的第十层说：“在这里可以看见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一览无余，瀛台到北海大桥之间，由于端门和午门挡了一下，稍好一点；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心里很

不安，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了，不能再等了。十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

张镛建议朝西的方向全作实心遮阳墙，遮住向西、北的视线。周恩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接着说：“这样还可以挡住西北风，北京的西北风沙很利害，以后搞设计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当周恩来说还是原来那个五十米左右的方案好时，张镛检讨说自己知道规划有限制，但后来因强调节约土地、多建房间，背离了全面观点，未尽尽职尽责。

显然，周恩来理解张镛当时的处境，没有再追究，转而对万里说：“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五十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六十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

由于在十四层截止，楼顶按原设计已不协调，周恩来建议说：“做大屋顶太贵，是否可以做小斜坡顶？既对排水有利，人也上不去。谈罢握别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

三天后晚十点，万里、赵鹏飞叫张镛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对新东楼超高处理设计做最后敲定。半小时后，周恩来也来到新疆厅。他看了修改处理后的模型，并听了汇报，对新东楼西向门窗遮挡，在西华门建屏风楼的处理方案表示满意。

随后，周恩来同万里谈起北京的城建规划。周恩来说他就此同梁思成讨论过，梁从美观、形式上考虑得多，很少照顾经济问题，而没有经济概念是不行的。

十一月四日上午，张镛正在赶制修改后的北京饭店设计图，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到了新东楼施工现场。

张镛立即赶往现场，施工现场的人说，周恩来已经乘室外的运料电梯上了顶层。“那部电梯摇摇晃晃不太安全，可总理不顾

这些还是上去了，他对毛主席安危的关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从顶层下来后，周恩来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张铸等，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休息。这天周恩来的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工程以外的话。他说：“我希望能活到八十岁，能为党、为毛主席多做几年事。”

“人要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句周恩来喜欢反复重复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先改造主观世界，再改造客观世界。我们改造了清朝皇帝溥仪，改造了国民党总统李宗仁，改造了特务沈醉。经过改造，化敌为友了，不是吗？”

他继续说：“今天遇到的麻烦，不少是人为的客观存在，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明，自然就决心大。拆几层东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后遗症。”他一边说着，一边吃着花生米，还喝了一杯白酒。当他要喝第二杯时，被杨德中劝住了。

在简单的午餐后，周恩来要大家再随他到西华门城楼上看看。西华门由八三四一部队把守，一般人不许登攀。张铸跟在周恩来后面，走上已经残破不全的登楼马道，有的路段坍塌损坏严重，但尚能攀登。

张铸第一次走上这近十一米高的城台，只见城楼四周和两侧墙顶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周恩来在前面披荆斩棘，张铸等尾随其后。他们走走、看看、说说。透过蒿草，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的全景如在眼前，清清楚楚。

走到西南角楼的台阶下，看着俗称九间、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角楼，张铸向周恩来报告说：“经测量在此建脊高二十六点七米

的屏风楼，即可遮挡从新东楼西观中南海的视线。计划南段由西华门楼起到西南角楼，用连接体的连廊式和高三十一米二米的西华门重檐上脊相连。”

接着，他们又随周恩来掉头向北，过西华门走了约与向南相等的距离，张钫告诉周恩来：“计划两条直线的配楼建到此为止，已可把中南海的重点部位遮挡住了。”

周恩来未作答，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走到与三大殿的中和殿平行的位置才停步。他变换着角度看了看，说道：“配楼做到这里，就可以把三十九局和西花厅等处全遮住了，就定在这里吧。”这样一来，配楼的建筑比原先预定的长度多出近四倍。

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对万里、赵鹏飞、张钫说：“屏风楼建成前，新东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

周恩来还说：“在紫禁城东西华门西侧加点房子对国家、对故宫都有利。至少从‘广积粮’来说也是需要的嘛！八三四一部队可以用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其余的可作文物房。所有的房子在形式上要配合故宫，所有朝西的房子只做盲窗，从外形上看要有棂花窗扇。”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万里、赵鹏飞、张钫粗一估算，发现屏风楼和配楼工程量约在五万平方米以上。骤然增加这么大工程，任务又急，又是仿古建筑，还要抗震，在资金、材料、人工上都有较大缺口。

北京市政府表示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屏风楼的工程，使承担设计责任的张钫感到压力很大。故而在与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吴院长一同研究时，他从省工、省时、省资金出发，提议平台上只做单片屏风式墙。

不料，他的设想送报周恩来时，周恩来很不以为然，批示

道：“不能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

周恩来的批评，在张镈心中引起很大震动：多快好省固然应讲求，但不能采取削鼻子，削耳朵式的机械简单方法。他精打细算，缜密设计，决心不让周恩来再为此牵扯精力。结果，第二次设计顺利通过了。

在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中，张镈作为主设计的建筑占了十分之三；七十年代以后的新“十大建筑”，张镈成为主设计师的，又占了五分之一。这就是新北京图书馆，北京饭店贵宾楼。

新北京图书馆的拟建预算在一九七四年末，次年初春，周恩来即做了同意的批示。建址选在紫竹院北面。当时北京城西边一代的高层建筑限制很严。木樨地拟建国宾馆时，被要求不许在北面开窗，怕看到江青常住的钓鱼台。

原北京图书馆藏书达一百四十万册，随着藏书量的日益增长，已日显狭蹙。因此考虑建一个能藏书二百万—三百万册的新馆。这等规模，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庞大的，而在北海公园西侧的老图书馆，多为古旧建筑，已经没有扩展余地，因而建址选在尚属空旷的紫竹院附近。

由于书库的容量要翻一番，而且要建一个采用最先进手段检阅书籍和资料的现代化图书馆，要有礼堂和声像资料馆，这又是一个占地阔、楼体高的大工程。这就可能要触及城西一带不得建高楼的禁忌。

曾几度主管北京城建的万里，对此发表意见说：中国“不能是大国小馆”。周恩来同意万里的观点，做批示说：“书库作到十五米高是否可以，请万里同志考虑。”当时万里已经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在他的参与下，新北京图书馆的规模按设想定了下来。

新北京图书馆的方案，请了五院五校参加拟制，依然是竞赛，

选优。五院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委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建研院、西北建筑设计院、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五校则为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建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评审工作有当时国家建委分管设计的副主任宋养初负责，建筑学会老理事长周荣鑫参与此事。

竞赛三轮，初拟的方案基本以洋式为主，宋养初很不以为然。老前辈杨廷宝认为：国家图书馆必须有传统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气派，不能只讲功能不讲形式，但他的观点，被其所在的南京工学院的系党支部和工农兵学员以因循守旧而批判否定。

宋养初对把继承传统、古为今用视为复古守旧颇不以为然，指出中国的建筑，不能不讲究民族形式。虽然民族形式的概念还不清楚，但应该向这个方面努力探索。

他点名请杨廷宝拿出意见，杨廷宝遂画了个草图，宋看后很欣赏。他要杨画出正式图，并吩咐南工来的人协助。但是，南工来的人知道杨的方案是被批判的，不敢帮忙。张镈主动找了有关人员，帮助做了石膏模型。

当时工农兵学员很吃香，且受文革期间泛滥的冲劲影响，凡遇不同见解的人，便扣以“奇谈怪论”“因循守旧”大帽子。

可宋养初不理睬这一套说：“‘中而新’的民族形式总在嘴上争论，不实践、不钻研、不试验，永远不可能出现。我不主张复古，但也不能割断几千年来的建筑艺术传统。”

在他的建议下，组成以杨廷宝为首、张镈为副，有戴念慈、吴良镛、黄远强参加的五老班子，要他们在半年内搞出一个精品方案。

新北京图书馆方案定案时，已在“四人帮”粉碎之际。如今的新北京图书馆，即是在“五老方案”的基础上，经修改建筑

的。我请张镛先生作一评价，他认为改动较大，有失五老原设计图神韵。

改革开放以后，张镛已近耄耋之龄，但他依然伫立在建筑领域，指挥着凝固音乐的交响。北京饭店西侧那耀眼的贵宾楼，就是他的弟子在他的指导下谱出的一串美妙音符。一九八九年，他荣膺设计大师的称号，然而当时关于这位大师平生的记载，不过短短的四百字。

如今，行动已不十分灵便的张镛先生，却仍不得不时常有所行动，赴海外考察，与建筑界同仁交流。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及美国、瑞士、日本、新加坡……

在国内，他也不得闲，虽说设计大师是终生不退休的，但张镛说“连人家邓小平都退了，我也就退了吧。”他现在还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顾问总建筑师，北京市政府的技术顾问，每有重大建设项目，他依旧是要被邀请指教的座上客。

王尚荣

在总参调度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

王尚荣：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长征时任红军二六军团五师师长。抗战期间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团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一野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五二年到总参任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又由代部长而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共和国每有重大战事，他均在中枢参与指挥调度。“文革”后期复出，任副总参谋长。

王尚荣
简历

“战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多数将领来说，是与昔日的辉煌战绩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后，战将的含意，他们只能从“想当年气吞万里如虎”、“铁马金戈入梦”中去回味了。

而对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将军来说，“战将”的称谓，则涵概了他生命的全部旅程。

红军时期，他就被贺龙、任弼时认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战将。抗战期间，他率领的一二〇师独立旅辖下的“亚五”（七一五团），曾令冀中敌伪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期间，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全歼胡宗南大部分主力的扶郿战役，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炮火和硝烟依然没有从他身边飘散。解放一江山岛的渡海作战；炮击金门、马祖；西南边陲的平叛；入缅进剿国民党残匪；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作战；直至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他始终处在作战的中枢指挥位置。

当笔者道出“王尚荣将军是永久的、名副其实的战将”看法时，王将军的老伴黄克阿姨很平静地说：“怎么评定他的一生呢？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总能算是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老参谋吧。”

“党内军中，对王将军已有公论，诚如我在您家中看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华夏名将，吾辈楷模’的题词。”我说道。

他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五师，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道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足迹
要引起贵妇人倾心的漂亮团长

王尚荣的祖籍，在处于鄂湘交界的湖北省石首县，世代为农。父亲十九岁时离开了土地，到调关镇一家店铺当了帮工。由于家境困厄，生于王尚荣之前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因此发狠努力，终于从帮工转为小鱼行的老板，总算稍得温饱。

六岁时，王尚荣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此后又进了国民小学，以聪颖好学得老师厚爱。然而好景不常，随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降生，家中经济再呈紧蹙，他不得不中辍学业，过早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学徒帮工之途。

也就是在此期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交界一带领导武装暴动，创建了洪湖、湘鄂西等根据地，石首县也属根据地范围。有一点文化基础的王尚荣，立即为共产党、红军关于推翻封建军阀、买办、地主黑暗统治，摆脱列强欺凌，建立昌盛民主的新国家，使天下广大受苦人翻身作主人的宣传所吸引，萌生了追求光明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

一九三一年，王尚荣投身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于幼年时期，不仅要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扼杀抗争；其稚嫩的肌体还受到内部滋长的不健康毒菌的销蚀。自这一年始，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对敌主张军事冒险，攻打大城市；对内过分渲染敌人的渗透，使肃反扩大化的势头日增。

就在此期间，曾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夏曦，自上海的中央来到湘鄂西根据地，出任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他把肃反中滥施刑讯、任意捕杀怀疑对象的过左做法引入了湘鄂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至段德昌等一批党、政、军负责人相继遭到误杀。

王尚荣因为参加的是段德昌率领的部队，被视为虽非蒋介石

体系但仍属反革命阵营的“改组派”分子，受到刑讯人员的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就发了两个包谷，撵他离开红军。

在露宿荒野，哭了整整一夜之后，王尚荣第二天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含着眼泪说：“参加革命后，红军才是我的家，我不怕打、不怕杀，就是不能离开红军这个家。”他的赤诚，感动了在场的人，终于被部队留了下来。

由于王尚荣作战勇敢，应变机敏，很快被提升为团参谋长。一九三四年末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一九三五年，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肖克率领的红六军，组成二六军团，王尚荣升任第五师师长。

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贺龙、任弼时等率二、六军团，从云南向北进发。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的玉龙大雪山后，贺龙命王尚荣率领五师，担起整个军团后卫的重任。

一九三六年的夏季，王尚荣率部来到草地的边缘。屏挡追兵的袭扰，他们亦战亦走，时有伤亡且疲惫异常；又因为拖在最后，可征购的粮食、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甚至连野草，都被前面走过的部队征集、采食光了，饥饿冻馁一次次把他们推向死亡线。其他部队大约都在七八天内走出了沼泽泥泞的草地，而他们却越趄了十多天。

当五师的后卫团十五团走出草地时，这个原有一千八百人的队伍，只剩下四百人了。许多官兵，口含野草，永远沉默在沼泽之中。王尚荣麾下的这四百名官兵，在红军万里长征之途，留下了最后的足迹。带着衣衫蓝缕，躯体孱弱的部队走出草地，王尚

荣这个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硬汉，眼睑湿润了。但当他看到他们的眼里仍然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欣慰和自豪又溢满他的胸襟。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和二方面军的部分师、团级干部，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培训。一九三七年春“红大”更名“抗大”王尚荣和余秋里、张震等被编入抗大二队，继续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相当多：毛泽东、周恩来讲授国内外时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朱德讲授中国近代史；刘伯承讲授战术；罗荣桓讲授党的建设。这是王尚荣第一次系统地接受党建和军事理论的洗礼。

“七七事变”后，为适应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在抗大学习结业的王尚荣，被分配到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任七一五团团团长。此时的王尚荣，无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还是在军事指挥艺术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跃进随即在军事斗争中显示了出来。

一九三八年四月，毛泽东做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以王尚荣率领的七一五团为主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在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带领下，向绥东大青山挺进。

刚进入大青山地区，王尚荣即带领七一五团两个营，连续奇袭陶林城、乌兰花两镇，两战皆捷，歼敌两百余人，引起日寇的惊恐。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柯尔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不与抗日武装敌对，王尚荣派人和四子王旗的代表谈判，争取到四子王旗的合作。在初人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的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

日军企图趁八路军在大青山立足未稳，迅速调兵围攻大青山支队主力所在的绥东，王尚荣率部顺势向绥西发展，以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他还指挥部队，连续向敌人视为动脉的绥包铁路沿线，发动袭击，使包头以东数车站的敌军，接连遭受重创。

进入绥东未满四个月，大青山支队便横扫阴山七百里，由相互呼应的绥南、绥东、绥西三个游击区构成的大青山根据地初显轮廓。

不久，刚刚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诗人、文学家何其芳，为体验各根据地的抗敌斗争生活，来到了大青山。他和七一五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了一星期，王尚荣及其麾下的将士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大青山人民的抗敌气概，引发了诗人内心澎湃的激情，《七一五团在大青山》长篇散文，遂从他笔端流出。

在这篇散文中，他叙述了和王尚荣的初次相识。当勇武英俊、年方二十四的王尚荣站到他面前，顿时引发了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联翩浮想：“你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

如此描绘一位八路军战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独到而别致的。但紧接着何其芳笔锋一转：“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无聊的小说里面而是活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虽然王尚荣他们“吃着小米饭，进行着战斗，而且甚至于缺乏着充分的安稳的睡眠”，但“还是这样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卖弄风情的贵妇人而是为了无数苦痛的、不幸的中国的人民。”

接着，何其芳不吝笔墨地讴歌了“七一五团怎样从敌人的统

治下夺回了大青山”；大青山“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人民怎样能结合成了一个坚硬的堡垒”这块长约千里 宽约三百里的土地，“怎样变成了一块不能消化的石头梗塞在日本军阀的喉间。”

罗瑞卿扮演冷面“红娘”贺龙、关向应给
“王大帅”主婚
婚后的“苦恋”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中央决定一百二十师主力开赴冀中。贺龙命令七一五团留下一个营坚持大青山游击战争，其余全部由王尚荣带领东调冀中。

临行前，李井泉对王尚荣提出：从大青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着眼，七一五团是否可以多留下一些干部？王尚荣随即同政委朱辉照等商议，决定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员，留在了大青山。对王尚荣的顾全大局，早已是有口皆碑：他得知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因此在大青山根据地转战期间，每缴获战利品、征集到款项，总要将其大部输送往延安。

一九三八年末，王尚荣到冀中向师长贺龙报到时，恰逢一二〇师新创两个独立旅建制，贺龙任命王尚荣为独一旅副旅长。这个旅的主要兵源是有抗日救国热忱的开明绅士高士一召集的 因此他任旅长 但他并不精于用兵之道 所以王尚荣是作战的实际指挥者。

刚刚就任的王尚荣，正赶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率领这支新军在战火中淬炼。反围剿作战持续了半个月，王尚荣与日军交手二十九仗，歼敌近千人。紧接着，王尚荣又带

领独一旅，参加了围歼日军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的战斗，使这个八百余士兵均获过勋章的“王牌大队”，仅四十人乘风沙黑夜脱逃。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王尚荣率独一旅到晋察冀边区陈庄，与七一六团配合，在陈庄一带设伏，全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一千五百余人，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范例。连续打了好几场漂亮的歼灭战，指战员们对旅长王尚荣善于把握战机，临阵处事果断的指挥艺术更加钦佩。不久，部队中就传出了“王大帅”的称谓。政委朱辉照听到了，凑趣说：“这个绰号嘛，王尚荣在大青山就有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呵。”

也就是在喜庆陈庄胜利的那段日子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的学员们，在大队长苏振华的带领下，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女兵排，排长是位窈窕白净、热情奔放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黄克。

起先，王尚荣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排队。可不久，他感到他的老上级、老同学、老战友们，总在他面前谈论那女兵排排长如何如何，敏于戎机的王尚荣，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直到他们直截了当鼓动他向那女排长“进攻”，娶她作妻子时，他才明白他们的用意。

惯于神速运兵的王尚荣，在恋爱婚姻的行动上，却显得忸怩迟疑。可最终经不住贺龙、罗瑞卿、苏振华等人的撺掇，他终于决定把婚姻之事提上日程，先和女排长见见面。上级和战友们，帮他安排了一次对抗大学员大队的检阅。

为“检阅”王尚荣专门找了件半新的军装，把缴获日军的马靴擦了擦。可他在队前走了两个来回，也没看清黄克的面孔，于是抬腿开始第三次检阅。警卫员不知其中奥秘，悄声提醒旅长；

“您已经检阅两次啦！”两次怎么啦 我还没看清呢。”王尚荣嘟囔道。

得知王尚荣动心了，苏振华找到了黄克，聊了没几句，就谈到了王尚荣。“咱们独一旅的王尚荣旅长，长征的时候就是后卫师的师长，英勇善战。他读过几年书，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哪！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苏振华见黄克静静地听着，以为她对王尚荣有好感，进一步说：“你看他一米八的个头 英俊威武 浓眉大眼……怎么样 你满意吧？”满意什么？黄克莫名其妙。“选择这样的人做丈夫还不满意？”选择丈夫？”是啊。”我不干！”

人家不干怎么办，王尚荣踌躇了。战友们说得拿出作战的勇气和毅力，穷追不舍。结果王尚荣一连写了四封情书，可黄克都给撕了。其实对王尚荣这样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员，黄克从心里是钦佩的。可钦佩不是爱情，他们相互还不了解，更何况她到延安是为了抗日，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的……她刚十九岁，刚入党两个月，现在还不是谈婚姻的时候。

黄克出生在辽宁省的凤城县，“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出过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战期间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话剧《凤凰城》，就是描写这位英雄的。黄克的父亲，也是一位抗日的军人，因战事失利而流亡北平。她在北平国立中山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与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她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离家奔赴延安。

最热心撮合此事的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见黄克固执地拒绝王尚荣，便扮演了冷面“红娘”的角色。他为了让黄克更多的了解王尚荣，分配她到一二〇师工作。黄克犟劲上来了：“工作我去，要是为了要我结婚，我就不去，哪怕离开部队干地方！”

“去一二〇师，是贺龙师长亲自点头的事，”罗瑞卿绷起了脸：“你是党员、是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嘛！”就这样，黄克到了一二〇师，后分配在独一旅政治部。一九三九年底，她和王尚荣结了婚，主婚人是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

黄克和王尚荣结婚，多少有点命令的意味，因此黄克很希望通过婚后的相处、交谈，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感情的沟通。但当时战事频仍，王尚荣整日军机缠身，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

偶尔有一两个空闲的黄昏，黄克硬拉着王尚荣，在夕阳晚霞映照下的乡间小径散散步，说点体己的话，可是一看到王尚荣身边寸步不离的卫兵，刚刚调整好的情绪，一下子又都被破坏了。没过多久，她内心甚至生出对军营的抵触。

组织上根据黄克的要求，调她到地方工作。她本想这样十天半个月见一次面，也许能加剧相互间的思恋。可在战争环境中，她每次回部队和王尚荣团聚，都要被营地的哨兵左右盘问个没完：找谁，为什么事，和被找人的关系等等等等，思恋的情怀，经这一盘问，被冲得烟消云散。

没有办法，黄克又回归了部队，担任旅司令部的秘书。一次，她到距司令部较远的基层部队去听取汇报，王尚荣怕她往返辛劳，专门为她挑了一匹听话的老马，然而在黄克夜间返回时，这匹一向听话的老马不知何故发起了脾气，把黄克摔在地上，自己跑了。

从昏迷中醒来的黄克，发现自己躺在旅卫生所里，她环顾四周，有好几张亲切的脸庞，可就是没有她最希望看到的、能给她最大抚慰的人。婚后一系列不愉快的情景，顿时都浮上心头，她委屈得泪水潸然。

可一心扑在作战中的王尚荣，并没有体会出妻子为增进他们

情感付出的努力。他是贺龙的爱将，因此每一重要的战役，他率领的独一旅都充当着关键的角色。他要为战役的胜利筹谋；他要为属下的几千将士负责；因而他忽略了对妻子的体贴和爱抚。

漏屋偏遭连夜雨，感情的苦恼尚未解脱，病魔又袭来了，黄克感染上伤寒症。在四十年代，在战争的环境，在艰苦的根据地中，伤寒往往意味着死亡。两三个月过去了，黄克的病没有丝毫好转。她几度昏迷，又几度醒来，每当醒来之际，都发现一个高大的身躯在病榻前忙碌着，为她煎药、喂药。

看着既忙于战事，又要照顾自己的丈夫；看着丈夫因为疲惫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黄克感觉到了她曾经渴望的温暖：王尚荣并不是不懂得爱慕和关切，他不过是不善于用言词表达而已。然而越是想到这些，黄克越是感到不安：她的病也许好不了，她不能拖累王尚荣，更不能把这几乎不治的病症，传染给王尚荣。

一天，她趁王尚荣不在，硬撑着爬起来，想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静静地死去。可虚弱的她刚下床就又晕过去了。王尚荣回家见到后，立即把她扶上床，询问是怎么回事。黄克央求说：“你让我走吧！我也许活不了多久了，不能再传染你。

“你胡说什么呀！我这身体，敌人的枪炮都打不倒，还怕那小小的细菌？你放心，有我在，你就死不了！”

就这样，黄克在病榻间，补回了婚前没来得及的恋爱，体味了赳赳武将难得的柔情。爱情和愉快的心情，是一帖最灵的药，黄克的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当黄克彻底康复的时候，她觉得一度笼罩在她的婚姻上的阴影，也同折磨她的病魔一道消失了；王尚荣又可以宽心地运筹帷幄了。

一九四二年，独一旅奉调西渡黄河，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徐向前兼任司令员的绥德警备区，王尚荣任副

司令员之职。在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年间，他率领部队在四百里黄河河防线上，与敌军作战数十次，使日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一次次破灭。

解放战争期间，王尚荣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鼓德怀的麾下，坚持陕北“蘑菇战”，在歼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中，屡建战功。在成为围点打援杰出范例的瓦子街战役、令毛泽东极其欣慰的扶郿等战役中，王尚荣和他率领的部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此后，王尚荣随第一野战军挺进西北。当他拥军进入青海省城西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刘伯承向周恩来推荐的高材生
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战役后，就任作战部长

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央军委在新中国刚刚问世之际，即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由德高望重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出任院长。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高级军事学府的创办，亲自为之题词致贺：“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已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赴军事学院学习。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突然要成为一名普通的学员，这在有些人，是会生出难以排遣的落差感的。然而曾经几度进过军校深造的王尚荣，已经深深体味出：作为一个高品位的军事家，系统理论的丰富和战争的磨砺，都是缺一不可的。

王尚荣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参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他被编入高级速成系，由于整个学院正处于初创时期，教官也不完备，王尚荣一人而具两重身分，既是普通学员，又被任命为该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的原二野五兵团司令员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

由于既是学员又是教官，王尚荣一面要认真听课，汲取知识；一面还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刘伯承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他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还和其他学员一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编写战例教材八十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

除了课堂学习的紧张繁忙之外，野外的大规模作战指挥实习，也给王尚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在江苏省句容至丹阳之间进行“军进攻战斗”演习。杨勇为红军军长，王尚荣为红军参谋长。当红军第一梯队突破蓝军第一道防线，红军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推进时，蓝军增援的一个加强团赶到，试图阻遏红军的推进。

面对变化的战场态势，红军的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给予立足未稳之“敌”急袭然后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推进。但杨勇和王尚荣认为运用我军一些成功的战术更有效。决定以红军第一梯队正面突击第二梯队从侧翼迂回，将蓝军加强团分割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

经王尚荣具体布置实施，作战意图迅速有效地得到实现。在场的苏联顾问也发现中国指挥员的战术运用更有效合理，连称

“哈拉硕，哈拉硕。”院长刘伯承也对此给予了好评，同时开始关注王尚荣，这个在作战指挥上既富天资又治学勤勉的学员。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国庆节，他作为广场游行受检阅部队的一员，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三人，分别代表海、陆、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检阅的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一九五二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刘伯承说：“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

刘伯承思忖了一下，回答说：“高级速成系有个学员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之职。”

周恩来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如此直截了当，便决定采纳他的推荐。他随后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调王尚荣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一九五二年五月，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就任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当时的部长是张震将军。

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的战火已经平息，国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上。因此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军事方面的中央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

朝鲜战场偃旗息鼓的主要标志，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的签字。在这之后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讲话，重提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话题。

早在一九五二年夏季，坐镇上海的陈毅，就召见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授意由他主持拟制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作战方略。张爱萍几经考虑，拿出一个先攻取大陈岛，由北向南推进的作战设想。后根据中央先取大、小金门等南面的岛屿，以期北面诸岛屿蒋军不攻自退或稍打即退意向，做了全面修订。陈毅首肯后，报北京又得毛泽东、彭德怀批准，并指定由张爱萍担任总指挥。

但进攻并未随即实施，一直拖延到这次怀仁堂的会议。毛泽东此刻认为：形势已发生变化，美国人不大可能对解放军的行动做较大的插手干预，因此可以准备拿下大陈岛，先解放浙江沿海一带的敌占岛屿。他要军方着手拟制作战方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彭德怀主持了如何实现毛泽东意图的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讯部长王诤、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东北军区副司令邓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也参加了会议。

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同时考虑解放台湾。彭德怀针对此意见指出：此时解放台湾是不现实的，解放台湾需要卧薪尝胆地长期准备，操之过急，适得其反。

张爱萍向与会者讲述了关于解放大陈岛的作战设想：首先夺取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得手以后，全力强攻大陈岛。彭德怀认为该方案是可行的。一定要充分准备，谨慎初战，战则必胜。

粟裕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他补充说：这是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第一次协同登陆战，作战情况要比以往复杂得多：而且要考虑到美国可能会插手，要准备艰苦作战。在初战时可先进行飞机小编组对一江山岛、大陈岛轰炸，看看蒋方、美方的反应。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为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全部解放奠定良好基础。

八月十日，张爱萍在南京主持作战会议，详细拟定了攻取大陈岛战役的作战方案，并报告北京。中央军委、总参在审议了作战方案后，于八月二十四日，由作战部电话通知华东军区：中央已批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在一切准备停当后，即可实施攻击。

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准备，华东军区调集了一个步兵师，海军集结了各类舰艇一百三十七艘，空军集结二十二个大队。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岛强行登陆战打响了。清晨，空军混合机群首先飞向一江山岛，对蒋军守岛阵地猛烈轰炸，继而远射程大炮密集轰击。下午，由舰艇和渔船运载的登陆部队强行登岸，经过八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千余人，初战告捷。

一江山岛解放后，各类作战物资源源运抵岛上，使大陈岛处在人民解放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大陈岛守敌深感难以抗拒解放军的进击，在美国军舰的掩护下，裹挟岛上的一万八千余居民，仓皇逃遁。

至二月二十六日，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省沿海蒋军占据岛屿，全部解放。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渡海登陆作战过程中，作为作战部副部长的王尚荣，始终处于指挥中枢的位置，忙碌着战役的组织和指挥。他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和总参领导汇报；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

这是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后，第一次参与较大的战役指挥，作战前夕，作战部部长张震奉调到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随即被指定为代部长，实战中王尚荣从容若定的大将风度，证实了他果然如刘帅推荐的那样，完全能够胜任作战中心的指挥调度工作，于是不久即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毛泽东决定在金、马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最初是按炮击之后，登陆作战准备的
转送林彪写的条子

炮战一打就是二十一年

王尚荣就任作战部部长的最初几年，局势处于比较安稳的状态，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气氛渐趋紧张，在此后的三四年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瞩目的战事。

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四个月间，蒋军飞机二百零四批三百八十七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最深入点达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将这一情况，向总参领导做了汇报。这一汇报随即被送到毛泽东那里，遂有了“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批示。

军委和总参依照毛泽东的批示，着手防空力量的调整，王尚荣对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重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迅速为总参领导采纳。此后，防空部队取得了击落敌机四架，击伤十一架的战绩。

尽管如此，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并没有减弱，除了空中外，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的骚扰也趋于频繁。而且入夏以来，美国继

向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座 II”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台部署可佩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六个步兵师，八个独立炮兵旅，五个高炮营，三个轻战车营，计九万六千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两个步兵师，四个独立炮兵营，两个高炮营，计四万人。

中国军民，对蒋军和美国的一系列行径反应强烈，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严惩蒋军。毛泽东在深思之后，决定在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方面回击蒋军的袭扰；一方面向美昭示中国人民不会对他国插手台湾事务坐视不管。

毛泽东战略决心已定，七月十四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制定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具体方案。会议主要研讨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但并没有将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限制在炮击上。

这个会议议决了以下内容：陆军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二十二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六个岸炮连，打击料罗湾的蒋军军舰。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调两个师进驻连城、汕头，以取得作战地域制空权。海军以东海舰队为主，集中八个岸炮连，配合陆军轰击大、小金门；调五个鱼雷快艇大队、两个潜艇大队、一个高速炮艇中队，进驻泉州、东山、三都澳，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

六天后，总参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研究作战部署，火力配制、各个军种间配合、各指挥机构的设置、后勤保障、通讯联络、作战费用预算等一系列细节问题。

会议议定：驻华北的三个加农炮团做好入闽作战准备；由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签发空军入闽作战命令，由聂凤智中将负责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彭德清负责组建舰队

前方指挥所，指挥战区除海军航空兵外所有海军部队。

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做了较长的发言。他提出：炮兵方面，对敌方地面目标的射击，应采取突然炮击、细水长流的方式。成立福州基地。海军方面，需再增加二个快艇大队到作战地区。要使用潜艇，担任海上救护任务，准备用杜二飞机在海上布雷。战区的海军已经可以保障输送四万人的兵力实施登陆。空军方面，通讯联络和指挥中心，在福州或晋江都可以。迅速在连城修筑雷达阵地。

在谈完空军一些师、团的调动后，王尚荣说到了登陆作战。他认为可以考虑先拿下大担、二担，第二步再对金门实施登陆作战。为便于登陆作战，可以考虑调一个工兵团。

最后，王尚荣对各类炮所需炮弹的基数，各类轻武器所需弹药的基数，所需费用做了一番估算。他的建议和设想，在商议中，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会议结束，王尚荣又向总参谋长粟裕交换了他对于金、马地区作战的一些想法和应注意事项等看法和建议。

王尚荣认为：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之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是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

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

王尚荣还建议在作战的过程中，各个兵种的指战员应该轮换到前线，以进行实战的锻炼。粟裕对王尚荣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均表示同意。

从围绕金、马作战总参各部的会议，军方一些高级将领的交谈看，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而且就在毛泽东下战略决心前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猜度的是参加演习的部队，在演习完毕后，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而是驻扎在演习地区待命。

据说，蒋介石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紧张得坐卧不安，猜想中共可能在海峡地区会有军事动作。我军高级将领，在得知毛泽东决心在金、马一带对蒋军作战后，自然要考虑到登陆作战的问题并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军委旃坛寺作战会议后，王尚荣奉命电话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于七月二十五日向金门实施炮击。

然而由于天气恶劣，延误了参战部队的调集和部署；同时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也还需要一些时日；加之美、英出兵中东，毛泽东决定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做一段观察，因而炮击未能如期实施。

在等待炮击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中央和军委对炮击的重点、炮击的强度、炮击的时机等，进行了几次调整。北京指挥中心同福建前线指挥部之间，电话往来频繁。当空军调入福建后，随即与蒋军展开激烈的制空权争夺。

七月下旬，解放军空军十、十八两个师进驻连城、汕头机

场，并立即升空在福建和海峡地区巡航。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我空军到达福建后，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一度将炮击时间的决定权，下放给福建前指。他们告诉王尚荣：最近敌由台湾到金门、马祖的两个师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二十六日下午，二十七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打击目标主要是海上换防的舰艇和陆上目标，包括金门、马祖。

王尚荣在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这番指示后，立即与在前指的叶飞通了电话，转告了毛、彭的指示，然后要求前指在炮击前，通告一下作战部，以便作战部掌握情况，但无须再请示批准。并告第一次打击可发射炮弹一万五至二万发。叶飞回答说：“都清楚了 遵照执行。”

随后王尚荣又将毛、彭的指示通报了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并要封做好向前线运输炮弹的计划，确保炮击所需。

然而在二十七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和即将接替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认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彭、黄在阅信后，遵毛泽东所嘱，由王尚荣转给叶飞。

八月以后，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左右，解放军空军以损失二十余架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五十多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在解放军控制之下。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炮击可以近期进行，遂让王尚荣通知叶飞速赴北戴河。

叶飞到北戴河毛泽东住处，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准备的情况，炮击的部署。当时在场的人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他们把地图摊在地毯上，一边指点，一边谈论着。这时，毛泽东突然问叶飞：大规模的炮击会不会打死蒋军中的美国人？叶飞说：会的。毛泽东问：能否设法避免？叶飞回答得很干脆：不能。因为当时蒋军营级即配有美国顾问。毛泽东感到此事需要再做斟酌。

这天晚上，王尚荣给叶飞送去了一张条子。条子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主席很关注如何避免打美国人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

当时所有看到林彪的条子的人，都认为林彪的建议与力求在突然的炮击中给蒋军予重创的作战意图背道而驰，因为向美国透风，无异于直接告诉蒋方。叶飞看了条子也感到吃惊，忙问王尚荣：“主席让你把条子给我看时，有没有交待什么，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说：“主席只要我拿给你看 没说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拍板按原定的突然炮击计划打，时间定在三月二十三日十七点三十分，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

王尚荣立即通过电话，将中央的决定告诉在福建前指代叶飞指挥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张翼翔：二十三日十七点三十分炮击按计划实施，具体时间最后由总参作战部转中央军委命令。炮击目标，首要任务是打掉蒋军雷达。第一次炮击，海岸炮零点四个基数，其他炮零点五个基数，预计二万五千发。

然而当晚十点四十分，彭德怀告诉王尚荣：“领海线内容有些条款写得不够清楚，需推迟两天公布，这与炮击金门无关。”王尚荣马上追问了一句：“那炮击的时间是不是还按原计划在十七点三十分开始。”

耿介直爽的彭德怀说：“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怎么还问？”王尚荣认真地说：“不问怎么行呢？原先的大方针是先对外公布领海线，然后再炮击么！”一板一眼是王尚荣的一贯作风，他曾反复告诫作战部的干部，一字之差、一地之差，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所以面对彭总，他依然如此较真。

彭德怀说：“炮击时间不变。使用炮弹数一万至一万五，也可以少于一万发，不要机械规定死了。”和彭总谈完话，王尚荣随即将谈话内容转告了叶飞。叶飞告诉他：“毛主席开始考虑先打几百发，由小而大。我向毛主席说明了先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最好由大而小。毛主席同意了，先打一万发。领海线问题我已知道，先打后公布。”

八月二十三日，是实施炮击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指挥中心分外忙碌。

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张翼翔副司令的电话，说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命令一下，就可执行任务。王尚荣将昨晚和彭总的谈话告诉了张：“领海线推迟公布几天，但与打炮无关，炮击按计划进行。中央军委无新指示的话，今天十七点三十分进行炮击，我们不再通知。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再告诉你们。”

王尚荣交待说：“彭总还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一万或一万五，由你们掌握。对水面目标主要打舰艇，好好的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

关于作战事项，王尚荣布置说：“要充分准备对付敌人的还击，人员要组织好疏散；敌人还击时，我们要压制他。要注意防空。我炮击后，敌人可能对鹰厦路、福州等处进行轰炸。”

刚刚放下张翼翔的电话，福州军区石一辰副参谋长的电话又

到了。石说：“前指刚收到叶飞政委的三点指示：一、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三五千或六千发；二、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三、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

王尚荣回答说：“当前对敌斗争的总原则是直接打蒋，间接打美。炮击是否如此，一切按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我们会立即转告你们。”

十点三十五分，彭德怀办公室的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新指示：“一、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二、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三、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这个问题。”王尚荣对郑文翰说：“炮击还有待中央军委的最后一道命令，有了决定马上告诉我们，前面没有命令是不敢行动的。”

显然，炮击的时间，炮击的目标，此刻又出现了可能变化的迹象。而且也是在此刻，作战仅限于炮击，不在此之后实施金门、马祖登陆作战的意向，才正式明确下来。

王尚荣对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昨天在作战会议上，针对炮兵阵地还准备得不够好的说法，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插话：炮兵阵地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推迟炮击时间，炮兵阵地准备成什么样？难道还能修筑成钢筋水泥的？”

雷英夫说：“刚才开了个会，叶飞又提出三点，彭总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打，打二万发，打了以后炮兵再疏散一下。假如发现岛上敌人撤退，我们就不打，让他撤走算了。对福建前指的电报，彭总的批示是：打否请主席定。”

王尚荣说：“由此看来，第二步的问题等一下再研究算了。”雷英夫说：“是啊，第一步打不打还没有确定呢。”

十四点四十分，石一辰从福州报告：料罗湾现有蒋军舰“中

字号”、“美字号”各一艘。今天炮击的话，作用可能不大，因为目标太小。王尚荣再次告诉他：炮击要等毛主席批准后实施，但一切按原定计划准备。

十五点三十分 彭总办公室又来电话了：“彭总午后在福建前指的电报上指示：‘我同意按福建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主席在十五点看了彭总的意见说：‘同意。’然后转给了周恩来总理。我们已经将毛主席的指示转告黄（克诚）老，黄老也认为可以。现叶飞已将毛主席、彭总的指示，通知了在厦门的前指。”

王尚荣听后，再次给福建前指打电话，向张翼翔重复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这也就是说，是在炮击实施的前两个小时左右，炮击的时间在十七点三十分，重点目标是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敌舰，才最后确定下来。

十七点三十分，面对金门的三十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十八点十六分，石一辰向王尚荣报告第一次炮击的情况：已进行了两次火力急袭，大、小金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据我方观察射击较准，“中字号”舰中弹五发。从敌方获悉我炮打的很准，都打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和师部附近，“打（雷达代号）”已被打坏。

午夜零点五十五分，福建前指张翼翔向作战值班室报告一天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蒋军伤亡七十人；小金门敌伤亡惨重，但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军一片混乱，伤亡数字自己尚不清楚；美顾问团二十余人下落不明。我一线炮兵已撤下十多个营，还留在阵地的有二十多个营，总伤亡十人，都是原阵地上的炮兵。现在，海军的快艇正在准备截击载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军舰；空军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

王尚荣当即同意使用快艇出击，并告以不要太被动，对有利的目标可以主动地打。

后又从敌方获悉：俞大维带领作战助理次长华金祥、军医局局长杨文达、总政治部监察署长汪贯一等，二十三日刚刚到金门视察。当晚六点三十分，金门防卫司令胡璉在翠谷水上餐厅设晚宴，招待美国顾问。因胡璉、俞大维和美国顾问到场晚，故侥幸躲过了炮击。而早些到场的金门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当时毙命；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伤重陨命；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

也是根据敌方的消息：在解放军开炮七八分钟内，金门的通讯联络就被打断，雷达全部被摧毁，可见第一次炮击是十分成功的。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此次炮战一打竟持续了二十一年。

毛泽东说：西藏问题总要来一次决战，才能彻底解决。

当历史即将翻过一九五八年这一页，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反动上层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助，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到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十二月十八日判匪在拉萨以南不足一百公里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三十七人，杀伤二十二。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不到四十公里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三十六人，杀伤十三人。一九五九年一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约二百公里的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驻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权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

这些情况材料，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摆在了中央决策层领袖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认为西藏的动荡，尽在预料和控制之中，叛乱者越是穷凶极恶地暴露其面目，则越为将来的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然而毛泽东并未对叛乱集团掉以轻心，一月二十二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这份批示立即被送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一直负责着西南地区平叛作战的组织、协调和指挥的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得知这一批示，感到毛泽东的预见，和他们这些始终处于作战第一线的军人的感觉，是那樣的相近。

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西南地区叛乱的区域性、作战的特点，分别组建了三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四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部队联合组成的“西藏军区指挥部”。

虽说各指挥部划分了各自的作战区域，但由总部负责指挥和协调。例如在边缘地区或结合部的协同作战，空军的支援，后勤的保障等等。王尚荣即被委以指挥和协调的重任。

在与少数民族叛乱武装作战时，处于指挥中枢的王尚荣，根

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他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边缘、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总在战前，反复嘱咐作战部队，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至一九五九年初，平叛部队共歼敌二十余万，大部分地区的判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中央对西藏上层采取的政治影响、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方针，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鉴于这种情形，王尚荣在总参党委扩大会议谈到平叛作战问题时，强调西藏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提出了西藏地区总有一天是要进行决战的见解。

就在王尚荣密切注视西藏的情况变幻之际，三月十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二千多人聚集到十四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当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砍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在此以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三月十九日夜间，叛匪们继十六日武装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然而也是在

十九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做出“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武装叛乱的决定。

中央做出决定后，王尚荣立即将作战命令，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张国华、张经武一接到命令，随即拟制出具体的作战计划。本着政治攻势在先的精神，西藏军区在二十日发出布告：

“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纠集和纵容叛匪，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匪气焰。及至今年三月十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匪结成一体，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于三月十九日夜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军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律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

上午十点正，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及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晚二十一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乱总指挥部罗布林卡。

到二十二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拉萨一带的战斗全部结束。

张国华随即向中央报告：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平息。翌日，中央军委下令：由驻藏人民解放军解除藏军的武装。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及溃败的叛军，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在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二十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

为了不使叛乱武装有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指示：“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的命令；同时要求作战部队严格执行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平叛后还须实施分区清剿，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并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力争“平息一地 巩固一地”。

四月初，解放军渡过雅鲁藏布江，分兵四路直趋山南。叛军自知不敌，分散成数股活动。王尚荣根据变化的情况，提出了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必须机动灵活，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以实现“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的平息”的作战目标。

到一九五九年底，西藏境内南山、纳木湖、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基本被剿灭。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当局不得不将逃入缅甸的残军，空运回台湾。但还是有一部分残军留了下来

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重点 林彪的作战原则

当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

从一九五七年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其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越国界的军事行动，不是边防部队能预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一九六〇年六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于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

周恩来等刚离开缅甸，且在访问期间，缅甸国会批准了刚刚签订的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然而他们此次了解在缅国民党残军的情况，却并非只有两国将根据协定共同勘定边界这一个背景。自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对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在缅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做了“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的批示后，中央和军委便对盘踞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这批国民党残军属原国民党第八军九三师二七八团、二三七师七〇九团，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于一九五〇年三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这一地区山峦叠嶂，居民寥落，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

下脚根。

缅甸军方发现了这支国民党军后，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但这支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似乎除了盘踞金三角外，难觅立足之地。于是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国民党残军，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

此情形传到台湾，蒋介石惊喜异常，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帅旧部。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到近两万人，占据了比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

主权国家缅甸，难以容忍自己的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一九五三年春季，缅方调集了八千多剽悍骁勇的克钦族将士，近四千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各国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美机开始运送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残军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他苦心经营了两年，残军又扩充到三千余人。

一九五九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亲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告以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声称：“不仅缅敌

找上门来要打 而且要打进云南 以击引暴 以暴致乱。”他还拟订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有关方面获取了这些情报，送报中央，毛泽东看后，批示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关注中缅边界，警惕国民党残军。

一九六〇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四百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两千多名窜扰骨干。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的。显然，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不仅对缅甸如芒刺在背，中国亦感到是个必予割除的隐患。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五日，根据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对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树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前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代表之一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是王尚荣亲自委派的。

在谈到勘界的警卫问题时，姚仲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指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缅甸，盘踞掸邦地区，声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人民更是胡作非为，还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破坏中缅勘界。为了保护勘界人民的安全，必须给他们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们听了姚仲明的这番话，非常受感动，说周总理把问题看透了，我们也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深感忧虑。此刻，中缅对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可谓灵犀点通。

王尚荣在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立即召集作战部连

续开了几次紧急军事会议。并亲自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提出：需在同缅方达成协议后，对盘踞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实施打击。这对确保安全勘界，巩固云南边防，具有重大意义。王尚荣认为：此次作战是非常机密的爆发行动，必须充分做好各项准备，仔细侦察敌情、地形，周密制定作战方案，对部队进行反复训练和演习，加强干部，加强火力，凭借准确的情报和优势火力重创残军，力争歼敌一二千人。

十一月初，王尚荣派成学俞前往昆明，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方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四日，他们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的协议。

协议规定：对盘踞在第四勘察队工作地段，对勘察、树桩工作有威胁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部队共同负责加以捕歼清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滇部队负责捕歼清除旧三十号界桩（孟遮以西至六十号界桩）南腊河与澜沧江交会点地段附近的国民党残军。中方部队，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二十公里。清除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

协议签定后，昆明军区立即拟制了警卫作战方案，以三个战群二十二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十六个据点。然后将此方案送中央军委、总参审议。

虽说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残军的作战，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的突击队山地丛林战。毛泽东、周恩来都对之十分关注，几位老师、总参谋长罗瑞卿先后参加了作战方案的审议。王尚荣参与了审议的全部过程，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及由周恩来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几位老师的

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重点，是出境作战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会不会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遗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的口实？因此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二十公里的出击范围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并说：“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打，否则军法从事。”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军设地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歼的六名敌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缅甸要求中国军队越过红线支援

周恩来说：可以讨论

罗瑞卿说：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

按预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应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打响。然而二十日，总参接到周恩来的指示，通知王尚荣，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阅看了最新材料后，产生的一些担忧。

王尚荣电话通知昆明军区：毛主席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勘界保卫的丁荣昌联系商议，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方式，把我方的关注转告缅

方。昆明军区毫不迟疑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缅军，缅军对中方的提醒表示感谢。

二十一日晚二十一点三十分，二十二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十六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五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恩来“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语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

秦基伟向昆明军区设在勐海的前线指挥部发出新的指示：“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该在二十二日凌晨六点三十分打响。然而这场对解放军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能全按计划行事。扑击的十六个据点，最早四点五十分就接火了，最晚七点五十分才交火。由于解放军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十六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会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一军二师师长蒙宝业北击毙；五点四十分打响的曼俄乃，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战中，击毙了敌四军五师师长李泰。但敌我伤亡之比是一比三，我军大于敌军。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解放军由于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很死，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秦基伟得到战报后，一面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一面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我军越过红线追击敌四军主力。但中央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直到一九六一年新春，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九个营约一万人，沿湄公河以西，有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决意以

“引蛇出洞 将缅军诱人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方略 瓦解缅军的攻势，佯装节节败退。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至九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领四百人的庞大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十三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捷报频传。可中旬刚过，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远程大炮难施实威力，飞机的战术动作倍受限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经离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十九日，缅方得到周恩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步联合作战的讨论。

在这同时，中央军委已经在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等聚集一堂。贺龙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聂荣臻认为：入缅作战的力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军委常委罗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然而在短期内，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一九六一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被逼还债，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重重困厄之中。

出席了军委作战会议的王尚荣，在会后向指挥出境作战的昆明军区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下一步作战问题比较大，必须把敌情、友军力量、我军力量、作战方针、作战方法、作战时间等问题研究透彻再说。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一月二十一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第

三、五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被困缅军。

缅方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研究。总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蒋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

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王尚荣向昆明军区电话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的情况准备，敌约四千人，我们使用八个营、两个便衣队。孟百了两个营两个便衣队，孟百了以西两个营，索永两个营，重点孟百了。”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昆明军区接到作战部转达的罗瑞卿指示：“已经原则上同意配合缅军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一下，我军尽量迅速出动。请缅军在芒林、王南昆咬住敌人，以待我军南下配合歼灭之。”

当天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十五点，罗瑞卿要作战部将此通知昆明军区。他还指示：孟百了以西两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争取二十五日打响。

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二十五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解放军的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些。

经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因此，当其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共歼敌七百四十人，击毙敌师长两名，活捉敌副师长一名，捣毁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经营了十多年的巢穴，协助缅甸方面解放了拥有三十多万人口、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

特别引起军方注意的是，这是解放军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岳丛林突击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都非常重视对这次作战中的经验及教训的总结。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及王尚荣参加的会议，听取作战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军委派工作组赴昆明，帮助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二月刚过，一支由总参副团长张爱萍牵头的工作组，奔赴云南。王尚荣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随工作组一同前往。不想刚到重庆，他就因心脏病突发，失去了对现代突击作战调研的机会。

王尚荣心想：尼赫鲁的胃口也太大了毛泽东问：尼赫鲁为什么要将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

一九六二年，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中央发展决策方面

的失误造成了严重困难之后，中国的财政经济形势终于又绽露好转的迹象。人们对国计民生的恢复和发展，又充满着期待。然而肩负着守卫祖国疆土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却是最多事、最紧张的一年。

在西北边疆，四五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新疆自治区的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塔城四个地区二十二个县，有六万七千多边民，逃往苏联。有关情况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恐怕又是“老大哥”搞了名堂吧！从此中国的北疆，结束了同“老大哥”友好的温情时代。

在东南沿海，台湾当局认为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状态，是实施反攻的最佳时机，大肆叫嚣“光复大陆”，并积极准备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进犯。

五月末，刘伯承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尚荣，和所有与会者都得出如下共识：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

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的：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不久，他又得知了毛泽东同罗瑞卿的谈话。

毛泽东分析说：根据目前情况必须有所准备。准备好了，国民党军不来也没坏处。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整个地区都要准备。如果今年国民党来进攻，就不让他上来，这样对我们就比较有利。南下的部队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

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其行动。

在毛泽东谈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随即都开会研究对蒋作战事项。中央的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军工生产，李先念负责粮食准备。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五个战备值班师要在六月二十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然而，北线无战事，东南沿海的蒋军大规模军事冒险还没等到，西南中印边界沿线地区的形势却骤然紧张起来。入夏以后，印度陆军全线接管了中印边境地区的防务，侵入中国境内布置了一百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楔入中国边防哨所之间；有的距中国哨所仅几十米甚至几米；有的竟插到了中国哨所的背后，这浓浓的火药味，吸引了中国决策层和军方的注意力，自然也吸引了身兼作战部部长、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防敌突然袭击小组副组长数职的王尚荣的注意力。

中国和印度毗邻处，有一千七百公里的边界，虽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了一条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传统习惯边界线。一九一四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与西藏地方政权代表团以秘密换文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使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遭到破坏。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承袭了英国吞噬西藏领土的政策，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挑起事端。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要求将其非法强占的中

印边界东段九万余平方公里、中段二千余平方公里、西段二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

王尚荣听说这一消息，不禁义愤填膺：“尼赫鲁的胃口也太大了，竟要把中国相当一个福建省的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吃过去，这还了得？”印方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针对印度当局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从维护亚洲地区和平及友好睦邻关系出发，采取了一再忍让，息事宁人，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方针。毛泽东甚至提议先搁置分歧，中印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然而，中方的良好愿望，没有得到印方的回应，结果中国单方面后撤了二十公里。

在这以后，王尚荣多次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打电话给驻西藏、新疆地区的边防部队，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三十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二十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但中国所作的一切，都被印方视为软弱可欺。印度总理尼赫鲁，竟然对他的亲信国防部长梅农、印军参谋局长考尔中格说：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只叫不咬”，可以放心大胆地干。

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时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国防部里，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本属中国却被尼赫鲁圈入印度版图区域的罪恶计划——“里窝那”计划，最后定型了。

在这次秘密的作战会议上，梅农首先声明，这个计划是在总理尼赫鲁赴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前，亲自授意他拟订的。印

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帕利特准将叙述了“里窝那”计划的内容。他说：里窝那是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名，因此时的印军参谋长二战时在那里作过战，故名之。

该计划的作战要点是：在边界东部，印军要占领塔格拉山，将此处中国军队赶走；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二十一个据点，全部占领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四军，参谋局长考尔亲赴东北边境任前线总指挥，并兼任第四军军长。

该计划遭到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的反对，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轻率的计划，是出自只善哗众取宠、纸上谈兵的考尔中将之手。他认为这种仓促地向中国境内推进，只会把印军推进坟墓，并可能导致中国反击进入印度国土。但除了个别人默认他的观点外，几乎所有的与会将军，都认为他怯懦得荒唐，里窝那计划顺利地通过了。

十月二日，尼赫鲁公然声称：印度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此刻，印军在边境西段，集结了五千六百多人；在东段则集结了一万六千余人。十月十日上午，印军入侵中国西藏扯东地区的一个营，越过克节朗河上游，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十四日，印国防部长梅农发誓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并飞赴边境的提斯浦尔城运筹作战。

这些情况送报中央后，引起毛泽东的深深思索：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又都是为世界称道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印度为何非要在边界以兵戎相逼，不惜流血和刀枪相向呢？他连续几天睡不安稳。

周恩来察觉到毛泽东的索眉苦思，亲自责成总参作战部负责中印边界问题的副部长雷英夫，与总参防突小组就此进行研究，

拿出看法，供毛泽东参考。雷英夫和防突小组副组长、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组员们及作战部边防处的参谋聚议了几次。

实际上当中印边界的局势益发紧张后，他们就常在王尚荣的办公室里，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情况和对策，在那段日子里，王尚荣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才熄灭。他们认为印方之所以敢在边界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近和制造流血事件，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印度政府不愿放弃原英国政府的扩张政策，不愿放弃对中国西藏的领土野心。尼赫鲁认为，只要把据点修在了中国的领土上，就有望作为即成事实，进而争得国际上的承认；

二是印度认为大的国际背景对其有利。美国一直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五十年代末，中国又同北面的邻国苏联交恶。中国面对着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威胁和经济封锁。

三是印度有在南亚地区充当霸主的欲望，以在中国边界咄咄逼人，显示其威风。

四是近些年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问题上升，因此引起的不满情绪，可通过边界的战事转移。

五是错误地估计了军事形势。印度方面认为：中国的主要正规力量在东南，用以对付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的反攻；自中苏关系交恶，特别是塔城、伊犁边民暴乱外逃事件后，北面的中苏边界又吸附了中国的大量军力，以致东、北两线即占去中国全部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中印边境一带是薄弱环节，新疆、西藏除少数边防部队外，几无正规部队。再则中国尚未从三年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复苏，没能力支撑战争，更难顾及遥远的西南边陲。印军的推进，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印方甚至将中国对印方略归纳为“只叫不咬”。

当毛泽东见到雷英夫，向他提出尼赫鲁为什么非要把战争强

加在中国头上时，雷英夫将防突小组研讨的意见，说了出来。毛泽东说前四点他也早已想到，对第五点尤为击赏。显然，不予迎头痛击，印方的进逼将永无止境；而打骄横而无准备之敌，是易操胜券的。

王尚荣通知成都军区司令黄新廷，将一个野战军调往西藏

毛泽东说“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

刘伯承说：这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布势

得知毛泽东有反击意向后，王尚荣及时通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要求两军区抓紧拟制、上报作战方案，提出作战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电话通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将部署在该军区的一个野战军，调往西藏；通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兰州军区的一个步兵师，将进入新疆。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否对印军在中印边界武装挑衅加以反击，进行最后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

在雷英夫和乔冠华介绍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映后，周恩来对之做了综合分析，得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结论。

毛泽东接着说：“多年以来 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 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在讨论中、印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和胜负几率时，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的赢打不赢呀？”

印度军方一向高估自己的战斗力，早年就声称其和中国军队作战可以以一当十，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军方到前线参观后，看法有些转变，但仍称可以以一当六。然而张国华不信那个邪，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我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犯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

在场的军方将领们，都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说，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布置。会议同意了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制的反击作战计划，以及总参提出的于十二月二十日反击的时间。

十月二十日凌晨，印军首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面进击。中国边防部队，在张国华主持的东段指挥部和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西段指挥部指挥下，于东、西两段奋起反击印军。至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时，东段作战部队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了旅

长达维尔准将；西段作战部队，拔除了印军建在中国境内的三十七个据点。

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日周恩来还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并于二十八日，全线中止反击作战。

然而尼赫鲁不仅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反而在国内宣布“紧急状态”，积极备战，又将三万印军置于中印边境地区。新组建的四军军长考尔，也亲临一线，要同中国军队决一雌雄。

自反击战打响后，王尚荣就昼夜坐镇指挥中枢，了解瞬息万变的战况，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总参命令，指挥协调。这里虽然没有雪山高寒、枪林弹雨，可殚思竭虑的运筹也非常紧张疲劳。一位一九三七年从军的老参谋，晕倒在作战室内，后来他成为作战部最早退下来的干部。

当印军部署的新阵势情报传来，军委和战略研究小组，立即研究了对之实施有效打击的部署。刘伯承说：这是一种“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布势，企图是阻止中国部队向毗临不丹的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对之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分割歼灭。王尚荣马上将这一部署，通知了前线。

十一月十六日，中国部队在印军又一次发动全线进攻后，实施反击。仅仅三天，中国的作战部队，就打到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来势汹汹的考尔，差一点成为俘虏。至此，印军共被歼灭三个旅。

印方已经无险可倚，无隘可恃，中国军队可顺势长驱直入，追歼逃敌。了解边界战事的印度人，此刻大多神情抑郁，中国人

会不会打过来？

而处在指挥中枢的王尚荣，则又一次领略了最高统帅的潇洒。毛泽东并不准备“宜将胜勇追穷寇”，就地停火，退避三舍，让世界和印度都感觉要我们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这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如是告诉他身边的战友们。

林彪说：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也不用这些人

“我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

彭绍辉悄悄透露了毛泽东的批示

周恩来对王尚荣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的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到各军区勘踏地形；研究拟制中越联合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首长，他似乎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所以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初，他被突然召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会后他私下对老战友说：“定罗瑞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年多后，他自己竟也成为“阴谋夺权者”，被揪了出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反对他作为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引见者。他们先向代总长杨成武、主管外事的副总长王新亭反映了意见，没有得到答复，就直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反映。徐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既然群众反对，就先不要让潘振武引见了。

此讯传到总参，外事局的群众贴大字报庆贺，同时认为杨成武、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他们写好后，来到作战室，要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们签名。王尚荣不同意。可群众非要领导们签，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王尚荣等领导无奈，只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这种事在文革初期司空见惯，可林彪出于要打倒贺龙的目的，借所谓“八二五事件”大做文章。他亲自煽风说：贺龙是个“刀客”，“到处搞夺权”。说贺龙夺军委的权，策划兵变，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而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八二五事件”是王尚荣在夺总参的权，与贺龙遥相呼应。

林彪给“八二五事件”定性是“反党行为，反革命行为，他们想全军性的搞政变，这不是小事。因此，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也不要这些人。”

就这样，王尚荣被关押了起来，遭受到残酷的刑讯。和他关押在一处的，军中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陈再道；政界有彭真、陆定一、林枫、李井泉、万里、刘仁、荣高棠。

当时，林彪集团给贺龙定下的主要罪状，就是策划军事政变。他们很希望通过逼迫王尚荣，得到想要的“证词”。贺龙专案组的人，一次次到关押王尚荣的地方，要他交代在贺龙处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等策划兵变阴谋的情况。

王尚荣说他从未在贺龙家和许光达单独见面；更没在贺龙家同时见到过廖、许两人。

专案组见从王尚荣这儿，实在抓不着什么用以陷害贺龙的证据，便要他交代如何吹捧贺龙，攻击、污蔑林副主席的。王尚荣说：“我对一些军区的负责人说过：林彪不在北京时，军委工作是由贺龙主持的。他照顾大局，接近群众，关心干部。”“我对个别同志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是听杨成武、肖华说后才知道的。”气得专案组的人一个劲儿地叫他“不许继续放毒！”

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两年后，在一次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老同志时，毛泽东说：“看来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他提出还有一些案也要翻，“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贺龙的案要翻，为因揪贺龙而遭陷害的王尚荣平反，也就有了希望了，可迟迟没有下文。一九七四年七月末，由毛泽东介绍人党的彭绍辉悄悄告诉黄克，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亲做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

七月三十一日，他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在三座门，受到中央军委部分负责人的接见。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到场了。王洪文主持，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邓小平的讲话开诚布公，要大家正确对待。时为军委常委的张春桥发言最长，说关于贺龙，毛主席早有指示，因为工作忙，办得晚了；并提及吕正操在文革中有错误。吕正操当即顶了一句：“做工作哪能没错误？过去工作有错误，今后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误！”

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前，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外，所有政

治局委员又同杨、吕、余、王见面。当周恩来与王尚荣握手时，王尚荣见他面庞清癯，先问道：“总理身体好吗？”还好，就是做过个小手术。”周恩来顿了顿又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你的问题我都清楚。”接着，周恩来问道：“你身体怎么样？”王尚荣硬挺了一下说：“我没问题。”

王尚荣终于走出了囹圄，但他的身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头部和腰部留下无法痊愈的后遗症，睾丸被打得一个萎缩，一个水肿。但他认为参与迫害他的人，多数也是不明真相的受蒙蔽者，复出后没有对整过他的人做任何计较。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

邓颖超打电话给王尚荣说：真是太对不起啦……

这年十月，叶剑英来到王尚荣家，在嘘寒问暖后，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要他出任副总参谋长，同时将任副总参谋长之职的还有杨成武、胡炜、何正文。因为王尚荣是在杨成武主持总参工作时遭关押的，故而叶剑英嘱咐他要同杨搞好团结。王尚荣说保证好好配合。

由于整整八年没有工作了，王尚荣急于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复出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部长后，便天天听总参各部的情况汇报，听作战部介绍国际形势、战备工作、部队部署、编制和设防工程的情况汇报。

他的夫人黄克和跟随他二十多年的李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带还没系好，就跑到院子里，问有要批的文件没

有？只要听说有文件，就不处理完了不休息。我们为了让他的病体早些得到康复，当没有急需回复的文件时，就只好骗他说没有。”

当时中苏的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而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

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百分之六十七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百分之三；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五十八万，欧洲就三十一万，而亚洲、太平洋和美广大地区才二十七万。

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当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

一九七五年，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国会提交一九七六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研究。发现施对美军事战略提出了新构想，较以前有三点变化：

一是主张改变在欧洲以苏，在亚洲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战略格局，认为苏对美威胁，不仅在欧洲，亚洲也存在。批驳了“欧洲存在缓和”、“苏联在东方遇到了麻烦”的“西和东进”论。

二是美军需和盟国一起扼守一线战略要地，不可能再像二战时那样，依赖盟国部队在一线为美国赢得宝贵时间。

三是准备同苏联打长期的常规大战，批判了基辛格的西方只有靠战术乃至战略核武器，才能抵御苏对欧洲的进攻的观点。

王尚荣等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汇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他的许多观点，映证了毛泽东对美苏争霸重点在欧洲等一系列分析。

就在王尚荣不知疲倦地在军事岗位尽职尽责之际，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因癌症不治，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新华社经邓颖超审看后，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着军装、戴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地图上标画着什么的照片。

端详着报纸，王尚荣怎么看照片中的“周恩来”，怎么像自己一九五一年在军事学院拍的为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照片。可在这种悲悯的时刻，怎么好去申明那张照片不是周恩来的，而是自己的呢？

过了一段时间，王尚荣突然接到了邓颖超的电话，她听说了那张标地图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便向他询问。王尚荣这才承认那张照片确实是自己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指出来呢？”那种时刻我怎么好去指出呢？那太对不起啦 照片是我审过的 你那张和总理太相像啦 结果让你这个大活人 当了一回逝去的人。”没什么 没什么。”

新华社为了进一步证实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还专门派了几个摄影记者，要王尚荣站在地图前，摆姿势，从各个角度拍照对比。王尚荣说：“别拍了 那就是我。”后来许多知情者出来作证，新华社做了更正。此事方了。

李先念说：要甩他一个耳光
在反击战打响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带参
谋班子进入指挥中心
华国锋、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无无都到
指挥中心来

一九七八与一九七九年之交，是中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正酝酿着重大调整，人民期待着在国家综合实力上空前跃进的时刻。此时此刻，一个安宁的国内和周边环境，似乎比什么都显得可贵。

但此时中国的南疆，却越来越不平静。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的越南，在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后，忘记了中国人民在其战争最艰苦的时刻，给予的人力、物力的最无私的支援。而将中国视为其取得地区霸权的主要障碍。

从一九七五年始，越南就开始在中越边界制造纠纷，蚕食中国领土。至一九七七年，已经发展到蛮横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连续挑起流血事端的地步。一九七八年，越南犯了当年印度犯过的错误，认为中国老一代政治家刚刚去世，十年政治动荡刚刚结束，中国的主要兵力布置在北方，不可能对越南的步步进逼，实施有力的打击。公然做出反华决议，急剧升级在边境的军事挑衅。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被迫作出在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用李先念的话说，叫做甩他一个耳光，警告、惩罚他们一下。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坚决地支持中央的

作战决断。

在反击作战打响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中央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中心。在这些天里，王尚荣严密地关注着前方的动静，几乎没有睡觉。

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中国军队向越军发起反击，迅速突过边界线。但由于种种原因，初期的作战并不理想。在战事胶着的几天里，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等天天到指挥中心来，叶剑英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邓小平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他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正像后来叶帅所说的那样，“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总导演，是邓小平同志。”

反击战持续了一个月，王尚荣在这数十天，就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有几位年纪比他轻的参谋人员都支持不住了，直到作战部队攻克越南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会十七个县市，重创越军四个正规师又十个团，毙敌三万七千的胜利捷报传来，他才舒了一口气。

对越作战后仅一年，王尚荣终于因积劳成疾，文革期间受摧残的后遗症缠身，不得不离开指挥岗位。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从红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坚持在战争指挥部，功勋赫赫的将军。一九八八年，当他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时，他的胸前，又增添了一枚一级红星勋章。

王敏清

保健总管五进五出中南海

王敏清 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王士英的儿子，在延安中学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于山西医学院毕业，到保健局工作。一九五四年进中南海，先后做过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江青、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且多次为毛泽东做过保健工作。一九八三年后，历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先后参与组织过叶剑英、班禅大师、胡耀邦等人的抢救治疗。

王敏清简历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他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二十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在本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政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其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我想倘若对他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寻常的经历，都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将与江青结婚，
他父亲领衔上书劝谏
康生质问王世英
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
去无妄之灾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

山西省洪洞县，同时洪洞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一九二一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优则仕 衣锦还乡”对他失去诱惑而涌动在胸的是“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在地下共产党和进步思想影响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胡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本人倾向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纳了不少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共产党人再难继续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革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属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党。自一九三一年始，王世英受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他组织了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但尚未来得及实施，方志敏就遭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中共的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炸毁南浔路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人员已经到位，可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因失去意义而终止。

那是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的部分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他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组织关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经王世英联系，在一九三四年恢复了党的关系。并由他代表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在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系统，曾一度代管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坚持白区斗争。直到王明、康生从莫斯科指令上海不再保留任何中央机构，他才率中央局人员转移到天津。

一九三八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很吃惊。四年前，蓝苹在上海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了对她的营救。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表现不佳。此后，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风流韵事，给他留下极坏的印象。他更清楚地记得，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时，国民党当局发起购飞机祝寿运动，蓝苹参与了这一活动。

已经确立了中共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他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信上签名按了手印。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他亲自将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央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文章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 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 应该受到尊重。”但没有写明张持反对态度的另一缘由 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并以自己的党性，为已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申诉。

他将报告递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负责人康生。康生见报告后，立即写信给王世英，要他把党票收好，不要乱保人，还附上了周峻烈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

王世英翻开材料一看，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派到延安的特务，周被审讯逼迫，只得承认，并招认他还在一九三五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四十四师中已发展为中共党员的旅、团长。看罢材料，王世英更认定这是个冤案。一九三五年出卖四十四师党员的叛徒叫吕渭鳌。事发后是王世英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四十四师抢救中共党员的。但他们迟到了一步，几

位党员已经被捕。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在此前根本不知道四十四师党组织的事，如何出卖？周的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怒，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延安便有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传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些时日并无动静。一天，毛泽东突然派人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他面就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他：“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十年后再看。”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的过火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了他的强烈的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父亲的故事。

五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延安保小的学生，都是烈士子女。不是真烈士子女，就是假烈士子女

和父亲相比，王敏清“参加革命”时就显得年轻多了。三十年代初，王世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

他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果毅扮做假夫妻。久而久之，在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战友情谊之间，又增生一重两情依依的爱恋。后来，他们结成了真正的伴侣。

王敏清对我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以夫妻身分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一直在故乡由家人养育的王敏清，接到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三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带着王敏清，并把情报藏在他的身上，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后来，他们还经常把密电码及重要密件，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即便敌特到家里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玩耍而一无所获。

久而久之，王敏清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熟的孩子，这过早地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感慨。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着还挺像样的，可那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很经常，我甚至以为搬家就得改名。所以，后来在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自己真正的家了，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永远叫王敏清’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摆脱了压抑的松弛和激动。”

到延安的那年，王敏清九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

在延安保小就读的，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王敏清这样的，父母虽在世，但有的在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也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是在树杈上挂一块黑板，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在地上练。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白家坪拍的照片，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上。

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贺光辉、林汉雄。那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白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照相新发的。照片是中央专门派人来拍的。中央领导们看到照片后，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些营养品给我们送来。我们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中学。在延中，十七岁的王敏清入了党。我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在这篇作文中，记述了一此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 using 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畅报告的干部的过程。

临汾战役打响时，王敏清成为正式的军医初进北京医院，带他的教授是给中央领导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康生吩咐：不见医生。但王大夫可以来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出任卫生部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 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

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二十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一九五〇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一九五四年八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保健局，又由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我说：“一到医院 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 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革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别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

病。我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我问王敏清，他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康生向院方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我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文化革命前，我父亲从未对我透露过他同康生的龃龉。我只知道康生同我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我家中看望我父亲，所以我去七号楼看过他。他那时对我挺客气，很关心，还为我写过几幅字，可我当年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
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
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
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谈话，对他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

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乎从未闪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一九五五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当时的中南海保健处也在这儿附近。中南海保健组、处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保健处有三位负责人，他们是周泽沼、周毅胜、黄树则，都是延安时期就从事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老资格。

王敏清刚到保健组时，保健组里共有六位医生：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因为毛泽东原来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刚刚离开保健组，到苏联学习去了，徐涛来接替他，但当时毛泽东的身体不错，又不太愿意见医生，而江青的身体则不太好，就让徐涛多照顾江青；顾荣奇医生没有固定的保健对象，机动，后来他接替了翁永庆；还有一位医生是巫鸿坤，负责环境公共卫生。

王敏清刚去时也是机动。所谓机动，就是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同时他还主要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我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

中央领导人观看时，我们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甚至曾闪过到延安评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会特别深。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

“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当然我们有时也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

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

一九五五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在西湖畔，王敏清受到毛泽东“表扬”

一九五五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些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一九五六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地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失去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新的热潮。

这年一月，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并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六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进一步跃进的构想。

也是这些天，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

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护士魏琳在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立即冲进屋里，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风趣地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虽然患有的一些慢性病，但都不是什么严重的病症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
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一九五七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杨尚昆的医疗保健。

“杨尚昆的身体情况好像一直不错吧，他有什么经常要医治的病吗？”“杨尚昆的身体情况应该说是相当好的，虽有一些慢性病，但都不是大病。他时常犯的病是低血糖、结肠过敏（拉肚子），还有就是因吸烟太厉害导致的慢性气管炎。”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十二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晕倒了。”

针对杨尚昆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杨尚昆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块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杨尚昆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仔细观察发现，杨尚昆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杨尚昆。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杨

尚昆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

“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杨尚昆。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是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一九六四年，杨尚昆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一年；文革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杨尚昆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杨尚昆接人待物，平易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杨尚昆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清都要与杨尚昆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时间。

每到这时，杨尚昆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者说某项某项检查做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杨尚昆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安排。可不久，杨尚昆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杨下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

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杨尚昆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而让杨尚昆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耿耿于怀。后来杨尚昆听闻此事，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问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孩子。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对王敏清说：为江
青找保健医生很不容易
父亲有难言之隐
江青心血来潮提议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
进餐

一九五七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一九五九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璋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候。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傅连璋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可行，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璋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同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他还得知，江青甚至因李强华辫子摩擦衣服的声音太吵，软硬兼施地逼她剪掉了。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如果谁出了声，江青就骂谁：“你是猪。”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到吃惊：主席的夫人怎么这么专横，这么不尊重别人？

“江青说同甘共苦、一桌吃饭，她和同桌的人都吃一样的菜饭吗？”“我们是坐在一起吃，但她的菜是单做的，和我们不同。她有时会拣两口我们的菜吃。”她吃得很奢靡吗？有的文章或书中说她常吃高级补品。”“在今天看来，倒不算很奢侈。鸡、鱼、肉、蛋，每顿总是有两样。有时也吃些高级营养品，像燕窝等，但不是经常不断。”

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不许别人吃饭出声，她自己难道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吗？”我问道，“记得某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也感到和江青一起进餐是受罪，因为江青吃饭时爱喋喋不休地议论这、评判那，而且吃相饕饕，让人厌恶。”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确实没有什么声音，否则她骂别人猪时岂不也是在骂她自己？”王敏清答道，“可也奇怪，她对辫子和衣服摩擦的声音都挑剔，可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

是从香港过来的。”

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下午查体
乍冷还寒的初春，江青寓所周围的园工
却光着脚
江青嫌过往的飞机太吵，吩咐工作人员
说：跟广东省委打个招呼，把白云机场
关闭掉

一九六〇年元旦过后，保健局根据江青本人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教授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检查身体。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关心，到广州时，让负责自己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吴旭君也来协助体检。

“据某医生回忆录，专家聚集的检查是在一九六一年春。您能肯定是一九六〇年吗？”“肯定是一九六〇年，否则我就不会在场了，而且有照片为证。”说着他翻出了几幅一九六〇年在广州他和几位给江青体检的专家的照片。“当然那位医生也在场，但他的叙述显然错了。”

他们迅速做好了检查的准备，可江青却编织出各种理由，今天有安排，明天不舒服，迟迟不能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坐等了一个多月。春节过后的一天，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也没看看广州，估计今天也检查不成了，便结伴上街去了。可偏偏在这天午饭时，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专家们，下午可以体检。

“我一听就急了，若告诉江青专家上街了，要她变更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真相，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代；马上寻找吧，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上哪啦？吃罢饭送江青休息后，我立即同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商议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寻找几位教授。结果出动了不少人，总算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给找回来了，我那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地。”

体检中，有几个查血的项目。抽血大概一般的护士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的人却步。王敏清对在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吧？李大夫推脱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护士长也有些犹豫。王敏清感到只有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 in 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的经验，一针就扎中了血管，快速而顺利地抽完血，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乍冷还寒的初春，不时有飘零的落叶撒落在院子里。但由于江青怕声响，负担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有一天王敏清清晨即起，当他推开窗户，远远望见江青住在一号楼台阶上，一位园工正光着脚，在一片片地捡拾落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到江青身边已经两月有余。最初他以为江青有病，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紊乱，导致脾气暴躁，心绪烦闷，产生一些乖僻的念头。后来渐渐感到这并非出于病态，而是她心态扭曲和极端的个人至上在作祟。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她甚至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她要广东

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在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广州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如此所作所为，哪里像我们党的主席夫人的样子？！王敏清幼年在延安，耳闻目濡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事业奉献，江青不也是从那个环境中走过的吗？可她的言行与延安的精神和宗旨怎么那样地格格不入？

王敏清想：江青的所作所为大概毛主席还不知道，他若是知道的话，绝不会允许她这样。可谁又能向毛主席诉说这些，给他增添烦扰呢？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为了毛主席解脱琐碎的生活问题的缠绕吗？离开江青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而，又不能主动要求调动，还不能敷衍工作，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冬季的广州，依然有蚊子。江青怕蚊子叮咬，可又不许采用喷药、点蚊香的方式驱蚊，认为这样对她身体有害。于是只得在晚饭后，江青散步和外出活动之际，动员小岛招待所和省委接待处的干部，到江青的卧室和客厅里面打蚊子。这些人行动要干净利索，否则江青在自己的卧室发现了生人，又要闹得鸡犬不宁。

有一天晚上，江青就寝较早。王敏清觉得这下自己也能睡个好觉了，便多服了一粒安眠药。可刚睡下不久，就听到江青招呼的电铃。他迷迷糊糊地走进江青的卧室，不知有何吩咐。江青说：“你们怎么搞的卫生？我的蚊帐里面有蚊子，吵得我无法休息！快叫护士来给我打蚊子。”

王敏清感觉到江青这是在刁难人，她的房间里只点着一盏台灯，而台灯外面还罩了一层厚厚的绿丝绒，暗得乍一进她的房间，什么都看不见，怎么打蚊子呢？可江青的吩咐又不能不照办，王敏清只好叫醒护士殷曼丽。

殷曼丽在江青身边受气多年，她走近昏暗的蚊帐前，束手无

策地愣住了。这一是由于看不见，二是不能有声音，怎么个打法呢。坐在远处沙发上的江青随即恶语相加：“你是死人呵，站着不动！”“蠢东西！”一通训斥。王敏清马上走到殷曼丽身边，悄声说：“你捕风捉影地打几下，就说打着了嘛。”他心里有数，蚊帐睡觉时才放下，里面绝不会有蚊子，江青听见的，最多是蚊帐外漏网的个别蚊子。经这一折腾，江青也困了，她睡着后没再找麻烦了。殷曼丽总算对付过了关。

保健处郑学文处长突然来到杭州毛泽东住地

飞机已经发动，江青突然责怪起王敏清、张仙鹏。并把他们赶下飞机

一九六〇年三月至六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匆忙度过的。他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参加的南屏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三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他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

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作的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候，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在幕后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如何工作。当他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对王敏清说，她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他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返回了北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服侍江青时间最长的殷曼丽，屡屡遭受江青的辱骂，“蠢东西”，“寡妇脸”……王敏清了解到她已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毛泽东原先的化验员朱宝贵恋爱谈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至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除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王敏清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

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忿忿，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王敏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当他给江青送睡前服的药时，躺在床上的江青突然说：“王大夫，你太高了。”

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江青从不抬眼看普通干部和工作人员。一般吩咐什么事情，她根本不看你，你可以站着，听完吩咐离开即可。但要同人对话交谈时，就要谈话对象处于比她视线低的位置。因此当她在沙发上和床上谈话时，对谈者就得处于半蹲半跪的姿势。对此王敏清极为反感，这不是在耍皇太后的淫威吗？哪里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听到江青的指责后，王敏清看在毛主席的份上，并想到遇事忍三分的自戒，往下蹲了蹲身子。不料江青又念叨一遍：“王大夫，你还高。”再低，就只有下跪了，王敏清忍无可忍了，没有再理会江青，办完事，站起身走出江青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见面时，江青对他说：“王大夫，你有架子！”王敏清没答理，心想你才有架子呢！事后，护士说江青为此事很生气，一夜没睡好觉。王敏清知道，此后可能再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但他认准一条，忍让可以，但人格绝不能丢失。反正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到哪里都一样干，你江青不满意，尽可另请高明。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青去北戴河。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他们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愠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的任务是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下去！”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飞机。

第一次到邓小平家中探望

卓琳告诉王敏清：鸡蛋倒是每天煮了，但是邓小平不吃
在朝鲜访问时，康生总和团长邓小平拉开一段距离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接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此事，也许还要费番口舌解释。不料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十分欣慰。

从北戴河回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组织决定他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一九六二年春季，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内勤卫士张宝忠、秘书王瑞林见了面，之后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他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邓小平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卓琳告诉他，邓小平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不仅棉被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

那时的邓小平身体状况很好，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

合。一次他中耳炎犯了，我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外边，当时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并建议每天早晨给他吃一个鸡蛋。

过了些日子，王敏清到邓家探视，询问起吃鸡蛋的事。卓琳告诉他，鸡蛋倒是每天早上都煮了一个，但邓小平没有吃，都给小儿子吃了。“他说他看着小儿子吃，比他自己吃还要舒服。卓琳也无可奈何。

“根据邓小平爱孩子的特点，有些我们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情，就通过孩子来做。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而他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办公一样，也是坐着，所以他的体力活动很少。我们劝，卓琳说，让他多活动活动，可效果不大。后来，每当该休息的时候，就让小儿子连拉带拖地把邓小平拉出室外散步，结果这一招还比较灵。”

由于邓小平的内脏没有病，所以，王敏清在负责邓小平保健医疗期间，主要是组织好邓的定期体检和外出时跟随他出差，算是医疗保驾吧！除了国内出差外，他还随邓小平出访过朝鲜和越南。

“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为抗美援朝作战之事，叶剑英、总

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曾秘密访越。您们那次访越是否也与此有关？”我问道。

“那我就知道了。我们保健医生只管保健医疗方面的事情，别的事情从不过问，人家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跟随领导人时，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们谈话时，没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我们向来不往前凑。”

“翻看相册时，我看到好几张您和邓小平在朝鲜拍的照片，您能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吗？”

“那次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访问朝鲜，团长邓小平，副团长是康生。康生对邓小平当团长、他当副团长内心可能有点不服气，老没个笑脸。而且代表团集体参观、活动时，他不是紧随团长，而是一个人总在后面，有时拣石头、看字画，或东张西望。团长、副团长老相隔那么远，是不太正常的，在外事场合更不妥当。一次邓小平曾对朝鲜同志笑着说：‘康老呵就是喜欢古董 爱考古 看见石头、字画就走不动啦。’”

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保健局撤销
史书翰、郑学文要王敏清四进中南海
王敏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揭发康生的长信，可信却落到了康生手中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其名包括撤销卫生部保健局，取消保健组。他还批评专门负责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北京医院，应该“改名老爷医院”，要北京医院对外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南海保健组也撤销了，回到北京医院。我们全体保健人员撤离时，在保健组的院前合影留念，毕竟在此工作多年。”

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到陕西省咸阳的牛角村“四清”，除了警卫赵宇田、中办机要室干部刘吉顺跟随外，组织上决定王敏清随杨一起去“四清”。

在陕西乡村的“四清”生活，使王敏清重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在延安度过的艰苦岁月。解放十五年了，中国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牛角村十分贫困，有的老百姓甚至买不起食盐和点灯的油。王敏清他们最初每天只能吃两顿棒子面糊糊，后来陕西省委看到他们工作组又苦又累，决定工作组另起炉灶，这才喝上了面汤。这也就是很大的改善了。

当他们“四清”结束，回到西安市时，刘澜涛曾在西安大厦款待他们吃炸馒头片。结果盘子一端上来，就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因为厨房已经下班了，做不了其他花样，只得再炸馒头片。第二盘、第三盘均很快被扫光，直到大师傅炸完第四锅，他们才打住。“那时肚子里缺油呀！不仅是我们终生难忘，在场的人都留下深刻记忆。”

一九六五年秋，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负责保健工作的郑学文处长，相继找王敏清谈话，要他四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自从撤销中南海保健组后，中南海内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的治疗，都得临时叫人来或出中南海去看病，很不方便。而原中南海门诊部并不担负领导人的保健医疗工作。史书翰、郑学文找王敏清，是希望他去后，能兼管一些原保健组的工作。

已经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王敏清，一再推托不愿当官，他说当

医生，治病救人足矣，从未想过担任什么职务。他推荐原保健组别的几位资格更老的医生，说他们更合适就任。可史书翰、郑学文一再找他谈，认为他曾为多位领导人服务过，相互熟悉融洽……王敏清最后答应，先由他顶着，希望领导继续物色人选，一旦物色到合适人选，他就退出来。

王敏清就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半年多，就遇着了狂飙疾雨。一九六六年初，杨尚昆已经处于被批判的状态。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将杨尚昆列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而王敏清长期担负杨尚昆保健医疗，并随杨到陕西“四清”，被视为同杨尚昆关系很不寻常，所以当批彭、罗、陆、杨进入高潮之际，王敏清也随之受到波及，开始受到种种诬陷。

不久，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原来康生曾诬陷王超北、刘雅洁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是特务、内奸，王世英为他们和康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父亲还给王敏清看了一九六二年他刻画康生嘴脸的诗：“阿庾逢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难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敏清听呆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康生经常来看望父亲，表示亲近；为什么对自己客气有加，并向江青推荐自己做保健医生……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手段封住父亲的口，不揭他们的短。当他们发现这一套对刚直不阿的父亲不起作

用后，便荫生祸心，乘“文革”之乱置父亲于死地，杀人灭口。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及其迫害王世英的阴谋。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他被多次抄家、关、斗，后来又下放西北劳改……父亲王世英于一九六八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九月，蒙冤十三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的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二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向党、向人民揭露康生的累累罪恶。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庄，一直为不能将康生劣迹抖落于天下，致使许多是非辨不清，民愤难平抑而耿耿于怀，收到这篇来稿，不禁大喜过望。当时还没有一篇如此翔实而有力度 的揭露鞭挞康生、能言人所未言的文章。可当时中央尚未对康生定性，发这篇文章要冒一定的风险，但也会引起好的轰动效应，因此李庄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未与其他人商议，便拍板发稿。

文章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刊出，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有人跟王敏清开玩笑：“你这是五进宫
啊！”

叶剑英肺炎复发

王敏清对杨尚昆立下军令状

胡耀邦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已经接到通知：准备布置追
悼会

一九八三年初，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通知王敏清，组织决定要他出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他呕心沥血创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刚刚走上正轨，马上离开有点舍不得。他推荐了几位同志，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他只得服从。

王敏清再次拿到了中南海的出入证。这是他第五次进中南海。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五进宫’啊！”

时隔十七年，王敏清又回到他熟悉的工作岗位，但工作却与以前不尽相同了，他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叶剑英的心与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为了及时向中央报告病情，王敏清每天参加医疗组专家们的会诊。

“负责叶剑英医疗的大夫都是一流的教授与专家。如邓家栋、方圻、陶寿淇、牟善初、王新德、朱玉珏、胡懋华、李家泰等。经过专家们夜以继日的会诊、治疗，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重。次日，邓家栋教授、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汪石坚和军委办公厅肖洪

达向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汇报了叶剑英的病情。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在场，杨尚昆让王敏清也到场听取情况汇报。

汇报完后，杨尚昆希望医疗组尽全力做好叶剑英的医疗抢救工作，并指派王敏清参加叶剑英的医疗组工作。王敏清受此重托，感到任务非同一般。“作为中保办的副主任，对任何一位患病的中央领导人的诊治都必须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对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我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抗战刚刚胜利时，毛泽东同我父亲谈了一次话，要他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工作部部长，不久即接到了正式任命。当时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由于共事，我父亲和叶剑英关系密切。而我在延安读书时，又和叶帅的孩子曾是前后同学。再就是我对叶帅敬仰由衷，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向杨副主席立了军令状，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

杨尚昆见王敏清充满自信，又吩咐说：在医治抢救过程中，要依靠专家，尊重专家们的意见，互相协调，通力配合。王敏清心里也清楚：叶剑英是党内、军内、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侨胞心目中非常有威望的老师，他的生命能延续一天，对稳定时局、祖国统一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会后，王敏清即随邓家栋、汪副院长一起住进叶剑英西山的家，同医疗组的专家们携手紧张地工作。王敏清告诉我：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当然主要是依靠专家们进行，他主要是了解病情及负责医务方面的联系与协调。一星期后，叶剑英的病情被控制住。

然而进入七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

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以至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王敏清再次进驻西山。

据王敏清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

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二十四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会儿。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的抢救治疗工作非常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做指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

当时医疗组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一流的，只要病情需要，即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援。

一天晚饭前，大约六点左右，专家们在会诊时认为，叶剑英此刻的病情需要请广州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会诊。王敏清和有关方面打招呼 and 联系之后，当晚九点半，钟南山医生奇迹般地出现在抢救大厅里。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知各国驻华使馆，今年的“八一”，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王敏清也在此期间随时同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保持着电话联系，要他们提前准备遗体保护工作，以防万一。

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务人员，仍在极力为挽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

稳地度过了“八一”建军节。到八月十日，奇迹出现了：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医务人员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一位护士说：今晚可以看看电视了。王敏清这才想起，自己竟有一个月左右没听广播和看电视了。

两个月后，叶剑英的病情保持稳定，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来西山探望，他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杨尚昆、习仲勋、胡启立和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抢救叶剑英的全体有功的医务人员。

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兼任中央保健局恢复后的第一任局长
温家宝的指示是“三个最”
在班禅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央抢救小组
的医生均未出席

从一九八四年年底，卫生部就在酝酿恢复保健局。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保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三十一年前，他成为保健领域的新兵时，还那样年轻。如今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已经两鬓飞霜了。他的压力和责任更重了。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是个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八点五十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他拿起电话才知是从

西藏日喀则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张建纪，是全国人大陪同班禅赴西藏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活动的干部。

张建纪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四点多发生心肌梗塞，我们在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王敏清听后感到事出意外，因为班禅在离京前没有任何会突发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尽管如此，北京医院还是派了内科医生和护士陪班禅赴藏。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保委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温家宝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王敏清和北京医院的院长蒋葆生、副院长陈曼丽经紧急商议，十分钟后便决定，王敏清亲自带队，内科心脏病专家沈瑾、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以及有急诊抢救经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组成抢救小组。同时迅速准备抢救药品与器械。

王敏清给杨德中打电话告知准备的情况及抢救组的人员。杨关心地问：“你亲自去身体行吗？”王敏清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年届花甲，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四年前还曾陪同当时是副总理的李鹏去过西藏；特别是作为领导，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带头上。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任务的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许孔让、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

在这些人中，王敏清的年纪最大。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

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王敏清非常赞赏温家宝的这一决断，因为他们是去救人的，如果在重庆等候天气变化，延误了时间，他们还去西藏干什么呢？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像摇煤球一样被颠来倒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五点二十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走了几步发现没人跟上，边嘟囔边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刘元恕正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沈瑾则由《民族画报》社的一位记者背着。他这才想到：他们毫无过渡地一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京，直达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日喀则，氧气稀薄导致了严重缺氧。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已经呈现紫色。

王敏清进入抢救现场是六点三十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

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等查清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遂下令恢复抢救。

沈瑾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和刘元恕商议，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沈瑾监视着心电图，进行指挥；由刘元恕亲自操作；护士们配合。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考虑到可能是机器故障，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王敏清、沈瑾、刘元恕，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八点十六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说明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十六个小时，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八点十六分停止跳动，病逝了。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终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的指挥有丝毫不

当之处。他紧张而疲惫的身心，顿感慰藉。

快晚十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才想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做了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 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 当时不仅是劳累 更主要的是缺氧。”

他回到休息的房间里，还没来得及脱衣服和鞋子，已经酣然入梦。第二天，向班禅遗体告别的仪式上，人们发现抢救组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到场，他们全都病倒了。

当王敏清他们离西藏返京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代表藏族同胞，对中央派遣的抢救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赠献了哈达。班禅的家属们也再三表示感谢，并说：抢救组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全国各大报均刊登了新华社关于班禅抢救情况的通稿，其中《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有如下文字：“由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专家刘元恕、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沈瑾等组成的专家组到达后，先后两次作心内起搏，持续抢救……”这种由新华社发稿，报道在执行医疗任务中医生姓名的情况，是罕见而不寻常的，说明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荣誉。

王敏清回首此事，感慨尤长：“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所以我们抢救过程中一举一动，每一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不光是实际工作的差错，就连可能引起旁观者感觉的差错也不行。任何一点差

错，都可能引发事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给党和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麻烦。仅就班禅逝大师世没有波澜而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胡耀邦突然昏倒在怀仁堂

胡耀邦对王敏清说：我不是心脏病，我是胃部疼痛

在海南，王敏清从广播中听到令他惊异的噩耗

一九八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四月八日中午，王敏清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他放下电话，丢下碗筷，乘车直奔中南海。

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乘北京医院的救护车来到这里。胡耀邦被移到怀仁堂的后厅，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心电图显示是心肌梗塞。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主任依据心电图显示告诉胡耀邦说：“您患的是心脏病，需要安静。”胡耀邦听后不相信自己患的是心脏病，他对王敏清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胃部疼痛，是胃病。”

因为王敏清的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王敏清对胡耀邦也很熟悉，知道他的脾气跟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

公。同时也了解他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连续紧张工作。

鉴于胡耀邦的性格习性，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于是，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

闭着眼睛的胡耀邦，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微微睁开眼睛，见他神态严峻，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问道：“住哪个医院？”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天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才将胡耀邦送到北京医院北楼，王敏清一直跟着把胡耀邦送到了病房，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才于晚七点左右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第一、第二天，王敏清都到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的病情稍有稳定。第三天，王敏清因有公务，匆匆离京前往广东、海南。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樣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的病情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赶回北京，立即去医院了解胡耀

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因为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胡耀邦对此很不习惯，非要上厕所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四月二十一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发病期间胡耀邦的孩子们不在北京；对他所熟悉和敬重的父执，他本应更多地守护在他身边，可他偏偏因事外出了，他后悔得无以复加。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到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

一九九〇年春，六十一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他胸襟恬静坦然：“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二十五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的身影。

赵浩生

穿梭于大陆、台湾、香港高层

赵浩生：一九四五年进入《中央日报》，因采写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政府还都大典、有美国参与的国共和谈等重大政治新闻而名声鹊起。一九四八年任《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记者，继而赴美留学，后留在耶鲁大学任教。他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成为联合国注册的记者。一九七三年他重返大陆，写下一系列报道，被视为海外华人认同祖国、回归大陆的开拓者。八十年代后，他时不时出现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高层政要之侧的身影，使他更具神秘色彩。

赵浩生
简历

大凡爱看《参考消息》的中国人，相信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赵浩生”。

我是就是从《参考消息》上连载的《海外归来答客难》系列鸿篇认识他的，这篇被称为海外华人认同祖国、回归大陆历史进程中筚路蓝缕的开拓之作，其阒中肆外挥洒间亲情、人情与爱国情的水乳交融，与彼时国内充斥“假大空”新八股文风的乏味，恰成鲜明对比，让人过目难忘。

当我写了一两篇文章，记述了作为新闻前辈的赵浩生与国、共几代领导人的过往故事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也多是从《参考消息》上得识赵先生的，也曾被那力透纸背的真情感动得热泪潸然。他们告诉我很长时间没读到赵先生的文章了，很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

打那儿以后，我每与赵先生见面闲聊，总设法把话题引到赵先生的身世，一点一点地将他人生精彩的片断，缀联成篇。

小小的息县，却有一段载入儒家经典的历史
赵浩生就读的开封中学里，出了几位在中国大大有名的人物
向往延安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息县，位于和鄂、皖两省相邻的豫东南一角，这个县很小，县城就更小，用赵先生的话说是：“在东城门摔个跟头，摔掉的帽子就滚到了西城门。”

“提起往日的河南省，有人说可用三个字形容，即‘古、

土、苦’，我们息县，可算是‘古、土、苦’的典型。”在赵先生几次向我这样介绍他的家乡后，我做了一番钩稽，感到赵先生的话果然不虚，皆有出处。

息县并未因其小且偏僻而史上无闻，它以周王赐给息侯的封地而得名。息侯的夫人息美艳绝伦，以致楚文王在得闻此情后，竟为占有这位美丽佳人发动了一场灭亡息国的战争，就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占有盖世美女海伦而劫掠了希腊。

但息不是心旌摇荡的海伦，被掳后的她趁楚文王出游之际，偷偷见了息侯，告诉他“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身更二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随即赋诗一首“妨则异室，死则同穴，有如不信，视于敷日。”吟毕自尽，息侯亦同日而亡。

这感天动地的贞节故事，被记载入了十三经中的《诗经》、《左氏春秋》，还上了西汉经史大家刘向著的《烈女传》。然而在此后近二千七百年间，息县再未于文史经典上露脸。

说到息县的“土、苦”，我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得到应证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干校最初开办在息县，杨先生说：凡是到过息县的人，都是对那里的闭塞、贫困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学部的干校竟无法在那坚持下去，没多久便因饮食饱暖问题而他迁了。

赵浩生的诞辰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的幼年，被大革命的喧嚣包围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从战败国德国的手中取回被占领土，热血的士子学生们被激怒了，以他们作主角在天安门前演出的旷古未见的悲壮一幕，被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从此揭开。

继而，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近期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继而，革命经年的国民党和新生的中国

共产党，携手北伐，以完成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使命；也就是赵浩生初入学堂的时候吧，“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飘拂到了鄂豫皖相交地的上空。

也许赵浩生还是晚生了几年，他没能像我曾写过的另外一些出生在鄂豫皖边界地域的人物那样，从此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那个时代重大革命事件的参与和目击者。

潮涨潮落本是自然律动的节奏，可人类历史的行进亦不与之悖反。没过多久，大革命的高潮即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反共而急剧跌落。曾经飘拂过的革命歌声中包涵的理想，不可能在历史的瞬间就置换广大中州民众意识中被浸淫了数千年的封建理念，当毗邻息县的潢川县中国共产党人谋划的暴动，被国民党推入血泊之中，闭塞的息县民众的娱乐，竟是到衙门口观看杀人。

彼时惨遭屠戮的，大概多为共产党人吧，当听着赵先生陈述他以孩提的眼光看到的那一幕历史片断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鲁迅作品《药》中描述的场景，华老栓拿着馒头去蘸革命者鲜血，以医治自己儿子的痼疾。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赵浩生没能感受到那场革命大潮的激越；潢川县共产党人喋血的惨烈，与正读着小学的赵浩生，距离似乎也远了些；但革命落潮后的黑暗和压抑，却并没有因他身心尚幼，而无知无觉。

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仅剩数百人的武装遁入方圆不过五百B024里的罗霄山余脉，便把主要精力，用于降服拥兵一方的军阀，以成就蒋氏一统天下的大业。继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大战之后，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又开始了，这次搏杀的主战场，就在赵浩生的家乡河南。

而在那蝥螭沸羹的岁月，赵浩生家中偏偏没了顶门立户的汉

子。受过些新思潮濡染的赵浩生父亲，是因拗不过父母之命，才与没文化的母亲合^婚的，故而婚后不久便出走不归。

于是每在兵荒马乱的深更，弱妇雏儿只有紧紧地抱在一起，怀着任人宰割的恐惧，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乃至一个甲子过去了，赵浩生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那提心吊胆的情境。

赵浩生还记得，为了躲避军队拉伕，舅舅们不得不藏在家中，由年迈的姥姥去买冬季喂驴的稻草。看到裹着小脚的姥姥被沉重的担子压得东摇西摆，乱蓬蓬的白发被冷风吹得和稻草飞卷在一起，如注的汗珠顺着她脸上纵横的皱纹流淌，赵浩生便泪眼模糊。

也是那段岁月，赵浩生的姥爷、大舅死于“痰塞”，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肺结核。他看到姥姥涕泪滂沱地对着姥爷的遗体嘶喊：“我哩天哪！我哩人哪！可怜你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你今后不再受罪了，啥也不管了，你叫我们咋着活下去呵？！”声声哀号，给赵浩生幼小的心灵留下死了比活着好的深深印象。

世道太黑暗了，生活太贫困了，而心灵则备受压抑，这大概就是革命产生的温床吧？此时的赵浩生，固然还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拨开黑暗，趋向光明的意念已在心中萌芽。他听在外闯荡的父亲说，有一种叫手电筒的器物，即便是在风雨如磐的昏黑夜晚，它也能将脚下的路照得雪亮。于是能拥有一支手电筒，竟成为赵浩生儿时最大的奢望。

“……手持银色的电筒，一道闪光划破黑暗，照亮了泥淖不平的小路，可以从垫起的砖头上走过去，电光闪闪，威风凛凛，真一世之雄也。”他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童年有过这样的奢望，以致三十年后他在香港采访已经功成名就的塑料大王丁熊兆，得知就是他当年在上海生产出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

无畏牌”电筒和电池时，当即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并从此与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父母突然回家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开始关心儿子的学业。“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救国”的口号，在那个时期，远比如今更能撼动国人的心，何况赵父是个受过新风气吹拂的人；当然我也不排除其间中国父亲固有的“望子成龙”的成分。

他把儿子带到开封，寄栖在曾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乡友人家中，让儿子认友人的妻子余芳馨作干娘，随后送入更新、更具现代意味的学校。他根本不考虑乡村学堂与城市新学校的差距硬逼着赵浩生升入四年级就读。

同当年他弃家不顾，给予赵浩生的是饱尝孤儿寡母的凄楚一样；他眼下的关心，又使赵浩生平添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进开封的学校第一天起，赵浩生就开始为缩短与同学间的数学差距而疲于奔命，并在尔后几乎每一个假期，都为准备补考的沮丧和疲劳的阴霾所笼罩。

数学蹭蹬人后的心灵挫伤，也许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赵浩生生性好强，数学有所短，就在文学方面争强。多年有母无父的遭际，自然而然濡染上多愁善感；寄人篱下的生涯，培植了对周围事物的敏感，这些恰恰是吸纳和蕴育文学必要的铺垫，故而他对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悟解，明显地超过了同龄人。

小学毕业后，赵浩生进了开封中学。这所中学当年真是汇集了中州的精英，数十年后，颇出了几位在中国甚至世界大大有名的人物：有曾出任过总理和总书记的赵紫阳，有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

从事教育工作的余芳馨，对息县籍有出息的子弟充满爱抚之

心。认她作干娘的，并非赵浩生一个，于是赵浩生有了一些干兄弟。其中有一个干哥哥叫周新吾，在北平读大学，他在假期会回来时，会携带一些思想清新的书刊，会讲许多新鲜的事物。

受周新吾的影响，赵浩生开始苦苦思索，为什么广大农村的民众在生不如死的水火中挣扎？为什么世间存在那么多黑暗与不平？他更如饥似渴地浏览，在书籍中寻找答案，求索冲破黑暗消除不平的理想之途。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面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严峻现实。这对一个民族看似极不幸的，然中国至圣先贤有句名言：“无忧患敌国者国衡亡。”没有存亡危局，就不可能唤醒大批热血儿女，投身捍卫社稷国祚的伟业。

经周新吾的介绍，赵浩生加入了进步群众的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一起从事救亡宣传的过程中，赵浩生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

救国抗日，强国革命，这一思维逻辑，很快征服了年轻而对积贫积弱、专制腐败国家现状不满的心。当纯真的友情中，注入了政治的因素，最终会导向一个极自然的目标——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在周新吾的帮助下，息县许多爱国且追求光明的青年奔赴延安，包括赵浩生的舅舅、姨妈、表兄，他也怦然心动，想加入这一行列。

父亲看穿了赵浩生的心思，可他不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该走的理想之途。他以家长的口吻强迫赵浩生到大后方四川继续读书，并亲自押送赵浩生由河南而汉口，转托一位朋友继续监护自己的儿子入川。

当记者的念头萌芽了

《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

周恩来说：在降旗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赵氏父子还没有分手，日军飞机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炸弹落处，楼坍砾崩，血肉横飞。赵父一位朋友的妻子分娩后尚未离开武昌医院中，就在轰炸中与婴儿双双罹难，现场惨不忍睹。

他们协助朋友料理完丧事，乘渡轮返回汉口时，已是夜幕笼罩，四周死一般沉寂，唯有长江流水汨汨呜咽。面对周匝弥漫的死寂，赵浩生骤然生出一重惶悚：硝烟血光之后，死者被黄土掩埋，一切渐渐会恢复如常，仇恨也可能随逝波而淡漠，那死者的血岂不要白流了吗……

入夜，赵浩生辗转反侧，他感到他有责任将自己目睹的一切告知广大的国民，用亡灵的遗恨，播下复仇的火种。虽然他刚刚踏入高中的门槛，虽然他从未领教过新闻技法，他只将一腔喷薄的激愤倾注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撰稿署名赵浩生。通讯的文字或许难脱稚嫩，但如泣如诉的写实，以及字里行间澎湃着的狂潮般义愤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他自己。

赵浩生原不曾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如此效果，自己的所知所感，能引起社会的共鸣，自己的名字一下嵌进成千上万读者的脑海，其成功感让人陶醉。作一个报人，也就是以记者为职业，对年轻的赵浩生骤然生出不可抗拒的诱惑。

然而，此时的赵浩生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向往，当他被父亲委托的监护人送到重庆后，他偷偷地跑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赴延安的请求。结果此事让监护人得知了，他极力阻挠，投奔延安之梦再次幻灭。

延安去不成了，但赵浩生依然热情奔涌地参与抗日的宣传活动。这时，有文坛神童美誉的吴祖光，创作出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讴歌东北抗日英雄苗可秀。赵浩生随即与他的宣传伙伴们排演了这部话剧，他扮演剧中人，把许多青年导向爱国之途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赵浩生先生和我在吴祖光先生家相聚畅谈时，很自然地就忆起了这段往事。赵先生背了几段台词后，仍觉不过瘾，又唱起了《凤凰城》话剧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峰烟匝地，沦落我神州……”吴祖光先生听着，连连说道：“一字不差，一字不差。”

也是在那一年，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我说：“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处在恋爱的年纪。”

在抗战八年中，赵浩生既读书，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流动于西南数省，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不能写。”

也许，他觉得那“满身香雾簇朝霞”的良辰美景，那“无端隔水抛莲子”的玄妙，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

自从《是种子，不是死尸》体尝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赵浩生便不辍笔耕，时常向报社投稿，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也不间断。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

当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初见分晓的时候，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不久，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中央日报》。

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中央日报》的“面试”：他按通知于深夜十一点晋见社长，走进社长办公室，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对赵浩生的话，他心不在焉“啊，啊”两声，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就说：“明天到采访部上班。”

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莫非他仅一瞥，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好料？更何况《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可胡连你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这实在出乎意料。

后来，赵浩生了解到，当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

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而至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 廖化充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应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十二家报章之聘，领取十二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洋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

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他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主席长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没。当时在坐的有国民党代表八人，其中孙科、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父子间的家务事，外人置喙也无用。

我在有关的史料中，只看到在一月十四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随即提议释放西安

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

他使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一条在《中央日报》用，一条则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特殊报道，写一页，传递一页，文章占了报纸的大半个版面

蒋夫人亲自开球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关注的场合更显活跃。他一再置身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以致周恩来、邓颖超都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他时常出没在各种聚会或文化名流的沙龙，交游日广。在育才校庆的舞会上，他目睹身穿褪色军装的叶剑英，同自己的舞伴谈论英国诗人雪莱；一次演出后，演员白杨请郭沫若题词，郭沫若大笔一挥写下“我爱白杨”，惹得观者哄堂大笑。他还常常搭主管文化宣传的国民党中委张道藩的车，去沙坪坝学校区去采访，他知道，张道藩到那儿去，是与早已和徐悲鸿分钗断镜的蒋碧薇幽会。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作撒在文章大菜中的小佐料。

虽说赵浩生是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记者，可在新闻采访过程中，他还是以他的聪敏、敬业、真诚、友善，与持各种立场的报纸的记者们，甚至和中共《新华日报》的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山城重庆采访，出门爬高下低、翻丘越岭，是很辛苦劳累的。赵浩生时常让接送他采访的吉普车，从《新华日报》社门前绕一下，捎带《新华日报》的记者，一起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有时，有些新闻发布会《新华日报》的记者参加不了，他便应人之约，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发表在两家针锋相对的报纸。

“这种事干了许多回，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赵先生接着说：“一次，我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工商贸易行业的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希望加以报道。于是我就写了两篇报道，发在《中央日报》上的，是政府方面在会上介绍的如何扶持工商业，促进出口贸易的情况；给《新华日报》的稿子，则反映工商行业人士在会上对政府经济政策，行为不满所发泄的牢骚。两者都是座谈会上的真实情况。”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宋美龄随即赴孙中山陵前奉行还都典礼，国民党军政大员齐往参加，全南京城内，也是普天同庆、万众喧腾。赵浩生从头至尾随行，对整个过程进行报道。

那天，赵浩生站在中山陵最高讲坛一侧，耳听讲演，眼观典礼，手则奋笔疾书。那是一份特殊待遇的报道，为了抢发这一重大新闻，他每写完一页，马上就有人将这一页传下高高的台阶。台阶下，早有邮递专车在等候，接稿即疾驰上海，发到印厂赶排。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一页一页传递，一页一页赶排。第二天，《申报》第一版几乎整版，都是赵浩生的这篇通讯，题为《唱啊 南京》。

这篇通讯采用移步换景、多视角、多层次的写法，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南京城内外数十里军民欢腾雀跃的情景一览无余，通篇吞吐着海立云垂的浩然气势。

赵浩生说：“这是我写得最过瘾的一篇报道。三十九年后，当孙中山先生冥寿六十年纪念之际，我再次造访南京，又瞻仰了中山陵，并应邀演讲。故景新情，《唱啊！南京！》旧日文章又浮现脑海，于是我依然援用它作为此次演讲的标题。”

到南京后不久，社长胡健中离开了《中央日报》，回到他自己创办的《东南日报》。出乎赵浩生意料的是，胡先生竟邀他进入《东南日报》，并聘他为驻南京的特派员。

回忆起胡先生的“师傅领进门”的往事，赵浩生良多感慨。最初见面，他不过“啊，啊”两声，并不曾醍醐灌顶点化迷津，使赵浩生深识“修行在个人”寓意。后来，他才明白，胡先生的风格就是让新人在新闻实践中自我修炼。胡先生的用人之道是颇值得借鉴的：给一方天地，而不置任何羁束，是鸿鹄必飞得最高，是骐驎定奔得最远。许多年之后，赵浩生更闻知，胡健中先生曾于不动声色中荫庇过自己。

初为《东南日报》驻南京记者，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热点是周恩来率团来宁谈判、马歇尔继续调处使命、毁众誉寡的国民大会……事事牵涉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国民党的统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报章行文置喙，动辄得咎。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赵浩生有感于一些代表行止恶劣类同地痞流氓，便写了篇《国大中的一股逆流》的短评，予以斥责。文章惹恼了对号入坐的代表们，他们聚众向也在国大会上的胡健中抗议，说赵侮辱国民大会，应撤职查办。但胡既没撤赵的职，且连这些人找他麻烦的事也未对赵浩生透露。

一九四六年夏季，赵浩生随蒋介石到被称为“夏都”的避暑胜地庐山采访。其时国共和谈已濒于决裂，赵浩生以为在最高决策人榻侧，或能捕捉到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消息。

孰料，中共代表周恩来，为表示对蒋介石欲将局部内战引向全面内战阴谋的反对，对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相继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的义愤，留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拒绝上山。作为调解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因此也留在了南京，仅在周末到庐山与其夫人聚首。

这样一来，踌躇满志尾随上山的记者们，无新闻可写，赋起闲来。文人禀性的赵浩生倒没觉寂寥，“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平湖青黛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诗仙词圣们的赞叹，勾起了他欲识庐山真面目的兴致。

赵浩生昼间倘佯，傍晚为文，险峰飞瀑，古刹花径，无不涉笔成趣。每天总有五千字左右匡庐风光云雾的文章，通过电报局发往报社。终于有一天，赵浩生接到了总编辑杜绍文的来电：“大作可读，但电费可观，再这样打下去，要把报社打垮了！”赵浩生只好“忍痛收笔”。

并非所有的人都似赵浩生这般，有叙景抒情的闲情逸致，无聊乏味之间，部分记者提议，与总统的侍卫们进行一场篮球比赛。

记者们遴选出最精壮的汉子，组成老爷队，与孔武有力的侍卫们一决雌雄。蒋主席总是公务缠身，无暇捧场；蒋夫人却有意与民同乐。她亲临球场，为比赛开球。

秀才遇上兵，其结果不难想象，主席也会礼让三分的无冕之王，被身手矫健的侍卫们打得一败涂地。三十余年后，赵浩生获得一次单独拜谒宋美龄的机会，刚见面他就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请宋美龄过目。照片正是当年球赛结束后的合影，记性颇佳的宋美龄随即说道：“那次你们可输得好惨哪！”

南京机场，热得汗流浹背的梅益，无论如何也不脱长衫
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
美国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
事件，相继发生

和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而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南京时，身兼公务私情的赵浩生，随着送行的人们也到了机场。那天天气闷热，赵浩生等都穿着短袖衬衫，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却捂着一件长衫。

望着梅益与天气不太和谐的衣着，大家几次好心地劝他把长衫脱掉，可梅益支吾着就是不脱。四十多年后，赵浩生在北京再次与梅益重逢，言谈间又说起在南京机场分手的情景。

梅益笑着对赵浩生说：“其实我理解你的好意，但当时我不能脱长衫，也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时我的衣服里藏着许多金条，那是我们的经费，一脱就该露馅儿了。”

国共再度枪炮相向，作为曾有过投奔延安念想的赵浩生，每每在写报道和时评时陷入两难。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抗战惨胜之后，应该有段休养生息的和平，内战显然是有违民意的。

放眼寰宇，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革命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可赤县之内，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沦陷区民心本为“想中央，盼中央”来接收，孰料，盼来的却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劫收”。

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了一部以接收为题材的话剧，名为《五子登科》，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霸房子、占车子、搂金子、吃馆子、玩女子”的种种丑态。

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被赶出境了，但美国兵又被国民党政府邀请了来。没多久，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美国水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一类的事件，就相继见诸报端，中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列强奴役、欺辱的命运。

又过了些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兴起，刚刚脱下学生装不久的赵浩生，眼看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将棍棒和高压水龙，对准还穿着学生装的热血青年们。

也许，当时的赵浩生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中国正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还不太理解，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民心，走向颓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褪去了挥洒《唱啊，南京！》时的豪情，不忍睹与渴望日益拉大距离的现实，更不愿与这浮华颓靡的世界一起沉沦。他开始拼命地补习外语，并最终《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身份，离开了祖国。

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可函札一去无消息

今泉智慧小姐，突然出现在赵浩生的逆旅生涯之中

当赵浩生浮槎东渡之际，当哺育他的这片国土在视线中渐渐远去，他并不曾流露感伤情怀，因为内战中的祖国的走向还扑朔迷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他这一别之后再度重返故国的旅程，竟会那样的漫长和艰辛。

初到日本时，日本刚战败的痕迹还到处可见，赵浩生在此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都住着由战胜国来的人，赵浩生也跻身其中。所以他在数十年后，形象地用住饭店、吃饭，概括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变迁。

他说：“最初，我能请日本人吃饭的饭店，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肯问津的，被邀请者对能进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颇感荣幸；后来，在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对日本人来说，渐渐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请我的饭店，倒是我不太敢于问津的豪华饭店了。”

在饭店里，他首先结识了盟军司令部特批进入日本从事商贸经营的二百家公司的各国商贾，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如当年在美国餐饮业界小有名气的李兆焕。他与如今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船王董浩云，也是在日本定的交。

但没过多久，他就体尝到中国只是二等战胜国的滋味。他看到，每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或各盟军代表团插有国旗的座车在街上开过时，路人皆对之鞠躬致敬，唯对插着国民党政府国旗的座车熟视无睹，连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商震也感到面上无光。

中国何时能真正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呢？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并未因大洋的阻隔，减衰赵浩生心头的震撼。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坚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篱以来，中国哪一届政府曾如此豪迈地与世界对话？赵浩生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线希望。

在备受屈辱的历史被翻过去的那几日，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的新闻笔触又逢为翻天覆地变革而讴歌的机遇。他给当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之念，还随

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推想，也许是因自己《中央日报》记者的经历而不被接纳？人生真好比下山的殊途，在山顶不过几步之遥，而到了山脚却参商远隔了。

也是在此时，《东南日报》从大陆迁台湾，可印刷机械设备却在航运途中沉没，再无力恢复，一份在中国新闻史上闪烁过熠熠光彩的报刊就此殒没。报社不存在了，自然也就无需驻日本特派员了，赵浩生成了无所归依的“天涯沦落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当自己母亲和兄弟所在的祖国，结束了战乱，显露百废待兴的生机时，赵浩生却浮萍飘蓬一般在异国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此时此刻，女性的温柔，大概是最能抚慰羁旅难归游子的心灵了。

在日本，有一所著名的津田塾女子大学，据说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寥若晨星般的几位卓异女性，皆出自这所大学。赵浩生在日本期间，曾应邀赴这所大学讲演。向他发出邀请，以及在学校负责接待他的，是当时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泉智惠小姐。

我还是在一九九四年，即与赵先生相识多年后，才得识其夫人今泉智惠女士的，她身材修长，文质彬彬，年轻时亭亭玉立的风韵可以想见。如今赵先生每言及夫人便由衷感叹：“她是个圣人，她很爱我，是那种带几分崇拜的爱。”由此能推想她的兰心蕙质。显然，赵浩生别出机杼的谈吐和倜傥脱俗的风度，赢得了这位才貌双全女子的芳心。

记得我和赵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彼时在台湾汽车配件行业风骚独领的叶松根先生也在座，他精通数国语言，因而推测在日本、美国皆有一番因缘的赵先生日语一定不错。赵先生当即自豪地说：“我的日语流利得足以打动日本姑娘倾心相许。

在那以后，我曾提出请赵先生谈谈和今泉智慧女士相识、相恋并终成眷属的细节，但赵浩生回复的寥寥数语让我大失所望：“一个未婚的男人，一个未婚的女人，他们相遇了，相识了，又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便结合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就这样，很简单。”

“怎么会呢？一个异国的男子，同一个异国的姑娘，他们的背景都是礼仪繁缛的国度，他们的婚恋，不可能是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我很不甘心。

赵先生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大多数终成眷属的婚恋，并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缠绵悱恻、感天动地，而确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相反那些终不能成眷属的苦苦相恋，像陆游、唐婉那‘一杯愁绪，几年离索’，‘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才是既罗曼蒂克，又感人至深。”

“打个比方，”赵先生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已经结了婚；一个女人，也已经结了婚。因为某种机缘，他们相逢相识，蓦然发现，对方才是心灵久久寻觅而未得的意中人。而他们不忍心毁灭已有的、并不乏温馨的家庭，命运又总驱遣他们天各一方，并注定不能成为眷属。他们只能靠心灵相互拥有，并爱恋得死去活来。这才叫恋爱，恋爱不一定能结出婚姻的果实。”

听着赵先生那番话，我脑海仿佛骤然落潮，一切曾经过眼的古今中外爱情名著中的有关段落，像海边的礁岩一样浮现。赵先生拟构的情节虽有点远离尘寰，但感觉似比真事更富魅力。那一年，《廊桥遗梦》好像还没有问世。

数年后 琼·帕特森教授在明信片上认错
耶鲁大学培养了三位美国总统
傲慢的人类第一位太空人

赵先生至今没有对我亲口讲述他和今泉智惠女士的婚恋始末，这一段故事，我还是在他送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文字果然简简单单：

“一九五二年，他们（即赵浩生和今泉智惠）先后赴美留学。在美国，这爱情的花朵终于瓜熟蒂落。贤惠的妻子给了漂泊的游子以心灵的慰藉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赵浩生的后半生有了一个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伴侣。”

这对异国男女接踵去了大洋的彼岸，赵浩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全部奖学金。当他踏进大学门槛时，正逢美国偏执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年月。由于美国扶持蒋介石，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向东方扩展的决策，以蒋介石溃逃台湾而告失败；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枪炮相向，又增添了一重仇视，美国国内反华排华的气氛更为浓郁。

赵浩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租房子，房东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拒绝出租；他作为第一家中国人在白人住宅区买了房子，搬入的第一天，玻璃窗就被邻居的孩子打破。一次他走在路上，几个美国小孩见是中国人，竟唆使一条狼狗咬他。狼狗被他手中的石头吓退了，但那几个美国孩子恶作剧的笑声，却永久地嵌在了他记忆中。

那一瞬，他深切感受到一个没有强盛祖国背景的侨民，是多么的孤伶无助，经常迎对着，怎样的屈辱；对回归家邦的渴望，对祖国昌盛的祈盼，从未有过地在心头急遽膨胀。

可是，家邦已是海天遥隔，连音讯都断绝了，他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挚爱，化作学习的动力。凭借触类旁通的悟性，当记者训练的敏锐和中国人特有的刻苦耐劳，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由于大洋的阻隔，特别是美国政府选择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人为设置起一道厚厚的“竹幕”，导致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隔膜和误解。在美国读书期间，赵浩生就对此屡有感触。

赵浩生对世界外交史课程很感兴趣，他甚至想在学成之后，从事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但是在美国大学执这一课程教鞭的，都是美国人。因隔膜和误解，无知、偏见乃至荒谬的推论，在授课中时有显现。

给赵浩生讲授美国外交史的老师是琼·帕特森，是位学识和教德都令人钦敬的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作战中双目失明。但他熟悉校园和他教课的教学楼，当他昂首阔步走进教室时，不知情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是盲人。

但即使是这位令人钦敬的教授，在讲授美苏、苏中、中美关系时，依然时出荒诞不经的论调。有一次，赵浩生实在听不下去了，顾不得尊师重道的传统，同他在课堂上辩论了起来。

帕特森并未以师压人，颇有涵养地听完赵浩生的见解，又以自己的逻辑加以反驳，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赵浩生觉得这样做影响他人听课，就给帕特森写了张纸条，请求免听中、美、苏关系课程，而写一篇论文作为该课程的学习成绩，帕特森同意了。

帕特森在分析苏中关系发展前景时认为：中国将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成为苏联新的卫星国；且在苏联的驱使下，使中国同美国交恶，并成为亚洲和世界的祸患。赵浩生不以为然，他从中、苏的历史渊源，中共、苏共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的同异等方面条分缕析，得出中、苏两国势将分道扬镳的结论。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深度和远见的论文，但因与帕特森的观点相左，帕特森只给他打了个“B”，评语只有一句话“是非只有

时间能证明。”尽管如此，在帕特森教授其他内容，在段落终结时，他总爱讲这样一句话：“赵，请你也谈谈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当赵浩生毕业离校后，他和帕特森一直保持着在圣诞节前互致贺卡问候。一九五八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征兆已隐约可察。就在这一年圣诞节前，赵浩生在帕特森寄来的贺卡上看到这样一行字：“赵，好像是你对了，那篇论文你应该得‘A’。”

有意思的是，以上这段往事并非是在赵先生同我讲述自己身世时说的，而是在议论美国今日的对华政策时说的。他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那些最令人讨厌的，就是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即“中国通”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旧日的成见，且至今不愿对冷战思维改弦更张。

他当时还给我讲了一则笑话：“一个在美国号称中国问题专家的人，在用中文对中国国是指手画脚了一通后，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泽民江主席采纳我的建议的话，中国就将如何如何。这位专家连中国人名是姓在前名在后这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还有什么资格指点中国国是呢？”

因此赵先生认为：“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发展问题上，不必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寄托太大的希望，倒是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没有成见，更注重事实。如美国现在的驻华大使尚慕杰，他已经促使大批美国国会议员来华访问，对促进中美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还计划动员所有的议员都来华看一看。我曾对他说：让你作驻华大使太合适了，原因就是你不是个中国通。”

赵浩生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在常春藤大学之一的耶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说在耶鲁执教是令人骄傲的，这所大学曾培育出了三位美国总统，除了早些时候的塔夫脱外，第三十八任总

统杰拉尔德·R·福特，第四十一任总统乔治·布什，则是当代人听说过或熟悉的。记得一次讲演他开玩笑说：“在我们学校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叫做考不上耶鲁的，才考哈佛。”

有意思的是耶鲁大学同中国还有些异乎寻常的缘分，中国人留学西方获取的第一份毕业证书，就是耶鲁大学颁发的。获得这份证书的人，就是毕生致力于使西方近代文明应用于中国强盛事业，说服中国政府并亲自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带到美国的容闳。而在他带人美国的这第一批留学生中，还有一位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记得的响亮名字，即中国第一段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主持铺设的铁路的设计、主持者詹天佑，他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耶鲁大学教授的位置是极诱人的，赵浩生和他的夫人今泉智惠均在此占有一席之地。难怪当赵浩生的好友，已经成为世界级船王的董浩云，请他出任办得蒸蒸日上的海上大学校长时，他考虑再三后还是婉拒了。

赵氏夫妇在风景如画的汉姆敦，购置了一所欧式的漂亮而舒适的宅院，在此生育了一双儿女。儒雅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充裕的生活，圣人般贤淑的妻子，健康活泼的儿女，“人生幸福的要旨似乎已经齐备了。”记得第一次同赵先生见面时，同坐的叶松根先生也打趣说：“拿美国薪水，娶日本太太，倘伴中国山水……人间的美事，让你占全了！”

然而，沉湎安乐不是赵浩生的性格，耶鲁的象牙之塔里，太少跌宕的宇宙流；常春藤围墙内的天地，总嫌狭小。自从记者生给了他敏锐的新闻目光后，他已经不可能对人世间的焦点冷眼相向；凡事关祖国和同胞，就不可能不勾起他置喙的激情。

在授课的同时，赵浩生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从此，世

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每周都会刊登一二篇发自“海外观察”专栏的文章，赵浩生的名字，在广大海外的华人世界渐渐有了知名度。

当时的美国，有着世界最先进的资讯媒体，可以最快捷地了解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大量的信息，经过赵浩生的取精用弘与思辨，遂成一篇篇有声有色的报道，或深中肯綮的评论。

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采访撰稿，并在新闻媒体确立自己的地位，个中的甘酸苦辛，是未涉足者难予体尝的。一九六二年二月，美国制造的“友谊七号”宇宙飞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飞船用了四小时五十六分环绕地球飞行了三圈，而后在巴哈马群岛东面的大西洋降落，操纵飞船的小约翰·H·格林，成为进入空间轨道的第一个美国人。

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也就是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世界第一位太空人后仅一个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在十年内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格林的太空之旅，是实现往返月球的“阿波罗计划”的前奏，同时也是美、苏空间技术角逐的重头戏，因此一直吸引着世界和美国民众的目光。

作为“海外观察”主持的赵浩生，自然不会漏过这举世关注的热点，何况比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当格林回到他的家中后，赵浩生立即与格林通了电话。

当格林得知赵浩生是位华裔新闻人士，希望就他在太空的经历感受做一次采访时，他言语顿时生硬和傲慢了起来。他对赵浩生说：“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要知道，报道此次太空历程是要付高额酬劳的，你支付不起采访我的费用。”说罢即挂断了电话。

赵先生说：“当时我的感觉是受到极大的羞辱，格林无视的并

非我个人，而是中华民族。”格林这种傲慢态度固然令赵浩生忿忿，但他并没放弃努力，而是翻阅了有关太空计划和此次飞行前前后后的几乎所有资料和报道，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经过数次会面地点的变更，赵浩生终于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说有意见时，蒋介石开始抹脸”
关于蒋介石形象的“十二字”套语

弹指已在美国盘桓了十几度春秋，作为耶鲁教授和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得到了渐多的尊敬和荣誉，但他拂不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不解乡愁。他讲学、采访，曾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却无法穿透冷战思维下人为设置的“铁幕竹藩”置足桑梓，只得空怀乡思，徒吟“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在赵先生同我谈他和世界级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曾提及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三十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最热闹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赵浩生不解其何以生出这种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

比亚的国歌 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 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货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炎黄子孙感到凄然呢？

赵浩生深思有顷，对董浩云也是对自己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

“回祖国 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 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一九六六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挈妇将雏前往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四十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名声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 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会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 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任务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

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六十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二，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一九六一年的二百九十九所增加到五百七十六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六，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十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四十五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

“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十二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

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作为《中央日报》的老记者，能于此次台湾之行中单独采访蒋介石，赵浩生已经感到此行不虚，身心俱慰了。然而在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后，儿女们一连串率直的问候，一下子又让他坠入无尽的惆怅。

儿女对赵浩生说：“爸，这就是中国吗？你不是说中国很大吗？”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这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当飞机临近香港，赵浩生指着舷窗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蜿蜒海岸线，对儿女们说：“你们看，那云彩底下，海岸线勾勒出的那一大片陆地，都是中国。”

说到祖国，赵浩生话语多了起来：“在那片大陆上，有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们爸爸和你们长得一样的中国人。爸爸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你们的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在那儿……”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呢？”孩子天真的

问话，使赵浩生的眼眶湿润了，顿了顿，像是对儿女，也像是对自己说道：“现在还不能，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从此，赵浩生更关注着来自大陆的每一点讯息。一九六九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他那四壁古籍的书房里，以旋转乾坤的智慧，运筹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访华后，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新中国建立后，除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伍修权以特派代表的身份到过驻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中国政府再未正式派遣过一个政府官员或代表团前往美国。因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牵挂着祖国的赵浩生，带着夫人和儿女追逐着乒乓球队，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在赛场上，他第一次看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听到了久违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任自己的泪水顺两颊流淌。

一九七一年暑假期间，赵浩生夫妇去了法国，这是他们到过的第一个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座悬有五星红旗的建筑，这就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赵浩生心潮起伏。他在街上徘徊了许久，有时只需侧身几步就可叩到使馆的大门。可一想到自己曾是国民党党报的记者，想到自己美国的国籍，想到海外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报道，他既怕被中国方面当“反动派”排斥，又怕被美国方面视为中国特务，在瞻前顾后中失去了叩门的勇气。

几天后，他意外地看到了一场中国的影片《红旗渠》。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反映河南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使旱地变良田的纪录片。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深知道林县有多旱、多穷、多苦。当影

片放映到开闸放水的霎那，他忍不住热泪滚滚。“新中国有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造林县，一定也可以改造全中国。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祖国、老家的新生面貌。我感到这种多年积下的恐共病被红旗渠的水和我自己的眼泪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子回去看看。”

还没等赵浩生离开法国，基辛格秘密到北京安排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就被披露。“连美国总统都可以到中国，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和当时的驻法大使黄镇通了话。

接着，他无所顾忌地接受了法国巴黎世界报的采访，他坦然告诉采访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给海外华人带来的兴奋，“就如同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民众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天亮了！’”

回到美国后，赵浩生又目睹了更振奋人心的场景，在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二十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全力的提案。

十一月十五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乔冠华在联大讲坛全面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到会的各国记者见了面。

乔冠华谈笑风生，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西方的新闻媒体，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我们现在到大家中间来，就是要让大家仔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不是骇人的魑魅魍魉。

作为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当时就站在被邀的记者群

中，他再次领略了在重庆时就以舌利笔健称著的“乔老爷”的倜傥。赵浩生心潮澎湃，他当时的激动与兴奋，我敢说远远超过了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国民党的外交，是屈膝哀求式的外交，它根本无法使广大海外侨胞在所在国挺起腰杆；而新中国政府的强盛和独立的外交，才使海外华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种感觉，长年生活在国内的人是难得体验的。

一九九五年春季，当我陪同赵先生拜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时，章女士曾对一位外籍华裔女作家在乔冠华沉浮境遇下的迥异态度，流露了不满，赵先生立即解释说：“您应该理解那些在海外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是比生活在大陆的人还激进的。”

他们还很自然地忆起了在联合国的初次会见。赵先生说：

“当时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代表团的男士一律中山装，女士都着两用衫，而颜色则几乎是一样的灰色，谁和谁都难以区分。”章含之闻之莞尔：“咳，您就别提这个啦。”

周恩来批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

一路走去，就像阅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尼克松的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冷战的坚冰渐渐解冻。回中国，对赵浩生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梦，他开始为申请回国而忙碌。

一九七三年春季，对“文革”中的中国，是个颇不寻常的时刻；在赵浩生的人生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从驻加拿大的中

国大使馆，拿到了回国的签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归国之梦的实现，是他在重庆作记者采访时就几度接触、因而分外敬重的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

赵浩生终于在与祖国阔别四分之一世纪后踏上了归程，“我带着满腔的兴奋，满头的白发，跟和我结婚二十年但还没有进过赵家门儿的老伴儿”。

当年，赵浩生是在民不聊生，国家前途迷乱的背景下扶槎去国的；所以尽管此际中国尚处在十年浩劫之中，但与二十五年前的记忆之间，的确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对一个渴望还家的海外赤子来说，祖国母亲的怀抱，是那樣的温馨如怡。

从走过深港间的罗湖桥那一刻，赵浩生就怀着新奇与激动，睁大眼睛，贪婪地捕捉跃入眼帘的每一道风景，“差不多想把这锦绣河山吃下去。”

由深圳而广州，这里虽堪称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策源地，但赵浩生却是第一次光临。他站在镇海楼上，眺望越秀山、珠江桥、黄花岗、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感觉到钟灵毓秀和爱国志士之间的脉络。

由广州而韶山、长沙，赵浩生参观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诞生和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那傍山偎塘的故居，那葱茏的岳麓山、那萋萋的橘子洲，赵浩生在这山川草木人文地理中探索，是什么因素启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理念。

这一路走去，“就像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列车继续北行，终于停靠在距赵浩生故乡息县仅七十里的信阳火车站。在抗战胜利后，赵浩生曾回过一次息县，他还清晰地记得战乱之后，饿殍载途、哀鸿遍野的当年情景，而此刻眼前的

一切，与昔山的记忆形同霄壤，我们还是来看看由他自己记录的内心感受吧：

“火车在信阳车站停下来时，我刚走出来，就听见有人又哭又叫着：‘大哥，大哥……’接着就看见一个背着旅行袋的人跑过来，我虽然不认识他的脸，但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弟弟更生，我离开家的时候，他才九岁。我也叫着他的名字跑过去。我们兄弟见面了。我介绍太太跟他认识，三个人都激动地哭起来，火车上的乘客和车站上的人看见这个场面都在替我们高兴的不得了。

“从信阳到息县，我记得以前要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现在有了挺直的柏油路，两边儿都是大树，我们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

“快到的时候，我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电灯光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息县！’我没有想到息县有了电灯，二十八年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点的是豆油灯啊！”

“我弟弟又指着公路两边儿的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我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里看见过，今天息县竟然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县县城也完全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都是土坯麦草房子，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当然，最令我们高兴的，就是跟我们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二十八年不见，我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我太太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给她磕个头，她拉着我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老规矩了。’”

“我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我们在一起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二十多年的变化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是不是做梦？’她老人家说：‘这不是在做梦 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比做梦还要好”，这就是赵浩生去国二十八年回归后对故乡、故国的总体印象。

目睹毛泽东之后中国舵手的风采
今泉智慧问赵浩生：我能否藏在桌子底下
聆听高论
一不留神，成了“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

重返桑梓后，赵浩生随即登上前往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列车。

从赵浩生记事起，北京一直被称作北平。她在赵浩生的心目中，绝非一个仅具单纯地理概念的词汇，而是有着巨大向心力的文化归属，是闻之肃然不释诱惑。

虽说他从未身临其境得睹这数朝古都的风貌，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那样的熟悉：未名湖畔的遗世砖塔，清华园内的滟潋荷塘，卧佛寺周的霜濡红叶，紫禁城头的金辉兽吻……他已感受过不知多少遍了。

那是因为他还是同学少年之际，就热衷于文学，而他成长时期所景仰的一代文学大师，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在北平淹留，不曾将北平诉诸妙文。那心灵的牵引，曾驱使他壮着胆子向平素敬畏的父亲，提出到北平求学的请求。不料，父亲顿时拉长了脸，厉声吼道：“不行！”他转过身，不敢再出一语，可母亲却看清

了他眼眶中溢出的泪滴。翌日，母亲悄悄地告诉赵浩生：“你爸爸难过得一宿没睡，家里供不起你到北平读书呵！”就这样，到北平成了埋在赵浩生心底的奢侈的梦。

他没有想到，他竟在去国二十五年，自己已过知天命的年纪，终于置足“心实仰之”的梦中境地。他将现实的北京，同他心中的北平，一一加以匹配参比，既似曾相识，又备觉新鲜，更引发无限感慨：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出故宫，步入那广阔宏伟、举世无匹的天安门广场，它的宏伟，代表着中国人的胸襟、豪情和气魄，任何人都会被这伟大的气氛所吞没。当你仰望广场中心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想到三十年前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宣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不论是外籍华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赵浩生到京不久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国宴，那是宴请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就在这次宴会上，以新闻记者身份来访，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时局的赵浩生，第一次目睹了毛泽东之后把握中国航向的舵手。

“当我们在等待着黎笋和范文同入座的时候，那位曾是中共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号代表，被打倒并销声匿迹数年，似乎政治生命已告结束的人，悄然走进了宴会大厅，他就是邓小平。”

这样一位人物的复出，明显地预示着中国当时的政局出现了或即将出现某些变异，当时世界所有关注政治的眼睛，都不会对这悄然而又意味深长的邓氏复出澹然视之。

据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就是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可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不

管怎么说，到了一九七二年，中国的时局比之前数年，确有几分松动。一些在“文革”地震中被压倒的人，陆续复出，我想曾是《中央日报》记者，又入了美国国籍的赵浩生能重返大陆，也不会不与这种氛围相关。也是因了这重氛围，赵浩生采访吴作人、李可染等文化名人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得知吴、李欣然接受采访，赵浩生喜不自胜。早在抗战时期的成都，赵浩生就见过吴作人，并为其画艺所倾倒。他还记得吴作人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棕色西服，那潇洒倜傥风度给赵浩生的印象，“和他的作品一样深刻”。可以说，与吴的对话，他期盼了数十年了。

景慕中国文学艺术的东方文化学者今泉智惠，闻知吴、李两位国画圣手同意接受赵浩生采访，也十分欣喜，她也想一瞻两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的风采，聆听高谈阔论，她带着几分调侃地对赵浩生说：“你们交谈的时候，可否允许我藏在桌子底下？”

在言及国画艺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说起一代宗师齐白石。“文革”期间，这位画艺超凡脱俗的画坛巨擘，已被污浆浊水泼溅得不成样子。特别是有文化革命旗手之称的江青对齐大张挞伐后，人们更对公允评价齐白石噤若寒蝉。

然而出于艺术家的良知，对艺术的真诚，以及当时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吴、李两人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齐白石的变革精神和严谨的画风在国画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对齐朴实、正义的人格美德，表示了赞许。

通过吴、李的交谈，赵浩生才知道外间流传的许多对齐白石的毁誉之辞是污蔑不实的，但吴、李当时并没告诉他，这些多是由江青散布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多年从事新闻的人，赵浩生感到有责任以他掌握的真实事实，通过传媒正视听。

接着，两位画家又忘情地谈论起各自的艺术观点，由他们各自的经历、修养、艺术思想的变异，到艺术的差别与个性；现实的真、美同艺术的真、美……所言无不与当时盛行的单调而贫瘠的江青文艺定律大异其趣。

还沉浸在重返大陆喜悦中的赵浩生，显然对稍显宽松气氛背后的险恶顾忌不足，他毫无顾忌地将自人为是精彩纷呈的谈话变为文字，刊诸海外报章。这些文字，引来不少人的惊喜，却也招致一部分人的恼怒。“没想到我在一不留神之间，成了后来‘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赵先生在讲述罢难忘的采访时说道。

赵浩生为何这样说呢？原来从一九七二年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外事往来渐趋频繁。北京饭店新楼就是在此北京下兴建的，周恩来即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指明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从下放地调回北京，提供较为安定的环境，让他们挥毫泼墨。一批人们久违了的山水风光花鸟新画作，被装点布置在外宾下榻、活动的场所。这不禁使一批中断创作的艺术巨匠重新拿起了笔，使肃杀的文苑，绽露了几点红绿，还为更多的文化人复出，埋下伏笔。

曾经是“文革”首当其冲的人物，在国务院宾馆的掩护下，重新开始艺术创作，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敌视，姚文元阴阳怪气地说：“有人又在搞花鸟鱼虫了。”可犹豫周恩来的声望和拓展外交的形势，未能随即掀起风浪。

当赵浩生的文章发表，他们感到抓到了把柄。说吴、李同赵浩生的谈话，是为齐白石、为“文艺黑线”翻案，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还将当时黄永玉的《猫头鹰》，宗其香的《虎》、黄胄的《毛驴》、李可染的《山水》、李苦禅的《残荷》穿凿附会，指称其间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并引出“他们为什么能到

国务院宾馆作画”的质问，把火烧向周恩来，此即耸动一时的“黑画事件”。

“这件事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警告我说：你的文章得罪了大陆的某些重要人物啦。我琢磨了好久，还不知此话从何说起。但我确实因这警告对踏足大陆分外谨慎了。一九七五年末，母亲去世消息传来，我踟蹰良久，才决定回家为她送殡。”

五十二天的故国神游，赵浩生说：“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要好！’”

他对在故国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去体味，去赞美，他的那些真实可信、又充满激情的文章发往世界各地，使多年被外界和自身所封闭的中国掀开了窗幕的一角。有多少像赵浩生这样被隔绝了二十多年的游子，读了他的文章，引发了积蓄在心的思乡狂潮，把多年所受的反共宣传和恐共心理一股脑抛掉，逐渐走上认同祖国，回归大陆的归程。”

返回美国，赵浩生忙碌了起来，他向许多在美国的华侨和美国人讲述他此次行程的观感，他的演说和漫谈，被冠以《中国归来答客难》题目，在报刊发表，并为《参考消息》连载。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赵浩生，对美中敌对的错误选择及其遗患，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中国人眼里，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中国周边如朝鲜、越南燃起战火，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是标准的“战争贩子”；而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则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家”，中国人都单调刻板、冷酷无情、不可捉摸，是可怕的“黄祸”之源。

为打破两个民族的误解，赵浩生说他愿作一个“半客半主的

红娘”，架设起相互间了解的桥梁。经他穿针引线，在他归国寻访的第二天，便促成了“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的中国之行。

由十五位专业各异的教授组成的“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除了赵浩生外，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他们沿着广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广州路线，在中国走访了二十一天。

赵浩生在这次回访中，又和母亲及三个弟弟见了一面，并同他渴望拜会的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分别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晤谈。他心满意足，“即使有人称我为假公济私，我也不加否认。”

但收获更大的，还是那十四位第一次踏如中国领土的美国教授。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太陌生、太神秘了，以致当尼克松秘密访华时，美国人称之为实施了一次“登月计划”。当他们的亲身感受与习惯了的宣传大异其趣时，更勾起了对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浓厚兴趣。

一位美术史教授，被西安半坡村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吸引，舍弃了其他参观，独自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下午；在延安，教授们对将陕北黄土高原营造成丰产梯田啧啧称奇；一位女教授，与女翻译聊到兴奋处，搂在一起大笑时，突然想到曾于传媒上看到“革命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宣传，又忆起有些旅行社“访华须知”关于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有亲热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身体的特别警告，笑得更欢了。

教授们返回美国后，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报告，并乐此不疲地开演讲会、写文章，向美国民众揭示以往被竹幕遮蔽着的真实的中国。当赵浩生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是否从旅行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时，他们竟回答说：“我不要清醒过来！”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礼貌，分明地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熊向晖受邓颖超之托，给赵浩生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中国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

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孰知刚刚料理罢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他追忆起一九四六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时用词不妥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必须于一月十日以前离境。申辩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

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一九七八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但直到他登机回返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熊向晖向赵浩生解释说：“邓大姐患了感冒，有些话委托我转告你。”

熊向晖告诉赵浩生：追忆文章邓颖超已经看过了，她很感动，但文章中有些推测和援引的传闻不准确。其一是赵浩生推测周恩来的遗体火化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对。中央领导人逝世后遗体火化，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倡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签了字同意的。那是四月二十七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回家就对邓颖超讲了关于签字火化的事，他随后告诉邓：我已经替你作主同意了火化，我走在前面，你替我火化，你走在前面，我替你火化。其二是关于周恩来的骨灰保留了一部分，准备在台湾回归后，撒在台湾的传闻不准。周恩来的骨灰没有留，为了表示他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关切，在撒骨灰前，他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放置了一夜。

那次来华，中国正在迎接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形势已经出现了喜人的变化，我对那趟来访非常满意，了却了我心中埋藏了很久的两个愿望。”

“两个什么愿望呢？”我问道。“一个是采访大陆活着的三十年代成名的文化界人士；一个是到雪域边陲西藏走走。”

赵浩生到北京不久，就向文化部透露了想采访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赵丹、张瑞芳等人的愿望，他感慨系之地说：“他们成名的时候，我正着迷于中国现代文学，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文化部方面满足了赵浩生的要求，经过安排，在以烹调宫廷

佳肴闻名的北海仿膳，赵浩生与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等共进晚餐。但郭沫若没有到，赵浩生被告知，郭沫若已在医院住了不少日子了。

不久后的一天，当他到夏衍家作客，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夏衍在接了电话后，神情黯然地告诉赵浩生：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是郭老的情况很不好，他必须尽快赶到医院。继而，郭沫若撒手人寰的消息传来了，赵浩生扼腕太息没能在郭沫若逝世前做最后的采访。

除了郭沫若，赵浩生想见的人，都一一见到了，“谈得非常融洽，了解到许多我希望了解的东西。”采访到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素材被赵浩生裁剪成为《从三十年代到新的长征》一书。

离开北京，赵浩生去了西藏。西藏高原，冰封雪裹，跋涉艰险，对世人简直有点不可望不可及，疑团与传说丛生，大量人类及宗教的原始遗迹，使之充满神秘色彩，也就更令人痴迷和神往。赵浩生对有幸置身其间，游览寻访，异乎寻常的满足由衷而出。

“是否从此以后，您便‘步履更加轻快，精神更为昂扬，便候鸟一样频频往返于大洋两岸’？”“的确，从那时起，我与大陆之间的往返是更增多了。”

不光是赵浩生本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他还把自己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儿，送往中国服务。赵浩生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

奔丧那年，他是带着妻子、儿子一同回国的。此时儿子已经成熟了许多，他严肃地向赵浩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一问给赵浩生很大震动，由此引申出“当别人为改变自己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艰苦奋斗时，你在做什么”这更难回应的问题。

他突然想到，虽已数度回国，但主要是游览探亲，对故国是打扰的多，贡献的少，平添了一重负疚感。“今天我虽是外籍，但不是外人。不能只遮荫而不种树，只旁观而不参与。特别是祖国新的长征开始后，看到国内四个现代化的热情高涨，更急切地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否则必将再度造成遗憾，会无以对第三代的孩子。”

因此，当女儿向他提出大学毕业后，希望回祖国参加为“四化”建设做些工作，而不愿总当一个游客时，他分外欣喜，立即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最终办妥了此事。可当女儿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之际，赵浩生却一头扎入邓小平访美的一连串欢迎活动。

女儿走了，赵浩生更多地思考起自己如何为祖国的发展与强盛做些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他觉得他力所能及马上可做的，就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这三个在历史上既有过友好传统，又有过流血敌视国家之间，解释恩怨，加深了解，疏通搭桥。

在中国，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就美国的新闻、选举做专题演讲；他住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向学子们介绍美国的教育和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他甚至走到中学生中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祖国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在美国，他重返母校伊利诺大学，在他的老师帕特森曾经站过的讲坛上，举办中国问题的讲座，并在帕特森妻子的陪同下，到自己老师的墓碑前献花致敬。他甚至辞掉了他当年不愿舍弃的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接受一些跨国公司顾问的聘书，专门为他们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做政策资讯。

在一九八九年秋后，在美国等西方诸国假“人权”制裁中国背景下，赵浩生应日本金融界邀请前往东京，向三百余名银行界

人士，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他以翔实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

他强调：中日关系和中、日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同，无论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方面，中日两国都近于欧美。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尤其不能追随美国，而应在中美之间起调停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可能永久僵持，迟早会出现转变。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
赵浩生的名字上了黑名单
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
陈诚雄心勃勃，想对蒋取而代之

“八十年代末以来，您每年约在中国盘桓多久呢？两三个月？”哦，可不止，差不多有近半年哪。”近半年都做些什么呢？是否像有些报刊中描写的那样：为疏通中外关系尽心竭力，为促成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经济改革问诊切脉？”“我主要是想听听说说中国话。”

人到老年，依恋故土，怀念往事，喜听乡音，虽大智大觉者，也概莫能外。但赵浩生那似乎比我还年轻的精神，那依然敏捷的思维，及什么都敢于尝试的雄心，是不可能听听说说乡音中怡养天年的，一旦事关祖国、事关民族大义，他便起而关顾。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大陆看电视，差不多只要一播放台湾开会的新闻，就会出现台湾民进党人舞拳踢脚大打出手的镜头；报章上也时有这类消息。当时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民进党成立于一九八六年，其前身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所谓“党外”

势力。自建党后，其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台独”的倾向日趋张扬。该党的头面人物，不少曾留学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其中不少还是学法律的。就他们的教养而言，无论如何都难以和拳打脚踢联系在一起。

一次和赵先生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企业家，赵先生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民进党为什么总在立委会上打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一位企业家说他为此曾就教过许多人，包括民进党人，多数说法是国民党在台湾独大，在立委会上，民进党被国民党淹没了，新闻媒体根本就关注不到民进党，只有打架才能把电视镜头吸引过来，使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现其主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运用如此“新颖高妙”的战术，该党的品貌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到了九十年代初，该党膨胀的势头及“台独”的喧嚣，已经不能不引起关心版图完整的人们的警惕。就在那个时候，赵浩生萌发二次入台的念头。

赵浩生向台湾方面提出入台申请，是担着几分风险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黑名单的。可进入九十年代后，我推想旧禁已解，而且渴望为增进海峡两岸间的了解，尽些绵薄之力。”

在办理签证时，赵浩生发现他的护照和他太太的不一样。他的护照附有一封密封的信，不许拆封，要他本人带到台湾，入关时交给台湾方面。

这令人狐疑的特殊待遇，使赵浩生心中忐忑，担心此次入台会发生什么不测，便给在台湾国府任职的熟人，如萧万长、钱复写信询问。萧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钱复则是当时任外长的台湾政坛“四才子”之一，曾就读耶鲁。他们复信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劝赵浩生安心就道。

赵浩生第二次登上台湾岛，与第一次相隔了二十四年。此行让他难忘的，是他同《东南日报》老社长胡健中的长谈。已是耄耋老人的胡健中，不断向赵浩生问起他当年熟悉的故地杭州、西湖，思乡怀故的感情溢于言表。

赵浩生对他一一讲述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随后鼓励他回杭州看看。胡健中说他确实有意在有生之年故地重游，但就怕自己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

说到半身不遂，引发了老人烈士暮年的感叹和件件恍如昨天往事的回溯，面对远道而来，一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老部下，他毫无隐晦地道出了自己的往事心思。

到台湾后，因印刷机械在航运途中沉没，胡健中断了继续办报的念头，但仍以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政坛。在退到台湾的政要中，胡健中属于有才华、有眼光的，故深得蒋介石欣赏倚重。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的身份只是个下野“总统”和国民党总裁，实权旁落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手中。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他的部下也跃跃然，推陈诚出来竞选“总统”。

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讨论“总统”人选的中常会上，蒋介石故作倦勤姿态，拥陈派正欲乘虚而入，胡健中一跃而起，慷慨陈词，力保蒋的领袖地位。他的演说激越且声泪俱下，使与会者无不感动。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借机半推半就接受胡氏忠言。此后胡奔走于台湾、香港间，为蒋竞选，终使其坐牢“总统”宝座。

胡的护驾之功，使他在一个时期成为蒋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蒋对他言听计从。作为回报，蒋让胡从行政院长到驻日大使

中任选一职，但胡对作官不感兴趣，安于作智囊。

蒋介石事无巨细都征询胡健中的意见，这既令人艳羨，也招人嫉恨。更堪虞的是伴君如伴虎，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千古恨，而胡偏偏出现了“闪失”。

一次，蒋介石同胡谈起蒋经国的前途。为了给小蒋执政作铺垫，老蒋直言告诉胡，想让小蒋掌管情治工作。胡听后又以古大臣风坦言说：“以经国兄的雄才大略，必可膺党国重任。但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以树德为本。情治工作是树怨的工作，经国兄以不介入为好。”

在善玩政治权谋，靠情治维系自己政治统治的蒋介石看来，胡健中这番颇有见地的忠言，实属天真的书生之见，未予采纳。小蒋终执情治牛耳，胡对此自然有看法。这些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芥芥。

老蒋逝，小蒋当权，胡遂遭冷冻。早该颐养的胡健中倒不太介意冷落，出乎他意料的是，由芥芥引出种种不可说的灾祸，使他在风烛残年反而多起事来，又患了半身不遂的病。

一肚子的感叹，在台湾，面对炎凉世态，胡健中长年三缄其口。只有在老部旧、入了美国国籍、真正置身事外的赵浩生面前，他才一吐为快。赵浩生也籍此对台湾有了更多重的认识。

赵浩生提出了想见见民进党头面人物的想法

丁关根想送给李登辉一套《毛选》

李登辉说：就职演说颇费斟酌

赵浩生的此次赴台的一个主要收获，是同台湾岛上一个个举

足轻重的人对上了话。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台湾立法院院长、“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梁肃戎，以及萧万长、钱夏等等。他们无不向赵浩生了解大陆的情况。

几年来，赵浩生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对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经济改革，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曾对新生的特区建设，开放政策，以致北京市的规划，都提出过一些建议。赵浩生向他们讲述了他对大陆的感受；并就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言自己的主见；还说出了想见见民进党头面人物的想法。

当时台湾的情形是，民进党乘国民党领袖日趋老化，民众对国府统治的某些弊端和腐败现象不满之机，连连向国民党发起冲击，咄咄逼人，其在国大和立委席位的绝对数量不多，但递增的相对比率却不容小觑，使常年主宰台湾政坛的老大党，面临严峻挑战。

八十年代末，民进党除了要求开明政治，扩大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外，对争取台湾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呼唤，也不再琵琶半掩。一时凡是关心台湾前途的人，无不对该党的崛起加以非常的关注。

出乎赵浩生意料，这些台湾的“大人物”听罢他的介绍和见解，不但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认为他很有必要见见“李总统”。赵浩生不禁喜出望外，“我能见到他吗？我个人当然希望能同他见面。”梁肃戎即自告奋勇，说由他负责联系。

几天后，赵浩生接到“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的电话，预告李登辉将于何时何地接见他。

接见的地点是赵浩生曾经光临过的“总统府”，依然走过那长长的长廊，依然听到侍卫官宏亮的唱名：“赵教授到！”可他依

稀记得，总统办公室原来在二楼，如今却被带到了三楼。

赵浩生问蒋彦士：“我上次见蒋‘总统’时曾被领进总统办公室好像是在二楼？”蒋彦士答道：“是的，蒋‘总统’办公室是在二楼。他辞世后，他的办公室一直保留着，所有陈设布置，一如他生前那样。三楼是原来李登辉任副‘总统’时的办公室，他现在依旧在此办公。”

与李登辉会面的气氛比较随和，赵浩生无需像见蒋介石那样，要为打破沉闷僵局、兴奋蒋介石谈话的细胞而煞费苦心。赵浩生以他拿护照时的曲折开场，李登辉则聊了一通他对美国 and 耶鲁的观感。

“我来台湾前，曾先到了大陆，见了中共对台湾事务负责人丁关根。”赵浩生说道。在那次会面时，丁关根曾问赵浩生此次赴台是否会受到李登辉接见，赵浩生觉得没有把握。“丁关根说：如果你能确定李登辉会见你的话，我很想托你给李登辉先生带一件礼物。”

“礼物？丁关根要送我什么礼物？”他说他想送你一套四卷《毛泽东选集》。”李登辉对此感到不解：丁关根为什么要送我《毛选》四卷呢？

“丁关根先生说他很仔细地拜读了你的‘就职演说’其中言及今天的国共关系、互相尊重、和平共容等问题，但没言及历史。他说如果你手边有《毛选》的话，就会对国共历史上曾有过几度合作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李登辉当时对赵浩生说：“你不知道，我那篇演说稿在拟写时，是很费了一番斟酌的。我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并未死守政治分野，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的。我们对大陆别无所求，台湾奋斗几十年，搞了一点建设，有了一些积蓄，攒了一些

外币，得来很不容易。我希望大陆方面体谅我们的心情，给我们一点生存空间。”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辉被“国大”推举为新“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在谈到两岸关系时称：“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的统一和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他愿意“建立双方沟通的管道”，“研究国家统一事宜”。但他又设置了一系列前提，即如果中共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海峡使用武力；不阻挠台湾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台湾才愿以对等地位建立双方沟通管道和全面开放交流，奠定彼此间互相尊重、和平共荣的基础，期于客观条件成熟时，依据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公意，研讨国家统一事宜。字里行间，又为尔后向“台独”倾向漂移留下余地。

鉴于此，赵浩生在李登辉“生存空间”言语后，单刀直入：“李‘总统’，我可听到一些言论，说你是‘独台’哟。”在今天看来，“独台”与“台独”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隐性与显性的关系；但在赵浩生说此话的时候，两者还被视为量与质的区别，故而不致出现尴尬局面。

“我只是比较提倡本土化。”李登辉接过话题：“但是要知道，本土化并非由我首创，是老‘总统’提出的，又为经国先生继承和光大了的。你不知道，我坐这个位置可是不容易，费尽心机，整天搞平衡。国民党内各派系，国民党与民进党、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平衡，非常辛苦。所以我只准备干一届，不求连任。”

时至今日，李登辉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他当年同赵浩生的这番对话，实在是言不由衷的。

“逃兵”的“自首”使郝柏村开怀大笑

赵浩生向杨尚昆提议建立“热线”

乔石接见赵浩生

朱镕基对赵的礼物非常欣赏

赵浩生在同民进党、李登辉晤面后，又向有关方向提出想见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先生在向我叙述此事时，没说他可以提出那样的请求，但从当时的背景看，赵浩生要求会见郝，绝非‘say hello’，即纯礼节性的。

郝柏村是军人出身，一九九六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此后历经擢升，由总统府侍卫长而陆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陆军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他属于老派的国民党人，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坚守一个中国，坚持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立场，因而成为“台独”、“独台”势力攻讦的焦点。他与“台独”不共戴天，又与李登辉的某些倾向存在分歧，显然属于李登辉所说要平衡的诸多派系势力中的一方实力人物。赵浩生见民进党，见李登辉，见郝柏村，均与台湾未来息息相关似乎是毋须猜疑的。

然而，见郝柏村并非易事，可秘书长蒋彦士一出面，情况就不同了。郝柏村应允后，蒋彦士提醒赵浩生，郝是个军人，不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你要注意。

于是，赵浩生对见郝柏村时如何寒暄，又费了一番思考。会见那天，赵浩生同郝柏村一握手就连连称呼“老同学”。郝柏村被叫得一头雾水，不知自己何时与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成了同学。

“你不是黄埔第十二期炮科的吗？”赵浩生问道。“不错。”郝柏村回答得利落。“我是十六期的。”赵浩生紧接着说。“喔，那你后来怎么当起记者来啦？”

“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热血一沸腾，就进了军校，可军人

锻炼的那般艰苦我又吃不消，就开小差了。”逃兵”的“自首”，引起郝柏村的开怀大笑，谈话气氛随之融洽。离开台湾，赵浩生又经香港回到北京。他通过有关渠道，透露了尽快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希望。很快他就得到通知，国家主席杨尚昆将单独接见他。

会见时，杨尚昆听了赵浩生介绍访台及与李登辉会面经过后，认为他捎带的信息十分及时，并对赵浩生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接着，杨尚昆又说出了海内外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设法促成两岸双方领导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直接对话的希望：“两岸有什么事情和意见，总要找人传话转递，多麻烦和误事呢？你能否想个办法，使两岸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对话，而不用转圈子呢？”

“有个办法。”赵浩生似乎已有考虑：“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为了防止在紧迫情况下出现误断，导致难以挽回的事变，或对非常变故紧急协调，建立了一条‘热线’，有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只要一个电话便解除了。”

杨尚昆说：“这个办法不错，例如每当我们在闽、浙一带搞军事演习，台湾总要紧张一阵，以为我们要对台湾有什么举动。如果有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告知是例行的演习，就可避免一场虚惊。建热线，我们这边是没问题，可不知那边怎么样？”

这番话应该是很快就能传到台湾的，但至今没有回应。就目前的形势看，架热线似乎尚需一定的时日。

当赵先生讲述完他与台湾的故事，我请他对海峡两岸时涌暗流的现状做一评价，对海峡两岸关系会否改善做一前瞻。

赵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时局的变幻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和左右的，台湾问题扑朔曲徊，固然有种种缘由，但归根结底是经济

在主导制约着一切，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的确，亚太地区这几年日益为世界瞩目，就在于该地区在西方经济衰微阴霾久久不散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韩国的政治要求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首肯，根本的原因也在其经济上的崛起。

“因此台湾的回归，”赵先生说：“很大成分上要依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评估而定。大陆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比率与台湾持平，或超过台湾，则台湾的向心力亦随之增长。这就好比亲戚关系，人们通常以富亲戚为荣，对穷亲戚比较冷落；与富亲戚关系比较密切，愿意走动，同穷亲戚则不自觉地疏远，甚至断绝往来。因此大陆如若能稳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台湾的回归只是时日的问题。”

一九九二年，我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先生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消息，这的确是个新闻，而几十年来，赵先生是以采写新闻闻名的！

当我们再次坐在一起时，我向他问道：“听说您在大陆投资办了两个工厂，一在北京，一在深圳。近几年您来华时间比较多，是否与产业经营使然？”“不是，我只是投了点资，经营之事我基本不插手。”

对我何以想起在中国投资的疑问，赵先生回答说是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一个年近九秩高龄的老人，向十二亿中国人民发起扩大和加快改革的新进军令，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这坚定了我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面对十二亿人口这极富潜力，充满机遇的巨大市场，大潮涌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岂能隔岸观潮，置身海外？此时不下海，更待何时？”

“于是，您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制造了一个‘下海’的新闻。”

“应该说，我还有一个动机。”赵先生说，他这一辈子记者而教授，教授而顾问，光说不练。或纸上谈兵，或为他人运筹帷幄，从未自己操作，化理念为现实。如今企图变换一下，“君子动口又动手”，过一把操作的瘾。

赵浩生向妻子“要”了数十万美金，投资中国的两个乡镇企业。一个是北京丰台的乡镇小厂光明电器开关厂，改称为大光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普通的民用产品；一个是深圳的福斯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他身兼两个公司董事长。

我曾问赵先生，在投资前是否做过一番调查和预测，所投资的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润可图。他说对此毫无把握，并没在这方面仔细分析推敲过。“一个跨国公司的顾问，整日价为别人的公司经营战略策划运筹，而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却不加思索？”哦，告诉你一个我的‘私念’，我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感兴趣，关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进去，了解操作的全过程，问题、缺陷、难点、特色……企业生存、发展了，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适应和事务而式微，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您对您的产业的市场和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对生产的产品有不内行，那您是如何对您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呢？”

“我对经营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时下流行一中理论，我颇欣赏，叫做‘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既然不懂得电器和数控机床，就应绝对地信任内行。因此我提出了‘三信原则’，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第二、对企业经营者绝对信任；第三，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必守信用。”

如此一放手，赵先生便悠哉悠哉了。实际上，他还是更关注

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他是江泽民、朱镕基、万里、丁关根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把自己观察到的、思考到的与中国命运声望相关的问题，向他们传递诉说。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著，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国宴，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赵浩生便径直向朱镕基的座位走去。

朱镕基也看到了赵浩生，他对赵浩生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接着，他对坐在身边的委员长乔石介绍说：“这位是赵浩生先生。”

乔石一面和赵浩生握手，一面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可一直没机会认识您。”“我也一直盼望有机会拜访您，今日很荣幸。”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
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
恐怕不能总是尼克松、基辛格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美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

七十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并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轸的赵浩生分外焦虑。

他有感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而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故每在来华期间，便竭尽所思，先后写了《如何向美国新闻媒体做工作》、《说‘游说’》诸文，介绍了西方媒体的权威中心、旨趣倾向、运作方式，游说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作用、成功的实例……这几年，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以求中美关系尽早蹶出低谷。

一九九四年孟春，我们见面闲谈时，我把话题引到了四十年代，想听他讲讲在重庆当记者的旧事，他与当时中共新闻工作者的交往。谁知没说上几句，他突然感叹起来：“中共刚刚进入延安的时候，人不过数千，困厄重重，但宣传工作却做得那么出色。到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和那总能唤起民心共鸣的主张。”

“那时中共的领袖群里，不乏挥洒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有一批优秀的宣传家。更难能的是，他们神差般地使社会传媒发出同情中共的声音，吸引国外一些大牌记者前往中共根据地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我的思绪顺着他的话头延展。

“今天的中共远比延安时期强大，国家的进步和昌盛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赵先生原意并不在追溯，而在对比。我当时对他突发这一番感叹，并未做更多的深思。

一九九五初春，赵浩生先生约我齐聚在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家中。他和柴大使从他们在美国相识的往事，在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盛大招待会上的匆匆重逢谈着谈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改善中美关系上来了。

赵浩生说：“柴大使在美多年，在美国各界都结识了一些朋友；继您之后的章文晋大使，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你们应该动员这些老朋友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多做些工作。”

“我从外交部退下来后，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我和几位老人发起组织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些力。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华访问，我还和她谈了转圜中美关系之事。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的前任遇刺身亡，她于匆忙中就职，我是第一个同她会面、致哀、道贺的外国使节。”

“这位女士我知道，她对中国非常友好，她访华返美后，在演说中客观地叙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澄清一些在美国流传的谬说十分有益，只是美国会中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结交一些这样的朋友，特别是要注意结交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朋友，不能老是基辛格。中、美、以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美对抗，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不利。像柴先生这样的资深外交家，在扭转这不利势头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很愿意与您共同为之努力。”赵先生滔滔不绝，直到他要赴另外一个约会而不得不开柴府。

这一年秋季，他把世界上每生产六吨纸浆就有其一吨的世界纸浆大王兰迪戈，邀请到了中国的辽宁省，与当地合资兴建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从辽宁一回京，他便匆匆约我到他下榻的饭店，将他刚刚写就的、准备呈中共领导人的《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给我过目。

在我看文章的时候，赵先生忍不住说道：“在美国，我每天早晨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听到看到的，只要是涉及中国，就是人权问题、贸易倾销问题、出售武器和核扩散问题、西藏问题、产

权侵害问题等等，一片指责之声。听到看到这些与实情不符的报道铺天盖地，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不排除美国有关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正面报道的‘封杀’，但全力以赴地设法打开更多的、非官方的渠道，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扭转视听并非不可能。不然，中国政府涵养总是那么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国大众就会以为报道的是事实，你在默认。”

《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对台湾何以使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和媒体为其张目，列举了其“公关”的情况并加以剖析；并就中国如何对美“公关”，对象和方法，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读着这篇文字，可以感到赵先生那爱国之情的灼热。显然，他对此已思忖良久，洋洋数千言条理清晰，怪不得一年半前他突然感叹起中共的宣传工作。

“由您做这番进言是太合适了。”我的情绪也被赵先生的文章调动起来：“从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看，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尖锐冲突外，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也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两大伟大的民族，这两个民族若由误解导致仇视，将是世界的悲哀。最近大陆畅销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以为中国政府对‘说不’历来掌握得很有分寸；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沟通，使相互说变成历史。”

“你这个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的说法，太精彩了，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被强迫说英语的强烈刺激
采访香港的三“T”

当历史的时针从一九九五向一九九六、一九九七跃动之际，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它们都在关注、等待着无疑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来临的那一刻。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英国治下有一百五十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先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顺畅，自一九八九年秋后，英伦称盛的迷雾更频频飘来，记得是一九九二年我即请赵先生对此稍加评议。赵先生说“香港的问题，九九归一，还是经济。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而，赵先生话头一转：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玄机，依旧是经济。近几年亚太经济为世界看好，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列亚太前沿，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经济就是这样互为因果，只有向哪里投入，才能向哪里赚取。正因为如此，美国虽总有人发出制裁中国的不谐之音，但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取向，却没有动摇。谁要是一想到中国那无比广阔的市场，投资后的可观前景，谁就不可能长久地坚守敌视中国的政策。”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但是殖民的历史，终归是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在退出受控地区前，蓄意挑起纠纷、制造麻烦，只会遗患于该地区，却绝不可能给企图混水摸鱼的纠纷和麻烦的制造者，带来丝毫的好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但若从长远的观点看，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就可能求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也比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英国在香港有经济利益，在回归问题上合作得好，这些利益就容易保持，这是大概是长计。”

在等待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和赵先生见面交谈的时候，香港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在三十年间屡屡置身港岛的赵浩生，对香港有叙不尽的历历往事和感慨，我随即将之一点点记录下来。

一九九六年，身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第一次踏上本属于中国，却由英国人统治了百余年的岛屿。他没有想到，在这个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居多的岛屿，他却被迫讲英语。

“被迫讲英语，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而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英语被认为是上等人的语言。不会讲广东话，我只感到抱歉；而为了我的工作与上层人物交往，被迫说英语，使我深受刺激。”

赵先生那次去香港，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一切食宿行事宜的。也许是为了获取较高的佣金，旅行社把他安排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下飞机即被接进酒店歇息，一夜无话。孰料翌日清早到用早餐时，酒店餐厅的侍者竟先侍候后到的白人，把赵浩生这位先来的付了同等金额的东方人，晾在一边。这种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给赵浩生的印象恶劣至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从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开始统治时代起，就被用作发展商贸的基地。但当时的商贸，只是炮舰商贸，独占商贸，强取豪夺的商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不光彩的商贸。”说着这些苍凉往事，赵先生颇动情感。

在儿子即将成年之际，赵先生曾带他去了一趟英国。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官前观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儿子的目光除了被盛装马队、铜扣流苏吸引外，还常常瞟向宫外明晃晃的镀金栏杆。赵先生触景生情，对儿子说：“你知道这金子是怎样得来的吗？

那是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当时我的儿子对我的话懵里懵懂。”

如今，当国人满怀喜悦地翘首香港回归的时候，赵先生说：

“想到这颗东方明珠更璀璨的未来，许多个人的恩恩怨怨，仿佛过眼云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

就在赵浩生第一次到香港之际，正逢香港经济进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时代。记者的敏感，促使他对代表这种开拓力量的香港三大企业：航运、化工、纺织，进行了采访。

有意思的是当时香港这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的英文名字，均以“T”，字母打头：航运大王董浩云（TUNG）、塑料大王丁熊兆（TING）、纺织大王唐星海（TANG）。“那次我走访了三‘T’。”赵先生说。

“三‘T’中的航运大王董浩云，和我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况下定交于日本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从几条破船发展成‘船王’的经历。他成功之道，就是讲信用，这是一笔无形却无价的财富。就凭‘董浩云’的一纸签名，日本最大的造船厂愿为他制造三十万吨的大油轮；就凭‘董浩云’三个字，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愿和他签订十年的运油合同。”

董浩云的事业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出一千一百万吨的巨大船队，到世界各个港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而他的心、他的根，他的感情的最后寄托，还是在中国。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就反映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

“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经香港赴中国内地时，住在董浩云的别墅里。分别前我们曾彻夜长谈，他忘情地吐露了他早晚也一定要回内地念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这样向我坦白地表明心迹，显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

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期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工商组织的首脑。

赵先生归纳说：“丁家在香港成功的秘诀，就是从熊兆兄那一代起，世世代代都认识到：香港繁荣的源泉是在祖国内地，当年是如此，待回归之后，更是如此。”

在回溯的时候，赵先生常常提出一些他随之想到的问题，并以往事来映证，例如香港人应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的传统文

化价值的问题。

六十年代中期，赵浩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发现四个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三个是东方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香港。

赵浩生对中国学生选学中国文学有些猜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会中文，觉得这门课容易及格才选修的。学生都自称中文底子有限，做的这种选择，完全出于醉心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对如是回答很欣赏，就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让他们要个心理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赵浩生发现他们的中文水准要比英文差许多，但他们很用功，有思想。为了训练他们的中文阅读、写作能力，赵浩生不仅要求他们读中文原著，还要他们用中文写书评，对作家、作品的思想、风格、时代背景加以评述。

最初，他们的写作结结巴巴，不久便趋于通顺，最后居然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第二学年，赵浩生鼓励他们把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于是，一份与耶鲁谐音的杂志《冶炉》诞生了。

就在此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与香港有关联的新闻，即陆续有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赵浩生随即提出就此写分析评论的要求。看了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所做的分析，赵浩生对香港青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文章分析说：香港留美学生的苦闷，除了遥居异国的孤独和生活难以适应外，更深层的在于失去了文化归属感。香港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享受，但没有令青年人感到自豪的香港独有的文化。

学生的分析认为，香港的文化，既非英国文化，又非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中英杂揉、以发展商贸为主的文化。他们做

这些分析时，香港回归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他们已根据自身的渴望，提出香港的文化应该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发展出根深叶茂，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的香港文化。

我看好的人现在还在保持沉默
董浩云悄悄离开人群
他购买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
一把意大利名师制作的小提琴

一九九六年九月，赵先生再度来华时，“特首”竞选之事已经沸沸扬扬，但人们揣测的大热门董建华，却一直没有就是否参选明确表态。“我这次来先到了香港，在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才到北京。”当我如约走进赵先生下榻处，他对我说。

“新特区行政首脑推选的事已近眉睫，好几位表态参选，港人对他们反映如何？依您分析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问道。

“我看好一个人，如果他表态参选的话，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当选。”

“谁？”

“董建华。这两年以来，我和他的几位旧识一直在对他进行劝说。这种历史机遇不说千载也是百年难逢的，而董恰恰具备良好的条件，让这种机遇失之交臂，而不挺身有所作为，太可惜了。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似乎被我们说动了。”

“您跟他很熟吗？”

“当然，他的父亲就是我同你说过的董浩云。”

“原来董建华就是董浩云薪火相传的后人。”我恍然大悟，赵

浩生和董建华有一重特殊的关系，随之想起赵先生昔日同我谈起的一系列有关董浩云的故事：

董浩云抓住“二战”后各国闹船荒之机，购置了一批轮船，从事近海和远洋运输，渐成有“现代郑和”之誉的“船王”。但他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般概念的商人。他与画坛巨擘溥儒张大千是至交，他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而在“东方”之后，还要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寄托对文明和美好向往的情怀。每新造或购进一条船，他都要为之写一首诗，再为诗谱上音乐，作为这艘船的船歌。一个给大海写诗，在波涛上吟唱的人，谁能说他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商人？！

赵先生还曾告诉我这位富甲一方的船王，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他购买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作为海上大学的用船。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皇后”号从弗劳瑞德到香港进行装修时，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

后来，赵先生还向我讲述过董浩云买提琴送给马思聪的弟弟马思宏的故事：马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古玩店，看到，爱不释手。可这把珍贵的小提琴价格不菲，要七千美元。阮囊羞涩的马只能望琴兴叹。赵浩生得知此事，无意中同董浩云言及。几天后，赵浩生接到董浩云的电话，“那把小提琴我买下了，花了七千美元，现已送给了马思宏先生。”而董浩云的生活一向自奉俭朴，他在办公室用的玻璃杯，都是用过的果酱瓶子。

董建华对赵浩生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奔走的情况
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

对董建华说的“五大有利条件” “见面时。他递给我一份书面声明”

“您如此看好董建华 定是有些令人悦服的依据喽 。我言归正传。

“当然，较长时间的交往了解可以说出很多感觉，我想只说一件事便足矣。一九九五年我到香港，我曾同董建华到东方海外公司的董事会议厅，在瞻仰董浩云遗像的悲喜交集之际，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奔走的情况，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他对这一问题分析之透彻，着眼之远阔；他在美接触人物之广泛，奔走所产生之影响，都使我感到他不但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且仿佛是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从他对此事所投入的心力与热情，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对香港的热爱，和港人利益的休戚与共。这样的人，不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吗？”

在和赵浩生先生这次交谈的几天后，我看到了董建华通过媒体的参选表态。此刻，我还不知道，赵先生是在董建华处看到了那份参选表态的稿子后，才对我透露这一口风的，但我却很想知道他们是用怎样的言辞说动董建华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去了外地，我忙着赶一部书稿，竟未得再叙的机会。

一九九七年春节前夕，赵先生又涉洋来华，于在京期间赴香港小住了几日。此时，董建华已接受国务院正式任命。归来叙谈时，自然扯出董建华的话题。赵先生说本来预计能安排个单独晤面的，“无奈时下的董建华太忙了，仅与他共同出席了一次晚宴，虽然他特意邀我和他坐在一起，但在那样的场合总得关照所有的

在座者，所以没有什么独家新闻了。”

“还是谈谈您们是如何动员董建华参选的吧。”我向赵先生要求。

“那是有一个过程的。”赵先生接着告诉我 就在一九九五年那次见面时，他脱口对董建华说：“建华，你应该竞选香港的首任‘港督’做香港的‘华盛顿’啊！”

但董建华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他不会在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时，轻易吐露自己的倾向。他对赵浩生说：“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并强调自己长期经营实业，不准备全身心介入政治；再者企业有三千员工，他不能抛开他们，所以他说他还是以企业经营者终其一生为好。他的夫人赵洪娉，也不太希望丈夫从政。

“经反反复复做了许久的工作，他似乎不那么截然拒绝了。我为他作了分析，说他参选有五大有利条件。”

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对董建华说的一番话：“首先，你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熟悉香港，现在强调港人治港，你持的是香港永久性护照，无懈可击；第二，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你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熟悉了解英国，一方面，你同英国各界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倘若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什么手脚，玩什么花样，欺瞒不了你这个留英生；第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当然现在有人想把她搞成政治城市，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而你在商界经营多年，精通商业的运作和管理，且在商界有一定的威望；第四，我认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澳门回归，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以这一方式统一台湾，你父亲开创的‘东方’事业，与台湾商界有联系，你个人在台湾也有人缘，你妹妹是台湾前“总参谋长”的儿媳妇；第五，是句玩笑话，你出生在上海，现在中国上层领导人

大多在上海工作过，中国有句关于老乡的俗话，所以你同他们容易打交道。”

“他当时被您说服了吗？”我问道。

“他还是没有表示可否。直到去年九月，我在赴中国前，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我在到大陆前，将在香港停留。董建华听了我的话后，告诉了我他的近期安排，他要到新加坡料理一些事务，但他告诉我，他将于我在港的九月十六日返回香港，并相约和我见面。”

“你们如期见面了吗？”

“见面了。他那天下午四点从新加坡回港，五点钟，我们便坐在了一起。见面时，他递给我一份书面声明，要我看一下，说他已经决定参选。我看了他的声明，方知他决定参选。声明写的很好，言简意赅，我建议他尽早刊登出来。他向我解释道：“下决心参选后，他立即让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同事把东方公司多年做过的贸易全部清理、检查一遍。在确信没有污点后，才确定宣布参加竞选。‘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这样做，需要时间，所以宣布得晚了一些。’他说得一板一眼。”

香港交接仪式的特邀嘉宾
者群体良莠不齐
建议董建华模仿一下二战时的罗斯福
替老友董浩云激动

随着香港回归的一天天逼近，董建华，这位将承天降大任的斯人，更为世人瞩目，新闻媒体对他盯得更紧，同属圈中人的我，自然也希望能从赵先生那里得知一些相关的信息。

在距香港回顾尚有九十天之际，赵浩生先生越洋打来电话，告知他被“特首”董建华和中国政府聘为出席七月一日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特约嘉宾。

五月末，赵先生来到北京。“不走了，直到七月一日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见面时他如是说。我再度提起董建华的话题，赵浩生先生告诉我，他在董建华当选候任“特首”后的几次接触中，董建华曾私下就一些事务向他征询过见解。

“您给董建华过什么有益的忠告吗？”

“我想，关于‘特首’职责内的政务，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裕如，他也有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智囊团，无需我置喙。当然，对他我会竭尽绵薄，我近期就在为他在权利交接后的对美访问，作周密精细的设计和筹划。”说着，他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附有图片和表格的日程表。

在我翻看后，他才接上前面的话题。他告诉我，此前他曾以老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从资讯的视角向董建华进了一言。他说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而董建华现在又被新闻媒体包围，每天见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话，“说不定哪一天，人家就会把不知道是谁的话、或谁想说的话，塞到你的嘴里，因此要谨慎，要警惕。”

赵先生说：警惕和谨慎不是缄口不言，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讲坛，或直接掌握一条可靠的传播管道，以杜绝谬种流传，以树立良好的媒体形象。

他向董建华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创了一个《炉边闲话》的专栏，每星期六上午，就时局和民众关注的问题发表见解。他悠闲地坐在白宫办公室的壁炉边，手持他独特的烟袋，身着家常的便服，仿佛坐在听众的家

中聊天。他这种对时局和问题直接而完整的叙述，使人无法篡改和断章取义，既能匡正任何流言，又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做法被他的后来者们效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建议董建华“不妨模仿一下二战时的罗斯福，也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我想，没有人会比身处资讯业异常发达、活跃的香港，身为首任‘特首’的董建华能更敏锐地掂量出赵浩生先生这番话的分量。

赵先生递给我一篇刚写就的文章《辨是非 雪国耻》

七月一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

在关于《炉边闲话》的交谈后，赵先生和我约定，他将在参加交接仪式后来北京和我见面，叙谈香港之行的见闻和感触。可六月二十一日，赵先生突然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又去了一趟香港，曾与董建华在他未来的办公室内晤谈良久，刚刚返京，问我下午能否到他那里坐作。

赴赵先生住所的途中，我一直思索着他约我前去是要对我讲些什么。前次长谈的内容我一直三缄吾口，因为赵先生不让我写，也许他不愿给人以此标榜的印象；也许他觉得还不到公之于众的时机；也许是因为他新出任美国普泽传播顾问集团公司的主席，便不能再像自由人那般将自己的行止言谈公之于众？

我一走进赵先生的房间，赵先生就递给我一篇他刚写就的文章 标题是《辨是非 雪国耻》。他告诉我 文章是积蕴已久又因近期经历见闻的一系列事情有感而发的。他同我讲述了一些情

况，包括他在香港未来特首办公室与董建华的晤谈，但依然嘱我不得对外吐露。

接着，他说道：“随着香港政权交接期限的日益临近，国内一片喜迎之声，其乐也融融。顺利交接固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这种时候，我们似乎不该一味沉浸于欢庆。”

“的确，对回归一事，有些人感到不甘和不舒服，这是意料之中的。从有人欲将香港这座‘经济城市’变为政治角力场，从‘唱衰香港’的鼓噪，从四处呼吁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香港民主党首领李柱铭辈的奔忙，从英国为编结杯葛临时立法会联合阵线的游说，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不出席临立法会就职宣誓……七月一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除了‘喜迎’，的确要以更多的心智应对迎面而来的大量实际课题。”我接过他的话题。

“我觉得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也不能不对有关香港历史的荒谬评说加以辩白。有一种论调，说香港的繁荣应归功于英国的统治。”

“而您的这篇《辨是非 雪国耻》，就是与这类论调理论的。”

“是的，香港的繁荣，除了地缘和特定的历史因素外，是生活在香港的炎黄子孙自强不息的结果；是和背靠大陆的支持分不开的。当然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公务员群体，所以董建华希望这些公务员继续留任，中国政府也赞同他的这一举措。如果说英国的统治管理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它从日不落帝国，一步步退缩回原有的英伦三岛；它连自己国家衰落的问题都没解决好，还能竭尽心智去繁荣殖民地 这不合逻辑嘛！”

说到这儿赵先生显得有些激动，和他接触得久了，我已经对此多有了解，每逢言及事关祖国、言及事关民族的大义的话题，

他便会很殚思、很动情。

“您这次和董建华先生会面晤谈，他可曾流露对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产生的忧虑？可曾对承担起治港重任感到什么压力？”

“哦，董建华对香港在政权交接后保持平稳发展充满信心！基本法规定制度五十年不变，保障安定繁荣的因素没有丝毫的削弱，只要中国政府继续支香港，而中国政府肯定会更积极有力地支持董建华，这一点从江泽民、李鹏率代表团出席交接仪式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董建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赵浩生接到董建华的传真，告以他将如
以往一样于四月赴美
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
文章
董建华说：我将推迟出访美国

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经常于香港、美国间来去匆匆的董建华，以香港第一任“特首”的身份踏上美国国土。消息传来，不由得让我想起此事幕后和赵浩生相关的一段秘闻。

在这一年的三四月间，董建华就酝酿着美国之行了。因为每年四月，美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董建华每在这一时间几乎都是在美国，在为争取最惠国待遇这与香港经济悠关的决断奔波游说中渡过的。

四月十二日，赵浩生听说董建华将于四月下旬赴美访问。他感到四月绝非访美的合适时机，立即给董建华发去一份很长的传真，为董建华分析利弊。

赵先生认为董建华此际赴美的不利因素有二：

其一是香港问题正热，美国各种舆论很多，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祟，对香港回归、香港未来“唱衰”的言论很盛。此时来美，必陷于应对无穷谬论的被动地位；且交接尚未成实现，再雄辩的说词也是无力的。而以董建华未来“特首”之尊，与这些无稽之谈争辩太跌身份。

其二是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大陆的攻击甚嚣尘上。此时来美若有人借题发挥的话必难脱困扰。

赵浩生建议董建华将访美的时间安排在政权交接之后。顺利交接已成事实，香港政治、经济前景更趋明朗，以“特首”的正式身份出访，许多在这之前可能出现的麻烦，将不复存在；对不利鼓噪即便不置一辞，亦无关宏旨。

传真发出后不久，赵浩生就看到了董建华推迟访问美国的消息。

香港顺利回归后，董建华以特首之尊，相继出访美国、日本及欧洲，受到隆重接待。其言论风采赢得各国一致的崇敬欣赏，以“董旋风”的气势，载誉返港，其声望在新一轮民意调查中突破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峰值。

看到如此情景，赵浩生直替老友董浩云激动：五十九年前，他给他的孩子起名“建华”，寄予了由衷的希望。如今，他的孩子正将父亲深深的冀望，一点一点地实现着。他内心起伏的波澜，都被始终关注着他的我，看在了眼里。

在为本文结尾之际，我突然记起赵浩生先生曾在一次追溯人生片断后深有感触的慨叹：“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始，记者这个职业便与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我为自己在那时即选择、并长久地从事这一职业，感到庆幸和自豪。假若时光能倒转，或者真的有来生，我还将选择作记者！”

“还要选择当记者？”

“是的！世界上有很多引人入胜的事情，而最富魅力的，当数千革命、谈恋爱、当记者！”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新奇的排列。”

赵先生见我这样说，便扳着手指娓娓道来：“在我刚刚开始记者生涯之际，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也就二十多岁吧。在那个年代，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沾上些革命的色彩是极具骄傲感和很时髦的。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甚至扭转乾坤……那时的小伙子，胳膊肘里夹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嘴里哼唱着《五月的鲜花》就能引起青年女学生的顾盼。我也曾经那样时髦过，害过严重的左派幼稚病。”

“二十多年，也正是恋爱的年纪，初恋总是圣洁而美妙的，哪怕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所以我们都自甘坠入‘维特之烦恼’，沉浸在爱河和置身革命洪流一样都是那样地引人入胜。”

“然而，我不能把当记者排斥在引人入胜的事情之外。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是既很幸运，又很不幸的时代。民国之后，传统男人的许多权威和乐趣，例如抽大烟、讨小老婆都不再容于礼法。但我却赶上了历史上数百年才出现的大变动时代，几十年浓缩了西方世界一两百年才完成的社会转型。虽然我只是个小人物，但由于从事了记者的职业，能在一个较佳的视角，把这大动荡、大变革尽收眼底，记诸文字，甚至可用自己手中的笔，推波助澜 促进变革 鞭挞丑恶 引导向善。这难道不引人入胜吗？”

他的话，使我的情绪受到了感染，也为我自己曾有过一段记者生涯自豪起来，更为自己有机会将有如此丰富经历的前辈的生平笔录下来，感到荣幸。

张思之

我曾被指定做江青的辩护律师

张思之：毕业于有中国律师摇篮之称的“南东（东吴大学法律系）北朝（朝阳大学法律系）”之北朝。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北京市法院任职，“文革”后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公审“四人帮”林彪集团案时，被指导指定为辩护组组长。

张
思
之
简
历

当我知道委托我采访的对象，是差点成为江青辩护律师、并被指定为“两案”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先生时，那尚未久远的历史画面，随即浮现在我脑海。

一九七九年与一九八〇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但“批判的武器”总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消息传出，举世瞩目。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因此在“两案”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在西方、律师拥有“护法使者”的美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护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两案”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犯，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天将降小任于我，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的。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滔滔的
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江青提出“请律师为我说话”的要求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大法官。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难怪江青只同他见了一面，就断定“那个姓张的律师，是个什么‘长’字号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语温文尔雅，毫不急促，后发依然能够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虽然不了解“两案”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两案”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

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十八人，都是刑诉圈内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霖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十七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作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四处打探这位辩护组组长，甚至把电话打到了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了国务院一招。

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些昔日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律师们，骤然大失水准，相对话语无多，气氛凝重。他们的职业和专长，决定了他们无缘在举世瞩目的法庭上，充当高举正义之剑的英雄角色。他们本来也没奢望什么，只想与国民一起分享嘲弄历史的小丑被绳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运之神无情地迫使他们放弃并不奢侈的期待，当他们由衷地呼唤林彪、四人帮其罪当诛之际，历史偏偏把他们推上为举国皆曰可杀的林彪、特别是四人帮集团主犯辩护的法庭，却丝毫不理会这些罪犯恰也是他们、乃致他们至爱亲朋蒙受的劫难厄

运的制造者！私人的恩怨，亲情的恩怨，全体国民的恩怨，与职业信条的矛盾，在他们内心激剧冲突。谁愿被指斥为助虎的侏鬼？谁愿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犯一道远扬恶名做交换？

感情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律师们望案生畏的，还在于林彪、“四人帮”案件的特殊和复杂。“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的基调是“党内路线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党内的路线错误是分不开的。然而律师没有被赋予判定是路线错误，抑或犯罪行为的权利，这个事关党的性，不能由律师定。这一特殊性不仅决定了政策把握的繁难；同时决定了律师的作用，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处于此种无论从那个层面衡量，都以退避为妙的境地，辩护士们的确难以兴奋。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坚持不为林彪、“四人帮”辩护的律师；而对那些心底无私、忍辱负重走上辩护讲坛的“护法使者”。我们怎能不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翻阅案卷，介入审判的准备是仓促而紧张的，公诉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而从辩护组集合到开庭的时间，则仅在一月之间。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京郊秦城监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替江青说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辩护组住地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众人对其末日临头依然骄横，嗤之以鼻。

来自华东政法学院的朱荣华，是位专攻刑法学的学者，天生的乐天派，也唯有他平日里发出点嬉笑之声，被组员们戏称为“happy”。他独树一帜地说：“‘老娘’那话的重点，在前三字——请律师嘛！”但此次他 happy 不起来了，没有人应和他的幽

默 其他人心里想的是：“江青辩护士”谁愿顶着这空前绝后的荆棘之冠，同她一道遗臭万年呢！

然而在此后的十八天内，又是消息全无，这等待实在是种煎熬，大家心都悬着，猜测着可能的结果。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不料，平日和颜悦色、极少动气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听着组员们的对话，张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确其罪当诛。但作为律师，又不可忽略一个基本原则，再作恶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应得的权力，也不可随意剥夺，律师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这种权力是否得到维护。

当辩护组的组员们在疑虑不安中等待之际，江青也在为请律师之事转动脑筋。十一月十日，她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特别法庭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

江青对前来的审判员，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考虑了三个人，一是史良，因为她是著名的律师，又是女的，我认识她；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坚，我过去陪主席接见时认识的。”审判员告诉江青：史良年龄大了，走路要人搀扶。刘大坚年龄也很大了。他们都无法出庭辩护。其实，刘大坚当时已经去世。

“哦，这么说，我考虑的第三个人年龄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让亲属辩护呢？”她自言自语地数叨起来：“主席的二儿子神经不好；我生的一个被林彪逼疯了；贺子珍的一个口才

不好……”“法庭可以给你指派两名律师。如果你认可，就介绍给你。”江青最后同意见法庭指派的律师。

两天后，辩护组经过酝酿议论，统一了认识，准备接受林彪、江青两案主犯的委托或特别法庭的指派，依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此时，我已告诫自己，感情的因素，要服从法律原则，把它埋藏在心灵最深层的角落里吧！”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一个无可更改的决定落到张思之头上：明天上午，与朱荣华一道，去见江青，弄清楚她想见律师的真实意图。如果她愿意请律师出庭辩护，就全权承担下来。对这一决定；张思之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身为组长，不接最棘手、他人最不愿接受的委托，还用什么去说服他人呢？一向不在工作任务面前游移的他，此刻头脑中闪过的，竟是一句禅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你与朱荣华的身分和专长，已经通知监所转告江青了。抽时间看看预审时的录像，增加点对她的感性认识。”决定的基本内容就如此简短。张思之随即找到朱荣华，“得细心地估量一下这次会见的进程，设计出几个相应的方案。”他俩交谈着，讨论着，草拟着……直至深夜仍无睡意。

“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江青说，“至于你们……”

张思之觉得江青的话头越扯越远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张思之等七八个人来到秦城监狱。为了驱散一路上沉闷的氤氲，张思之暂时中断了案子的思索，由远而近，环顾起京郊景致。已是树枯草黄时节，红叶星罗，岗哨棋

布，牢房傍山，给人予世外的静谧。

根据安排，律师们由监狱负责人贾政委陪同，观看人犯的生活环境。穿过数道警戒，战士们无一例外地查验罢贾政委出示的证明函件，方才放行。朱荣华的幽默天性又掩饰不住了，轻声说：“纵使‘老娘’真有白骨精的妖术，也难以逃遁了。”贾政委听罢认真地告诉他们：“山上的警戒更严，可以说插翅难飞。”

进入牢门，他们从观察孔望去，江青的牢舍内放有一床、一桌、一椅。几本书籍摊于桌上，一只小箱横陈在侧，杂物不多，倒也干净。江青斜坐床沿，正用手平整着一件黑色棉背心。整齐叠好，审视了一番，才放在床头。她或许感到了室外的动静，站了起来，走到房中央，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回到床边，歪倚在被子上……她在想什么呢？

来到在距牢房不远的会见室，朱荣华示意看守传唤江青。他翻弄着记录纸，依然保持 happy 神态。张思之则阅看着由监狱提供的“江青狱中表现”，心中想到：她或许将成为我的委托人，此刻需要冷静，应当大度……

江青进来时，穿着刚才平整过的棉背心。她看了看坐在坐的人，似乎想给人素净、谦和的印象，没等律师说话，她先微微欠了欠上身，像似鞠躬示礼，又带着常人不具的矜持。张思之请她坐下后，她并不抢先发话，而是在等待。

“我们是律师，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问题，凡是与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噢，你们是律师。我向特别法庭提过，要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听说，但作为律师，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要求很不恰当。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不可

能出庭为你辩护。”“请你把声音提高点。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楚。我耳朵有毛病，当年用镭治病给搞坏的。”江青抱怨道。

朱荣华想反唇相讥，张思之示意不必，和缓地说：“可以，请继续讲。”“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至于你们……”她吞而不吐的，显然是“大概没那个胆量”的挑战性语言。张思之不想就此引起争辩，沉默不语。江青似乎感到没趣，转而说：

“检察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接着，她又说：“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得学‘九大’报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东西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要求委托律师辩护。”张思之感到她简直是在胡搅蛮缠。

“我讲过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感情一激动就说不出口。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这个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这种出格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作为辩护律师，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做出答复，这也可说是起到了顾问作用。”张思之耐心地告知江青。“那好，我请你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

这个问题本可以不回答，但朱荣华还是宽容地翻开《刑事诉讼法》，依据第一百条，简明扼要地做了解释。江青把手放在耳根后，听得很认真。朱刚有停顿，她便高声叫道：“检察员江文为什么欺骗我，他说还没和我谈完，怎么就起诉了？”

朱荣华说：“没谈完要看什么问题，起诉方觉得犯罪事实查清了，证据也充分了，就可以起诉。被告人想说的很多，起诉后还可以……”江青没把话听完，又嚷道：“我要控告公安部！他们那不是侦察，是法西斯绑架！绑架之后，把我扔在地板上，六个小时没人理我……”

张思之觉得有必要控制住她越扯越远的话头，插言说：“你的所谓控告，在你没有正式表示委托，或正式请求法庭制定我们作你的辩护律师前，我们不能就实质性的问题对你作出回答，甚至我们现在的谈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江青没想到张思之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有点勃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声音更高了：“我最怕人打断我的话，一打断，我就紧张。我是个病人，原来血压低，现在血压高，耳朵也不好，又神经衰弱。你这态度……”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随即转换用和缓的语气说：“可能与你的职业有关吧？”

言来语去，张思之已经洞悉江青在试图控制此番交谈，决定不让她牵着走，再次追问她是否打算请律师辩护。江青好像在极力躲闪正面回答，又把话岔开说：“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让你们跟我辩。”她自以为抓住了理，接着说：“他们，就是叶、邓，我的立场与他们不一样；一样，我就不到这里来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你的话话题太远了！”张思之感到不能让她这样东拉西扯，再次制止她。“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有病，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你刚才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现在又出尔反尔！”朱荣华也有些气愤。“现在距离近，我已能听清楚了。”“既然听清楚了，就把你的结论告诉我们，请律师，还是不请？”

江青的情绪在急剧变化，现出激动的样子，眼圈也红了，低

下头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的身分委托。”“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只有与你建立了委托关系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她斜过头，对着朱荣华，不理张思之：“你要相信他们那个（指起诉书）怎能替我辩护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决定是否请律师！”

江青依旧回避着，突然用手指着朱荣华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汇编，说：“你那本刑法、刑诉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这种要求，你应该按规矩向监所提。”“这么大案子，连一本小书都不肯发这么吝啬！”如果我们成为你的律师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提。”

“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江青终于失去了耐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请律师，或者是不请我们作你的律师，对吧？”张思之针锋相对。江青感到不应一下说得过死，马上转圈说：“你们再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们考虑的结果，我们没时间久等。”的确，此刻距离开庭，只剩一个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复杂，材料那么多，你们工作量会很大……呵，问题多，都是我们党内的事。哦，现在我不是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不过，那是他们把我开除的！”她又借机发泄内心的愤懑。

又费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应下午三点前告知考虑结果。该退场了，江青恢复了来时的素净、谦和，点了点头说：“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谢谢你们！”

组员们说：“江青把你便宜了。”

法庭的人说：“李作鹏脑子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

起诉书上有指控不实的地方

江青同律师见面后，找到监所负责人贾政委，说：“今天来的律师，一看就知道是代表官方的。那姓张的律师，是什么长字的，本身就是官方成员，看他那么凶，怎么可能为我的案子辩呢？”贾政委问她打算怎样，她说：“我要朱律师，他好；不要张。”贾政委提醒她，朱是张的助手，抛开主办要助手不合适。江青强调她可以选择律师。

“离开秦城监狱时，同来的人都已经清楚，江青辩护士的荆棘之冠，轮不到我戴了。组员们对我说：江青把你给便宜了。”张先生以此结束了秦城见江青的故事。“这种结果，就个人得失论可以说是幸运的，江青没有让您陷于同她一道恶名远扬的尴尬境地。但站在今天回溯起来，从健全、推进法制进程的探索，从丰富律师刑诉辩护的经验角度看，江青没要律师，或者说您最终没有成为她的辩护士，是不是又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呢？”

“你这种反问的确有些道理。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对法制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

“让我们重新回到两案的话题吧。我看到有关材料记载：法庭推荐北京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傅志人接替您，他和朱荣华又见了江青。江青认为起诉书否定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把她和彬彬列在一起不伦不类，要律师按她的基调辩护，被律师告以其责任是依事实及法律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力，而不是作代言人。江青一气之下，又把他俩便宜了。”

然而张思之并未被彻底地便宜掉，从秦城监狱回来当晚，法庭便找到他。“来人对我说：李作鹏要求辩护，他曾经是搞密码破译的，脑子转得特别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正好江青不请你辩护了，你就准备为李作鹏辩护吧。”

严格地说，律师的天职是依法维护被告受法律保护的权力，而不是同法庭其他方面的人员携手，共同对付被告。但“两案”毕竟是个极其特殊的例外，其首犯、主犯曾置身中国政治权力的巅峰，且错综复杂的案情涉及到一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应该防止某些被告利用法庭将其泄露出去，或以此要挟法庭。只是就“保密”这个意义而言，张思之表示愿意与法庭合作。

离开庭只剩下五天了，律师们才基本定位，明确了为之辩护的被告：

甘雨霏、傅志人负责为陈伯达辩护；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周亨元、武汉大学法律系马克昌担任吴法宪的辩护人；

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苏惠渔担任李作鹏的辩护人；

北京律师协会负责人之一周奎正、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舜华担任江腾蛟的辩护人；

上海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主任张中，被指定为姚文元的辩护人。

他们随即争分夺秒而字斟句酌地阅读分析有关各自委托人的案卷，并同委托人见面，询问有关案情。张思之在同意为李作鹏辩护后的第三天，重返秦城监狱，同李作鹏见面。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查阅辩护案件的材料，了解案情，可以单独会见被告。但鉴于“两案”的极为特殊，辩护人与被告见面时，均有看

守人员在场，以防泄密。

李作鹏见到张思之、苏惠渔时，表示是自己的罪绝不推脱。他说：“我有罪，有责任，我敢承担。我的肩头还是硬的，判罪也接受。”接着又表示不是他的罪过，不能要他负责。他说起诉书中提到一个叫“雷永通”的人之死，可他对此没有责任。这一点许世友可以作证，萧劲光也了解内情，如果考虑他俩的地位不便出庭作证，希望请许夫人出庭证明一下。谈话的时间不算太长，张思之已经感到李作鹏的脑子的确好使。

参与辩护的律师阵容，可以说是相当强有力的。当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把各自的案情仔细地捋了一遍后，立即发现了起诉书中的一些不实指控。

在几乎每日一此的辩护组碰头会上，为姚文元辩护的韩学章、张中，首先指出了起诉书中对姚文元的部分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第四十六条认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其中指控姚文元的依据，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他在谈论天安门事件时讲道：“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说这是为上海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可事实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在当年十月间，四人帮感到行将覆灭才着手的垂死挣扎；而姚文元讲这番话，却是在四人帮猖獗得意之际，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起诉书第三十四条，指控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镇压群众，导致武斗流血。而根据当事人王效禹的供词，只有张春桥说支持王，姚文元事先并未表态，事后才说了句庆贺的话。显然，他不该负挑起事端的责任。

但当时韩学章、张中对是否提出反驳，拿不定主意。因为起

诉书是经中共中央上层审阅的。辩护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提出反驳。中央的精神是要使此案的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主管“两案”审判的彭真也指示：“不仅要辩护，而且要很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不驳回明显失实的指控，不依律开脱被告不成立的“罪责”，则被告内心难以诚服，也不能使最终判决在法律上长久立得住，同时还是律师严重的失职。

也是在碰头会上，律师们还认为：起诉书第八、第十条指控、并被视为对“四人帮”审讯突破口的王洪文“长沙告状”，在党内组织上是合法的，不能构成罪行。一九七九年十月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为了在此次会上谋取更大的权力，怂恿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而当时江青、张春桥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他们和王洪文、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在钓鱼台共同商议问题，然后让党内排名在周恩来之前的副主席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叙述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可斥之为心怀鬼胎，可斥之为暗中作祟，但却不能视为罪行。因为政治局委员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在组织上没有丝毫不合法理之处。如若这也算罪行，则党内生活就无法进行了。

辩护组随即将这些认识，反映给“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采纳了律师们的意见，结果在开庭后，对姚文元做法庭调查时，就不再提在济南挑起武斗、为上海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的问题。姚文元对此十分感激，因为当时他和陈伯达怕死心理反映得最明显，而上述罪名摊上其一，无疑向死神更贴近几分。关于“长沙告状”的指控，也在判决时取消了。

律师认为林集团主犯与“四人帮”不同

李作鹏放林彪出逃有心；参与谋刺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无证
副审判长黄玉昆捏了一把汗

介入李作鹏案件后，张思之、苏惠渔通过翻阅大量的材料及和李本人的接触，感到被置于第二审判庭的几位将领罪犯，同“四人帮”及陈伯达等文职罪犯，有着较大的区别。他们都曾出生入死，留下过声威赫赫的战绩。

就李作鹏而言，他曾是东北战场上“硬”出名的勇将。辽沈战役期间，为了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他率部下一个前卫营一天两夜急行二百五十里，在北宁线同敌军遭遇接火。这时林彪、罗荣桓等来电，命其“继续前进，不要与敌人纠缠。”可李根据枪声，辨出敌军是正规部队，随即回电“敌情严重，不能继续前进”。不久真相查明，廖耀湘已改变南逃计划，决定东退沈阳，李作鹏占据的地方，正是廖军必经之地。他一摔大衣，投入战斗，廖耀湘军团被全歼，他功不可没。

然而这批将领均在特定的环境中，因私欲恶性膨胀，堕落成祸国乱军的罪犯。但在他们犯罪的过程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他们追随的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林不具备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他们不一定跟着走得那样远，陷得如此深，李作鹏也不例外。

在起诉书第十八、第三十二条，指控李作鹏犯有诬陷总参谋长罗瑞卿，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罪行。但忽略了李作鹏罪行是经林彪授意和督促后犯下的。林彪突然发难要置罗瑞卿于死地前，一再命秘书和叶群打电话给李作鹏，叶群露骨地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他揭发。李遂找王宏坤，张秀川整

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初春，林彪亲自找李作鹏，说要搞一个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东西，指示李提供海军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点了苏振华等人的名，明确“要采取列举事实的办法”，“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李三天后把“卷”交给叶群，点了十二个人的名，使之遭受迫害。而从这以后，李作鹏陆续点了更多的人，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

以上罪责李作鹏无可推卸，需加以甄别的是他并非主动犯罪，而是追随犯罪。在李的罪责中，取证最多的，是篡改周恩来指令，使林彪乘机从山海关机场出逃。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得知二五六专机被秘密调往山海关后，立即要李作鹏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二五六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可李将此命令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先指示放飞才放飞”。

九月十三日六时二十分，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发现异常情况，打电话给李作鹏，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竟要场站直接报告周恩来。后飞机强行起飞，已滑向跑道，赵雅辉副站长向李作鹏紧急报告，他回答“就这样吧。”未与制止致使林彪得已乘二五六专机出逃。

人证物证俱在，李作鹏有心放林彪出逃是显而易见、不容抵赖的。张思之、苏惠渔也认为此事如钉在板，没什么可辩的。但另外一些语涉李作鹏的指控，则证据明显不充分。例如一九七一年春，林立果根据与林彪的密谋，拟制了武装政变的方案。九月初，李作鹏将从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处得到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密报黄永胜。黄即转告林彪、叶群，促使他们“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经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告黄南巡讲话，怀

有促使林彪决心对毛泽东下手的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李参与了杀害毛泽东的谋划及行动。因此一切与谋杀毛泽东相关的罪责，均无须李作鹏分担。

再如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指挥，经调查，该阴谋在策划时，李作鹏毫无所知。决定实施时，其步骤是：由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林彪名义，电邀黄永胜去机场，再通过黄出面电告李作鹏等人到机场会齐，由江腾蛟、王飞等“裹挟”前往广州。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阴谋相关的人证物证，都证实李作鹏不曾与谋。

经核实、分析了大量案卷，张思之、苏惠渔将他们形成的上述见解，写进了辩护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点，特别法庭的审判开庭。随着法庭调查、法庭辩护的进程，两案被告的罪状逐渐清晰。除了张春桥死不开口，江青有时喧嚣狡辩外，其他被告面对确凿证据，基本认罪服罪；但有些被告对证据不充分，或他们自认为指控不当的罪责，还是极力辩解。李作鹏就是这“有些被告”之

因为李作鹏给山海关场站命令的记录，已被涂改，成为与周恩来命令相近的“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 < 才放飞 >。（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圆括号内为另加的文字，尖括号内为删去的文字）虽然法庭方面说经鉴定涂改是李作鹏所为，但李坚持“有保留地承认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

张思之、苏惠渔为李作鹏进行了辩护，除了以事实和分析对某些涉及李作鹏的指控，要求准确地判断和限定罪责外，还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李的历史和认罪态度的转变，从轻发落。

其他律师，亦根据证据及合理推断，为各自的委托人进行了

辩护。

当检察官认定吴法宪将空军大权交与林立果，使其利用特权在空军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吴法宪的辩护人马克昌、周亨元，要求吴复述“交权”的动机。最初没人对这一要求的微妙有所反应。等吴强调交权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林立果利用他给予的权力所搞的阴谋均不知晓时，人们才感到律师的机敏，原指控吴发宪对林立果利用职权准备武装政变应承担直接的罪责，因此被洗脱掉了。

然而也有个别专业功底深厚的老学者，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辩护的临场经验，在最初的法庭调查和辩护阶段不太适应，出现了辩护人角色的错位，在法庭上对被告比审判官、检察官还严厉，没有全力维护被告的合法权力，却时常将被告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

尽管他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辩护组负责人和组员们还是认真地指出了他的问题。看到老先生为自己的失当伤心落泪时，辩护组的同仁也有点于心不忍，但法律不承认感情，原则不容人礼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经同仁的帮助，本人的逐渐适应，最终还是较好地履行了辩护人的职责，依然赢得同仁们的敬重。

开庭以后，不到庭时的李作鹏表面上总托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但看守的人员还是发现，背着人的时候，他在悄悄地写长篇辩护词。法庭方面得知此讯后，不免有些紧张，生怕他的长篇辩护词中有泄密，或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形象的出格内容。

负责林彪集团主犯审判的副审判长黄玉昆，找到张思之，希望他以辩护人的身份，设法掌握李作鹏辩护词的内容。提出这种要求，严格的说是不符合法律条文的，但从保守国家机密，不使法庭上出现有损国家利益的情情考虑，张思之同意设法了解辩护

词的内容。

张思之同李作鹏见面时，没说上几句，李就明白了张的意图。“我想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对李说，是否能让我看看他的辩护词，帮他顾问一下。李听后狡黠地朝我笑了笑，说：辩护词我写好了，已经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了，没法取出来了。我后来又试探了两次，李还是那句话。离开李作鹏处，我只好对黄玉昆表示无能为力。”

黄玉昆亲自出马见李作鹏，当时李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黄对李说：“你的身体不好，辩护词就不一定非要在法庭上念了，直接交给我们，效果是一样的。”但李不同意。法庭方面怀着惴惴不安的忧虑，迎来了李作鹏宣读辩护词的一天。开庭后，黄玉昆再次告诉李作鹏。可直接将辩护词交给法庭，李执意要自己念。

念着念着，李作鹏突然感到不适，医护人员随即进行护理。黄玉昆又一次劝李，注意身体，不必再念了，交书面辩护是一样的，但李作鹏坚持说：“我自己念 自己念。”还是自己念完了。在这个过程中，黄玉昆手心真是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作鹏的辩护词中，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内容，法庭方面这才把久悬的心放了下来。

我想请张先生对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可他总是微微一笑
关于谁怕谁的辩论；王海容要唐闻生瞪江青
李作鹏评价张思之“敲边鼓”

作为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除了为李作鹏辩护外，不是他担

任辩护的审理过程，也要给予关注，特别是对他差点为之辩护的江青的审理，即便不能到场，也仔细观看了录像。所以我总想从他那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包括当年不曾透露而现今已不必保密的真相；作为辩护人当时感受最深的场面；一些至今不失警示意义的情节；以及对整个审判或某微观环节的客观评价等等，哪怕能对我掌握的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也好。

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律师，他内心能迅速经法理尺度衡量得出的评价，以及对细节甚至有些小题大做的关注，并不轻易吐露。对我的刨根问底，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是否定，是赞同，是认可，只有我自己去琢磨，当然如果我将之付诸文字，责任也必须由我负，但当张先生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主要案件梳扒整理，而后随后写下的感叹给我阅读了之后，我感到了他对我这个晚辈的真诚，以及他的人格力量。

“为了这次采访，我看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許多人。我听说在一次审理江青案时，她攻击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在制止时说：‘江青你这个反革命罪犯应该惧怕我们！’‘嗯？’江青一下没反应过来。‘是的，你怕我们。’曾汉周斩钉截铁。江青反应过来了：‘我怕你 哼 你怕我！’‘不 你怕我！’曾汉周很想在气势上压倒江青。结果两人在法庭上‘你怕我’了十余个来回。这时江青突然冷笑了几声：‘我会怕你？笑话。你问问坐在你边上的江华，我怕过谁？’曾汉周此时才感到：江青的气焰，不是靠这种争辩压垮的，在短暂的僵滞后，转移了话题。这种场面的出现 有点失水准吧？”

，那时刚刚重建法制，就碰上这么大、这么棘手的案子，所有的人都缺乏准备。”十余年过去了，张先生语涉往事心平气和。

“的确，有些知情人告诉我，虽说案子审不审，怎样审酝酿了较

长时间，可宣布公审后，许多准备都显得十分仓促。例如法庭的布置：庭长、审判方、检察方都坐在台正中央，辩护人、书记员分坐在台前的两边，这种布置真有点史无前例。据说事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查阅了国际上的有关资料，认为如此布置不当，可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法庭，依然如故。您知道其中内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中间的内情，但这种法庭布置在以前的确没有见到过。”“还有，出庭证人的选择，及其出庭举止的关照方面，也有不周之处。据说廖沫沙在法庭上同江青对骂了起来，证人深受迫害难免情绪激动，但法庭应尽量设法避免出现上述场面。另外因错误地选择‘长沙告状’作审案突破口，请王海容、唐闻生出庭，她们对法庭氛围，江青的狡辩很不适应。听说王海荣退庭，对即将出庭的唐闻生说：‘你替我狠狠瞪瞪江青，她刚才瞪了我好几眼，真可气！’结果有关人员马上安抚王，又劝说唐不要感情用事。”

张先生也同意，从完善健全法制看，总结“两案”审理的经验 and 不足是有益的，有些问题在当时不一定能认识清楚，拉开点历史距离反而看得更透更深。但如今事件的大量纪实回忆有之，而认真反思的并不多。

张先生的话又让我想到一位老律师对“两案”的“苛责”。他觉得优秀的庭长，应是站在前台的导演，他应能裕如地控制整个法庭，机敏而不露声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发事变。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经验丰富而优秀的庭长是完全能驾驭，迅速让干扰审判进程的躁动销声匿迹。他向我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理想”庭长，那是五十年代沈阳审理日本战犯国际法庭的庭长贾潜。

我把那位律师的话，告诉了张先生，试图引起他对“两案”

法庭的评论，可他却很恬淡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有点准备不足。”的确，事后诸葛亮好当，可张先生从不愿扮演事后英雄的角色。

“您刚才讲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两案审理中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但我认为依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作用的体现是有限的。不少人说：辩护词是‘上面’定的，我想您的辩护词，大概也要经‘上面’审定后您才能读吧？”

“你推测的不错，的确经过‘上面’审阅。当然，从法律规范看，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此案在中国也是无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为辩护人，我一再坚持的几点要求，最后宣读的辩护词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讲到的申辩外，我坚持写上‘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要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另一点是应考虑李‘早年革命的历史’，辩护词中这个意思表达的极其委婉，因为在当时说这话太艰难了。人们对动乱祸患记忆犹新，把许多怨恨集于他们身上，对文革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这个层次。若晚些年审理，我们的处境或许会好一些。当时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确不该再给予苛责，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张先生告诉我，审判结案后，他和苏惠渔又见了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哦，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可脑筋转得飞快的李作鹏，没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显然，对审判他还是有看法的。即将分别时，他又冒出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听了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

诉我：‘二十年后给你！’‘那好 我等二十年。’我无可奈何。”

从李作鹏那里出来，“边鼓”之说便不断骚扰着张先生的思绪，使他联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的演奏，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李对律师在法庭上作用的刻画，律师们不过在“滚核桃”？张先生心中很不自在，但又感到无以辩解。

直到今天，“滚核桃”之乐 仍时时敲击着张思之。他经常扪心自问：“作为律师 我及格吗 我能做到无愧无悔吗？”张先生的核桃，似乎一下又敲到我这边来了：通过近期和一些中老年律师的接触，我深感中国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律师在审判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体现，还相当艰难。虽然新闻媒介一度把一些明星案炒得火热，有那么几个律师因之很风光。

张先生对我说：“我没有办过漂亮的案子。我经手的全部案件，事后想想，无一没有不足甚至失误。”他甚至把自己的律师生涯，戏称为“屡败屡战”。当张先生讲述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我内心也难以安宁。

一九四九年前，中国法学的摇篮，有“南东（吴）北朝（阳）”之说。张先生曾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彼时国民党的法律系统内，该系毕业生居多，号称“无朝（阳）不成（法）院”。新中国成立后，一九四七年入党的张思之到北京市法院工作。但在审理“两案”前，只有一次半辩护实践。他的处女作，是因南斯拉夫一个法律代表团要求旁听法庭辩护，才登堂为一年轻的抢劫犯辩护。后半个案子是当年颇有点轰动的罗抱一离婚案，男方是很有前途的高级经济官员，女方是位模范教师，可未及结案，他却“反右”骇浪卷入漩涡……

听罢张先生的经历，感到他“屡败屡战”的叹息，绝非因他本人无能。因为我最近常同律师打交道，我在报刊的朋友，便纷纷求我约他们写点公民如何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力的文章。可略知律师苦衷的我很清楚，这些“护法使者”自己依法行事的权力，亦不时会被侵害呢！

我没有向内行的人了解过世界律师制度发展的历程，但我想其必然要比张先生的律师实践更坎坷，健全律师制度的蹉跎与艰难，绝非中国独有现象。谈论思索到此，我感到我们的话题仿佛越来越沉重，便转移话题。

“作为一位资深律师，您能否谈谈律师应有的素质。我通过一些新闻报章对明星案或著作侵权案的报道，感到有些律师的确能言善辩，但他们似乎有点过于文学或感情的渲染，能赢得较高的印象分，这是一种趋向抑或是一种好现象吗？”

“论辩，可以说应该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如果一个律师法庭演说或写辩护词文理不通，言不及义，就太令人悲哀了。但如果仅仅是言语功夫好，可以哗众，律师个人赢得很高印象分，而委托人却不能得到实惠，那就把事情搞颠倒了。我赞赏高品味的辩护和演说，这绝不仅仅取决于对言语辞藻的驾驭，而在于律师人格完美的艺术体现，它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学识、风度、风格等等。如果在综合修养上有缺欠，不妨首先恪守老老实实按事实真相和法律原则办事的信条，也不要企图以言语辞藻来掩饰！”

张思之又陆续谈到律师应有的求实精神；应变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等素质要求，并用他经历以及听说的按理为佐证，倾听之中，我脑海中再次浮出这种念头：在中国戴律师这顶荆棘之冠，真不容易！

贾亦斌

与蒋经国从挚友到分手

贾亦斌：十八岁即辍学从军，抗战期间先后参加淞沪、徐州、武汉、鄂西、长沙诸大战役，因战功由营长升至军委会少将参议。战后在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与蒋经国共事遂成至交。经蒋力荐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一九四九年春领导了震动东南的嘉兴起义。解放后，历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长期参与两岸统一事宜。

贾亦斌
简历

作为一个热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我深知就中国革

命而言，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前辈，只是在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成为舵手后，国民党才褪去了革命的色彩。于是，矢志不移“民主、民权、民生”的人们，渐次做出与蒋氏政权分道扬镳的选择。

一九九三年，我曾有幸接触到一位这样的人，即儒帅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他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东北兵工厂中将总厂长。一九四八年十月沈阳城破在即，“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逃往北平。在北平遥控战局的蒋介石得知陈修和未离沈，立即亲命飞机返回接陈，然此时沈阳机场已被人民解放军控制。蒋介石的惦记，说明了陈修和同蒋不同寻常的关系。

如今，我又有幸得与原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先生畅谈，他也是一位做出与蒋氏政权分道扬镳选择的人，特别是他曾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有过长长一段“萍水相逢知遇深”的曲折渊源。

第一次见面前，我仅从有关资料中得知，贾先生曾为蒋经国同僚，蒋因故被迫辞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之际，力荐他接任，并要为他报请中将军衔；解放战争后期，他是震动东南的“嘉兴起义”的领导核心；一九七九年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一九九二年任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至今。显然，他属于我一向瞩目的历史关键人物，但从这些文字中我还感受不到他的人格，他的性情。

见面一聊我才知道，贾先生在国民党军中曾以骁勇善战称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为国民党第十军四十一师二四五团一营少校营长的贾亦斌经再三请缨，开赴淞沪抗战前线。在杨行守卫战中，他在头部、腿部两次负伤的情况下，仍

率领着由四百余减员到数十人的营队坚持在火线。

此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国民党军与同日军的历次堪称浴血的鏖战，贾亦斌几无遗漏。他这个既非黄埔、又非陆大科班出身，且与国府军方上层素无渊源的行伍士卒，所以能在二十九岁即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将军，缘由无他，就是因为敢战不怕死。

在同我这个与他小儿子同龄的晚辈的交谈时，他态度的温良谦和，给人的印象至深。即便是回溯那些最惨烈的战斗，贾先生说起来也是细语娓娓，一脸的慈颜悦色，不太像通常想象中冲锋陷阵，发号施令的将军。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某高人的名言：善战者不武，善言者不辩，善治者不为，善师者不教。这大概与高山仰止的当代军事家毛泽东，我们却几乎看不见他穿军装带枪是同理吧。

贾亦斌率领的补充团一千八百余官兵，
只有不足二百人活着走出战场
贾亦斌被迫拔出了手枪
三十岁不到已是将军

在一九三九年鄂西冬季攻势中，贾亦斌带领的四十一师补充团取得了攻打日军罗汉寺据点的胜利。然而当他喜滋滋地来到师部时，只见师部里一片沮装，师长丁治磐脸色煞白，哆嗦得说不出话。

原来四十一师主力刚刚攻克的日军多宝湾据点，又被日军的坦克部队收复，战役指挥官第十七集团军司令周岩，来电话严令丁必须立即夺回多宝湾，否则军法从事。所谓军法从事，就是枪

毙；而丁和几位团长感到部队伤亡惨重，再克多宝湾不啻梦呓，只好相顾唏嘘垂泪。

贾亦斌见此情景，自告奋勇地说：“补充团还剩六七百人，我愿率团把多宝湾阵地拿下来。”丁治磐闻言转悲为喜：“你赶快指挥反击吧，这下我的脑袋可以保住了。”

经几次反复，补充团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夺回了多宝湾阵地。而在是役中，然而刚刚凯旋的贾亦斌，不仅没有得到丁治磐感恩戴德的嘉奖，反而被丁逼得拔枪相向。

为了夺回多宝湾阵地，带兵突击的一营营长杨毅兴英勇阵亡，贾亦斌靠借贷和团部余款凑了四百元钱，但仅够将杨的灵柩送回原籍，因此他提出由师部支出四百元，以抚恤杨营长的家人。

可丁治磐却认为贾亦斌这是以作战有功要挟他，不同意给杨抚恤。贾亦斌闻言顿时火了，与之争执起来。丁竟指斥贾亦斌要造反，并叫来了卫兵，贾亦斌被迫拔出了手枪。后经在场的人劝说，贾放下了手枪，被丁关了一个星期禁闭。

从禁闭室出来，贾亦斌感到无法继续置足四十一师，遂自请解甲。然而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的名誉却不胫而走。曾与贾亦斌有一面之交的韩浚，彼时正在湖北军管区主管编练事务，闻讯主动找贾亦斌，自谓兼职过多，请贾暂代其编练处处长一职。

到了编练处任上，贾亦斌发现根本无兵可练；前方战事正亟，自己怎能安于在后方虚耗光阴呢？于是他请求到成都中央军官学校任教，以自己的实战体会，教练出战之能胜的军官。

韩浚挽留不成，拉着贾亦斌的手说：“危亡之际，我们军人理应厮杀在前，我实不甘在后方等待，正力争重返战场。请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一旦我获准上前线，你一定要同我共赴戎机。”

“只要你带兵上前线，我一定与你同行。”贾亦斌答到。“一言

为定！”一言为定！”

贾亦斌到中央军官学校后，被任命为上校战术教官，还兼军官教育总队步兵校、尉官研究班区队长。他没想到，在这里，他和后来对儒、释、道皆有精到见解，仰从者无数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成了同事南当时在军校任政治教官，与贾亦斌在教学中时有过往，谈话也投机，关系由同事而朋友。

贾亦斌的中央军校教官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韩浚争取到了上前线的机会，他被任命为七十三军七十七师的师长，遂电邀贾亦斌作他的参谋长。贾亦斌不仅是因为与韩有约在先，同时也渴望为国杀敌，故随之辞教从戎。

在贾亦斌赴前线不久，作了年余朋友的南怀瑾也离开中央军校，遁入峨嵋山，潜心佛学禅机，终于青年时从业的军事、政治之外，卓然成就别具一格的大文化学问。

一回到军中，贾亦斌就赶上了新一轮鄂西攻势。部队刚刚集结，师长韩浚就病倒了，贾亦斌接受重托，代理指挥七十七师作战。在宜昌附近的鸦雀岭争夺战中，由于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精良的武器和空军的有力支持，使主攻的七十七师几乎丧失的克敌制胜的勇气。

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先身士卒的果敢，有序的调度，很快地控制住局面，扭转了战势。这一切，均被路经此处的七十三军军长彭位仁看在眼里。这第一瞥形成的良好印象，为后来贾亦斌在彭位仁力荐下，得与蒋经国同事从而引出一段曲折恩怨，埋下了伏笔。

接着，长沙第三次会战开始了。贾亦斌所在的七十三军，与四军、十军、二十军、二十六军等部协同作战，取得了歼敌数万的长沙大捷。贾亦斌因参谋指挥出色受到嘉勉，并经彭位仁、韩

浚一再保举，晋升为少将。

在国民党军中，以不足三十之龄跻身将军之列者，罕有其匹。其实，贾亦斌早就因英勇善战，几度被他的上级申报晋级，可皆因他行伍出身，没有黄埔、陆大等名牌军校的学历，故而晋升屡屡被阻。这种现实，激起了贾亦斌渴望深造，且非要读陆军大学，这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雄心

稔知贾亦斌蹭蹭军旅生涯的彭位仁、韩浚，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均出面保举他上陆军大学。但这所前身可追溯到清代末年的陆大考试十分严格，且科目繁多，除了军事方面的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军制、兵器、筑城、交通外；还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这对初中没读几天就辍学的贾亦斌来说，不啻关隘重重。

知难而退，不是贾亦斌的性格，在几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到处拜师苦学，以致同僚中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头禅：“罗斯福有个智囊团，贾亦斌有个老师团。”功夫不负苦心人，一九四三年秋，贾亦斌终以优异成绩踏进陆大，这所他朝暮钟情的最高学府。

提出“新国防论”

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奉调进军山东

“这个军参谋长的职务我无法就任。”

蒋经国对同龄人贾亦斌刮目相看

求学不易，故而贾亦斌对在校学习异常珍惜，因此多有心得体会。针对中国近代频遭外侮，国防积弱的现状，他对国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加了冯玉祥召集的“国防研究会”，对“富国强兵”做理论探索，撰写出《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际》新

国防论著。

在《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际》书中，贾亦斌提出“四战论”即要‘人人能战——即过去所谓全民战；物物能战——即一般所谓国力战；时时能战——即能应付过去所谓闪电战、雷击战；处处能战——即所谓全面战。’以此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胜利。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贾亦斌表述了自己的理想：“在最近的将来，最好在下次大战以前，能培养多量精炼而真正‘文武合一’的预备干部。从事建设‘人人能战，物物能战，时时能战，处处能战’四战论的新国防。挽回我们这个破碎支离的祖国恶运，而能达到富强康乐的境域，并且能作远东与世界和平的支柱，渐进世界于大同。”

让贾亦斌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新国防论”及“预备干部制度”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此时在青年中寻觅有朝气的出类拔萃者，为未来接班做准备的蒋经国的注意。

陆大一上就是三年，临毕业之际，蒋介石不顾广大将士抗战后祈盼休养生息的渴望，执意将中国导向违背民心的内战歧途。此时，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的韩浚，奉调进军山东，他邀贾亦斌出任他的参谋长。

对老上级和敬若尊长的韩浚，贾亦斌始终怀着无尽的感激，在逆境中是韩收容了他；他的升擢与韩的力荐相关；他上陆大又得益于韩的保举……恩情私交，令他难启推诿之齿。但七十三军赴鲁的终极目的很明显，与中共一战是早晚的事，而贾亦斌从抗战胜利那一起，就抱定了绝不参与内战的意念。

沉吟良久，贾亦斌坦诚地对韩浚说：“这个军参谋长的职务，我无法就任。抗战期间您邀我任师参谋长，我不曾稍作踟蹰，畏死不是贾亦斌的习性！八年抗战，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

血，那是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现在需要的是建设，是和平民主。不置身内战前线，这是我不动摇的信念，希望您能理解。”

就这样，贾亦斌在陆大毕业后，没有重返战斗序列，而是经另一位老上司的推荐，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就职。不料，从此与蒋经国有了一段不解的恩怨。

言及“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不能不先对“青年军”做一番解说。

青年军创建于一九四四年秋季，由于日寇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更直接地从南亚获取支撑战争的资源，再次调集可机动的部队，大举进犯湘桂，贵州独山要塞随告失陷，陪都重庆因之震动，国民党政府甚至着手准备再次迁都西昌。

为了解此危局，蒋介石提出组建青年军的动议，他发表文告，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口号，激励热血青年从军屏寇。蒋经国、蒋纬国等国民党政要子弟率先报名从军，以示垂范。很快，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报名从军者即达十万，响彻西南山岳的“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今天忆起，还是那样叫人怦然心动。

一九四四年冬，由罗卓英为总监，彭位仁、黄维为副监的知识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成立，在对青年从军者加以短期集训后组成“知识青年远征军”九个师，派驻川、陕、滇、黔、闽等省。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支新军，团以上军官全由他亲自审定。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中将主任的蒋经国，亦费尽心机对之加以控制。他重演通过培养青年干部，自成体系，立足赣南的故伎，创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且亲自主持训练。

他与学员同吃同练，培养感情，树立威信，凝成一体，然后把他们逐级配置在青年军中，以政治工作网，实现对该军的控

制。他的目的达到了，“太子军”之称不胫而走也就不属空穴来风了。

可这青年军，除少数几个教导团开赴缅甸、印度，参加了远征作战外；绝大多数将士，则因不久日本即宣布投降，连向敌人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捞着。青年军成军了，战争也结束了，可如何安置这十万知识青年，顿时成为一大难题。因为当初创建时，国民党政府曾许诺：胜利后复员可享受优渥条件。

知识青年是最敏感富于冲击力的，倘若许诺不能兑现，势必要激起强烈反应，或者使青年们背离国民党而倒向共产党，或者搅得社会动荡不安。又是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成立了以军政部长陈诚兼处长，蒋经国、邓文仪、彭位仁为副处长这样高规格的“青年军复员管理处”。

管理处分就学、就业、联络、总务四个组，老上司彭位仁要贾亦斌出任管就学的第一组少将组长。贾亦斌的理想，是留校继续“新国防论”的研究。可刚刚拒绝了老上司韩浚，不好再驳这位彭老上司的面子；想想复员安置工作，与预备干部制度理论又关连，便应了下来。

彼时准备复员的青年军有七万三千人，而要求就学的逾三万三千。依优渥条件，高中读过两年以上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可免试上大学。但教育部门和各大学则不愿或不肯多接收这类复员军人。饱尝失学之苦的贾亦斌，颇能体谅渴望就读大学的复员人员的心情，他不辞疲惫地多方奔走，唇焦舌敝地与有关单位交涉争执，最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一组的差事，是复员管理处预料中最棘手的，即便费尽心机，也不免有些遗留问题继续拖累人。但贾亦斌却以他的诚挚与韧劲，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故而当他将工作过程向处务的实际

负责人蒋经国汇报时，使蒋经国在初次打交道中，就对这位同龄人另眼相看。蒋经国随即在公开场合表彰了他。

就在被表彰的那段时间，贾亦斌的《论预备干部制度》陆续被《曙光》等几家报刊发表。这在国民党军中，呼吁建立预备干部制度的肇始之声，不会不引起早萌接班志向，且已着意筹组自己体系的蒋经国的特殊的关注。今朝预备、明朝……有所作为的执政，离不了洪云托月般一流人才，而预备制度，提供了精英脱颖的土壤和机遇。“贾亦斌”这个名字，他记得更深了。

不久后，在一次处务会议结束时，蒋经国请贾亦斌留下，要和他单独谈谈。

“彭诚一（位仁）曾多次向我介绍过你，说你在对日作战时很勇敢，胡宗南大哥和第一军的朋友们也都如是称赞你。”蒋经国开诚布公：“不怕死，是应列为军人必须品质之首的，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那也许是他们对我有些偏爱，说起来难免过头。我青年失学，许多渴求的知识没能学到，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自幼记住了，战场上不过身体力行而已。”

贾亦斌继续说道：“若细究在战场上不怕的原因，恐怕还与日军的暴行刺激相关。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我曾亲眼目睹活生生的孕妇和她的两个孩子，顷刻被日军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孕妇的肚子被炸开，腹中婴儿临死前的蠕动；我亲眼目睹我的部下和士兵们。在日军的炮火下丧生……所以我抱定一个信念 就是宁死不当亡国奴。”

这些话很朴素，却勾起有相同经历的蒋经国的内心漪涟：“我的亲生母亲也是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我悲痛至极，殓葬了母亲，却殓葬不了哀悼的悲愤和复仇的决心，我把

‘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母亲的墓碑。看来，抗日爱国，我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感慨之后，蒋经国告诉贾亦斌，他刚刚读过《论预备干部制度》，许多新见解令他感兴趣，希望贾亦斌谈谈研究这一问题的起因及具体操作设想。

贾亦斌说致力于这一问题，首先起源于抗战中的感触，战时的伤亡巨大，合格军官匮乏的矛盾非常突出；继而又有感于战后的复员安置，军官突然显得多了起来，安置稍不得当，事端乱子便此起彼伏。预备干部制度的建立，恰恰是治疗这一结症的药剂。

“现代战争要全国动员，要做到官皆将、民皆兵，平战合一、文武合一。战时征文为武，平时转武为文。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军事思想，现代美国和土耳其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贾亦斌侃侃而谈，蒋经国听得频频颌首。

最后，蒋经国又询问起贾亦斌何以能那样投入地做青年军官就学工作。贾亦斌回答说首先是身在其位，必须履行职责。再则是自己曾饱尝失学痛苦，将心比心；特别是这些青年是在民族危亡当口，放弃学业，并准备牺牲性命报效国家的，政府理应对青年的热忱给予回报，更何况有诺在先。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资格与资产是成正比的。小有钱的读小学，较有钱的读中学，很有钱的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资格又与作官成正比，学历越高，官作得越大，这种官僚哪里懂得民间疾苦，哪里会作人民公仆！所以我想使这批爱国青年在服役后能就学，真正做到文武合一，战时能报国，平时能为民服务。”

蒋经国再次被贾亦斌朴素的语言感染，他拍拍贾亦斌的肩说：“你这些见解，讲到我心里去了，我想我们今后会成为能长期合作的同志。”

蒋经国要为贾亦斌证婚
自谭嗣同就义后，谭家便开始衰微
蒋方良没钱花时，会找宋美龄喊几声妈
妈

经过那番畅谈，蒋经国、贾亦斌彼此都生出志同道合的感觉，关系随之益发融洽。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蒋经国听闻贾亦斌近期将举行结婚仪式，立即来到贾亦斌的办公室，带几分责怪地询问：“你要举行结婚仪式，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们准备婚事简办，不想过于声张，所以就没惊动你。”贾亦斌连忙解释。

“那怎么行，谭吟瑞是我素来景仰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烈士的孙女，你们的婚事我不能置身事外。”蒋经国随即当众宣布：“我来作你们的证婚人，婚礼的事宜，也不用你们操心了，一切由我们机关负责筹办 就这样定了。”

六月三日，青年军复员工作全部结束，贾亦斌的婚礼定在次日举行，因而别具一重纪念意义。婚礼那天，蒋经国、彭位仁和各组组长徐恒瀛、易芳昱、徐思贤及复员管理处人员百余人全部到场祝贺。

婚礼上只是准备了一些茶点水果，毫不奢侈，但却举办得隆重热闹、气氛欢愉。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贾先生回忆说只依稀记得他的话亲切而幽默，全场几度为之忍俊不禁或掌声阵阵；但具体内容，则因当时情绪兴奋和紧张，又经半个多世纪尘封，竟未在脑海中留住。

有血有肉的蒋经国，他的人情味、幽默感，我还是在贾先生这儿头一遭领略，以往看过的书籍，例如江南先生所著《蒋经国传》、蔡省三、曹云霞所著《蒋经国系史话》中，蒋经国给人的印象，除了热衷政治，工于心计，筹划接班外，就干巴巴得近乎呆板了。

婚礼后，蒋经国又亲自派车，把新婚夫妇送到重庆北温泉度蜜月翌日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启事贾亦斌知道，这也是蒋经国安排的；但他如此上心和周到，则出乎意料，故而在友情之外，对他又添了一层感激。

记得第一次和贾亦斌先生见面时，我从贾先生递来的名片上，看到“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湖南谭嗣同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头衔，均属我多年热衷的近代史范围，便忍不住问？贾先生指了指夫人说：“都是因为她，她的祖父是谭嗣同。”

一九八八年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时，北京的十余位中青年近代史学者，搞了次戊戌变法运动的小型座谈，此后便以戊戌思潮为题，不时相聚研讨，我亦忝列末座。谭嗣同及其著作——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文献《仁学》，是我们经常谈论到的特别是在宫廷缙骑四出，康有为，梁启超逃逸，人们劝谭嗣同也暂避一时之际，烈士那“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掷地有声的言语，更是我每每思及便每每肃然的。

因此，我向贾亦斌先生问询了一些有关他夫人的情况。贾先生告诉我：虽然谭家属浏阳四大家族，谭嗣同父谭继洵曾官居湖北巡抚，但自谭嗣同就义后，家庭便开始衰微，贾先生夫人谭吟瑞父母早逝，一度靠长姐抚养，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被迫中辍。这一点，同贾亦斌少年时经历颇相似。

抗战期间，谭吟瑞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学过刺绣、缝纫、蚕桑，在高级助产职校毕业后，当过助产士。战争胜利后，她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参与《曙光》杂志的编辑工作。经四组组长徐思贤撮合，贾亦斌与谭吟瑞相识并恋爱，此时贾亦斌已在三十三岁年纪。

青年军复员工作结束后，该处即行撤销。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而设立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部长。原复员管理处的三位副处长，分别负责筹组国防部的监察局（彭位仁）、新闻局（邓文仪）、预备干部管训处（蒋经国）。

在蒋经国的恳切邀约下，贾亦斌同蒋一起筹划组建预备干部管训处。同时，蒋经国还委托他，把青年军复员的工作做一全面总结。

还都南京后，贾亦斌与蒋经国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交往更频繁密切了。

虽说贾亦斌挂着少将军衔，但他要赡养母亲和妻儿，生活拮据而清苦。他的一位堂兄本以为他的生活应较宽裕，便在他家住了一段，才知在他家竟吃不饱饭，菜里有几片肉，薄得像纸，风都吹得起来。

然而出乎贾亦斌预料的是，身为蒋介石长子的蒋经国，在生活上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且并不比他优裕多少。蒋经国带着一个机要秘书，都住南京励志社二楼，共两个房间，故而他的那间屋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还兼卧室，食宿都乏人照顾。

当时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住在杭州内西湖一号的一幢小楼里。夫妻不定期地在南京或杭州小聚，生活上颇不方便。

出于关心，贾亦斌问蒋经国为何不把家眷接来同住，蒋说是没有房子。贾亦斌不知背后的隐情，便热心地帮他张罗了一处不错的寓所，可蒋经国随即将寓所让给了一同留苏的同学。

后来，贾亦斌才知道，蒋经国说没房是个善意的敷衍：因为苏联大使馆设在南京，蒋方良是苏联人，蒋经国又有留苏历史，蒋方良常住南京，一旦与苏联使馆发生联系，定会引起美国人的猜忌，影响美蒋关系，故蒋方良只得按宋美龄意愿居住杭州。

不能陪伴丈夫的蒋方良，带着孩子在杭州也很寂寥，通常靠秘书陪着打牌消磨时光。她又没有多少钱，所以秘书同她打牌，只能输不能赢。尽管如此，她还是隔不多久便囊中羞涩，到南京找宋美龄，亲热地喊几声“妈妈”，宋美龄高兴了，就会给她一些钱。久而久之，蒋方良找宋美龄喊妈妈——因为没钱花，竟成为南京城里众人皆知的谈笑。

避暑区牯岭镇，冠盖如云，轿子熙攘，
政治烟云笼罩
三青团、青年军，是蒋经国政治攀援的
两根扶手
蒋经国身上，有一些蒋介石也没有的特质

一九四六年秋夏之交的庐山，有些不同寻常。虽说，为了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有美国人作调解人的国共和谈中共方面的代表周恩来拒绝上庐山，与在此避暑的蒋介石谈判，累得美国调解人马歇尔八上庐山，在沪、赣之间来回传话。避暑区牯岭镇，依旧不冷清，冠盖如云，轿子熙攘，政治烟云笼罩。

原来，不光是国共和谈还在以特殊形式持续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军复员工作检讨会议，也在庐山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这两个会议，均与蒋经国的政治前途相关，他要贾亦斌全力投入检讨会议准备工作。

蒋经国是从在江西搞青年工作，训练青年干部起家，建立起自成派系第一批班底“赣南系”的。此后，他进入三青团中央，又由掌三青团中央干校，掌青年军政工，羽翼渐丰，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三青团、青年军，是蒋经国政治攀援的两根扶手，所以他分外重视这两个会议，并成为两会的中心人物。但就在会议筹备与召开期间，贾亦斌却目睹了蒋经国在政治跋涉中一再受挫。

首先是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新建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出任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相当于国民党党校，由 CC 系控制了近二十年。两校合并，是 CC 提议的，意在将培训党内干部的权利通通抓在手里。

不料，蒋介石却另有栽培自己儿子之想，在他暗示下，蒋经国被任命为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这使 CC 系掌帅旗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懊恼，不仅没抓着中央干部学校，连视为禁脔的中央政治学校及培训党内干部大权也旁落了，于是他们全力予以抵制。

在二陈的暗中指使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大闹校园，“老子任命儿子 要拿我们当孙子！”我们不当孙子！”反对父子家校！”的喊声响成一片 并以罢课相威胁 弄得蒋经国十分难堪。

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电召陈立夫，严辞训斥，命其立即平息校园内风波。就在当天，蒋经国找到贾亦斌，告诉他说：“今天领袖把他们骂得都哭了。”说时很解气，可教育长他也不好去作

了，内心颇忿忿。

虽然教育长未能就任，但此时作为中央常务干事的蒋经国，在三青团内说话已很有分量，三青团也成为有一百二十四万之众的大团体。三青团骨干，大多数原为复兴社成员，长期受以 CC 为主体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压制，党团矛盾日深，故而重组新党与 CC 系抗衡的意念，在团内日益滋长。

在庐山召开的三青团第二次全体大会上，确定三青团地位和前途是主要议题，在热衷组党的骨干分子的串联游说下，独立组党的呼声淹没了会场。这些人还川流不息地于蒋经国寓所，怂恿他表态支持。

如此局面，引得蒋经国心绪繁复。他早就对 CC 系把持国民党组织不满，企盼新兴的组织崛起，打破旧的格局；但对三青团多数热衷组党的活动分子内心另有所图，他也洞若观火；且兹事体大，在不清楚父亲的意图时，率先表态是愚蠢的，所以他的态度始终模棱暧昧。

庐山上组建新党的喧嚣，南京很快就知道了，CC 系及部分国民党元老惊异不安，陈立夫拉着戴季陶上庐山见蒋介石，力陈不可，要其出面制止。

蒋介石也察觉组党运动背后别有图谋，随即明确表示“决没有改团为党的意思”；“以成立政党相号召”，“不仅是绝对的错误，而且是极端的危险”。

庐山上的组党闹剧，虽因蒋介石发话嘎然而止，但组党的狂热分子们，并未善罢甘休。他们在庐山会后，利用国民党政府推行宪政举行的各级选举，通过“运用组织力量”，支持团部的人竞选和当选，以便“直接参与政治”，同国民党党部对抗。终于导致党团公开冲突，武斗、暗杀事件频发，闹得不可收拾。

三青团的缔造者蒋介石，又不得不充当了三青团的终结者，亲自宣布取消三青团，实行党团合并。已在团内形成气候，并冀望借之有所作为的蒋经国，因三青团的一朝瓦解，使自己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前功尽弃，其沮丧之深，是可以想见的。目睹这全部过程的贾亦斌，颇能体会蒋经国的心情，但这都属后话了。

为庐山上的另一个会议的召开而忙碌的贾亦斌，也在他那个青年军复员检讨会议上，经历了大大出乎意料的场景。

之所以要召开这么个会议，是由于在青年军第一期七万三千人复员后，第二期的征集编练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因此要做一番经验问题的总结检讨。

参加这个坐议的有青年军的三位军长刘安琪（第六军）、钟楸（第九军）、黄缙（第三十一军），下属九个师的师长戴之奇、潘华国、罗又伦、吴啸亚、覃异之、萧劲、罗泽、黄珍吾、温鸣剑，以及军、师的政治部主任共三十余人。

在会议开幕那一天，蒋介石亲自到会“训话”。作为会议秘书组长的贾亦斌，专心地做着记录。

蒋介石的讲话显然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有关青年军的一些问题，他一一做了解释。在这之后，蒋介石话头一转，提高了声调：“你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只看我下令停战，也不要只看马歇尔八上庐山，搞什么调停。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打！”

“只要我们打，美国就会支持我们，会给我们大量的军火和静寂援助。凭国军的陆海空优势，只要六个月，中共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蒋介石滔滔不绝。

做记录的贾亦斌，被蒋介石突转的话题惊呆了，钢笔从手中脱落，“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这个最高统帅的形象骤然在他心目中黯淡了。

去年年底，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此前不久，经马歇尔的调停，国共又签署了停战协定，蒋介石亲自下了停战令，还组建了由三方参加的军事小组，负责监督停火；与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商讨着建立联合政府事宜。尽管一九四六年以来，内战的阴霾愈积愈浓，但贾亦斌还没亲耳听到最高当局明言开战，和平的希望并未彻底破灭。

可此时此刻，这个曾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声称要给民众以和平的蒋介石，就在自己的眼前，毫不掩饰地、出尔反尔地袒露了他开启内战的决心。《孙子兵法》中云：“兵者 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然而就在二战后，国家惨受痛创，人民渴望休养生息之际，作为军过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却无所顾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把战争摔给了国人。贾亦斌虽然还得做记录，可意绪渺然，只是下意识地挨到了散会。

会后，蒋介石与全体与会者合影，随后又逐一同与会者照两人合影。看着其他军官兴高采烈地侍立在蒋身边合影，贾亦斌瞥往一边想躲过去。可蒋介石在同其他人照完后，连问了数声“还有谁没照”，蒋经国随即说“还有贾亦斌”，并把他拉到蒋介石身边。就这样，贾亦斌留下了一张毫无表情的与蒋介石的合影。

晚上，蒋介石偕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和复员检讨会代表共进晚宴。蒋介石很客气地与在坐者打招呼，还特意同贾亦斌多询问了几句。但贾亦斌兴致全无，入夜他难以成寐，暗生回陆军大学搞他的“新国防论”研究的念头。

贾亦斌把自己的想法，首先告诉了将他邀来复员管理处的彭位仁。彭听后很奇怪，“经国先生不是很器重你吗？”可贾亦斌执意要走，他找到蒋经国，直截了当提出要回陆大。

蒋经国大不以为然，他有些激动地说：“亦斌兄，你可不能

走，你是我这儿的台柱子，你一走这里岂不要垮台？”并恳切挽留。贾亦斌被感动了，回想许多人曾向他讲述过蒋经国以往识人、用人、容人的事例，今天亲身领略。他觉得蒋经国身上，有一些蒋介石及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具备的特质，竟涌起“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动。

见贾亦斌不坚持走了，蒋经国连说：“好好！你不要走。如果有什么不是之处，你尽可直说，我喜欢敢于提意见的人。”“我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有意见自会提，提得不妥，也望你海涵。”贾亦斌被蒋经国留下了。

蒋介石把蒋经国召来斥责了一通，蒋经国不仅不记恨，反而提升了贾亦斌
有人说蒋经国师承共产党

复员管理处撤销，新成立预备干部管训处后，贾亦斌任负责预备干部训练和学生集训的第一组组长。

为了将培训工作正规化，贾亦斌认为应该营建长久的基地，而不能像以往那样临时租借老百姓的住房，他拟定了个建设预算，在办公室加盖了蒋经国的图章，递交参谋总长陈诚。

陈诚未置可否，就转呈蒋介石审核。蒋介石本无心实行预备干部制度，且内战已启，财力物力投入以战争为先，故而对如此庞大的营建预算一见即烦。也许还因为六个月解决中共的作战受挫，他心气不顺，遂把蒋经国召来斥责了一通：“战事正亟，预备干部培训造那么大预算干吗？”

这一段偏偏蒋经国也是政途蹭蹬，挨了训的他，憋了一肚子火，乘车赶回处里，便追查预算的拟订者。“我做的。”贾亦斌

随即承认。“你是怎么搞的，这不是让领袖为难吗？”蒋经国怨气难遏。

“怎么是为难领袖呢？不建长久基地，既扰民，又搞不好训练，不能长此对付呀！再说预算上也盖了你的图章了，怎能只怪罪拟订预算的人呢？”贾亦斌也有些恼火。

“我什么时候盖图章了？”蒋经国皱起了眉头。蒋经国把自己的图章交给办公室主任俞季虞掌管，这样一来，有些事他就不负责了。

贾亦斌叫真儿说：“俞季虞盖和你盖是一样的。你若不信任他，为什么把图章交给他？交他就说明他可以代表你，盖了你的图章，你就应负一定的责任！”两人吵得面红耳赤。

回到家中，贾亦斌怒气未消，若不是蒋经国一再挽留，也不至于受今天的气，离开之念复萌，便接连三天没上班。第四天一早他刚起床，就听见吉普车急停在自家门前的声音。

来人是蒋经国，他进门就说：“喂，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那天我发脾气不对，但那并不是冲着你来的嘛！”他走近贾亦斌，像对亲兄弟般温和地拍了拍贾亦斌的肩膀：“上班去，上班去。”硬拉着他上了吉普。

途中，蒋经国告诉贾亦斌，他已将原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调走，要贾亦斌主持办公室。到机关后，马上办理了交接，蒋经国的图章也由贾亦斌掌管。

往事现状齐集心头，贾亦斌再次被感动了：早在四十一师，自己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几度替师长排忧解难。可因为争执一个部属的抚恤之事，师长便翻脸不认人，以‘性情桀暴，忤逆长官’罪名，将自己逐出部队。而自己与蒋经国顶撞争吵，起因是工作，可蒋经国不仅不记恨，反而提升了自己，还亲自登门相

告，请自己上班。两次争吵，结果迥异，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情谊更深了。

贾亦斌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后，每逢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最高作战会议”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主持的“部务会议”陈诚主持的“最高参谋会议”经常受蒋经国之托，代他出席。

这样的会议参加得多了，贾亦斌更多地目睹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指挥上的颠预无能，更快地得知了国民党军在军事上节节溃败的消息，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败因。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在最高参谋会议上，得知了老上司韩浚，在山东莱芜与中共作战时兵败被俘。

在四五月间，蒋介石主持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蒋介石因山西运城失守，丢失大量军用车辆，怒斥联勤司令郭忏、参谋长李树森无能。他一个劲追问丧失的军车是新的还是旧的，郭、李吱吱唔唔答不出，激得蒋介石对他们由责而骂。

一个多小时在骂声中过去了，贾亦斌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给李树森写了张条：“不新不旧。”李把条给了郭，郭照条宣科，蒋介石才停了下来，宣布散会。

就在这以后不久，预备干部管理处升格为预备干部局，蒋经国任局长。预干局的成立，与贾亦斌在国防部厅局长会议上的据理力争有关。会后，年轻气盛的他戏言：“诸葛亮舌战群儒，我是舌战群猪。”

这话被在赣南时即加入“太子系”的王升听到了，向蒋经国告状说：“贾亦斌鄙视国军高级将领，恐有反意，对他宜加注意。”但蒋经国对此不仅未予介意，反而在深思熟虑后，选贾亦斌出任副局长，并亲自找蒋介石要下了委任状。当时许多人不服，蒋经国还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此后还不到一年，就发生青年军三十七军军长因贪污事泄畏罪潜逃事件，此案还牵连该军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两人均被处决，后者还是蒋经国的学生。蒋经国备感颜面无光，请辞局长之职。由谁来继任局长一职，备受国防部内外官员瞩目。

蒋经国把贾亦斌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他说：“领袖的意思，我不当局长了。我考虑由你代理局长，我去请领袖亲自下手令。”

贾亦斌一听，感到很突然和意外：“连你都干不了，我还能干得了吗？这个局长我当不了。”

“还是由你来当。军务局会支持你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军务局长俞济时；军务局副局长周宏涛也会支持你的；万一还不能解决问题，你还可以直接来找我嘛。除了联谊会的是还由我管，青年军的所有事都由你管！”蒋经国不容再商量。

这决定一宣布，引起了比贾亦斌任副局长时更强烈的反响。

“贾亦斌在抗战中身经诸多重大战役，置生死于度外，屡次负伤不减勇猛；为官多年，官居少将，却身无私人积蓄，极为罕见。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贾亦斌两者兼备，这种不可多得的将才不用，我还用谁呢？”

又是蒋经国一番说服工作，才平息了啧啧烦言；他还提出要贾亦斌申请中将军衔，只因贾亦斌极力反对才作罢。

此后，贾亦斌同蒋经国私下交谈的机会多了起来，听到了许多他在公开场合难得一吐的胸臆。蒋经国向他讲自己在苏联留学的岁月，像被羁异国的人质，政治迫害和生理疾病几度交加于身，差点丢了性命。但他似乎没有太多的抱怨，回溯起那段往事，更多的是感叹和眷恋。

蒋经国谈得最有兴致的，是他归国后在赣南立足创业，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奠基的时日，他如何禁烟、禁赌、禁娼，如何与恶势力角力，如何培植新建设力量……

然而最能激起贾亦斌内心共鸣的，还是蒋经国对国民党内黑幕重重，官僚徇私舞弊，欲敛聚天下财富于一家，置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等劣迹疾恶如仇的批评。他深怀忧虑地说：“国家要灭亡就毁于这些人之手。”每逢此时 贾亦斌心底牢骚的宣泄也无所顾忌起来。

此外，蒋经国对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中统”、“军统”特务横行，也流露过不满。他分析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除与中共相互敌对外；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在治国大政上铸错不绝，遂致民心丧失。因此他提出“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中共；亦反对国民党内贪官污吏。

对“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目标的实现，蒋经国寄希望于青年军。故而他非常重视对青年军的把握，以及青年军自身的建设和完善。贾亦斌因而常陪同他下基层，参加青年军的各种活动，由是目睹蒋经国与青年军官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关怀体恤下士，赢得了官兵的好感。

每一思及这种种观感，贾亦斌总是觉得：蒋经国与那些养尊处优的国民党官僚不可同日而语，与那些贪婪鄙琐的污吏更异其趣。倘若国民党的高官大员们，都能像蒋经国这样，国家也不至于呈江河日下之势。

然而蒋经国的这种形象，在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异论的。有人说这是蒋经国在“笼络人心”有人说他这一套是“师承共产党”。贾亦斌心想：倘若蒋经国身上那些可堪称道的优点，真是“师承共产党”的话 那么共产党倒是真应得到拥戴的。

国民党的用人政策是“喂猪驱虎”用钱政策是“肥强瘦良”
蒋经国还会武功
洋太子与土太子之争渐趋公开
政见不同冲淡了友谊

一九四七年春季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危机更趋凸显，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族工商业颓败，失业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威胁着广大的工人、公职人员及面临毕业的专科以上的学生。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第四届三次会议开幕当天，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十六所专科以上院校的学生，高张“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帜，在南京联合举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一百余人受伤，二十余人被捕，此即著名的“五·二〇事件”。

事件发生后，各地学生和社会各界群起声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在全国涌起波澜，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称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这一运动形成的冲击和影响，很自然地会在以青年人为主的青年军中产生反应。八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喊醒了正在熟睡的贾亦斌，对他说：“北平青年军夏令营中，青年军和三青团间矛盾闹得很大，已经无法开课了，请你以讲学的名义走一趟，恢复那里的秩序。”

贾亦斌立即从南京飞往北平，他经一番调查，了解到这陷于僵滞的争执，表面上由青年军发了毛毯，而三青团未发毛毯引

起，实际上早转入对国民党统治评价的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辩。

他召集双方开会，首先要求营员复课；并要求营员在毛毯问题上，发扬先人后己和谦让美德；随后表明他个人倾向对国民党统治弊端持批评态度的进步营员们的观点。

夏令营的讲课恢复了，贾亦斌离开前，北平夏令营训育组长要贾亦斌向蒋经国反映，有几个营员有亲共倾向。他提到的人，正是对国民党统治弊端持批评态度的活跃分子。贾亦斌替他们辩护说：“这几个人不错，就是心直口快，爱发牢骚而已。”随即在私下里，向那几个活跃分子打了招呼，要他们注意。

回到南京，贾亦斌在国防部看到有三个复员的青年军的学生被关押。他们被怀疑与“五·二〇事件”相关，在嘉兴的青年军夏令营被捕，但并没有是共产党的确凿证据，只是对现实不满，屡发牢骚。

在向蒋经国讲述北平夏令营的情况时，贾亦斌说：“北平的问题，是进步学生和保守学生的争吵。如果有些做法不易辙改弦的话，国民党非亡不可。”

对贾亦斌突如其来断言，蒋经国听了一怔：“为什么？”

“时下国民党用人政策是‘喂猪驱虎’，用钱政策是‘肥强瘦良’。”贾亦斌讲道：“只要口头上反对共产党，明摆着是庸人，也看作忠贞之士，进爵加饷，这是喂猪；再有才干的人，只要对当局稍有不满，发点牢骚，就被当作共产党，或民盟，视为老虎加以驱赶。这不是‘喂猪驱虎’是什么？”

见蒋经国盯着自己一言不发，贾亦斌继续说：“再看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大贾富商，个个肥得流油；而那些奉公守法的好人，却捉襟见肘，形销骨立。这不是‘肥强瘦良’吗？这样的政策风行，能不亡吗？对此你、我都不满意，都发过牢骚。若

发牢骚者皆以共产党论处，那你、我不都成了共产党？”

“我在国防部看到三个青年军复员的学生，年纪轻轻，就因为对现实不满，发了几句牢骚，便被关押起来了，难道不该马上释放他们吗？”贾亦斌一直说到这儿才停顿。

“你把这些意思写个书面材料吧，我送到领袖那儿去。”蒋经国说。后来他将贾亦斌写的东西转呈了上去，并下令释放了那三个被关押的学生。

一九四七年九月的一天，美军顾问团参谋长柏宁克准将主持召开“中美军事联席会议”，国民党军的参谋次长林蔚，陆军副总司令余汉谋、孙立人，国防部的六个厅长，都出席了会议，国防部所属八个局的局长列席，刚代蒋经国当局长的贾亦斌亦在其中。

会上，柏宁克提出了一个事关青年军的“议案”，主要内容有二：取消青年军作为培训预备军官的训练计划，全部调往前线与解放军作战；降低青年军待遇。林蔚、余汉谋随之附和。

贾亦斌觉得，柏宁克的议案，在事前根本没和他这个直接负责官员磋商过，是对中国有关当局的藐视，而这一议案的实施，将迅速使广大学生士兵成为内战炮灰；同时其间也含有削翦压抑蒋经国用意。

蒋经国与美国人的牴牾由来已久。在华美军顾问，趾高气扬，发号施令，几同太上皇，引起许多中国官兵的不满。而蒋经国更是个性倔强，惯于我行我素，不喜如影随形的人。加之他长期在苏联学习生活，又加入过共青团，其思维行止常带有一抹抹不到的影响痕迹，分明地显露出与国民党大多数官员不尽相同的特色。

他到重庆不久，就同美国兵演了一出全武行。那是他奉父亲命，到美国空军志愿援华大队（即飞虎队）见队长陈纳德。美军哨

兵见是中国军官，便阻其进入，争执中美军哨兵耍蛮首先动起手来，而蒋经国偏巧学过武林功夫，顺势将美军哨兵摔翻在地。此后，蒋经国对美国人更显冷淡，深怀戒备。

美国人感到蒋经国难于控制后，对蒋经国势力的膨胀，更抱猜忌、压抑态度。青年军初创时，蒋介石为了鼓励青年从军，给予青年军比较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蒋经国则通过政治工作体系，迅速掌握了这支由知识青年组成的武装，故时人有“太子军”之称，而美国人由此联想到的却是蒋经国身上的苏共影响。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际，美国拟装备国民党六十个师，组成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远征军，赴印度、缅甸作战。本来这六十个师包括青年军，但当美国人发现“太子军”的事实，便将青年军排斥在外，不予装备。

美国方面还有意扶植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以遏止蒋经国在军中的进取势头。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不经国府应允，就把孙立人邀到欧洲战场观战三个月。蒋介石参出了此间蕴意，当孙返回，蒋介石连连诘责：“你是美国人的部下，还是我的部下？”蒋经国心里明白，分外恼火；“洋太子（孙）与土太子（蒋）之争”渐趋公开化……

贾亦斌停止了浮想，站起身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指出议案未征询直接负责部门意见就匆匆通过是不合适的。

柏宁克向来傲慢自大，从不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又见只有贾亦斌一人持异议，遂专横地打断贾亦斌的发言，说列席代表没有发言资格。

但贾亦斌并未屈于他的威势：“讨论中国的事务，我们中国人当然有发言权。中国人对中国的事务比美国人更了解，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中国人！”

也许是因为在中国还不曾遇到过这样强硬的顶撞，柏宁克接连叫喊出几个“NO！NO！”想迫使贾亦斌停下来，会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贾亦斌则想：既然已经顶撞起来，干脆一不作、二不休，豁出去了，中国的军队，不能总让美国人指挥得团团转，今天就为中国军人争这一口气。

于是，当柏宁克吼叫时，贾亦斌就把喉咙放得更高，会场被两人的争吵淹没，议案无法继续讨论。最后，柏宁克只好悻悻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孙立人赶到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说：“亦斌兄，你今天总算为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啊！”贾亦斌没想到，像孙立人这样受美国人青睐的军官，也会向他表述这样的感叹，可见自己的举动维护了国家和军队的权益，是得到多数与会者内心支持和同情的。

会后，贾亦斌立即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在叙述了与柏宁克的争执后，他难抑制愤懑地写道：“中国人长期受日本人的气。经过八年抗战，牺牲了无数同胞，好不容易刚刚把日本鬼子打垮，却不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我们又要受美国人的气了，我实在难以忍受！”

蒋经国很快就给贾亦斌回了信，丝毫未加责备，反露击赏之情，特别是那段结束语，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今日岁已寒矣！”贾亦斌感觉到，这字里行间含有某种寄望。

就在收到蒋经国的信后不久，蒋经国来找贾亦斌，要他立即去杭州的青年中学一趟，“学生闹学潮，随便赶校长，这还了得，你去调查处理一下。”

青年中学创建于青年军复员之际，全国共有 7 所，后归属预备干部局。杭州的这所，学生皆为青年军 209 师复员士兵。该校

第一任校长袁侠民，因贪污学生给养，被学生轰下了台。

二任校长吴宝华，是三青团中央团校一期学员，较早进入蒋经国体系，深得蒋经国信任。他初上任时，聘用了一些高水平的教师，学生对其印象尚佳。可一段时日后，随着他独断专行作风的显露，渐招引不满。1947年暑假后，由于伙食质量下降，该发的蚊帐等用品未发，学生们反映强烈。吴宝华对学生反映粗暴压制，导致矛盾激化，继而学生们感到吴有贪污之嫌，驱赶校长之声又起，南京遂得到消息。

因在南京即看到有关学潮的材料，故贾亦斌衔命到杭州后，便组织人清查帐目，同时分别召学生代表和教职员座谈。教职员因慑于校长权威，座谈气氛压抑，但同情学生的倾向还能感觉得出来；而青年学生则无所顾忌，在列举吴宝华有贪污嫌疑事实后，情绪激忿：

“蒋局长曾来校宣讲‘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本身包括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我们反对校长的贪污行为，是响应蒋局长的号召可现在却被指斥为‘有意煽动闹事’！”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自己内部的贪污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不违背蒋局长为官清廉的倡导吗？”

“蒋局长在赣南大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尊敬他；如今他若仍像当初那样支持我们反对贪污，同样会受到我们的尊敬！”

很快，帐目清查的结果就出来了，吴宝华确有贪污行为。贾亦斌感到事实都调查清楚了，对学潮的起因和性质，对如何处理，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便返回南京向蒋经国复命。

“杭州青年学校学生闹事，起于校长贪污，事实已查清。因此，我认为应将贪污的校长撤职，而不是开除闹事学生，这样才

能说服学生，收拾局面。”

初听贾亦斌的意见，蒋经国很不以为然：“学生动不动就闹事，要撤换校长就撤换校长，那怎么行，以后秩序还怎么维持？带头闹事的学生绝不能留！”

“校长贪污，你不处理；却要开除为反对贪污闹事的学生，这样倒果为因的做法，是难以服人的。我们天天喊反贪污，反腐败，如今你的学生贪污了，你却不反了，这说得过去吗？我们应当重法而不徇私情！”

见蒋经国不吭声，贾亦斌继续说：“我是不同意开除学生的，你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撤吴宝华的职，一是撤我的职。否则我无法向学生们交代。”

贾亦斌态度坚决，所说的又无懈可击，最后还是蒋经国做了让步。尽管有些勉强：“好吧，我把吴宝华调走。”结果吴不仅被调走，还被从少将降为中校。

几度争吵，都是以蒋经国采纳贾亦斌的意见止，使贾亦斌在屡屡生出国民党腐败，其统治难以为继的感叹时，又隐约觉得凭着自己这样一些人的无私、热忱，加之蒋经国等能对决策施与影响人物的从善如流，就可能还有使国民党改弦易辙、挽回颓势的希望，暂时平抚与国民党决裂的激越。

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在背离民意的路上越走越远，政治、经济局势的急剧恶化，贾亦斌同蒋经国的争吵日渐多了起来，私人情谊，终被政见的日渐分歧磨蚀殆尽。

面对众叛亲离的蒋介石心情恶劣，动辄雷霆大发

蒋经国指示：以后“铁血救国会”活

动，不通知贾亦斌 杜月笙之子被叛刑

时至 1948 年仲春，国民党军已从内战以来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转而仅余招架之力。自 1947 年秋季始，中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进逼豫皖苏，兵临国民党政府的肘腋之地；而在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四平、锦州几个城市，被围歼只是时日问题。

与军事溃败相伴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倾轧的加剧，面对众叛亲离的蒋介石心情恶劣，动辄雷霆大发。为了强化自己指挥和控制力，他唯寄希望于爱子，亲写手谕给蒋经国：要其纠集骨干，“成立一个能行动有力量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

蒋经国熟读过《俾斯麦传》，眼见蒋家统治摇摇欲坠，很想效法这位“铁血首相”，以强硬手腕拯救危局。临危授命后，他即与亲信江国栋，王升等商议，决定成立“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两秘密组织。

在此后不久的一天，贾亦斌接到蒋经国的电话，要他翌日到南京黄埔路励志中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贾亦斌赴会时，见校园内分外冷清，各路口皆有人把守指路，显得神神秘秘。会议室内更是肃穆威严，挂着蒋介石的像，每个人的座位前摆放着一份油印的《铁血救国会章程》和《誓词》。

贾亦斌环顾与会者，有胡轨、王升、李焕、江国栋等 30 余人，多数是三青团中央干校一、二期学员，少数是蒋经国留苏同学及在赣南追随他的骨干。虽说自己和蒋经国私谊甚深是众所周

知的事，但自己从不属于这个圈子。

与会者都神情严肃，使贾亦斌感到似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落座不久，身着中山装的蒋经国来了，他依旧亲热地同每个人招呼寒暄。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诚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值此革命大业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这正是考验每个人的灵魂和良知的时候。希望大家成为疾风劲草和中流砥柱，要永远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要做孤臣孽子，坚决执行校长（蒋介石）的政策和指示，不成功便成仁，至死不渝……”

蒋经国语调抑扬顿挫不失激情，他再次重复了“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后，话题一转，指出今天请来各位是要成立“铁血救国会”，也没征询在座者的意见，就宣布“各位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以往，蒋经国在私下议论国民党内弊端时，对其党内派系林立，小组织形色各异，互相倾轧勾斗流露过不满，可如今他怎么也搞起这样的组织来了？贾亦斌感到疑惑，因此当蒋经国要他表态时，他直言自己不主张成立这样的小组织，并指出国民党内小组织勾心斗角，声誉不佳的事实，还说这样会把青年引上歧途。

在贾亦斌讲这番话时，蒋经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遂要其他人表态。其他人都表示拥护蒋经国的主张，置贾亦斌的意见于不顾，赞同组成“铁血救国会”。

蒋经国随即提议进行宣誓，他自任领誓人，要与会者一同起立宣誓：“忠于三民主义革命事业，坚决拥护校长的反共救国政策，服从组织，服从命令，保守机密……永矢不渝，此誓！”

宣誓时，贾亦斌虽不得已和其他人一同站了起来，但他内心

觉得这无异于又一个“复兴社”，对此生出反感，他没按要求留下《誓词》而是揉作一团在散会后将之撕碎扔了。

数十年以后，贾亦斌才知道，会后在清点《誓词》时，发现少了一份。王升猜测违规的人肯定是贾亦斌，提议追查，因江国栋等人不同意才作罢。但此事还是辗转传到了蒋经国耳朵里，他指示以后“铁血救国会”活动，不通知贾亦斌。两人的私谊出现裂痕，但蒋经国表面对贾亦斌还保持一团和气。

1948年入秋，蒋介石面对国统区金融危机和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所谓“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艰难时世看得很清楚，但国民党政府命运系于此番改革的成败，父亲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寓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他个人的前程也与此相连。总之，他已骑上了虎背，干到底是唯一选择。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灰颓，倒有几分踌躇满志。

贾亦斌得知消息很晚，对自抗战结束后就在一起共事的同僚蒋经国说：“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

是违反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

“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贾亦斌不无忧虑。“只需四五千万美金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蒋经国说得好像很有把握。

尽管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贾亦斌也希望经济改革的实施，能使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得到惩治，物价得到平抑，通货膨胀煎熬中的民众稍得缓解。他握着蒋经国的手，由衷地说了八个字：“秉公执法 早日成功！”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办公室，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法令条例要求：在十月二十二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九月三十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八月十九日以前水平。

舆论宣传的作用，向来为蒋经国重视。他亲自撰文刊诸报章，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他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自相标榜。为了昭明他绝不向显宦豪门退让，他提出了“不管你有什么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为了排除干扰，实施管制，蒋经国把赣南系、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王升、李焕、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蒋经国还调来了胡骥总管的“戡乱建国总队”下属的第六大队，扩编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专司执法。他还抽调了部分大学

生，成立了个经济研究小组，应对经济问题。可见为此之殚精竭思。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一一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首先拿来祭刀的，并不是往昔传说的小苍蝇。米上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八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这些虽未到打个喷嚏，上海经济就感冒的地步，却均属经济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

“CC系那边反应如何？”

“夫人那边有什么反映呢？”

傅作义埋怨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

雷厉风行的“铁腕”产生了短期的效用，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危机也看似缓解。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不免陶醉 想以上海为根基拓展“太子系”。他考虑把宣铁吾的上海警备司令取而代之；继而再谋吴国桢的上海市市长。

他几次给贾亦斌打电话，要贾到上海，一方面昭示他反贪官污吏并非仅留于口头，让贾领略他“打虎”的实绩；一方面想就在上海谋发展设计征询贾的意见，如果他出任上海警备司令，贾是否愿出任副司令。

贾亦斌到上海后，蒋经国约他到林森中路逸村二号自己家里深谈。贾亦斌见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有实绩，也为老友高兴。但在蒋经国期待老同僚赞誉之际，贾亦斌却提出了“会不会后劲不足”的疑问，一下子扫了他的兴。

其实，贾亦斌是为老友耽心，他继而又问：“CC 系那边反应如何？”这一问，把蒋经国的火勾起来了，他毫不掩饰地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十五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

蒋经国同 CC 系早存蒂芥，明争暗斗，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贾亦斌相信同 CC 系斗，蒋经国不乏勇气。但上海还是宋、孔两大家族经营的地盘，经济管制下去，总有一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蒋夫人就不可能再安之若素了。于是贾亦斌发出了第三问：“夫人那边有什么反映呢？”

听贾亦斌问到此，蒋经国半天没言语，他站起身，口含烟斗，眉毛紧蹙，并在屋内踱来踱去。贾亦斌看出他有难言之隐，不好再开口，便匆匆告辞了，而本来两人是准备深谈的。

后来，通过有关渠道传出的消息，贾亦斌得知蒋经国果然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

九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

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当时杜月笙也在场，他的儿子此次被查处判了刑。他以到会工商人士代表自居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深感杜月笙的老辣。因为这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继母，正是孔的姨妈“第一夫人”宋美龄。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很踌躇。

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规定午夜十二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弄得大上海服务总队长王升

及其部下一再向蒋经国告状。正在犹疑之间，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贾亦斌听到看到这些情景，预感到当初对蒋经国上海之行难得善终的顾虑，将变为现实。他很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不由得从旁敦促：“孔令侃的案子你还办不办？”每见到蒋经国，他便急着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可蒋经国已失去初赴上海时的那股锐气，对贾亦斌的询问，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贾亦斌陪蒋经国到申新纺织厂看视，入眼的不景气和入耳的艾怨之声，促使贾亦斌又重提孔令侃的案子。蒋经国却所答非所问地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的经济管制，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样很危险。”

分手后，贾亦斌咀嚼出蒋经国话，有退步抽身的内涵。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挽救，贾亦斌起初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蒋经国的雷厉风行，使他多少受了些鼓舞，觉得蒋经国尚有所作为。值此国人拭目等着看打“真虎”之际，蒋经国若撒手退缩，将大失民心。贾亦斌觉得：作为朋友知己，他必须竭尽谏言提醒之责，哪怕从此失和，也要当个诤友。

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 不打老虎’的骗局？”

这一段，蒋经国被诸多棘手之事缠绕，心绪烦乱，见贾亦斌总揪着这他避之惟恐不及的事不放，认为他一点不体谅自己苦衷，气得放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

见这位信誓旦旦“秉公执法”声称与贪污腐败势不两立，一度那么强硬的人，突然变得这么软弱，甚至无视事实，为大经济罪犯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一股爱诚怒烈的冲动，驱使贾亦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孔令侃没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连我都骗不过！”贾亦斌的这拍案一怒，后来被作家江南，写进了他的《蒋经国传》。

知道自己并不占理，蒋经国随后平静了下来，他有许多隐衷不能对人吐露，只好长叹一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哪！”

孝道岂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不依不饶：“你有你对父亲尽孝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尽忠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杜民之口，服人之心？国家还有救吗？”说罢，拂袖而去。

回到住所，贾亦斌又感到自己斥责完了就走，似乎未全朋友之道，遂长夜不眠，撑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十四页的长信。封上信，他觉得已把自己的一片诚挚都放在里面了。

关于扬子公司一案的内情，贾亦斌是很久以后才得悉其详的。当蒋经国封查扬子公司后，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

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

直到扬子公司真被查封，孔令侃才感到原先意为不能把他怎么样，是对蒋经国看走了眼。他只好匆匆赶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了在永嘉路的孔家宅院。

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这对表兄弟各走极端，而宋美龄已无计弥合，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是专门去主持对策和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一个劲埋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蒋经国在向上海人民表示歉意时的黯然伤神，泪滴扑簌

蒋经国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

他必须面对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的阵痛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屏蔽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而她则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半小说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化了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能违拗呢？

上海市警察局发言人随即对外宣称：“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遂不属违法囤积。曾积极报道“扬子公司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随之被勒令停刊，耸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此一来，国人都看透了经济管制的实质，这道松软的堤坝，再也束缚不住经济崩溃的泄洪。物价飞涨，金圆券狂跌，政府要员相继辞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经济管制的寿命仅仅维持了七十天，蒋经国作拯救‘党国’英雄的梦亦随之破灭。离沪前，蒋经国在上海广播电台，以抑郁哀婉之词，向上海市民告别。

陪伴在蒋经国身边的贾亦斌，尽管对他未能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有几分怨气，却不能不被他在向上海人民表示歉意时的黯然伤神、泪滴扑簌而感动。在返回的路上，蒋经国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的失守后果更不堪。”

在与被他调到上海的干部分别时，蒋经国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

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要守纪律，多保重。”

回到南京后在相当一段日子里，蒋经国的情绪低落，对国民党政府和自己的前途怅惘悲观。他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几次到励志社看蒋经国，几次看见他一面喝酒，一面烧文件档案。一次，他把原先印制的请柬也烧了。贾亦斌问他为何烧请柬，他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

但尽管如此，贾亦斌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认为他不可能同自己的父亲决裂，虽然他父亲是国家处于战乱，经济陷入崩溃，人民贫不聊生的罪魁。因此贾亦斌觉得：尽管蒋经国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想互以朋友相待多年；但个人恩怨与国家大义之间，应该舍小取大，他必须选择顺应历史潮流之途，这就难免要面对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的阵痛。

陈布雷、戴季陶自杀

“老头子指蒋介石发疯了！”

段伯宇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南京城内风传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关于自杀的原因，各种揣测都有，议论纷纷，震动很大。

贾亦斌听闻后颇感震惊，他想到自己的挚友徐复观。徐在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批评上，见解和贾亦斌相近。但徐分析原因是国民党缺乏人才，而人才基于学术，所以他设法搞了些经费，办了个《学原》杂志，倡导学术，集合人才。

徐是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副秘书长，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陈布雷，是徐的直接上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虽说徐对国

民党的批评直言不讳，但蒋介石、陈布雷都认为他是书生意气，不太计较。就因为这重关系，贾亦斌以为可通过徐复观了解些有关自杀的秘辛。

恰巧在这之后的一天，徐复观邀贾亦斌吃饭，贾亦斌遂在下班之后，赶到徐复观家。可直至后半夜，徐复观才回到家中。他见贾亦斌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发疯了！”

原来，徐这天晚上参加了由蒋介石召开的会议，讨论陈布雷后事的料理。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陈是蒋的高级幕僚，追随蒋时间长，地位高、影响大，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丧事应隆重，甚至可举行国葬；另一种认为陈是自杀，丧事大办，反而有负面影响。

双方意见各不相让，只好听蒋介石裁夺，可他并未直接谈丧事，而是说：“现在很多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什么‘四大家族’有很多财产。最为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他要我和宋家拿出几亿美元来做军费。我们几家哪里有钱！宋子文开始办中央银行只有几百银元，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要宋美龄出钱，她哪来的钱！”

蒋介石越说越生气，继而破口大骂陈布雷，足足骂了两个小时。在座的谁也不敢吭声，国葬一事遂不复再提。贾亦斌问当时蒋经国在场否，徐复观说在场，“只是一言未发，呆若木鸡。”

接着，徐复观讲了一些有关陈布雷自杀的内情：

徐说近期让陈布雷伤心的，经济管制失败是其一。金圆券刚发行，陈布雷就动员徐复观将经费全部兑换金圆券，支持中央政府政策。徐不同意，陈动情地说：“复观兄，我们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就完了，还办什么刊物？”他带头将自己夫人私下积蓄的十几两黄金，全部换了金圆券。徐感其以

身作则，遂照其说办理。金圆券崩溃，经费化为乌有，杂志没法办了，陈觉得愧对部下。

后来，国民党内一些高级将领以将士在前方拼死拼活，待遇很差，而四大家族却在后方刮民脂发财，拒绝打仗为由，要求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陈布雷出于忠诚，劝蒋介石动员宋、孔捐资疏急。蒋介石见一贯顺从的陈布雷也发起了逆耳之论，顿时火起，打了陈一个耳光。而在以往平日里，蒋介石总是一口一个“布雷先生”，对陈谦恭优礼备至。突遭凌辱，加之对形势的悲观失望，使他萌生了弃世的念头。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又传入贾亦斌耳中。陈布雷、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元老，他们都对国民党绝望而选择自杀，说明国民党气数已薄西山。

自从蒋经国“忠孝不能两全”的辩解，使贾亦斌预感他们终将分道扬镳后，贾亦斌就与段伯宇的往来多了起来。

段伯宇是贾亦斌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曾在蒋介石就读过的保定军校任过教，后与中共有联系。段伯宇则早在二十年代初即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潮，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内。

段比贾亦斌稍长几岁，但却显得沉稳老成许多。在陆军大学后期，内战阴云郁积，贾亦斌常毫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与主战学员争辩，段伯宇则总是沉默不语；而在私下里，他便不再隐瞒对贾亦斌见解的支持。贾亦斌隐约觉得他有共产党的背景。

离开陆大后，贾亦斌曾几度和段伯宇等知心同学聚会，对时局发发议论。一次，贾亦斌说到国民党政权已病人膏肓时，流露

了解甲归田的念头。段伯宇却意味深长地劝他要忍耐，“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贾亦斌细细体味，更坚信了自己的推测。

一九四八年晚秋，贾亦斌独邀段伯宇到中山陵，向段袒露了他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幻想，并告以前不久的江苏之行，发现许多将领也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想另谋出路的情况。

“时局如斯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贾亦斌问。“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要另谋出路乃势所必然。但光找杂牌军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段伯宇重复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句话。

在这次中山陵的密谈，贾亦斌和段伯宇商定了一个如何掌握武装的初步计划。分手后，他俩分头在国防部及国民党军事机构内，联络在陆大时旨趣观点相投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有十多人的反蒋秘密团体。

不久，段伯宇通过他的表弟温尚煜，与中共上海局接上了关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派委员李正文负责领导段，贾等的工作。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丢失了东北的全部地盘，黄伯韬、廖耀湘、王耀武、范汉杰等高级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数十万人被歼。在华北、中原的作战中，国民党军亦是损兵折将。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凭借长江天堑，扼守江南半壁江山了。

依照蒋介石这一意图，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计划在江南组建三十个新军，这就需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林蔚找到贾亦斌，询问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

贾亦斌第一反映就是，抓武装的机会来了。他说仅在嘉兴、杭州、重庆、关中四个青年中学读书的原青年军复员军人，就有一万余，他们均已取得少尉预备军官资格；此外还有不少等待就

业的青中学生，因此马上就可以召集一支万人的军官队伍。

林蔚听说能召集万人，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么一来，三十万军队的连、排军官就配备齐了。“太好了！”他喜不自禁。贾亦斌顺势毛遂自荐：“如果能解决编制和装备的话，我愿负责动员和组织训练。”

“你要什么，尽管说，我尽可能满足你。”林蔚当即拍板组建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这一计划很快即经蒋介石批准。

一支表面属于“太子系”的救急之师、实际上是准备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简称预干总队）”初创时有千余人，很快就扩充至四千人，贾亦斌兼任总队长。

当这一消息发布时，正在杭州家中的蒋经国曾致电贾亦斌，表示祝贺，希望预干总队能成为拱卫蒋家王朝半壁江山的有生力量。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恰恰是这支武装，举行了震动宁、沪、杭的嘉兴起义。

周至柔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

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
蒋介石拔枪打死了机要员，宋美龄吓得魂不附体

起义计划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

为了使预干总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所有重要职务，贾亦斌都尽力安排追随自己多年信得过的老部下；对时局不满而要求进步的青年军军官；曾作过解放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后，被国民

党送进中央训练团的军官。

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实际是“洗脑”。国民党对被俘人员极不信任，空军司令周至柔甚至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说是“如果不杀，将来亡国就亡在这批人身上。”只因有人认为这样会激起大事变，才决定将这些人送进中央训练团“洗脑”。但由于这批人深感被歧视，故而越洗越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除了组织保障外，贾亦斌还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使这些年轻的预备干部们摆脱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行动上。他还通过与预备干部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促膝谈心，把他们凝聚在自己身边。

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他把秘密团体的成员，紧急约到自己家中。

在向其他成员通报了迁移计划后 贾亦斌说：“我们不能让发动内战的祸首逃之夭夭，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式的突然袭击。”

在坐的大部分人，都同意贾亦斌的主张，他们甚至具体地商量起由贾亦斌率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刘农峻率伞兵第三团两路口飞机场，把蒋介石及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都抓起来，送往解放区，已及早结束内战。

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但贾亦斌他们没有丝毫的怯懦和犹豫，甚至纷纷掏出了手枪，恨不得马上行动。唯有段伯宇始终保持着冷静，不同意贸然行动。他分析说：就局部而言，南京的敌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时仓猝举事，无异以卵击石。

“大家的勇气 and 热情可嘉，但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已经做了相当的铺垫，不能使之功亏一篑。搞革命不能感情用事，逞一时之快；反蒋大举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要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最佳时机。”经再三议论，大家接受了段伯宇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初，平津，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共力量对比骤然改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急剧激化和公开化。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副总统”、桂系的头面人物李宗仁，授意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暗中串联搞“五省联盟”。而在此前，河南省主席张轸已宣布独立；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焦头烂额，偏偏此时白崇禧打来了敦促蒋下野、让贤于李的逼宫电报。电告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要蒋在二月一日前隐退；否则将把华中国民党军全部交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华中地区，停止使用金圆券；凡从四川东运的武器弹药均予截留。

据说蒋介石接到这份电报，顿时面色惨白，浑身发抖，竟当即拔枪打死了送电报的机要员。宋美龄被他的举止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孔祥熙家，对宋霭龄说：“不好了，老头子发疯了！”

迫于重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冬眠”，于一月底隐居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老家；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南京逼宫”。

在时局的这一演变后，贾亦斌所率的预干总队奉调到浙江嘉兴，原本酝酿的在南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的行动，便失去了再筹谋的意义；贾亦斌等遂因势而变，另谋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举行联合起义。

在上海市宝山路宝昌路口，有一幢白色的小楼，小楼的主

人，是段伯宇的弟弟、时任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的段仲宇。在军警的护卫下，这里成为密谋起义的理想之所。自一九四九年元旦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峤等便三天两头在此聚会。

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是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贾亦斌估算了以下，大约有由他领导的预干总队，刘农峻领导的伞兵第三团，段仲宇领导的淞沪港口司令部及附属的三个汽车团，王海峤领导的工兵第四团，贾亦斌的同学刘卫领导的驻扬中县第四十一师，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青年军二〇九师，同学王修身领导的驻守芜湖一〇六军，同学于兆龙领导的驻守南浦镇第九十五军等十二支部队，六七万人参与。

这个起义计划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李正文在段伯宇的陪伴下，一一检视了计划参与起义的部队，随后向这些部队一一派遣了联络员。

但是，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以分头准备，各自随机行动为妥。

显然，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起义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且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予重创，亦可使其新建三十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流产，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为此，策反委员会特派张文藻打入预干总队，以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贾亦斌为其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使之能够在预干总队公开活动。此时，预干总队起义方案的筹划，已进入具体细节的研讨。

在行动时间上，有人认为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为

好，里应外合，成功的把握较大。但贾亦斌认为及早行动虽然要冒较大风险，但能造成国民党军心的更大震撼，破坏其新建三十个军与中共隔江对峙企图，更能有力地策应配合解放军渡江。策反委员会认可了贾亦斌的意见。

恰在此时，蒋氏父子指示贾亦斌，率预干总队乘船从海路调往福建。贾亦斌想：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船上都是预干总队的官兵，掌握住船就控制了航向，可立即开往解放区，待国民党方面发现变故时，起义部队应已出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外。

海上起义，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就在此时，贾亦斌得知刘农峻率领的伞兵三团，亦将乘船调往福建鼓浪屿。如果预干总队在海上起义，必然引起蒋氏的警惕，使伞兵三团失去在海上起义的机会。如果伞兵三团被迫在陆上起义，其难度将大大高于预干总队。因此贾亦斌决定预干总队在陆地起义，把海上起义的机会留给伞兵三团。

贾亦斌的这种选择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反对，预干总队所驻的嘉兴处国民党政权中心地带，周围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四五十万，加上地方警宪约七八十万，而起义部队仅四千余人，又难以得到中共地方部队协同接应，处于绝对劣势；此外嘉兴地貌属杭嘉湖平原，无山丘屏蔽，却多水网阻隔，起义者凭两条腿与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正规军周旋，短拙毕显。因此有人认为贾亦斌的这种选择，将使他成为丁锡山第二。

丁锡山原来也是国民党军官，后率部起义。一九四八年春季，受中共派遣，率领百余人的“江南先遣总队”，从浙江四明山前往浦东打游击，结果遭国民党军围歼，丁被捕后被枭首示众。

按原设想，贾亦斌起义后的作战方向，亦是东进与浦东游击

队汇合。但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且事在人为，出其不意，运兵神速的话，这一作战设想是可以实现的。起义方案就这样定下了，余下的是加紧准备，瞅准时机。

贾亦斌突然接到蒋经国的电话，立即赴
溪口谒见蒋介石
贾亦斌从蒋经国的眼里，感觉到了逼人的
肃煞
中共指示贾亦斌策应解放军渡江

在蒋经国的嫡系部队中策动起义，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不露；且一向对时局持悲观态度的贾亦斌，突然对执掌预干总队如此热心，早就引起某些人的怀疑，故他的“异常”举动，相继传到蒋经国的耳中。

尽管蒋经国对贾亦斌曾那样的另眼相向，但面对这样的汇报，也不能不心生疑窦。不久，预干总队西大营北门外，支起了一个杂货摊，严密地注视着驻地的动静。

接着，蒋经国的亲信江国栋，突然携带大量银元来到嘉兴。他住进一家小旅馆后，那里进出的人便多了起来。预干总队有人被收买，刺探贾亦斌的言行，预干总队内的活动。有关情报，随即呈送蒋经国本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国民党保密局嘉兴站接到来自国防部的密电：“贾亦斌言行偏激 应予慎防。”这些情况很快亦被中共方面侦知，贾亦斌随之得到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的通知。贾亦斌感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加快起义准备。

就在这当口，贾亦斌突然接到蒋经国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

立即赴溪口谒见蒋介石。贾亦斌意识到溪口之邀，无异于“鸿门宴”，个人安危倒在其次，关键是身系起义成败，他必须和中共方面做一商议。踌躇之间，蒋经国的催促接二连三。

贾亦斌秘密去了一趟宝山路口的小白楼，与李正文、段伯宇商议是否去溪口。经分析贾亦斌认为：蒋经国不可能掌握自己与中共联系的真凭实据，也不可能探知起义的确信。如果不去，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导致蒋经国先发制人，使起义夭折。于是他要求冒险赴溪口，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张执一的首肯。

返回嘉兴后，贾亦斌即与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溪口，他们并没有被马上邀进丰镐房，而是被安排在武岭学校过夜。贾亦斌彻夜辗转，思考着如何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如何应对难以逆料的复杂局面……

翌日清晨，彭位仁外出散步，先期到溪口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悄悄趑进贾亦斌住处，对他说：“有人已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今天八点，蒋先生要约你谈话，谈得好就没事，谈得不好你就别想回去了。”

“果然是一出鸿门宴”，贾亦斌想。他很感激部下的提醒；同时也坚信，蒋经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要看自己是否能够机敏地周旋。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他反而更冷静了。

八时许，贾亦斌应约来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他们分手有两个多月了，他觉得蒋经国似已从上海打虎吃瘪的颓丧中走出。也许是各怀心思吧，两个人的会面，全没有了昔日朋友邂逅的温情。

蒋经国两眼紧盯着贾亦斌，想看穿他的内心；贾亦斌感觉到了逼人的肃煞，但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的皆是坦然。

“你带总队在嘉兴很久啦，部队怎么样啦？”蒋经国问得硬梆

梆。

“实际上也就两个多星期，不算长。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思念领袖，能不能请领袖去训训话，以安军心？”贾亦斌回答得自自然然。

“不可能！”蒋经国一口回绝。“领袖没空，你能否去呢？”
“我也没空。”谈话始终这么干巴巴的。

“预干总队要开往福建建阳。”蒋经国突然蹦出一句，并注视着贾亦斌的反应。“没问题，我回去就可带队伍开拔。不过这事应向参谋总长顾祝同通报一下，他曾表示过预干总队学员经短期训练后，即行分配到新建各军担任下级干部。”“这我会跟顾祝同打招呼。”

为了及早脱离虎口，贾亦斌顺势提出：“我是否可以早些回去做准备。”不行，蒋经国依然冷漠：“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你得多住几天；此外领袖还要找你谈谈。今天就到这里吧。”

尔后的几天里，贾亦斌天天被蒋经国的机要秘书萧涛英带着游山观景；与此同时，蒋经国派亲信在预干总队驻地，加紧对贾亦斌言行的调查。

贾亦斌自知被软禁，听不到外面任何消息，心中分外焦急。他不甘心在樊笼中坐以待毙，曾想逃进四明山，寻找中共游击队，但由于被监视得很紧，无从脱身。

度日如年的第四天过后，贾亦斌得到蒋经国的通知：“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在武岭学校演出《龙凤呈祥》，今晚你和我们全家一道看戏。”

贾亦斌听后觉得蹊跷，是否这看戏背后还有戏？他脑海不断浮现荆轲与太子丹相别易水，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景。他一再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但如果蒋家

对自己下毒手，自己也绝不束手就擒，而将像荆轲那样拼个鱼死网破。

然而，当贾亦斌按时进入演戏场所，看到的却是和祥的家庭气氛。蒋介石坐在第一排沙发中央，长孙和孙女依在两旁，贾亦斌和蒋经国及妻子方良，被安排在紧挨蒋介石后的一排。

在整个看戏的过程中，贾亦斌根本就没有关注过戏剧的情节，他的内心在不停的斗争着。他腰间挂着手枪，蒋介石就在眼前，这是击毙内战祸首以谢天下的良机，若中国因此而获和平，就是牺牲自己也死得其所。

但每在冲动之际，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关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的叮咛便回响在耳边，贾亦斌又一次次把手要伸向腰间的意识加以抑制。

时隔半个多世纪 贾亦斌回忆此事时感叹良多：“倘若我当时真的凭一时冲动行事，历史以及我个人的命运，都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戏看完了，蒋氏父子对贾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他们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但仍然不放他回部队。直到一天阎锡山来溪口，蒋经国陪其逛雪窦寺妙高台，兴致正好，才答应了贾亦斌回预干总队的请求。

离开溪口后，贾亦斌立即赶往上海，向中共地下党汇报了溪口之行的经历。策反委员会根据贾亦斌被怀疑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快起义准备，防止拖久了发生变故。

为策应贾亦斌的行动，中共同时布置加紧对国民党驻宁沪杭地区另外三个军和保安旅的策反；并关照贾亦斌做好家属的隐蔽安置。

就在起义准备按部就班。家属也刚刚转移稳妥之际，贾亦斌

风闻了国民党国防部已下令免去他预干局代局长、预干团团长、预干第一总队总队长，调往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由副总队长黎天铎接任总队长的消息。

这一人事变动，说明蒋氏父子已经视贾亦斌为异己，并将也从武装部队中剥离出来。李正文、段伯宇都为贾亦斌的安全耽忧；但贾亦斌满脑子想的却是如何不使起义因此而夭折。

他经过仔细思考，认为预干总队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四千余学员绝大多数是向往光明，拥护起义的，他们已和自己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只要自己振臂一呼，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随自己赴汤蹈火。于是他向策反委员会表示：“请组织放心 我活着 就一定能率领这支部队起义！”

事态的发展，为起义提供了契机。当贾亦斌被调职的命令发布后，预干总队的官佐和学员顿时大哗，他们罢操、罢课，声称要赴南京请愿，甚至放出了上山打游击的口风。

新任总队长黎天铎，面对失控的动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自感无力收拾局面，遂提议邀请贾亦斌回嘉兴开“欢送会”，并聘他为“名誉总队长”，期冀以此博得学员们的好感，平息众怒。

中共地下党鉴于还不到起义时机，学员们继续闹下去，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反而不利于起义；故而指示贾亦斌立即赴嘉兴，稳定局势，并提醒起义骨干们要讲究斗争策略。

贾亦斌回到嘉兴，受到预干总队广大干部和学员的热烈欢迎，很多人联名写信敦请国民党当局撤销调离贾亦斌的命令。然而，调离的成命是不可更改的。为了平抚干部和学员们的激忿，并为起义做进一步的动员，贾亦斌决定给学员就“预备干部制度”问题，上最后一课。

在这最后一课中 贾亦斌强调说：“国家的预备干部是新的革命军事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一定要以人民为后盾，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侵犯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会被人民所唾弃。无论古今中外的军队，依靠人民则胜利，脱离人民、背叛人民则必定失败！这是历史的真理，吾辈革命军人当慎思之……”

“欢送会”开罢，已经是三月末，贾亦斌一回到上海，就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盯梢。他在摆脱了特务的盯梢后，立即与中共策反委员会取得了联系。

此时，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共的和谈条件难以接受，正倾全力扩军备战，决心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亦随即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四月二日，李正文在和贾亦斌见面时，正式向他传达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发动预干总队起义，起义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起义日期定在四月十五日，起义后部队易帜“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

贾亦斌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保证完成起义使命。同时他提出：“万一我牺牲了，请组织批准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我的孩子尚幼，请在可能的条件下，对我妻儿给予照顾。”

李正文对贾亦斌的入党要求表示赞许，并告诉他组织已对他妻儿做了隐蔽安置，还就如何稳妥地举行起义，做了仔细的交代。贾亦斌在后来才知道：他以及刘农峻、段仲宇、宋健人随即被中共批准入党。

当晚，贾亦斌与妻子匆匆告别，踏上返回嘉兴的火车。

贾亦斌感到起义真正实施起来，其难度超过了预想

在谈论起义事宜中，突然有一湖南口音连连发问

蒋介石大骂儿子无能

陈毅说：你已胜利完成了任务

三日凌晨，贾亦斌秘密潜回嘉兴，在嘉兴北门外一户可靠的老百姓家住下后，随即开始了紧张的起义部署：

他派总队直属文化区队长刘汝沧等，根据起义预定计划，绘制起义部队行军路线图，并侦察沿途国民党军驻守情况；

派出人员，与中共策反委员会指定的朱专员接头，以便部队起义后，能得到即使的接应；

要求张文藻将起义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和进展情况，及时向上海中共策反委员会汇报；

派人前往上海，催修无线电台并尽快取回，以便在起义时进行联络。

贾亦斌自己则在秘密住所，不断地同起义骨干碰面，并召集部署起义的会议。此时此刻，贾亦斌感到起义真正实施起来，其难度超过了预想，而且随即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意外。

新任总队长黎天铎，是惟蒋经国马首是瞻的亲信，他在贾亦斌调离后，采取了一系列消除贾亦斌影响而加强自己地位的措施。同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军警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起义的环境骤然严峻起来。

四月四日午夜十二点，贾亦斌召集三十余名骨干，对新形势

进行分析，以做利于起义的调整，正在谈论中，突然有一湖南口音连连发问：“我们何时行动 到何处去 与中共有无联系？”

这些问题均属起义的核心机密，地下党组织曾一再叮嘱贾亦斌，绝不可过早泄露。贾亦斌遂回答那人：“这些问题不必问，到时候会告诉大家。”但并未考虑对提问的人做防范部署。

散会已是五日凌晨，不久就有人捎来口信，湖南口音的人是十三中队的，他将开会情况报告了其中队长林荫。贾亦斌顿感情况不妙，因为林荫是黎天铎的亲戚；而林把话传到黎那儿的话，黎必呈报蒋经国，蒋经国则必采取断然措施，扼杀起义。

恰在这天，李正文依原定计划到嘉兴视察。贾亦斌在同他会面时，通报了起义消息走露的严重情况；他因此力主提前起义，以防起义夭折。

李正文鉴于形势紧迫，当机立断，代表策反委员会批准了贾亦斌的主张。他告诉贾亦斌，由于起义时间改变，不可能通知驻平望的江苏省保安第二旅同步起义，预干总队将在没有策应的情况下，孤军奋战。

就在贾亦斌着手提前起义的同时，得知消息的黎天铎，也在筹划着如何逮捕贾亦斌，扑灭起义，向其上司邀功请赏。

四月六日清晨，黎天铎在早操时，询问和贾亦斌关系较好的第一大队长李恺寅：“听说贾局长来了？”“我不知道。”“我很想拜访贾局长，还是请你告诉我他现在何处。”黎天铎不死心。

“如果你能确定贾局长来嘉兴了，你应该知道他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来没来嘉兴。”黎见李恺寅毫不松口，就一个劲缠着他。李恺寅惦记着贾亦斌的安危，便千方百计设法摆脱黎的纠缠。

临近黄昏才，李恺寅终于脱出身来，他立即朝贾亦斌的隐蔽

的人家跑去。

“黎天铎已经知道你到了嘉兴，起义的事情已经暴露，怎么办？”李恺寅一见到贾亦斌，就急切地问。

“今晚就准备行动！”贾亦斌认为事已至此，倘若再游移不决，必将导致不可挽回的恶果，作为起义的直接指挥者，他必须毅然决然。

他把酝酿已久的行动方案，告诉李恺寅：首先，迫使黎天铎签署到莫干山进行军事演习的命令，使部队行动有个“合法”的名义，瞒过国防部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力争在没有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穿越京杭国道；第二，到达莫干山后，正式宣布起义，打出“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旗帜，开展游击战，策应渡江战役。

“请你立即向各大队、中队转达我的命令：一、迅速准备好武器弹药，饱餐一顿，到西大营操场集中待命。二、立即在东、西两大营实行戒严。三、将黎天铎围堵在总队部办公室，由我出面与之谈判，力争其配合，以演习名义出发；若破裂，则就地处决黎，宣布起义，并连夜开拔。”

李恺寅领命而去。垂暮时分，他和另一位大队长邓道三派了十数名带枪的学员，来接贾亦斌。贾亦斌走进西大营，看到跃跃欲试的学员们已经集结在操场，便随即带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学员，直奔总队部。

“贾局长，这是干什么？”黎天铎见贾亦斌突然出现在面前，强做镇静。贾亦斌直截了当说明了形势，并动员黎参加起义。黎错误地以为多数学员不会跟随贾亦斌起义，拖延一阵，就可能出现于己有利的局面，所以他始终不表态。

出乎黎天铎意料的是，办公室外的人越聚越多，但没一个是

来解救他的，而都是来参加起义的。但他不死心，仍闭着眼睛硬拖。

已经十二点了，贾亦斌感到不能再拖了，便掏出手枪，“啪”地砸在桌上：“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现在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送到国防部，这样可以升官发财；一是跟我们走，下令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必须明确答复！”

黎天铎被吓了一跳，当他看到一片对着自己的枪刺，和满屋怒目而视的目光时，他畏怯了：“你是我的老上级，你给我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旋即用颤抖的手，签署了演习命令，并通知了嘉兴城防司令部等相关单位。

此时，预干总队四个大队中十四个中队的三千余学员都到了，唯第四大队的第十三、十六两中队，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到西大营集结。就在焦急的等待中，起义者们听到了从东大营传来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

原来十三中队的中队长林荫顽固反对起义，他在拥护起义的学员行动前，率人抢先占据了东大营的营门，弹压起义学员，结果只有部分学员跳楼离开了东大营。

贾亦斌立即命李恺寅率部前往东大营，下令林荫归顺起义，但遭到林荫拒绝。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眼看天色渐明，贾亦斌认为不可继续拖在嘉兴，便发出了向天目山开拔的命令。

震惊宁沪杭地区的嘉兴起义，就这样在四月七日凌晨爆发了。

就在四月七日清早，栖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就收到了发自嘉兴和上海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

听闻此讯，蒋经国痛心疾首，流涕向父亲检讨。蒋介石暴跳

如雷 连连斥责儿子“无能”；“用人失策”他指示国防部火速调兵遣将，对起义者围追堵截，并悬赏银元五万，购买贾亦斌的头颅。

国民党当局随即调集了数个师及浙、苏、皖地区好几个县的保安队警察，甚至动用了守卫长江的精锐和空军，对起义部队层层包围，以图迅速扑灭这燃起在国民党心脏地带的起义之火。

由于起义是被迫仓猝爆发的，而且一开始就发生了意外，在东大营的作战中既暴露了起义，又耽搁了时间。没能按预定设想，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迅速跨越京杭国道，跳出敌人的围堵。

起义部队刚刚进入距嘉兴三十里的乌镇，就陷入了国民党军的包围。贾亦斌根据形势，将部队分兵三路突围。他自率第一路；刘异率第二路；李恺寅率第三路。

经过激战，三路起义军都突出了乌镇，但作战减员严重，原三千多人还剩二千五百人；黎天铎等反对起义的军官，也在战乱中逃脱。围堵起义部队的国民党军越聚越多，起义者在向莫干山的推进中，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四月十日，刘异率领的第二路军，打到了距莫干山 15 里的三桥埠，随后乘夜色冲破敌军封锁，进入莫干山。由于连日作战，极其疲惫，许多人一进山就倒地入梦。

国民党浙江省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谊，假装对起义表示同情，张罗膳食住宿，稳住刘异及部队；暗中却派人下山，通报国民党驻军赵荡辉部。赵立即部署围歼，于十一日拂晓发动突袭，使第二路军在措手不及中被缴械。

当贾亦斌所率的第一路和李恺寅所率的第三路汇合时，战斗人员只剩下三百多了。靠这些人硬闯京杭国道，显然是以卵击

石；且眼前的吴兴县城，又是敌人的防守重点。贾亦斌等决定：冒充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一部，以追击“叛军”为名，智过京杭国道。

吴兴城的保安团和警察，做梦也没想到起义部队敢从他们这重点防卫环节穿过。起义部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保安团和警察的防线，缴了他们的械，顺利通过了京杭国道封锁线。

四月十二日，贾亦斌率部来到妙西山良村。这里已是山区，放眼望去，群山叠嶂，起义者们无不以为进入了安全地带。五天了，他们一直在数以万计的敌丛中，且战且走，几乎支撑不住了。可他们在小憩中还未稍得调整，密集枪炮突然铺天盖地而来。

一夜鏖兵，只有八十余人冲出了良村。他们这才认清，即便是在山区，依然险情四伏。为了使这最后的八十余人尽量多地跳出敌人的罗网，贾亦斌决定化整为零，扮装成老百姓，分散突围。

为了松懈敌人，便于突围，他们散布了贾亦斌已战死的消息。国民党当局出于宣传目的，在各报以大幅标题刊发“贾亦斌在良村被击毙”消息，结果贾亦斌妻子看到这一报道，如闻晴天霹雳，悲痛欲绝。

分散突围后，贾亦斌历经辗转，终于在临近四月下旬时，在浙江、发徽交界处，同中共游击队接上了联系，见到了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钱敏。此刻，他再也支撑不住十多天操心，奔波和苦战熬煎，一下子病倒了。

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随即突破长江天堑。数日后，贾亦斌被送往刚获解放的南京家中养病。

在香港从报纸上得知贾亦斌“死讯”李正文，这时也返回南

京，他深为贾亦斌的“牺牲”而惋惜，立刻到贾亦斌家去慰问。不想在贾亦斌家中，看到了活着的贾亦斌。李正文分外惊喜，连忙告诉贾亦斌，在起义前夕中共已吸收他为正式党员。

几天后，中共华东局在听了李正文的汇报后，派人接贾亦斌到设在江苏丹阳县的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中共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陈毅，曾山和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在丹阳大旅社接见了贾亦斌。

由于起义部队最终被国民党打散，除一小部分人员逃脱外，一部分官兵牺牲，大部分官兵被俘，贾亦斌悲枪地说：“我没有将起义部队全部带到解放区，我觉得……”

“不，你已经胜利完成了起义任务，你的英勇爱国行动值得称赞！”陈毅没容贾亦斌说完，就截住他的话头。这使贾亦斌感到很大的慰藉。他随后留在了由陈毅统率的三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下定了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的战略决心
首次渡海作战九千余官兵大部牺牲而告失败
贾亦斌受命秘密潜往香港
蒋经国命令香港站站长设法除掉贾亦斌

新中国成立前后，贾亦斌在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我所在的九兵团的司令员，是宋时轮将军。”贾亦斌说。

早在一九四九年夏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下定了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的战略决心。毛泽东、朱德曾致电在东南沿海

诸省作战的三野：“希望你们抓紧作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加强海军力量，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歼灭敌人。”

同年仲秋，中央军委向三野下达了：认真研究以较少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台湾的命令。

浙、闽一带的国民党守军几乎一击即溃，故而三野十兵团在轻取厦门后，仅做了一个星期的准备，便匆忙实施解放台湾的作战。七个团二万余人的渡海登陆部队，在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指挥下，分两梯队向金门岛发起攻击。

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不了解风向变化、涨潮落潮对战事的影响，第一梯队在逆风渡海时伤亡惨重；且刚登陆即逢退潮，渡船全部搁浅，被敌机炸毁。结果因舟具尽失，第二梯队无法上岛，第一梯队亦在弹尽援绝之际无法撤退。首次渡海作战，以九千余官兵大部牺牲而告失败。

金门登陆战的失利，使中共对渡海作战更为审慎。一九五〇年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就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因而才有五月一日海南岛登陆战的全胜，国民党三万三千守军被歼。

攻克海南岛后，中共中央自然而然地随即在自己的军事日程上列入了下一个目标：“解放台湾”！这次作战，将沿袭解放海南岛的成功经验，即两条线作战，内外结合。

就在这个时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领导，先后找贾亦斌谈话，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将采取正面进攻和内部策反两面作战的方略。

他们对贾亦斌说：“你在蒋军特别是青年军中有许多老关系，因此你将被委派参与对台策反工作。”

随后，华东军区政治部及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也相继向贾亦斌布置了更为具体的工作。贾亦斌被任命为“台湾干部

训练团团长”，一方面负责培训可派往台湾工作的干部，一方面以此名义从事对台联络策反工作。

然而没过多久，贾亦斌就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要他秘密潜往香港，利用他在国民党军中的人脉关系，联络在香港的原国民党军官；并通过他们，与在台湾国民党军中的旧谊接上关系，策动投诚和起义，以配合解放台湾的作战。

就在贾亦斌秘密潜往香港不久，蒋经国在蒋介石的认可下，派了一名与中共高级将领有辗转关系的人，潜往大陆与中共上层进行联络。这位成为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第一位“秘密来使”的人，是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兄嫂的哥哥，名叫李次白。

据有关资料所载，李次白这次来，是奉命传话中共不要过紧逼台。李次白通过妹夫陈孟熙，见到了陈毅，把该传的话传了，但并没起什么作用。

贾亦斌进入香港后，住在了九龙的尖沙嘴一带，“具体哪条街记不准了，好像叫西洋菜街。我一到香港后，即派关系潜入台湾与我的旧部联络。”

不久，联络人从台湾返回。贾亦斌立即约他碰头，地点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然而在半岛饭店刚谈上几句，贾亦斌就感到情况不对头，饭店四周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他当即决定中止会面，迅速撤离。

“我出了饭店就打了一辆计程车，但发现有车在后面跟踪。我要司机东拐西拐，并连接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我，跟踪我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脱了。”

后来，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在贾亦斌赴香港后也尾随而去的郑重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秘密进入香

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那位站长姓王，名字我忘了，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要郑参与除贾行动。他布置道：打探到贾亦斌的住址，可得五万美金；活捉到贾亦斌，可得二十万美金。”贾亦斌说。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就捆绑到军舰上，押解往台湾。王还交代说：若不能活捉贾，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处决贾者，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在台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其安度余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我而后快呢？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我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后的痛斥，唯除掉我才算有个了结；其二，蒋经国自建情治体系后，与国民党原情治系统各派矛盾尖锐，起义使其陷入受攻讦众矢之的尴尬境地；其三，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我过往较频，蒋经国很难甄别谁同我仅仅是工作关系，谁和我有深层沟通，他以为捉住我有利于清洗内部，除掉我则可断了他们与中共的联系。”

如此一来，贾亦斌在香港的活动，便时时冒着生命危险，但在上级决定他撤出香港前，他始终依凭智勇与蒋方特务周旋，不曾丝毫松弛策反工作。

贾亦斌出任对敌工作部副部长
蒋家重新祭起当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口号
蒋介石有意对中共传递的信息做出回应

一九五一年秋季，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美国放弃坐观国民党政权生灭的“弃蒋”政策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共因形势骤变，且决定出兵援朝，遂将武力解放台湾计划搁置。处于国民党特务刺杀危险中的贾亦斌，随之接到返回的指令。

贾亦斌回到上海时，恰逢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对敌工作部，贾亦斌出任该部副部长。“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向台湾派遣秘密工作人员。”贾亦斌回忆道。

一些历史背景材料显示，那个时候被派往台湾从事秘密工作，是极端危险的。自一九四九年末国民党政府迁台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相继颁布了《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逾百种，实施战时戒严体制，甚至重新祭起当年汪精卫在武汉“清共”时“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口号。

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至今忆起那每户必须有三家“连环保证”人人自危，户口清查、突击检查经常不期而遇，买收音机也得到保安部门申报的种种恐怖情景，依然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在那个时候，许多派过去工作的同志，由于敌特的严密防范，无所不至的侦缉，环境险恶，最后暴露了身份，遭到逮捕。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义无反顾，英勇地献出生命。”

看到我很认真地听，贾亦斌又说到：“我们对敌工作部曾派一个女同志台湾的，她的丈夫当时是台湾宪兵团的团副。她被捕后，在敌特的逼讯面前坚不吐实。为了不牵连到其他人，她先是吞金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吞食了一盒大头针自杀，又被抢救了过来。最后，敌特觉得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遂判处她死刑。监狱有一个习惯，就是临行刑时，给被处决的人喝一杯酒。可她却把剑自手递来的酒倒在了地上，说：‘我活着，是个

清醒的人；死，也要做个清醒的鬼！’凛然赴义。每忆起那段往事，我眼前总浮现那些牺牲者们威武不屈的面容。”贾亦斌颇为动情。

一九五一年的最后几页还未翻过，贾亦斌的人生便开始出现波折。由于他曾是国民党军中的少将，又曾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儿子关系非比寻常，有人提出要他退党。接着，是漫无终期的审查，下放农村劳动。

这一审查，一下放，就是五年。就在那第五个年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解放台湾，除了采用武力之外，还有和平方式的新思路。毛泽东、周恩来几度公开申明：“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笔者在《毛泽东帮了老蒋一把》文中，曾言及那一年七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资深记者曹聚仁从海外赴大陆，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言及国共第三次合作之事，显然是要他透露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又通过时在香港的章士钊，转递致蒋介石函，其中“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一语，意味深长。

由此，揭开了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的国共新一轮秘密往来。

在这一背景下，贾亦斌的审查告一段落。他返回城里，并在这一年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被选为委员。采访这次上海政协会议的香港记者，发现了被昔日报章言之凿凿“被击毙于良村”的贾亦斌，突然复活了，遂争相采访，大抢新闻。

率预干总队起义的贾亦斌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消息，在香港报章刊出后，贾亦斌在海外的熟人、故友、部旧，才知道他还活着，纷纷去电去函联络、问候。

第二年，贾亦斌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

员。鉴于他的历史渊源，以及在国民党军中的人际关系，他再次被置于对台工作领域。“不过这回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没再涉及派遣和秘密接触的事了。”

笔者因在以往写过一些涉及两岸关系题材的访谈，对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两岸时断时续的秘密接触，略有所闻。例如“立法委员”宋宜山在大陆半个多月的盘桓。与大陆多有联络的曹聚仁的两岸走访。章士钊再次赴港后，居港多年的国民党元老许崇智的赴台。罗青长陪同周恩来在南方某岛屿，与台湾来人的秘密会晤。

当我向贾亦斌询问对此是否知情时，他非常谨慎的回答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他从事的是公开的宣传工作，没有与闻秘密接触的详情。

五十年代末接触的势头，终因大陆阶级斗争之潮日升夜涨，继以“文革”肇始，而嘎然中止。对“文革”期间的情形，贾亦斌先生没有提个人所受的磨难，反映出一种沧桑历尽及沉思后的冷静与宽容。他只说了一件事，就与两岸关系相关。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的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时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就在这次尼克松来华期间，中、美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贾亦斌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闻知也在席间的贾亦斌，曾同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贾亦斌身边，向贾亦斌自我介绍说他和蒋经国很熟悉，问贾亦斌有没有什么关于两岸关系或私交的话，需要他捎给蒋经国。

当时正处“文革”左潮泛滥之际，和台湾、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是最忌口的。但贾亦斌并没有回避这个为难的话题，简洁地说：“关于海峡两岸的事，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果你能见到蒋经国先生，代我致意问候。”

“历史在等待着经国先生如何书写！”

“妙高台望归帆至，晚节芬芳忠孝全。”

名作家江南撰文预言：“贾亦斌重返香港有重任。”

“总统即蒋经国 狠想念你啊……”

再次为两岸统一工作殚思竭虑，是一九八〇以后的事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他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包括徐思贤在内的不少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且与蒋经国、贾亦斌均稔熟的故友，在抚今追昔的感叹之间，贾亦斌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萌动出一些想法。

回国后，贾亦斌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海内外的报章刊载：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站起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经国先生现在在台湾的处境也比当年大大不同，可以自主了。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和平谈判条件逐渐成熟，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

一反掌之间。只要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经国先生就可以为国家，民族尽大忠，还可以迁葬父亲灵柩和祭扫母亲庐墓，以尽大孝。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历史在等待着经国先生如何书写！”

贾亦斌在这封信中，传递了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功德无量的两岸和平统一推进者的信息。在信的末尾，他附了一首一九八〇年在溪口经国旧居写的诗，《重游溪口感怀》：

“溪口睽违卅一春，迎春雪后景依然。喜看墨迹今犹在，传语家乡色更新。

借宿旧居怀旧雨，伫闻新曲谱新篇。妙高台望归帆至，晚节芬芳忠孝全。”

同年九月，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针对两岸和平统一问题，发表的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著名的“叶九条”具体内容有：

一、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定。

三、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涉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七、台湾各族、各界人士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

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商界来大陆投资，兴办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欢迎台湾各族、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两年后，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更明确了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设想，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盛赞。贾亦斌更不辞辛劳地为祖国统一奔走。

一九八四年，贾亦斌到香港访问。风尘未定，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就撰文预言：“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

在港期间，贾亦斌通过电话，与台湾的一些旧谊进行了联络。当他拨通上级彭位仁的电话时，话筒传来海峡另一端的熟悉声音：“总统 即蒋经国 很想念你啊 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

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也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希望他们都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真希望经国先生能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

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到大陆。

贾亦斌反问来人，“蒋先生对和谈是否真有诚意”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蒋经国对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深刻反省，有利于统一的熏微渐露。

一九八六年三月，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发表

了《中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形势》的报告。他鉴于“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关系。

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

到了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欣喜由衷而溢。回顾自己与蒋经国始以反帝御侮而一见如故，中以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贾亦斌更企盼着如今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他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这年初夏，贾亦斌陪同一位台湾访美学者，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王采玉、蒋经国母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多有感慨地说：“真希望经国先生能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

他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

“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

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那位学者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就在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到大陆。这位

既是蒋经国部下，又是贾亦斌部下的来者找到贾亦斌，一方面询问中共敦促实行两党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否真心诚意；一方面希望贾亦斌帮其于中共领导层沟通。

贾亦斌为他分析说：

“第一、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是和平，和平方式在后。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

“第二，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置于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强的武器。临近台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在海峡作战，这一带必然要遭受到严重破坏，代价巨大。”

当贾亦斌反问来人“蒋先生对和谈是否真有诚意”时，来说：“蒋行生也是有诚意的，目前蒋先生面对的压力很大。一是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和美国的矛盾始终得不到缓解。近几年，美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迫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故里探亲的问题，台北、台中都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我觉得

蒋先生确是认真的。”

贾亦斌遂将交谈的内容，向中共中央领导层做了汇报，并引其接受了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的接见。这位负责人还修书一封，托来人转交蒋经国。据贾亦斌先生记忆，函中昭示了中共领导层对“统一大业能在我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恳挚。

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出现休克和
心脏衰竭

“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
均甚痛惜。

贾先生始终怀疑，蒋经国的去世不是
正常的自然死亡

就在蒋经国择定了一位更重要、更熟悉大陆情况、更了解国共交往历史的人选，准备就两岸和解进一步接触之际，台北忽传蒋经国逝世噩耗。

据传媒报道：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上午七时三十分，蒋经国起床后突感身体不适，恶心呕吐。医师随即检查，体温三十六度，血压 110/70，脉搏每分钟七十，无明显异常。因其未进早餐，遂以静脉注射补充营养。下午十三时十五分，蒋突然大量吐血，并出现休克和心脏衰竭。医疗小组迅速以人工心肺复苏抢救，但未见效，至十五时五十分，心脏停止跳动。

贾亦斌先生说：“我得知此事后，于第二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

唁电中写道：“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

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

讲到这里，贾先生有些激动：“经国先生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老先生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蒋经国却突然在此时“病故”，因而贾先生始终怀疑，蒋经国的去世不是正常的自然死亡，“在此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

“我明白您的意思，蒋经国先生的猝然逝世，对两岸接触较好的势头，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蒋先生之后的李登辉在初继任时，还说了些让人对祖国统一感到乐观的话；但随着时局和台湾岛内情况的变异，他的所作所为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台湾正滑向分离的险途。”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分明地感到，在李登辉的纵容下，台湾的“台独”势力在日益膨胀，“台独”的噪音更趋喧嚣。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和作为炎黄后裔的民族义愤，我主编了《论‘台独’》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台湾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先生评论说：‘台独之宣传甚多，批评台独之书迄今似以贾先生此著最有系统。’”

说到此，贾先生找出一本《论“台独”》，题字赠我。

近几年，台湾和香港，陆续出版了几本有关穿梭于海峡两岸的“密使”的书。我想请曾经部分参与接触的知情者贾亦斌先生，对之做一鉴别。贾先生说这类书读到一些，但他未置臧否，我感觉他的话外之意是可信者寡。

在两次长时间的追溯后，贾亦斌先生归纳道：“我已经八十六岁了，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争取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不遗余力；后来在民主党派，全国政协任职，便更多地考虑参政议政，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互相监督，多党合作的问题。”

“您是军人出身，在通常意念中，军人以打打杀杀，执行命令为天职，而您却常常做民族大义前程的思考。请缨上前线；提出预备干部制度；为两岸统一呕心；主编《论‘台独’》；研究多党合作监督……特别有意思的是，四十年代末，当国民党一意内战，向专制腐败沦落之际，您同有知遇之恩的蒋经国分道扬镳；而在那四十年后，祖国统一的使命感，又使你们趋于同道。可惜天不假蒋经国先生以长寿，否则我想你们的手会重新握在一起的。”

在短暂的沉寂间，我环顾了一下他的客厅。

高高的书橱，占满了一面墙壁，里面擦满了书，许多书夹着纸条。可以想见，贾先生的公务之余，或许是在手不释卷中度过的。

在我坐的沙发背靠的墙壁上，有一幅胡秋原先生赠贾先生的诗，胡秋原是第一位打破禁忌，前来大陆探访、研讨统一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为此，国民党当局给他扣上“违纪”罪名，开除党籍。胡诗题为《亦斌老兄赠诗次韵求正》：

“非有闲情事舞文，求真淑世是灵根。

不堪骨肉长冰炭，欲仗精诚拯陆沉。

故国归游逢旧雨，细谈治乱喜同心。

集思广益长安策，天下为公四海欣。”

我想，大概就是胡先生说的那种不泯的“精诚拯陆沉”之心吧，才使得贾亦斌先生有了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成其为今天的贾亦斌先生；才使得他在八秩过五之龄，仍为国是操心不已……

我突然记起，近日刚刚结束的民革中央全会上，他被推为没有名誉主席的民革中央第一名誉副主席。

毕重远

策划国民党最大战舰「重庆号」起义

毕重远：一九四三年，十七岁的他即在南京从事学生运动，随后加入中共地下党。一九四六年打入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赴英国训练后，成为英国赠给国民党政府的“重庆号”巡洋舰上的水兵。一九四九年初，他秘密组织了有二十七人参加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于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发动起义，将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战舰驶到解放区。解放后，毕重远一直在海军任职，曾任海军司令部干部部长。

毕
重
远
简
历

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一〇二〇页，可看到如下一段文字：“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宣布起义。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一九四八年五月交给国民党政府使用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之一，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确保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准备将重庆号军舰调防长江，配合江阴要塞防守长江下游，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二月二十五日，该舰在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及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下起义，二十六日，由上海驶抵已经解放的烟台港。”

由于某种机缘，我和载入史册的毕重远有过几面之交，可望着年逾花甲的他，我竟从不曾推想过，起义时他刚满二十岁。直到前些天，我的一位长辈，拿出一堆有关重庆号起义的史料，我看到起义成功后，他难抑喜悦的留影，才蓦然发现当时的他竟那样年轻，以至在我这不惑龄内人的眼里，甚至感觉有几分稚气。

就是这个年轻人，策动了令中外震惊的事件。这期间固然不能排除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因素，但回想自己二十岁时境界，的确很难同他相比，可我毕竟还有由衷的景慕，还会泛起生不逢时，历史没有给我机会的遗怨。而对如今二十岁的青年人呢？你若讲述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则好像是在讲远古的故事，会看到他们一脸的不解。一股要写毕重远的冲动，顿时贯穿周身，我随即拨通他的电话。

与长期在军中任职的毕重远相对而坐，谈论的又是刀光剑影里的起义，可我丝毫不曾感到逼人的武威。他娓娓而谈，一下把我带到近半个世纪之前。

“澳大利亚皇后号”上的老成青年
朱济群同志对他说：“你要独立战斗，
要特别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我们等
待你胜利归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澳大利亚皇后号”缓缓驶离上海港，在这艘英国邮轮上，满载着身着水兵服的中国青年，他们是去接收英国赠舰的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的学员。此时，多数人尚处于出国接舰的兴奋，唯有一位少年老成的青年，独倚船舷，望着滔滔逝水，陷入与众人的神情不尽相契的沉寂。

这位十七岁的青年，名叫毕重远。从一九四三年始，他就在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下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继而经钟沛璋等介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刻，他突然要远涉重洋，去孤军奋战，顿时涌起对组织的万缕依恋之思，朱济群（真名刘鉴农）同志代表党为他送行的情景又浮出脑海……

那是风和日丽的仲秋下午，朱济群带来了党的指示：“你去英国学习海军，这实际上是为我们培养人才，将来我们也要建设自己的海军。”他告诉毕重远：“你的党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国外 因此你要独立战斗，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特别要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我们等待你胜利归来，不要辜负党对你的期望。”毕重远当即表示他会牢记自己的使命，绝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朱济群还向毕重远指定了新的通信联系人，并送给他一本外裹《中国之命运》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三篇报告）。临别之际，这位抗战时即从事学运的党员，深情地握了握年轻战友的手说：“送给你两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经历了一月左右的海上颠簸，“澳大利亚皇后”号泊靠在英国第一大港利物浦港。虽说二战的硝烟已杳，但码头及残垣上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学员们随即坐上开往朴利茅斯的火车，然后又乘火轮赴德文军港。港湾内，停泊着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和级别的战舰，蔚为壮观。当火轮从望不到甲板的航空母舰边绕过时，有人发出唧唧赞叹。最后，学员们登上了进行海军基本训练的战列巡洋舰“荣誉”号。

在朴利茅斯的学习和训练，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充满了新鲜感。现代化海军的崭新面貌，神奇奥妙的各种仪表机械，逼真形象的声像摹拟教学，英国教官接人待物的开放随和……

然而，学员们感触最深的，还是与当时中国国情有着极大差异的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繁华的商业贸易，以及用中国的法理、价值观无法解释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那时正值英国工党执政，新闻媒体不断变换的热点是，要不要取消皇室，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制；英国少女爱上了战俘营里的德国战俘，法理民情能否让他们终成眷属……在军港内，为了体现“劳工第一”，每逢下班，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须站立一旁，等工人先行退离。

耳闻目濡的一切，在学员们的脑海中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射，有人更盼望自己的祖国早日拥有现代化的海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有的人则发现中国现行的制度有缺陷，应当借鉴英国的民主；有的人隐隐演绎出工业发达与否，与国家贫弱的内在联系；但也有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纸醉金迷，流连于酒吧、红灯区，放浪形骸。

新鲜的风情环境，自然也会引发年仅十七岁的毕重远的好奇思索，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负的使命；团结教育周围的

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前，都是上级党组织发出指令，自己殚精竭虑去实现组织的意图；而如今则单枪匹马，从何处着手展开活动，凝集力量，全靠自己见机行事运筹谋划。严峻的现实，迫使这个年仅十七岁的青年，迅速沉稳和老到起来。他没有黯然地潜伏着，而是主动地寻觅着展开活动的机会和方式。

业余军乐队的第一小号
“国旗受辱事件”
被罚“摆地摊”的打抱不平者
“辩论爱好者”与《静静的顿河》

机会来了，英国方面提出要“荣誉”号上的中国学员组建一支军乐队，凡具有一定音乐素养或爱好铜管乐的学员，均可报名。而毕重远在南京模范男中时，就组建过一个青年军乐队，并利用乐队队长的身份从事学生运动。

他是个出色的小号手，娴熟的演奏，使他赢得“荣誉”号军乐队负责人一位英国海军少校的赏识，被视为军乐队的骨干。他随即将老同学和好友程伯敏、陈世宗等都拉进乐队，利用这个组织，观察和接近有爱国进步倾向的人，巧妙地展开工作。很快乐队中的另一小号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名叫陈鸿源的小号手，身材魁梧，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常常凭借身高力大，懂一点拳术，替受英国水兵欺侮的中国学员打抱不平；也因此对国外的拳击发生兴趣，有暇爱去观摩拳击比赛。

当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拳击冠军赛开场后，陈鸿源前往观

看，走入场内，发现场内悬挂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不管怎么说，惨淡的中国也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一呀！为什么没挂中国国旗呢？纳罕之间，他突然看到，英国裁判的脚，正踏着一面被揉搓的中国国旗。义愤填膺的陈鸿源，一下冲到裁判席前，质问那裁判为什么侮辱中国国旗，并要他把国旗拣起来叠好。中国水兵的凛然正气，使乱哄哄的拳击场一片寂静，那位裁判让一位英国水兵将中国国旗拣起叠好，陈鸿源一边大声向英国海军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持旗昂首走出拳击场。

陈鸿源回到“荣誉”号，把“国旗受辱”之事告诉了毕重远。毕重远感到：可以借题发挥，策动一场抗议活动。一方面，让更多的学员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可使团结的对象一目了然。他对陈鸿源的举动表示坚决支持，并提议发动广大学员参与抗议，要陈鸿源到各舱室联络，自己则在军乐队进行鼓动。

“国旗受辱”引起了广大中国学员的义愤，加之毕重远等的暗中活动，很快酿成一场“罢工，罢课，拒绝接舰，要求回国”风潮。国府驻英使馆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出面向英国当局交涉，提出抗议。英国政府也不愿因此而引发什么事端，责成其海军负责人上舰，向全体中国学员赔礼道歉，风潮遂告平息。

初次斗争的胜利，使毕重远欢欣鼓舞；同时发现了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同军乐队中的陈鸿源、孙国桢、燕文彬等人关系，也更趋密切。他审慎的目光，在更广的范围扫视，悉心地捕捉学员们在游移、苦闷、彷徨、憧憬中透露的每一缕信息。

在一次实习中，几个英国军士，对黄皮肤的中国学员傲慢无理。一个带点山东腔的学员挺身而出，打了一个优越感十足的英

国海军中士。他的打抱不平，换来的是依英国海军军规，罚苦役，冲甲板、刷厕所、除铁锈、涂油漆、“摆地摊”。“摆地摊”是中国学员给一种特殊惩罚起的名称，处罚的方式是将四季的被服在甲板上摊开，叠好，再摊开，再叠好，无休止地被折腾。可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并未因此而改变，苦役刚结束，他又把为虎作伥的军纪士揍了一顿。这倔强刚直的山东青年，给毕重远留下颇深的印象，他叫于家欣。不久，在他的床头，经常出现伦敦出版的中文进步报纸《民主阵线报》。

又过了些时日，一位有“辩论爱好者”之称的学员，也引起毕重远的注意。英国式的民主，以及“劳工第一”的现象，使“辩论爱好者”眭世达由新奇而赞赏，进而萌发了强烈的探索欲，时常就这些问题与人争辩不休。

一姓陈的“青年军联谊会”成员，对他大加攻讦，说“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眭世达激烈地反驳，称之为“独裁制度的拥护者”，并批评抗战胜利后国府的腐败弊政。陈某勃然大怒，一顶大红帽子扣过来，说他是共产党。

不料这一顶帽子，反倒引发了他对共产党的关注，对国内时局的忧虑，他淡化了争辩的热衷，转而在沉寂中苦读。毕重远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悄悄地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书借给他看。共产党人的形象、追求，渐渐植入“辩论爱好者”的脑海。

曼彻斯特奇遇“天涯知音”

“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

龚先生已经结婚……

给鲁平的信相继被退了回来

在朴利茅斯的学习训练正式开始后，毕重远随即按预先的约定，同国内地下党联系人吕朝林、李恭亮进行了联系。他急切地希望能及时得到组织的指示，了解国内形势的状况。但重洋远隔，党不可能对毕重远的行动做出具体部署，也很难向他详细介绍形势的进展。这是令远离组织和祖国的毕重远，偶尔流露不安和焦渴的唯一原因。

一九四七年复活节来临之际，舰上组织部分学员到英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参观访问。年轻的毕重远为了了解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抓时机与工厂的普通工人接触，并同一位叫奥尔弗雷德·耶茨的司机交上了朋友。

奥尔弗雷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典型的蓝领阶层。他个头不高，但目光深邃，握着他那勤于劳作的手，便会感到一种力量。他对中国的水兵分外热情，对有关中国的事情饶有兴味，能讲一两句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不停地询问着，毕重远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几经过往，他们因观点接近，都朦胧地感到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

当时，国民党刚刚占领了延安，英国报纸均对此加以渲染，可毕重远和奥尔弗雷德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将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们更多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系更融洽，信任感也一天天增加。天涯有“知音”，奥尔弗雷德兴奋地向毕重远出示了英国共产党党证。在异国竟能遇到信仰相同的“战友”，毕重远亦激动得难以自持。可组织上有纪律约束，使毕重远久久抹不去对异国同志隐瞒真实身份的歉意。

然而，有了这样的“知音”，他终于有了个倾诉心声的对

象，这对身在异国独立活动的年轻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和需要的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奥尔弗雷德是否真的受了毕重远的“蒙蔽”，从此他有意识地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送给毕重远阅读，并特别勾出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看，似乎对毕重远的与众不同是有所察觉的。

当毕重远离开曼彻斯特时，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难以割舍的友谊，他们开始通信联系。这种友谊因毕重远回国后即陷于战事和策动起义中断，但在数十年后，当毕家老友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她拿着毕重远提供的地址，在曼彻斯特找到奥尔弗雷德一家时，奥尔弗雷德说他之所以守着破陋的旧宅不去，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冥冥中感到，他那年轻的中国朋友会到这里来找他。熟悉毕重远同英国共产党员那段友谊佳话的战友、朋友们，闻知这中断了四十余年的友谊能够重新续起时，无不称之为“天意”。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曼彻斯特至朴利茅斯的信件中，时常夹有《工人日报》关于中国时局、中共领导的军队取得胜利消息的剪报，这是抚平毕重远因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和党的情况而不安焦渴的最佳良药，特别是当他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时刻。

一九四八年初，毕重远接到一封寄自南京中华路杨庆和银楼，署名 Luping 的信，信中说：“……现在龚先生已经结婚了，不久的将来，他会有孩子的。当你回来，一定会看到他长大起来……”在这里，龚先生即中国共产党，他的孩子，是指中共创建的新中国。从信中可以看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读之令人振奋。毕重远随即按这新地址同 Luping 联系，不想连发两封信均被退回，显然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放弃，他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在与组织失掉联系的苦闷中，奥尔弗雷德的信件和剪报，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他相继看到《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前挺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在十四天中失掉了十座城镇》《工会主席朱学范与蒋介石绝交》等报道。在信中奥尔弗雷德写道：“……也许你明天夏天还会在英国，然而当你回中国时，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中共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消息，奥尔弗雷德对时局的乐观分析，极大地鼓舞了毕重远斗争的意志，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促使他更热情积极地在学员中开展秘密活动，引导他们向革命靠拢。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外，奥尔弗雷德兄长般的质朴情感，亦如涓涓溪流滋润着毕重远那颗去国怀乡渴望亲情的心田。当他得知毕重远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即去信安慰：“对你父亲的不幸去世，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真情实感……思念令尊时，你须想到他最快慰时光，这样你就会品味家庭生活所给予的幸福而面对新生活。”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亲爱的毕，希望你在我们国家过得愉快，并对世界的这一部分深刻的了解。这样，当你回归时，就能把这里兄弟姐妹们的好意带给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从根本上讲，我们的问题和目标是相同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不管我们的肤色是否相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的朋友是一样的。剥削者是敌人，而人民大众、工人是我们的朋友，工人不应当打工人。如果有斗争的话，也不能发生在工人之间。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明白这点，那我们能很快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每逢节假日，奥尔弗雷德都会向毕重远发出邀请，并致以问候。这位英国共产党员，像慈祥的兄长，以无私的胸襟，仁厚的关切，使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阴霾时聚的英伦岛国，心

中充满明媚阳光，毕重远每回溯起这段往事，依旧是那样饱含深情：“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总是长久地在我眼前闪动；他待人亲切忠厚的长者之风，至今可感其温馨如怡。”

“震旦号”的非凡战绩

更名“重庆号”

直布罗陀海峡飘起《义勇军进行曲》的
旋律

陈嘉庚的一再叮咛

一九四八年初夏，中国国内的形势，比之毕重远赴英时，已有超人预料的变化。从英共《工人日报》上，毕重远惊喜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北的蒋占区仅剩百分之一。

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英国当局不愿再履行对国民党政府承诺的协定，只向国府提供一舰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不复再提赠送两艘潜水艇之事，所有的学员，均被编入两舰。毕重远同六十余名原本学潜艇的学员，上了“震旦号”巡洋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旦号”以其非凡的战绩，被视为英国海军的骄傲。作为英国海军部长的旗舰，它曾击沉德国巡洋舰“伯力克号”，令“俾斯麦号”战列舰闻风丧胆。编入地中海“K”舰队为旗舰后，先后击沉意大利驱逐舰两艘，运输舰十艘，击伤八舰；在袭击意大利沿岸作战中，使意大利军队吃尽苦头，因而被誉为“银色鬼怪”。当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之际，它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战。一九四四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此舰指挥对班泰雷利亚岛的攻击。

这艘巡洋舰排水量七千五百吨，长一百五十三米，最高航速三十二海里，各型火炮二十四门，并配有鱼雷发射管，有七部航海、海上警戒和炮瞄雷达，其无线、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讯。这是一艘在当时属武器精良、装备现代化的战舰。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赠、接舰仪式，国府驻英大使郑天锡代表国府，接受了“震旦号”、“孟狄浦号”两艘战舰。仪式后，“震旦号”更名“重庆号”，“孟狄浦号”更名“灵甫号”。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两舰拔锚离港，启航归国。

归国之途，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走印度洋……作为英国领地的直布罗陀，是“重庆号”归国停泊的第一站。这座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作“海克力斯双柱”的古城堡，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历史遗迹，在初夏晴空朗日下，登上欧罗巴角灯塔远眺，非洲摩洛哥丹吉尔港马拉巴灯塔隐约可见。“重庆号”停泊的码头附近，杂陈着具有南欧风格的舞厅、酒吧，其间小乐队演奏之声，袅袅飘来，令军乐队成员们闻之心动，毕重远他们结伴前往观赏。

在一家舞厅，正在演奏的乐队，发现进来一群中国水兵后，顿时中止了原来的乐曲，奏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外国乐手的友好举动，使这些去国离乡寒暑两度的中国水兵百感交集。

最令中国水兵难忘的，是军舰经科伦坡，越马六甲海峡，到达新加坡的情景。这里的华侨，在二战中饱受日本炮舰的轰击、屠杀和凌辱；二战结束后，过往停泊又都是英国、美国的舰只，耀武扬威。因此当他们看到悬挂着中国国旗的巡洋舰，驱逐舰到来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欣悦。中国水兵一上岸，便被侨胞们包

围簇拥。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中国水兵拽到家里作客，问长问短。三轮车工人，拉着中国水兵满城转悠，硬是不收费；许多华侨开的商店，都对水兵削价优惠。

侨胞们的热情与厚爱，使广大水兵感到他们对祖国强盛寄以由衷希望，唯其如此，蛰居海外的侨胞，方能挺起腰杆生活。而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振兴经济。因此侨胞们殷殷叮咛水兵们，归国后不要参与内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看望水兵的时候，也一再阐说反对内战的观点。这一切都留在水兵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登上“重庆号”
南京地下党的召唤
“重庆号”赴辽沈作战的“三种可能”
毕重远说：解放军在海上俘获“重庆号”
几乎不可能

仲夏时节，“重庆号”驶抵香港。一位国民党驻港的少将来到舰上，做了一番讲演，其主旨即要水兵们做好准备，参加内战。广大水兵的心，一下被撩乱了。

当一九四六年末，水兵作为学员赴英培训时，内战刚刚启开帷幕。年轻的学员们都不曾介入内战，且无不对刚刚从艰苦卓绝抗战中挣扎出来的祖国，又要被放到内战的磨盘下碾轧，怀有极大的逆反心理。在英国近两载的学习，虽是不闻战火硝烟，但二战的遗祸，随处可见；战后英国重建再造、振兴经济的氛围，触目动心。大家都希望重返祖国时，看到一派恢复建设的情景。学会操纵这现代化的战舰的技能，就是为了保卫和平的家园。归国

途中，各地华侨不参与内战的殷殷相劝还萦绕耳畔。可刚刚靠近国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内心祈盼大异其趣的“动员”。

“动员”引起的迷茫和噪动的情绪，毕重远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对展开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八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转了个弯，直驶南京，停泊下关江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参谋总长周宪章先后登舰，分批接见舰上的军官，并对全体官兵训话。内容依旧是军人的天职，投入内战云云。

当国民党海军将领们，看到这艘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技术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时，仿佛在连闻败绩而黯然的心里，兑入了几滴兴奋剂，他们期冀这现代化的军舰，会在扭转败局中创造奇迹。

结果在几天之间，国民党政界、军界要员，孙科、何应钦、白崇禧、蒋经国等，纷纷被邀携着登临“重庆号”，观看水兵们的操雷、操炮演习。

“重庆号”归国后，未在他处锚泊，直驶南京，使毕重远欣喜万分，因为他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他只能在那里同组织接上联系。他抽了个空子，离舰上岸，找到赴英时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李恭亮，要李迅速向组织报告他归来的消息，以便向组织汇报他在海外舰上活动的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然而，同组织的关系尚未接通，“重庆号”已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维修保养。军舰抵沪后，一面维修保养；一面加油备水、配置弹药，随时待命出航执行任务。这种情形，令毕重远焦灼不安，一旦出航，就更难与组织联系了。

恰在此时，他收到署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缄”的来信。

信中写道：“重远同学：匆匆别后，未及细谈，念甚。现在母校校友会已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希望你在回南京来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及海上生活的滋味……”

毕重远读着读着，眼眶不觉湿润了，这是地下党组织在向他发出召唤。几天来寝食难安、朝思暮盼的，不就是这一声召唤吗？他迫不及待地向舰方请了个探亲假，立即赶回南京。

九月初的南京，依然暑气蒸人。但当毕重远应约来到玄武湖畔一座小桥时，岸边丝绦摇曳的杨柳，湖面粉绿参差的荷花，却让他目爽神怡。一位三十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桥边踱步，毕重远同他对上了暗号，他自报家门胡玉民（真名陈良）。而对新的领导者和联系人，一种海外游子重归慈母怀抱的情愫，在毕重远心头腾动，他握着胡玉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胡玉民听罢毕重远汇报在英国的活动情况及“重庆号”士兵思想倾向后，简单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分析说：“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城内。蒋介石要挽救东北的败局，有可能将‘重庆号’调往北方。这样，‘重庆号’的未来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进行反革命内战；二是被我军俘获；三是组织策划起义。”

毕重远感到地下党对“重庆号”还缺乏了解，其技术性能和战斗力，在国民党海军所有舰只中均无能与之匹敌者，就解释说：我军在水上俘获“重庆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玉民听了，沉吟片刻说：“我们要随时掌握‘重庆号’的形迹，你在舰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

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

当晚，胡玉民即将毕重远汇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峰。此后，胡玉民带着党的指示，两次约见毕重远，告诉他：鉴于“重庆号”在海上流动性大的特点，暂不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往他处，仍由胡玉民直接联系。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毕重远建议以如意里三十三号其姐姐家为联络点，经常保持联络。他们还商议了如何在军舰上更积极周密地开展活动的事宜，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胡玉民和他一起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紧急启航”

一艘渔轮悄悄靠上“重庆号”

蒋介石的“锦州情结”

放弃劫持蒋介石的冲动念头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值此一九四八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授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六百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踟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

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一九四三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

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启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三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至，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一九四六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蒋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早在抗战胜利，杜聿明赴东北接收之际，蒋介石曾命其以锦州为界，不得超越。可美国从其对抗苏联的战略出发，以美援和美式装备为诱饵，使蒋将大量精锐调出关外。此刻蒋介石追悔莫及，大骂美国人坏了他的事，至他的看家精锐，都被关在东北。但他认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蒋军将领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蒋军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关闭，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做饭的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

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御驾亲征”，前往北平。他先在锦州西南葫芦岛一线调集了十二个师；然后亲飞沈阳，命令廖耀湘率十三个师组成的辽西兵团，由东北向锦州推进。

为了配合东西夹击作战，蒋介石调动了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海军最强力的战舰。与“重庆号”同时奉命北上的，还在英国租借的“灵甫号”。它们的任务，就是在葫芦岛一带，用炮火支持地面部队对塔山、高桥方面的攻击。蒋介石登临“重庆号”，是随舰前往葫芦岛，对这一线的进攻做最后部署的。

蒋介石上舰不久，广播中通知：“领袖”要对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以为他会讲讲时局，没想到他竟拿着《军人守则十二条》，照本宣科。广播传出“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的僵硬语调，引起许多水兵的反感。

此时年轻的毕重远，脑海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内战的祸首就在舰上，若趁此机会活捉了蒋介石，穿越锦西的蒋军阵地，将其劫持到解放区，这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呵！

他怀着这种念头，悄悄来到甲板上，暗暗观察。他发现蒋介石歇息的后甲板司令住舱，根本无法接近，蒋介石的侍卫们把半个甲板都封锁了。这时，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感到刚才的闪念有些不切实际。舰上进步士兵的争取工作尚未进行，就凭个别人的一时勇武，能够实现上述目的吗？必须抛弃“劫持蒋介石”这个令人诱惑的念头，毕重远再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震撼舰身的炮击，没能挽救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正直的水兵
六名水兵被流放长山岛
从东北返回上海，开小差的人超过了两百

十月十日，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重庆号”驶往葫芦岛港外浅海地带，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在舰首、舰尾固定，随即尽其所有，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上。

然而，震撼舰身的炮击，并没能挽救蒋军在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重庆号”上越来越多正直的士兵们。他们凭舷望去，整营整团完好的士兵冲向前；待硝烟散后，便浑身血污，跌跌撞撞地败下阵。夜幕降临，伤残士兵凄凉的呻吟，牵动了水兵们的思绪。

本来，大多数水兵是怀着建设中国强大的海军，抵御外辱，报效祖国，赴英学习和接轨的。而如今却被迫杀戮同胞，充当内战炮灰的角色。在香港初听内战“动员”时的迷茫浮躁，此刻转为愤懑和深省。特别是在锦州、沈阳相继城破，“重庆”号的任务从辅助进攻变成到营口掩护逃亡，看着国民党溃败的将争相登船的狼狈情景，水兵们更感到这不义的内战难以获胜。

水兵们的反战情绪，舰方有所察觉。十一月十二日，舰长突然派人到水兵的住舱进行大搜查，所有水兵的吊铺、衣物被翻了个遍。结果在秦勤、刘励等六名水兵的铺位中，发现了部分进步书籍。这六名水兵，当即被流放到长山岛上。国民党当局原本试图以此压抑禁锢水兵的思想，却适得其反地激增了水兵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怨恨。

一九四八年底，“重庆号”返回上海，恰逢国民党政府为挽

救经济金融颓败，于当年仲夏刚刚推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失败，原定发行的二十亿金圆券，此时已超出限额三十亿，迅速贬值，价格的限制随之被迫取消，经济金融呈大崩溃之势，整个国统区民怨鼎沸，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统治行将覆灭的片兆，暴露无遗。

水兵们刚回上海，一个月的薪水，竟不够买两碗阳春面，使已经积怨的人心，又燃起一把涣散之火。

有的人凭着在英国学到的技艺，弃舰到国外商船上当水手去了；一些水兵，寻找其他门路或回家乡设法谋生去了；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水兵，向往新的天地，辗转投奔解放区。原本六百余人的“重庆号”，开小差的几近一半，国民党海军方面，不得不从海军军士学校补充进一百五十余人。

战争形势的发展，蒋氏政权的飘摇，广大士兵的觉醒，加之一九四九年初，北方的沿海各港，除青岛外，均已被解放。使毕重远感到策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加紧了暗中的活动。

于家欣虎口历险

睦世达失败的逃亡

陈鸿源说：“我要有门子，早就开小差了”

毕重远乘机说：“不能那么便宜他们，要走连军舰一起开走！”

几天来，毕重远就如何实施起义，陷入深深的思考。根据“重庆号”巡洋舰的分布特点，如果每个重要部位需有一人的话，至少要有近三十名最可靠的人，组成起义基本力量，成功才

有把握，目前最紧要的，是将这批人聚集在自己周围。

就在此刻，一度不知去向的水兵于家欣，回到了军舰上。原来，他听同学说苏北泰州，兴化一带有共产党的军队，悄悄买了身便衣，投奔而去。刚到江北，就看见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他以为是自己要投奔的队伍，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盘托出，并写下数纸材料。当他被带到一个小镇时，才发现自己错投了国民党军，可后悔已经晚了。

关押数日后，于家欣被带去见镇上守军的军官。他对于挺客气，于遂请他帮忙脱身。军官说：“你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我不敢放人。但我可只将你转押上级，而把你的材料扣下销毁，或许有救。”在押送泰州途中，押送军官悄声告诉于家欣：“你写的东西已被销毁，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于家欣十分感激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军官，否则他难逃一死。同时他也感到：时下没有多少人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了。

当于家欣又被送往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看守所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已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位名叫肖家富的中共党员，在一家旅馆被特务跟踪，旅馆的女招待把他藏了起来。特务们恼羞成怒，声称不交出“共党”就枪毙所有女招待，肖家富遂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铁窗内，肖家富向于家欣讲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美好的未来。当他被押往死牢时，他把自己的半筒牙膏送给了于家欣，叮嘱于要治好身上的疥疮。死亡在即，却仍然关怀着他人的冷暖，坚守自己的信念，使于家欣对共产党人顿生景仰之情。

由于于家欣一口咬定自己是想回山东老家，当局又没有他投奔共产党的证据，只得让他被具保领出，他的虎口历险，反而赢得“重庆”号上好友们的钦佩。不久，睦世达找到他，相约再次

以“探亲”为名，投奔解放区。于家欣因有开小差前科，未被允准，眭世达只好孤身上路。

眭世达本欲过长江，先到安庆，可由于解放军已控制长江北岸，江面被蒋军封锁，民航交通中断，他在芜湖受困。后他通过同学帮忙，登上“安东”号军舰，试图随舰赴安庆，但“安东号”到大通便原地待命。眭世达几以辗转，也抱着逃亡失败的缺憾，回到“重庆号”，他随即也被严加看管，不得离舰。

几次逃亡壮志未酬，使于家欣、眭世达等像困在笼中的狮子，显得有些焦躁。这都被毕重远看在眼里，他悄悄接近眭世达，把话题引到开小差之事。不料一谈及此，眭世达竟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说着“我被看死，难以脱身了，你还不快回南京，那里马上就要解放了。”毕重远闻言灵机一动，接过话茬说：“一个人走，太便宜国民党蒋介石了，要走就连军舰一起开走！”

听到这句话，眭世达怦然心动，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毕重远的手。而毕重远也从这一握手中，感到他又增加了一个可靠的起义同志。眭世达认为夺取军舰并非易事，担忧能否找到更多愿为反对国民党抛头颅洒血的勇士。毕重远告诉他，已经有一些同志了，还需发展一些人。眭世达马上推荐于家欣，说他是“敢上刀山的人”。

毕重远同意由眭世达去发展于家欣，并交代了单线联系的方式。随后，他把眭世达带到舰上的邮政室，告知这是秘密集合的地点。这个邮政室，是他的同学好友、军乐队队员程伯敏管理的，所以毕重远在这里活动非常方便。一个多月前，他就在此首先同陈鸿源一起酝酿了起义的事情。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在邮政室议论形势，毕重远故意以发牢骚的方式，将蒋氏政权暴虐腐朽的种种迹象数落了一遍，见

陈鸿源亦有同感，随即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叹息说：“唉，我要有门路，也早开小差了。谁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毕重远乘机进言：“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出乎意料，陈鸿源竟随声附和说：“对，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过去！”

临近熄灯时分，他俩谈兴犹浓，便躲到高射炮座隐蔽处，继续交谈。毕重远将起义的初步设想和盘托出，陈鸿源激动地表示坚决跟着干。起义的话题像一团火，使他们忘却了江上凛冽的寒风。

此后的数日里，毕重远、陈鸿源又在邮政室就起义进行谋划，各自提出可发展的对象。毕重远开出了王颐桢、王元方等人名单，陈鸿源觉得王颐桢是个“书呆子”，怕他胆子小，不会加入起义行列。但毕重远认为：书生模样的王颐桢渴望进步，善于思考问题，曾热情洋溢地向自己描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中工人罢工的情节，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还商定发展军舰上司令走廊值更兵吴绍京，他不仅有进步倾向，还有一只左轮手枪，这种轻武器在起义中是很用得着的。

一天，毕重远在岸上遇到王颐桢，上前搭话道：“听说军舰近期要开往台湾，你有何打算？”王悄声说：“我准备找几个人一起开小差，离开军舰。”要走也不能弃舰而去，要把军舰一起开走，不然太便宜国民党了。”王颐桢先是一惊，继而约毕重远详谈。毕重远将起义设想告诉他后，他立刻同意参与行动。

就这样，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桢三人分头活动，又发展了六七个人。考虑到起义必须掌握武器，便又通过争取活动，把十来个受过军事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吸收进来。就这样，秘密聚集到邮政室活动的人员，很快有近二十人了。

毕重远赴南京请求进一步指示 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 活动。但互不相知

当毕重远感到起义的时机成熟，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后，决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党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请求进一步明确指示。他以回家过年为由，请了五天假。

当时沪宁铁路一片混乱，火车站拥挤不堪，根本买不到车票。毕重远心急火燎，因为如此重大的起义，有党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帮助下，硬是从窗户爬进车厢。

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南京，可地下党的新联络人胡玉民，当时正忙于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长时间没去毕重远姐家这个联络点了。毕重远又去找原先的联络人李恭亮，而他却已前往北平清华大学就读。

奔波数日，却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眼看假期结束，毕重远心中万分焦虑。继续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势非常紧张，沪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后，或许很难重返“重庆号”，这都会导致酝酿中的“重庆号”起义计划落空，想到“重庆号”是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军舰，其起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就怦然心动。既然组织上过去有过相机起义的指示，那就绝不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匆匆赶回上海，如期到“重庆号”销假。

此后不久，睦世达发展了于家欣，他是负责掌管航海雷达的，能为航行提供各种数据，并可监视整个航行情况，这样一个关键部位有起义人员，对行动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由他掌管的

二一八雷达室，处在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装甲钢板，工作间里面还有两间居室，外面的大铁门一锁，室内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毕重远决定将起义策划和指挥的中枢，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以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予。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电、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二十七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一九四八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

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蒋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会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香传、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 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 提供手枪十枝 美金一万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夺取武器是关键，打入司令走廊
有左轮枪和冲锋枪，不知有没有子弹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二十四小时，有官兵五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作法。因为摸清和掌握

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三十多支左轮手枪，十二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五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重庆号”去向突变 航行中起义计划难以实施

杨际和说：“你们一定要在停泊中起义 我

就不干了！” 赴江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二月十七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启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埔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异，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蒋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威胁，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四一六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蒋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睦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二八一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人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二八一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便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二八一室的策划并未停止，起义的具体方案十分周密

还是有人在起义前游移，二月二十一日动手的最初计划，未能实施

舰方已闻起义风声，情况更趋急迫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

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订，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拟造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舰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都表示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砺练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二月二十一日，毕重远于零至四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二十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这毕竟是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二十一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二十五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二月二十三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问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睦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即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去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即便有人打退堂鼓，也要在二月二十五日行动
突然生出一系列有利条件
二八一室内只许进，不许出
起义者们依旧分歧严重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同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于二八一室进行紧急磋商，认为起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了，决定如果有人打退堂鼓，就抛开动摇者，由剩下的坚定分子，于二月二十五日零到四时毕重远午夜值班更时行动，这是一个最后期限。为此，毕重远要于家欣将值更时间调到二十二时到零时，以便相互策应；陈鸿源负责监视水兵上下舰情况，观察有无变异；迅速通知“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于二十四日晚九时，在二八一室集合。

就在他们忙碌之际，突然听到司令走廊公布的每日活动“日令”上，决定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半移动锚位。因为军舰的铁锚隔一段时间，必须移动一次，否则被泥沙埋没太深，就很难拉起来。而移动锚位又必须提前发动军舰主机和电罗经。这样，起义时以假命令发动主机和电罗经，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了，停泊起义最令人头疼的事，基本解决了。同时，陈鸿源也顺利地调好了值更的时间。加之较难对付的副舰长离舰，都使二十五日成为非常有利的时机。

二十四日晚，于家欣、眭世达在二八一室内煮上猪蹄，摆了几副扑克，布置成打扑克、夜宵的样子；还拎来一只小便桶，防止有人以小便为由离开会议地点。“解委会”成员相继到来后，

陈鸿源、眭世达从外面将二八一室锁上，使与会者只能进，不能出，他俩则担任巡逻警戒。

毕重远首先分析了形势，将利弊权衡之后，提出无论如何，必须于凌晨他值更时起义。多数人表示赞同，但王颐桢要求继续推迟起义，因为他已将起义信息透露给与王淇有联系的王继挺、蒋树德等人，而王继挺要他们再等两天，以便和中共地下党联络，派人化装成厨师，每人携带双枪上舰，并称可获得江北解放军的接应。李铁羽则提议等待“灵甫号”搞两舰同时起义。分歧与争执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毕重远当时并不知道“重庆号”上的少尉军官王继挺、蒋树德等人，通过王淇的关系，的确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只是风闻此事后，委派水兵洪进先设法接近蒋树德等人，摸清他们是否真的和中共有联系。结果洪进先发现，同蒋等接头的，是调离“重庆号”的少尉曾祥福（穿针引线的人物王淇此时去向不明）。同时有人向毕重远反映，王、蒋等人曾以付美金，封官许愿的方式，拉人参加起义。综合这些情况，毕重远担忧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瓦解起义的，认为所谓地下党派人上舰是个骗局，对他们更加警惕。事实上王淇等人并未与中共地下党达成起义及配合的约定；当然和王淇有联系的部分下层军官，也不是毕重远当时根据观察怀疑的特务。

毕重远此刻认为：听信所谓定约，无异于自杀；继续推迟行动，也只能使起义落得流产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口，没有时间坐而论道、通过耐心说服来消除内部的分歧了。他联合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水兵，声明预定时间一到，有几个人愿意行动，就几个人行动；反对行动的人，留在二八一室。

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决方式，使这群热血青年及时做出了按

计划起义的抉择，一致同意一时三十分行动。毕重远考虑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否则难以控制整个局面，但多数人不主张选领导人，他遂提议选一个协调联络员。与会者一致推选毕重远、王洛为联络员。毕重远随即进行起义的部署。

司令走廊两侧门外，由曾瑞森、赵旭、王宝林、范泳分别警戒，防止在肃清司令走廊军官时，有人进入妨碍行动；

舰腹中段起重机下的楼梯口，由赵振亚警戒，与曾瑞森等配合，防止有人由此上司令走廊；

前甲板准尉住舱附近，由眭世达、韩师忠、孙国桢警戒，在后军官住舱未肃清之前，监视准尉军官行动；

军官住舱通往士兵住舱的通道，由任振修将厚钢门关闭，断绝前后来往，并把守在门内；

与任振修相反方向的左舷通向军官住舱堵门外，由陈英警戒；

通向上层司令走廊的楼梯口，由于家欣警戒，并与任、陈二人互相呼应；

左舷军官住舱的两个堵门前，由周正、郑希平两人警戒，监视军官行动。

行动组由十人组成：陈鸿源、王颐桢、武定国、刘懋忠、赵嘉宾、王元方、孙昌、张启钰、秦咸周、李铁羽，在取得武器后，负责缉捕弹压反起义人员，集中看管军官等行动。

毕重远发出起义信号

值更人员被哄进二八一雷达室

起义者们武装了起来

有六个行动迟疑的起义者，被锁在二

八一雷达室

未及布置停当，毕重远值更的时间已经临近，他必须回住舱，等待换更。零时刚到，毕重远被唤起值更。他来到司令走廊，同于家欣对了对手表，当时针指到二十五日一时十五分之际，毕重远发出开始起义行动的信号，于家欣随即转告守在二八一雷达室外的眭世达行动，王洛立即到配电房，切断了舰上通讯联络和警报系统的电路。

不一会儿，于家欣将上甲板的三名哨兵，哄到雷达室，他们随即被陈鸿源、眭世达等缴了械。接着，毕重远又将三名值更人员，哄进雷达室。这些士兵深明大义，没有反抗就交出武器，并表示支持起义行动。

此时，值更的军官不知躲到何处睡觉去了，为了防止他突然出现，妨碍行动，毕重远派两人把住通往司令走廊的通道，然后打开司令走廊的枪柜和枪架，并让于家欣迅速通知雷达室的人员，领取枪支弹药。

武装起来的起义者们，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头执行各自的任務。陈鸿源等直奔见习舰长卢东阁的寝室。这个卢东阁是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把兄弟，原是海军督战处处长，桂永清把他安插到“重庆号”上，是准备让他取代现任舰长邓兆祥的。他平日十分骄横，当陈鸿源敲他门时，还厉声问有什么事。陈鸿源说：“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可他开门后看见的，却是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此刻，全没了平日的骄横，老老实实地被押到舰尾的盥洗室。

毕重远在分发完武器后，就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前后奔波，督促协调整个起义行动。他来到前甲板准尉住舱，见这个原定由三人把守的位置，只有眭世达一人隐蔽在暗处监视着。眭世

达告诉他，另外两人未到位，且舰腹控制点也无人，可能有人在雷达室没出来。

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六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十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二十多颗四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邓兆祥被带到舰桥上

毕重远发现他不订《中央日报》。却
订进步刊物《展望》
舰长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此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五百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

又经过一段劝说，邓兆祥说出了他的疑虑：能否在短时间内把主机发动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军舰顺利地开出长江口？航行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时，轮机方面传来主机已经发动起来的消息；不久，前甲板的绞盘转动了，两条锚链徐徐上升。可邓兆祥依然下不了决心。他想了解见习舰长卢东阁的态度。可当他看到卢东阁不合作的态度，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压力，便再度沉吟不语。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沉闷，令人焦灼难耐。

毕重远感到不能再拖延了，郑重地对邓兆祥说：“航行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依靠航海雷达导航，万一军舰搁浅，我们也绝不会让它再回到国民党手中，去屠杀人民，阻止解放军渡江。我们已经派人在弹药库中，做好了引爆炸毁军舰的准备。”

士兵们临危不惧的凛然正气，和丝丝入扣的部署行动，使邓兆祥受到了震动，他终于答应领航。于家欣随即将事先准备好的赴烟台的航海图，摊在他面前，并协助他标绘出吴淞口至烟台的最佳航线。当邓兆祥做出这一决定后，便义无反顾地站在指挥台前，用沉稳果断的语气，发出一系列调整航向、航速的指令。他配合起义的行动，不仅保证了顺利的航行，而且对争取广大官兵协助起义航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舰出吴淞口，起义者们都松了一口气 《告全舰同学书》广播后引起小小骚动 发现一艘美国军舰，全舰进入一级战备

在迷蒙的晨雾中，“重庆号”启动了，向吴淞口外驶去。吴淞至长江口区，是暗沙星罗的危险地段，军舰在经验丰富的邓兆祥指挥下，越过园园沙、横沙和大戢山，把险恶的暗沙抛在了后面，起义者们这才松了一口气，邓兆祥的面容，也从严峻转而开朗。

驶出长江口后，军舰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航速行驶。晨曦渐露，沉睡中的水兵，被舰上的广播声唤醒。广播反复播送着由“解委会”草拟的《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不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域，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

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在《告海员技工书》中写道：“现在我们要把这条船开到解放区去，盼望诸位同学能多多帮助我们，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一九四九年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心目中默然失色，当“两书”反复播放后，相继有四五十名官兵表示愿意参加起义行动。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的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但“两书”也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个别人听说军舰将开往解放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毕重远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要严格防范对起义抱有逆反心理的人，警戒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同时天已大亮，如果国民党政府感觉到“重庆”号是开往解放区，必然会组织追击和堵截，眭世达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准备与遭遇之敌作战。

显然，国民党当局并未察觉“重庆号”的行踪，整个白天的航行，没遇到任何险情，二十五日深夜零点，舰桥了望哨报告：“左前方发现灯塔。”毕重远随即到航海雷达室察看，得知哨兵所说的灯塔，是千里岩灯塔，这标志着军舰将驶入青岛海面。

当时的青岛胶州湾一带，驻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二十艘舰艇。毕重远在筹划起义时就考虑到可能会在此地遇到拦截，因而持有极高的警惕，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只是在下午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哨兵报告发现一艘美国军舰，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解委会”同舰长商议后，下达全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的命令。

从准备起义到这时，已经高度紧张了十多个小时了，可一听说有敌情，毕重远他们的困倦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如遇有拦截，就以最高航速，边走边打，舰上所有的火炮、鱼雷发射管，一齐对准了由远而近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军舰并没有发起攻击，经辨认，这只是一艘运输舰。

二十六日黎明，是令人陶醉的黎明
烟台解放军炮兵，发现国民党军舰上
有人在挥动手绢
“我们已将这特大喜讯，电告毛主席
了。”

当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黎明之际，烟台的海岸已经隐约可见。虽说整个起义几乎没费一枪一炮，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一昼两夜，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这解放区的黎明，令毕重远他们分外欣喜和陶醉，他们终于实现了起义最理想的目标，把国民党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舰，送到人民手中。特别是毕重远，在敌人营垒隐瞒身份，独立潜伏了三年，如今，他终于能返回党的身边，可以自豪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了。

由于起义是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举行的，已无法通知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当“重庆号”越发靠近烟台海岸，毕重远越担忧会遭到解放军的炮击，为避免误会，他们决定将舰上所有火炮，都高高仰在六十度以上，表示没有射击之意；有的人还向岸边挥动白色的手绢。

毕重远在军舰驶离吴淞时，就陆续向起义骨干们表明了自己

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因而此时他决定由他带两个人，代表起义者与烟台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接洽。

这天清晨，烟台子午岛解放军加农炮阵地就隐约发现一大型海上目标，像是国民党的军舰，随即向烟台警备区请示如何处置。作训股长刘元兴刚刚以“军舰不开炮，我们也不开炮”作答，就又接到烟台东山炮台的报告：“一艘军舰向烟台港驶来。”

刘元兴一面要求各炮台严密监视，一面立即向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王泽民、政治部主任张少华报告。随后他们三人登上烟台山，既看清了“重庆号”的全貌，毫无射击之意的六十度仰角，也看到了舰上有人在挥舞手绢，他们马上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决定由刘元兴前往联络。他乘上小舢板刚划出不远，就与毕重远等乘坐的汽艇相遇。

毕重远向刘元兴说明自己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士兵代表，并介绍了军舰的情况。刘元兴立即将这惊人的喜讯报告给烟台市委和胶东军区。

不久，烟台市委书记、市长、胶东军区领导就赶到了岸边。毕重远随后向烟台警备区政治部单独汇报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南京地下党的指示，“重庆号”起义的详细经过，并将士兵解放委员会二十七名成员名单交给他们。

当天下午，邓兆祥等舰上军官，也被请上岸。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他不禁百感交集，拉着烟台市委书记徐中夫的手，面带愧疚地说：“重庆号过去的一切罪恶，都由我一人负责。”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含笑答道：“光荣起义，何罪之有？，徐中夫郑重地说：“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喜讯，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了！”

上海滩，记者们团团围住牟秉钊
蒋介石大骂桂永清无能
在讨伐“重庆号”的会议上，众舰长
声称不炸沉“重庆号”，就不出海执行任务

“重庆号”悄然逝去的情况，是几名离舰逍遥的官兵，在第二天清晨返回时发现的。六神无主的他们，匆匆找到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办事处，询问是怎么回事。办事处官员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电南京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桂永清闻讯，吓得面无人色，星驰吴淞口，但只见滚滚东逝水，哪还有“重庆号”踪迹。

一个多月前，桂永清面对国民党陆军的一败再败，凿凿有言“陆军不打，海军打”；国府上海市长吴国桢也虚张声势：“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忧。”而此刻“重庆号”突然去向不明，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滩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当时不在舰上的副舰长牟秉钊。

而牟秉钊自己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军舰与飞机不同，即便少数人士有异动，亦不能强制该舰北驶。唯一之解答，当为舰长接获伪造命令迳自出海北上。舰长在海上之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一出，众无异辞。惟以邓舰长之个性而言，乃极端守法之人，似不致有此异动；真相如何，非至有舰上官兵归来，不能确定。”

两天后，外出侦察的飞机，在烟台港湾发现“重庆号”，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确定无疑。

蒋介石得讯，肝火骤生，大骂桂永清无能。桂永清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重庆”号叛而复归的幻想破灭了，桂永清随即召集海军舰长会议，商议讨伐“重庆号”。不料，他的讨伐提议，竟没一位舰长附和其计。

冷场良久，“逸仙号”舰长道出原委：“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都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的确，“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现代化、最具战斗力的战舰，谁愿以卵击石呢？据闻各舰舰长一致提出，必须求助美国飞机炸沉“重庆号”，否则各舰拒绝出海执行任务。

三月三日，停泊在烟台的“重庆号”，遭到四架蒋军飞机的轰炸。鉴于烟台港距蒋统区较近，防空力量薄弱，难以给“重庆号”有力的庇护，同时燃料、食品和淡水的供应都不方便，毕重远提议将“重庆号”开往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葫芦岛。胶东军区向中央请示后，批准了这一建议。

夜幕降临之后，“重庆号”悄然起动，直驶葫芦岛。当第二日蒋军飞机再到烟台海域之际，“重庆号”又销声匿迹了。

伍修权说：一批青年人竟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引起我心中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

“留人不留舰”

贺龙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三月四日清晨，“重庆号”靠上了葫芦岛码头。几个月前，它曾到这里，把战火抛向人民；而今天，它又来到这里，投入人民的怀抱。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当地政府和驻军的领导，也相继上舰看望慰问，年轻起义者们的情感，

涌起异样的波澜。

正在东北疗养的张爱萍将军闻讯，随即来到码头观看这艘国民党海军的头号战舰。就在此后不久，当人民解放军刚刚打过长江，他即受命组建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军司令。新华社的记者穆青，也赶到舰上采访，以他那颇具感染力的笔触，写下《投向人民怀抱》一文，第一个记述了“重庆号”起义的历程。画家华君武，为该文绘制了插图。

不久，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奉中央和东北局之命，赴葫芦岛慰问“重庆号”官兵。他单独接见了组织者毕重远。他听罢毕重远详细地介绍如何经过长期准备及细致工作，团结了舰上一批进步、勇敢的爱国士兵，建立“士兵解放委员会”秘密组织，在异常危险紧急的情况下，发动起义的经过后，感到这群年轻人竟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内心生出“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

他看见毕重远自己镌刻并缀在士兵帽上镰刀铁锤五星，就告诉毕重远：“我军不久就将颁布正式的帽徽式样了，可不是你戴的这个式样的。”三十多年后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毕重远同志是我党在‘重庆舰’上的一粒火种，没有这个‘星星之火’，就不会有‘士兵解放委员会’，也就不会有‘重庆’舰的这次起义”。

为了保护“重庆号”，解放军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并对军舰进行了伪装。但最后还是被敌侦察机发现了，据说发现的原因十分偶然。蒋军侦察机在解放区各港口寻找“重庆号”踪迹，几次飞过葫芦岛，都未发现军舰。但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飞行员王金笃，曾经常在葫芦岛钓鱼，对该岛极为熟悉。他从葫芦岛掠过时，感到葫芦岛防波堤长了一截，便返回低

空察看，结果遭到“重庆号”的炮火攻击，目标暴露了。

从三月十八日始，“重庆号”受到蒋军轰炸机群的轰击。由于没有制空权，“重庆号”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水兵们和岸边的炮兵部队，舍死忘生地开炮还击，激烈的舰对空战持续了数天。三月二十日，一颗二千磅的穿甲弹击中军舰的右舷尾部，炸开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洞，六名水兵牺牲，二十余人受伤。

根据军舰难以抗击空中轰炸的现实，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留人不留舰”的决定，在拆卸掉舰上的重要设备后，护航人员全部离舰，主动沉舰。当天黄昏，“重庆号”舱底闸门全部开启。望着刚刚夺到手的军舰徐徐沉入海底，部分起义骨干不禁号啕大哭。

“重庆号”虽然自沉了，但起义水兵们的功绩却不会被淹没，中共中央随即派贺龙专程赴葫芦岛看望起义人员。当贺龙来到“重庆号”官兵中间时，水兵们为亲睹这位身经百战、威震国中的传奇式人物，激动不已；而这老战将面对众多年轻的水兵，也显得兴奋和风趣。他代表中央、毛泽东、朱德对全体人员慰问和欢迎后说：“过去我们用菜刀闹革命，今天你们又把蒋介石的王牌军舰都开过来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他接着“表扬”起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说从解放军的装备到“重庆号”，直到他身上的“over coal”都是蒋输送的。最后，他谈到了学习和思想转变问题。毕重远回想起当年情景时说：许多言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给邓兆祥和全体官兵的慰问电传到葫芦岛。电报中写道：“热烈祝贺你们英勇起义”“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电报

还预言：“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

的确，“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的预言，不久就变成了现实。未出两个月，国民党江防第二舰队大部分舰艇，在司令林遵率领下起义；接着，江阴炮台起义；“长治号”驱逐舰起义……

关于“重庆号”起义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但毕重远言犹未尽，又对我讲述了他和许多起义骨干在起义之后的故事，这些故事依然曲折，依然耐人寻味，只是限于篇幅，我不得不暂且搁笔了。

平措汪杰

坐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

平措汪杰：三十年代末，他创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曾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叶剑英秘密见面，随后入藏宣传马克思主义。解放军攻克昌都，他向阿沛·阿旺晋美进行解说。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中，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一九六〇年蒙冤入狱。“文革”后，他是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平措汪杰简历

从未到过西藏的我，却似乎与西藏有些不解的缘分。这两年间，自写了《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的最后岁月》后，又在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的采访写作中，以较长篇幅言及抢救班禅、西藏平叛作战等涉及西藏的人和事件。

此刻；我又有机缘坐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顾问平措汪杰的对面，聆听这位三十年代末“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创编者、一九五一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讲述我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另外一些有关西藏的故事。

他入读的那所学校，校长是蒋介石 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诞生 他们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致敬信

源于过去书本、电影中的印象，一说起旧日的西藏，我脑海首先反映的，不是湛蓝的天际下晶莹的冰峰，不是金碧琉璃的布达拉宫，翡翠一样葱茏的罗布林卡，以及神、佛、人相融相通充满神秘诱惑的氤氲，而是原始、荒漠与迷信，是近代列强觊觎的阴霾，是英军入侵的血腥和燹烬。除了极少数在印度受到英化教育的贵族，在这种环境里的生民，“共产主义”“变革”等与工业革命时代相伴随的意念，是如何影响和植入他们的思维的呢？

听完了我的疑惑，平措汪杰笑了笑说：“不光是你，许多人听说我在三十年代末就组建共产主义小组，都感到不可思议，认为那个社会形态下的藏民，怎么可能与无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发生联

系呢？这其间的确有特殊的机缘和经历，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的。”

平措汪杰出生在原西康省巴塘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城关镇，那是一九二二年仲秋，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和加入第三国际等重要决议这后者仿佛与一个苍莽藏区的新生婴儿风马牛不相及，但伸延的历史却一再证明，有些重大事件的意义，绝非过眼云烟。

故土的风抚雨沐给予平措汪杰的，是淳朴、爽直和善良，当然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贫困、不平，也被他看在眼里。十三岁上，他读完了小学。恰巧他的舅舅要赴内地，他便随舅舅辗转到当时的首都南京继续求学。经一年的补习，他进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内地创办的唯一一所民族院校，为了表示对之重视，该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出任。

而此时此刻的南京，已然放不下一张安定的书桌了。日本侵略者从南北两端向中国腹地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仍抱攘外必先安内旧旨，不事抵抗，华夏山河在一天天破碎沦丧。在一·二八淞沪战争后，日军获得了在上海吴淞、江湾、闸北暂驻军权，而中国军队却不得驻扎淞沪地区。在国都的南面，敌军虎视眈眈，却无险可凭，门户半开。一九三五年仲夏，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继东北失陷之后，华北又沦亡在即。

民族的危急，时局的激荡，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国风潮，使初到内地、方晓世事的平措汪杰，无法在书桌前安然就读。如何抵御外侮，如何寻得一条民富国强的途径，这些本为成年人思考的命题，骤然摆在了十四五岁的热血学子平措汪杰面前，迫使他思索，迫使他早熟。对桑梓的牵挂、对

父母的思念倒被冲淡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八月十三日上海滩的炮火，彻底唤醒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了。当蒙藏学校向内地迁移到达湖南时，平措汪杰生出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他和一位叫达瓦的同学，找到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要求赴武汉报考航空学校，成为空军，打击日寇。

张治中很赞赏他们的爱国热情，航空学校的校长随后也同意吸收他们入航校学习。可达瓦的家人反对他们去当空军，劝说他们先好好读书，掌握本领，然后才能报效祖国，为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同学遵从了家人的劝说，平措汪杰也只好前往芷江，回蒙藏学校继续读书。

但由于途中报考航空学校，平措汪杰耽误了蒙藏学校的考期。老师王学孟很同情他，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写一篇文章，代替考试。也许是战火纷飞，国难当头，披矢淋弹前方将士的鲜血，流离失所逃难民众的颠沛，富豪官僚依旧的纸醉金迷，以及欲亲身投入驱除强虏战斗的渴望，强烈地撞击着平措汪杰的心扉，他写下了《武汉之行》。

老师被他的文字打动了，不仅使校方允许他继续就读，还把他的文章推荐给《芷江日报》。文章发表了，平措汪杰第一次拿到了一笔十二元法币的稿酬。但他后来才明白，王学孟老师为什么会欣赏他的文章。

原来，王学孟是个接近共产党人的进步青年，在他周围有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平措汪杰的文章中、从此后的接触中，感到他也是个有爱国心、正义感和向往光明的人。于是，他们在一起传看进步书籍、报刊。

同所有渴望新知、渴望祖国的振兴和解放的青年一样，平措

汪杰立即被《群众》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报刊中新鲜、富有感召力，能为其苦闷解惑，揭示出光明未来的言论和观点深深吸引。

他像干涸的土地渴求雨露一样，去寻觅进步的、能够开阔视野的书籍报刊来阅读。他在朋友处看到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范长江著的《中国西北角》、邹韬奋著的《萍踪忆语》、《萍踪寄语》。这些书籍，使他这个走出藏区始知中国之大的藏族青年，进而了解到中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寰宇乾坤；了解到除了他置身的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之外，还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等等。

由于战火不断向中国纵深的蔓延，平措汪杰所在的学校，被迫从芷江迁往陪都重庆。在这里，平措汪杰结识了更多的汉族的进步青年，阅读到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念，渐渐植入他的脑际。

随着阅读的丰富，平措汪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述，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理论，也将能够指引广大西藏人民走向幸福美好之途。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深深吸引着他。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尧等，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

此时，平措汪杰知道，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党和组织，在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组织有一个联合的大团体，那就是第三国际。于是，平措汪杰他们便想方设法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他们以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名义，给斯大林和毛泽

东写了致敬信，表明要在青藏高原展开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希望得到具体的指导和援助。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各地藏族青年旅渝同学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

一九四〇年初，平措汪杰领导蒙藏学校的藏族学生闹学潮，抗议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此事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在一次纪念会上，严厉训斥了学潮行动。结果学校方面将学潮的领导者平措汪杰开除了。

叶剑英说：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

延安进不去，去莫斯科也行啊

费德林说：三个月内，我们给你能否去莫斯科的确信

失去学籍的平措汪杰，更全身心地投入了争取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活动。他给他心目中异常钦佩的邹韬奋写信，请他帮忙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联系。经邹韬奋牵线搭桥，平措汪杰终于和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中共领导人见了几次面。

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四周，国民党当局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因此会面必须设法躲过特务的监视。平措汪杰记得他和喜尧与叶剑英的几次会面，都是由当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王梓木安排的。

平措汪杰向叶剑英汇报了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宗旨和活动情况，提出了希望得到中共的领导和指示，同时陈述了想赴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迫切愿望。叶剑英对平措汪杰说：国民

党当局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对延安封锁得十分严密，你们近期恐怕很难进入延安，还是先回藏区，在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地域，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血气方刚的平措汪杰，不相信有什么冲不破的屏障。他和喜尧与叶剑英又见了一面，接受了如何在藏区展开活动的指示，每人领取了可观的活动经费。最后，叶剑英同他们握了握手说：“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

听了叶剑英的这番话，平措汪杰和喜尧认为他们整个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成员，理所当然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但平措汪杰并没马上奔赴藏区，而是和喜尧商定先设法到西安，然后相机进延安。

可他们刚刚走到四川广汉，就被国民党的哨卡拦住了。由于喜尧还是蒙藏学校的学生，有制服和徽章，被允许继续北上。不能继续北行的平措汪杰叮嘱喜尧：“如果你能进入延安，就把制服、徽章寄给我，我也如法炮制；如进延安的努力终归失败，就各自回自己的藏区故乡，从事革命活动。”

平措汪杰没等来他翘首盼望的佳音，喜尧未能闯过封锁进入延安，按事先的约定回故乡谋求发展了。去延安的路似乎真的走不通了，可亲往革命圣地的念头依然萦绕平措汪杰心间，延安去不成，去第三国际所在的莫斯科也行啊。

早在和中共联系的同时，平措汪杰就和昂旺格桑与苏联驻华使馆进行了联系，并见到了潘友新大使和著名的汉学家、参赞费德林，介绍了他们小组的情况，表达了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的愿望。

此刻，平措汪杰又找到了潘友新、费德林，除了再次陈述渴

望得到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援助外，还提出去莫斯科的想法。潘、费要平措汪杰提交一份有关他们的组织情况、行动纲领，以及计划如何在西藏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书面材料，由他们向第三国际和苏联报告、请示平措汪杰遂按他们的要求，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材料。费德林告诉平措汪杰，三个月内就能得到能否去莫斯科的准信。

三个月后，当平措汪杰再度和费德林见面时，费说莫斯科已经有回音，同意平措汪杰赴苏联，路线是从新疆进入苏联，因为当时控制新疆的盛世才，还施行着与中共合作和联苏的政策。

不幸得很，在平措汪杰正准备动身的时候，苏德战争爆发了。暂时去不成苏联了，平措汪杰决定先回藏区，把他所信仰的、认为能给广大藏胞带来解放和幸福的思想，传送到那里。

与阿沛·阿旺晋美夫人的叔叔宇妥·扎西顿珠相见如故

“你究竟信不信神？”“我的理想，和神佛所宣示的美好境界是一致的。”

“到拉萨后，请你把跟我谈过的内容，给噶厦的执政者们说说。”

在离开重庆前，平措汪杰从苏联大使馆得到了一大笔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他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购买了一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及进步书刊。他多次把这些书籍打在小包裹里，买通向西康运货的司机，带包裹进藏。遇到盘查较严的哨卡时，他就雇人搬运书籍，绕过哨卡再上车。第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就这样陆续秘密地运进了川康藏区及西藏。

他先回到了故乡西康藏区。在这里，他把许多进步的藏族青年，团聚到自己周围，阅读进步书籍，继而成立了“星火社”组织。后来他在拉萨创建的“高原共产主义革命小组”的成员，大多出自星火社。

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平措汪杰也感到，在西藏地区谋求广大民众的翻身解放，也必须说服和团结部分开明的上层贵族和知识界人士。

由于平措汪杰是因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而被开除的，噶厦政府驻重庆办事处的官员对他十分同情。当得知他要回藏时，办事处主动为他出具了一封介绍信。他遂持信前往昌都活动。

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地处澜沧江上游扎曲、昂曲两支流汇合点，扼由内地进藏北、中、南三条路的中路要冲。西藏噶厦政府对此地的镇守非常着意，昌都最高行政长官，向来都是由噶厦最高行政官员四噶伦中的一位担任，而且必须莅位理政。

此时的昌都基巧（即总管），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的叔叔，出自西藏古老的贵族世家宇妥世家的宇妥·扎西顿珠。宇妥·扎西顿珠的年纪已不轻了，但温文尔雅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关注世界大势，且十分开明。

宇妥·扎西顿珠在接受了平措汪杰的拜访后，发现这个青年思维清晰，言之有据，对所谈及的各种事物的权衡演绎剖析入情人理，顿时对他产生了好感，便在自己每日公务处理完毕之际，邀他前来聚谈。

在这以后的十几个黄昏到夜晚，平措汪杰都和宇妥·扎西顿珠促膝交谈，从内地的所见所闻，到西藏的现状前景；从国共两党的政见分野，到各自少数民族政策的差异；从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到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战争及世界大势的演化……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的欧洲大部，均在德军的铁蹄下呻吟；英伦三岛正蒙受着德机的狂轰滥炸；苏联境内苏军仍在与德军苦苦鏖战。在亚洲，日军已经占领中国沿海所有地区，腹地的战事也向陪都重庆逼近；东南亚诸国多沦落于日军之手；与西藏相邻的英属印度，也因日军兵锋直指阿萨姆，而人心浮动。鉴于这种形势，西藏噶厦政府及多数上层官员和贵族对前景的瞻望是：轴心国将取胜，同盟国将俯首称臣。

听了平措汪杰的分析，宇妥·扎西顿珠渐渐转变了一些成见。轴心国虽气势汹汹。但无论德国在苏联，还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在中国，强弩之末的内质已露；中国共产党虽说还像个远不可及的概念，但其关于民族自治平等和睦的主张，倒是颇能让人接纳的。

这个平措汪杰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怎么对时局有如此透彻的见解，对中共的政策如此知之甚详呢？于是宇妥·扎西顿珠一再向平措汪杰发问：“你究竟信不信神佛？”平措汪杰没有正面地回答他，而是说：“我的理想，和神佛所宣示的美好境界是一致的。”

再追问下去已没有意义了，宇妥·扎西顿珠认定平措汪杰是个视野宽阔而心地善良的人。他对平措汪杰说：“我希望你能在我的管区里担任官职，我本想任命你做代本（藏军的团长），可惜你不是贵族，你就做代理代本吧。”

平措汪杰想到自己不能围守一处，要在整个藏区展开活动，就说：“我很感谢您的盛情，但我是个飘忽不定的人，请原谅我不能就职。”他告诉宇妥·扎西顿珠，不久将前往拉萨。宇妥·扎西顿珠对他说：“你到拉萨，应该见见噶厦的噶伦们，把你同我讲的这一切说给他们听听。”宇妥·扎西顿珠还亲自给他签发了一

张特许通行证，写明平措汪杰在昌都基巧的领地将会永远受到欢迎。

“把邪恶带进了雪域”

噶厦的执政者看到了请愿书，认为所说的一切太离奇了

前往噶伦堡

巴苏大夫手比画着八字 用中文说：“我们是八路。”

平措汪杰来到雪域圣地拉萨，他把莫斯科出版的汉文版《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这些无神论的书籍，带进了处处可见神佛安居的玛尼堆，家家高悬祈神五色经幡的神佛之都。曾任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对平措汪杰早年在雪域高原传播马列主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也有人指责我把邪恶带进了雪域。”

不仅如此，他还在这里组建了“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除了原来的昂旺格桑、刀登等外，又发展了益西曲批、阿多、车列尼玛等同志。不久，这几乎与内地隔绝的雪域上空，居然也响起藏文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延安颂》、《假如战争明天来临》、《风之曲》等歌声。早在一九三九年，平措汪杰就曾将《国际歌》翻译成了藏文此刻，他又翻译了这些内地的进步歌曲，用以感染和召唤藏族的热血青年。

他像在昌都说服宇妥·扎西顿珠那样，说服了一批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上层贵族青年和开明人士，跟他一起向噶厦当局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中，他们提出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

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减轻民众负担、改善广大藏民生活现状的主张。

这些要求，在噶厦当局看来简直太离奇了，然而他们也没有视这种请愿为多么可怕的威胁，只是对请愿置若罔闻。

当苏德战事出现了巨大变化，苏联再次显示其强大的威力，即将把德军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干净之际，平措汪杰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心莫斯科的向往，也再次热切起来。他一路南下，经帕里、亚东、穿过锡金，来到印度的噶伦堡，找到了印度共产党在噶伦堡的负责人觉底士医生。

在觉底士的帮助下，平措汪杰前往加尔各答，住进了觉底士夫人的家中。不久他就与加尔各答地区印共负责人接上了头，这位负责人不是别人，就是同柯棣华大夫一同到中国支援抗战的巴苏大夫。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很有意思，巴苏用手比画着八字，用中文说：“我们是八路。”之后两人相对大笑。

平措汪杰提出了希望印度共产党帮助他前往莫斯科的请求，巴苏一面同设在孟买的印共中央联系，一面安排他住在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商人家里，这位商人是中共秘密党员毕朔望的哥哥，而毕朔望此时也住在这里。他等待了很久，可等到的消息依然是印共难以帮助他到印度赴莫斯科。他失望地返回拉萨。

德钦藏区的‘海司令’正在寻找平措汪杰
起义流产了

“前生注定的命运 我们俩相交为友了。”

“你到我府下的察隅县代理县长，避避风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平措汪杰一度在云南西北的德钦藏区活动。这里是一九三六年红二方面军走过的地方，从这里到甘孜一线，当时曾经诞生过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负责人是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等人。

此时，在德钦藏区有一支倾向中共的武装，称作滇西北游击支队。支队的司令员，是当年博巴政府的成员恭布次仁（又名海正涛）。这位“海司令”得知在藏区创建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组织并进行革命活动的平措汪杰正在这一带活动，便设法与他联系。

一九三六年初，他们终于聚集到一起，随即成立了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并准备依靠这支武装，在藏东康南创建革命根据地。此后，平措汪杰专门前去重庆，试图与驻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等联系，以争取指导和资助。但他到达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南京，周恩来等也随之离渝。

平措汪杰返回德钦后，遂与恭布次仁等筹划在阿墩子地区策动武装起义，然后向西藏进发。他们将武器隐藏在货驮子里面，通过马帮陆续运往起义的地点。可就在这时，恭布次仁的武装内部出现矛盾分歧，使起义的计划泄露了出去，恭布次仁及他的两个孩子，惨遭当地反动派杀害，起义流产了。

恭布次仁遇害的那天傍晚，平措汪杰和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的昂旺格桑、益西曲批恰巧没有同恭布次仁在一起。他们听到恭布次仁的住所一带枪声大作，估计起义败露，连夜脱离了险境，在山林中风餐露宿十余天，避过了风头。在这些日子里，国民党当局四处张贴告示，通缉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

平措汪杰在丽江潜伏了一段，后辗转来到昌都，见到了基巧宇妥·扎西顿珠。宇妥·扎西顿珠已经得知国民党通缉平措汪杰

的消息，对他说：“我跟你交往了这么久，竟不知道你原来是个共产党人！”事已至此，平措汪杰也就不再向他隐瞒自己的身分。

宇妥·扎西顿珠说：“虽然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前生注定的命运，我们俩相交为友了，我认为你是个好人的，我相信你不会做危害我们民族的事情。眼下你的处境很危险，你是不是改名换姓，我把你安排在昌都府辖下的察隅县当个代理县长，暂避一时？”平措汪杰直言相告他要经常在整个藏区走动，只想借一些盘缠。宇妥·扎西顿珠便借给了他五十秤（一秤五十两）藏银。

一九五四年底，平措汪杰又回到了拉萨，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左仁极对新任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说：西藏地区共产党头子，是宇妥·扎西顿珠的好朋友朱德给平措汪杰回了一份电报

一九四九年初，平措汪杰又到了拉萨，这时昌都基巧宇妥·扎西顿珠已经卸任回到拉萨。他们见面时，宇妥·扎西顿珠告诉平措汪杰他离开昌都前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左仁极在一次宴会上，对新任昌都基巧拉鲁·才旺多吉说：“平措汪杰是西藏地区的共产党头子，可宇妥却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听后反唇相讥说：“平措汪杰是我的朋友，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你既然知道他是共产党，为什么几次三番地请他吃饭呢？”左仁极这才无言以对。

因此，宇妥·扎西顿珠劝平措汪杰尽快离开拉萨。但平措汪

杰以音乐教师身分做掩护，留在拉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入夏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西南的挺进，使西藏噶厦政权感到恐慌，他们在外国势力的挑唆下，制造了“驱汉事件”，把在西藏地区的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官员和所有汉人、以及有共产党嫌疑的藏人，全部驱逐出西藏。

七月初的一天，一群藏兵来到平措汪杰的住所，两位噶厦政府派来的一僧一俗官员，宣布他有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嫌疑，必须在三日内离开拉萨。平措汪杰说：“拉萨是西藏人民的拉萨，不能由你们贵族的噶厦政府想赶走谁就赶走谁。今天你们可以赶走我，但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到拉萨的。”但藏兵不由分辩地说：“你现在已经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中，如果你不离开，我们就要强制你离开。

平措汪杰和刀登等藏族共产党人被武装押送从亚东出藏，在印度的噶伦堡，他与在此治病的宇妥·扎西顿珠又见了面。之后他绕道加尔各答，返回中国云南。他从昆明来到剑川时，这里还有战事，他迅速同欧根为首的滇西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滇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听取了平措汪杰和他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近十年革命活动情况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过去听说过有关你们的活动，但一直没有联系，现请你再办个入党手续。他们承认了平措汪杰的党籍，他领导下的其他藏族共产党人也同时一律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但党龄的问题须待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研究后定。

遵照上级的指示，平措汪杰赶到自己的故乡巴塘，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即巴塘地下党），并由他任工委书记。在发展藏族党员的同时，他还创建了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在他的引导和教育下，一大批藏族优秀青年，迅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尔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以及进行藏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在他们当中，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的有六人，地局级领导的四十余人，县级领导的一百二十多人。现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四川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等，都是当时的青年同盟盟员和党员。

当组织工作有序地运作起来后，平措汪杰以康藏边地工委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负责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去了一份致敬电。这时，毛泽东已出访苏联。不久他就收到了朱德的回电：要他尽快赴刚刚解放的重庆，向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汇报请示工作。

毛泽东致信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平措汪杰向邓小平畅谈了尽量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见解

阿沛·阿旺晋美出任昌都总管

平措汪杰此刻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将人藏问题，提到很紧迫的日程上来了，毛泽东近期就解放西藏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他又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他感觉，“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

定由西南局担负。”因此他明令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余军，做好入藏准备。为了更顺利地实现进藏，他提出：“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平措汪杰先抵达西康的雅安。在这里，他见到了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经他安排，平措汪杰乘飞机前往重庆。在重庆，平措汪杰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他首先汇报了十余年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刘、邓、贺把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召来重庆，部署入藏的行动，并与平措汪杰会面。当时进军西藏的路线、行动方案、注意事项等均已议定。平措汪杰还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叙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但他更强调尽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见解。

刘、邓、贺恰恰也最关注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希望平措汪杰能为此多做些工作，并决定带一批藏族干部和青年进藏，以便于开展工作。随后，他们任命平措汪杰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平措汪杰和张国华回到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新津。该军党委后任命他为十八军民运部部长。他被安排随南路进藏部队行动，并任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六月，他抵达了南路进藏部队的集结地巴塘前沿，这里与昌都府的辖区，仅隔着一条金沙江。

箭在弦上，但却没有立即发出。首先进入西藏地区的，并不是作战部队，而是一支支由“商人”和高僧、活佛组成的“劝和团”。

从一九五〇年开春以后，陆续有三四批以劝说噶厦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让解放军和平入藏为主旨的劝和团，踏进了雪域。

第一批是从西宁入藏的马帮，其中有两个汉族商人，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人员。他们带去了阐释中共关于

西藏政策的信件，信件的执笔者，是已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在西藏声望卓越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他们得到了噶厦当局回复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信件。这个千言的文件，称西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院的关系），噶厦当局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关系。这封信转到毛泽东手上时，他看了译文后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表明了一个态度。

继之而去的几个劝和团，就没有如是的幸运了。曾在哲蚌寺学经十载，考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第七名的高僧密悟法师，虽说与西藏上层人士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带领的劝和团被阻在金沙江东，再不得前进一步。

由青海藏区声高望重的活佛、千户们组成的劝和团，甚至动员出了十四世达赖的胞兄、塔尔寺的当才活佛，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专程到西宁为之送行。他们几经蹭蹬最终进入了西藏，可自西藏地方官员告知已将他们带来的劝和信转送拉萨后，便再无下文。

七月十日，又一支劝和团从四川甘孜的白利寺上路了。为首的是当年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这位热切盼望西藏早日和平解放的活佛，致电当年在博巴政府共事的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亲往拉萨促进和谈工作。

朱德认为他进藏劝和安全难有保障，请他先到北京重叙旧谊，并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可格达在接到朱德的回电后，更激起热忱，表示要待西藏众生得安康之后，再赴京见朱总司令。朱德深为他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再次致电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俟安全有虞，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

格达活佛于七月二十四日到昌都后，广泛接触僧俗人士，以

亲身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但他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喇嘛，敦促其与中共和谈的愿望尚未实现，就在昌都不幸逝世了。关于他的逝世。现存多种说法，一时难以作出定论。

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屡屡施放和平气球之际，昌都府基巧拉鲁·才旺多吉的任期满了，要求噶厦批准其卸任回拉萨。可在拉萨的三个噶伦，谁也不愿去昌都接手这个苦差。

解放军陈兵金沙江东岸，藏军的三分之二也都摆在了昌都地区。潜入的外来分子的鼓噪，有险可恃的侥幸心理，使得噶厦政府的官员以主战者居多，都企盼能将解放军屏挡在雪域之外；可谁又都不愿意到那战云笼罩的前线。

结果，孜本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

有意思的是，阿沛·阿旺晋美侃侃而谈的，与多数官员和贵族大相径庭。他既厌恶将共产党、解放军描绘成绿髯红须、青面獠牙的鬼蜮魍魉的无稽之谈；也不主张以铁血屏拒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于雪域之外的痴人梦呓。他言之凿凿的是：同共产党打仗，无异以卵击石。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精良武器支撑，尚且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把西藏男女老少都动员上战场，也不足百万，武器更不如人，采取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失为上策。

向来有分裂之思的摄政达扎，何以将倡言与中共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提升，推上前线呢？或许是因为相信他这种临危不乱的个性，不会不战而降；或许是感到他这种有责任感的人，不会因环境的凶险而敷衍塞责，一触即溃；或许是因为不惑之年的他，曾经有佛学和兵机两方面的砺炼，是个文武全才？

刚到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对入眼的一切倍感沮丧
泽宗山口附近的折骨寺举起了白旗
平措汪杰一进昌都城，就询问阿沛·阿旺晋美在哪里

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以东百余里甲玛沟的一个贵族世家。少年时即受业于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苍活佛，晨钟暮鼓，学得满腹经纶。二十三岁上加入了由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团，从班长一级级升到营长，可谓兼通韬略。因而被西藏赫赫有名的阿沛家族看中，招赘为阿沛·才旦卓嘎的夫婿。

入阿沛家族后，他曾担任过昌都府粮饷总管等官职，以精明强干擢为噶厦政权的四大孜本之一。然而此刻的升迁，并没给他丝毫喜悦。他认为以藏军现在的士气和装备，抵御解放军的推进，毫无胜算可言，可他背后却是喧嚣一片的主战之声。

自八月二十八日到昌都之后，入眼的情景只能令他沮丧。他在给噶厦的电报中说：辖区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更堪忧的是拉萨来的藏兵军纪废弛，奸淫扰民，各代本之间，互不相谐。此情此景，能战能胜吗？

他向执政者们提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设法阻止解放军入藏，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执政者们，仍欲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

等待不可能是无休无止的。八月中旬，毛泽东再次了解了入藏作战准备情况后，下达了实施昌都战役的指示：“十月解放昌

都，这对于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十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十月，昌都战役如期打响了。正像阿沛·阿旺晋美预料的那样，藏军一经打击便辙乱旗靡，仅八九天，解放军已进击三四百里，直逼昌都城下。一开始就不主张与解放军兵戎相见的阿沛·阿旺晋美，下令弃城西撤。但西退的要隘，已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中。

在泽宗山口附近的折骨寺，进退失据的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这大概是当过军人的他往昔从未考虑过的术语。这一战历时十八天，解放军歼敌五千七百余，英国报务员福特等四人，也在俘虏之中。

昌都解放后，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主持的前线指挥所，随即搬进城内，成立了中共昌都分工委，王出任书记。任副书记的平措汪杰，一进城就被带进昔日的基巧府，如今的前线指挥所大院子内。王其梅让他住在二楼轩敞窗明的原基巧住房，可他顾不得安顿，就询问道：“基巧阿沛·阿旺晋美在哪里？”

有关人员告诉他，阿沛·阿旺晋美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和其他旧官员、孜本们一样，都住在比较简陋的平房，平措汪杰听了，感到如此安置有问题，便立即准备了一些礼品，到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造访。

平措汪杰见到阿沛·阿旺晋美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绸缎的官服，只着一身普通的氍毹藏装。他随后又去看望了一些昌都府的老官员和藏军的孜本。发现他们的情形大致与阿沛·阿旺晋美相似。他立即找到王其梅，提出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阿沛·阿旺晋美住，并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还商定，将原昌都府官员和

藏军孜本的官服还给他们，投诚官员仍搬回原住所。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平措汪杰天天和阿沛·阿旺晋美及他的秘书见面，也抽空看望其他昌都府的官员、藏军军官们，向他们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意义，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权衡利弊。

在当年和宇妥·扎西顿珠促膝长谈的地方，平措汪杰和阿沛·阿旺晋美及他的秘书，恳谈了十多天，有时王其梅也同来。阿沛·阿旺晋美被王其梅、平措汪杰的诚挚所感动，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到和谈是最佳选择。

于是，他开始协助王其梅、平措汪杰，去做其他藏族官员、军官们的工作。

噶厦的执政者们，把命运托付给代神传
言的乃穷、噶东神汉
十五岁的达赖。还不能名副其实地亲政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后，噶厦当局和西藏上层贵族们心绪如麻，不甘与恐慌交织，是再战是求和，是出逃是留下，决断迫在眉睫，可他们唇争舌辩许久，依然莫衷一是。事关西藏的命运，仿佛只有取决于天意和神断了。

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被请到了达赖的佛殿。他们念念有词，舞来蹈去，如同与神灵絮语一般。突然，噶东神汉匍匐在达赖喇嘛座前如泣如诉：“神王达赖喇嘛乃全体僧俗民人的智慧和至宝，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隆昌。”

摄政达扎曾为了恋栈，不惜加害让位于他的热振呼图克图，但违拗神的旨意是要遭天谴的，他只得宣布辞职。达赖亲政了，

可此刻他刚刚十五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还得听凭噶厦当局、大活佛、上层贵族们越俎代庖。

就在拉萨的政教领袖们还在为解放军进入藏东后，战和走留纷纭其说之际，由阿沛·阿旺晋美执笔，四十名昌都府官员签名的致达赖及噶厦书送到了。在这封上书中，阿沛·阿旺晋美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进军西藏、和谈的方针：

“此次解放军进西藏，丝毫不存在以武力支持与藏政府有矛盾的扎什伦布寺和热振派来搞颠覆的企图，而是要把西藏人民从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帮助西藏人民幸福、民族昌盛。汉人决不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就确定的……目前藏汉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党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

阿沛·阿旺晋美恳请达赖和噶厦，“下决心速派一位高官官员为代表，经康区去北京谈判就能成功”。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他们又一次向神灵问策，打卦抽签的结果是“出走”。结果，达赖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孜本鲁康娃为司伦，代理政务，在四十名政教领袖和贵族的裹带下，沿江孜亚东一线，向印度而去。

出走前，逗留印度的孜本夏格巴，在与英、印等方接洽后，曾致电拉萨：英、美均答应支持达赖，印度将派兵接应。而当达赖等披风踏雪跋涉到亚东时，局势骤变。印度政府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和中国政府警告，收回承诺，只同意以难民身分接纳达赖；英、美亦改口不支持达赖离藏了。达赖一行顿时陷入进退维谷境

地，怅然若失。

能依时势应变者是俊杰，西藏的政教领袖们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阿沛·阿旺晋美上书余音犹在，中央人民政府依旧敞开着谈判之门。于是，一封由达赖署名的信札，被送到了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

以达赖名义签署的信札极富辞令
袁大使回信：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你的执政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在飞机上接到电报：
改乘火车赴京
周恩来亲自点将：平措汪杰担任这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达赖信札的字里行间，极富辞令：“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十月八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时下）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和外出两部分。”

然而信札中对谈判一事，也显得颇诚恳。说是此前已由“昌都基巧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的堪穷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起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请您（按即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这封信札被迅速送往北京。仅隔十三天，达赖就接到袁大使的回信：“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您的执政”，中央政府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驻印度大使馆将给予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的代表团，随即组成了：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官）土丹旦达为代表。后两位代表和藏方派出的翻译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黄国祯）、英文翻译桑都仁青，是从亚东经印度出发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从昌都动身的，中共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党委，派平措汪杰陪同阿沛·阿旺晋美经渝前往北京。“我们在重庆登机后，在飞机上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说是周恩来等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将到火车站迎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要我们在西安改乘火车赴京。”

“在西安，我们见到了博雅德劭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他是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老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大师来了。他的到来引起几位噶厦政府和谈代表的恐惧，因为噶厦当局曾阻挠过大师进藏。大师对西藏上层贵族的某些行为，用藏语批评了几句，所以主持宴会的汪锋发现有些代表的脸色不好看，却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二十二日傍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都在车站迎接我们。自在重庆巴蜀小学聆听周恩来做形势演讲，一晃十年了，我终于又在这么近的距离见到了他，他的风度和睿智 还是那样让人倾倒。”

二十六日，凯墨·索安旺堆等经印度赴京的代表，在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抵京。翌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一行四十五人也到了。但因当时达赖及噶

厦政权尚未就十世班禅的确认表态，作为噶厦和谈的代表们一直规避和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厅的人见面。

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于四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人民解放军西南区参谋长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周恩来还亲自指定了两位列席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汪杰和十八军宣传部长乐于泓。

最初，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翻译，是从中央民委调来的，他是青海人，对西藏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特别是谈判涉及许多政策性的解释，只有既稔知西藏的传统、现状，又熟悉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人，才能胜任传情达意的谈判翻译之职责。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平措汪杰担任此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噶厦政府代表先端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
李维汉说：要整藏族，打败了整岂不更容易，何须谈判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噶厦方面的代表端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

一、西藏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十三世达赖出国后延续下来的。同美国只是商务关系。二、归还旧汉政府占领及解放军解放的地区。三、如有外国人侵，再请汉政府协助。四、请撤走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

五、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这五项条件，是由凯墨·索安旺堆等从亚东带到北京的。据说达赖、噶厦执政者们曾一再叮嘱：和谈必须以此为依据，切勿轻易许诺。这五条的核心，还是要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使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徒具名分。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政府的意见 我们必须坦诚地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以解放和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从噶厦的五个条件看，西藏上层部分人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延以观国际形势变幻；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了对谈判的基本态度：英、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证明；巩固国防极为重要，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达赖保持原有地位；西藏地区内部各派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

樽俎谈判，总是源于分歧，又以有共同点可觅互为依存；是一种需要智慧和毅力的艺术角力。进军西藏，可谓谈判的第一个难点，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

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最开明、最早倾向和谈的人，而且同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已有一段接触，因此中央人民政

府代表团力争首先说服他。作为列席代表、政治翻译的平措汪杰，是每次深谈的在座者。

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代表，以历史文献说明，中央政府派军队入藏早有先例；而且西藏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西藏人民，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

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感到再难以坚守不允解放军入藏的条款。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总算是统一了认识。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噶厦政权与班禅堪布厅的积怨 李维汉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班禅的问题提出后，谈判陷于僵局 孙志远单独会晤西藏谈判代表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达赖、班禅间的和洽及在西藏的地位。可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却没有班禅和堪布厅的代表；且在噶厦带来的五项条款中，竟有“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一语。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同为藏传佛教黄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师徒三人，对黄教在藏区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尊贵的师徒三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自转世制度形成，

历代达赖与班禅都互遵长师幼徒之仪，相互尊重，情深谊笃。然而此时何以至此呢？

这与清代后期，国势衰败无力护卫边疆，朝廷对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引起其离心倾向有关。二十世纪初，英国侵略军进犯西藏，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不太听命的十三世达赖的势力有所削弱，没有积极支持抗英作战。

西藏抗英以失败告终，清廷驻藏大臣联豫在达赖出走印度后，假皇帝名义取消十三世达赖封号，将九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出任摄政。此事虽遭曲吉尼玛坚决反对，但却为后世达赖与班禅间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噶厦政权和班禅本寺扎什伦布寺的部分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屡造纠纷，推波助澜，更深化了矛盾与隔阂。

后来十三世达赖重返西藏，九世班禅又因噶厦和堪布厅的关系恶化，于一九二三年底逃往内地，双方结怨更深。一九三七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玉树圆寂。一九四九年六月，国民党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十世班禅。八月，十世班禅在青海境内塔尔寺坐床，但达赖及噶厦当局一直未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立即给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一九五〇年一月班禅及堪布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亦对十世班禅十分尊重，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日确定后，特邀他也赴京。

谈判前，周恩来亲自指示：在谈判过程中，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李维汉还根据周恩来的指

示，向平措汪杰和乐于泓布置说：此次谈判要涉及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要他们做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噶厦和谈代表的工作。平措汪杰说他们接受任务时，思想上毫无准备。

果然，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提出要将有关班禅的内容写入谈判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们反应强烈。他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谈判的十项条件中，本无此内容；噶厦当局，也只是交代和谈代表赴京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根本没谈班禅的事。

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等同，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谈班禅的问题，理由是九世班禅圆寂后，曾在青海、西藏、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噶厦当局尚未表态。也就是说班禅的确定还是问题，怎么能谈他和达赖、噶厦的关系和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何况代表们没有噶厦的授权，一定要谈的话，必须等待请示。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十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的问题。

范明很快得到了十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党政府颁给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政府欲自南京搬迁时，班禅堪布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晋美百般设法，催促、运动国府尽快批准班禅转世灵童，使李宗仁代总统在六月三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

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此后即派国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赴青海与国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坐床大典。这即表明十世班禅的确认，基本上是符合历史遗轨和制度的。

当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出示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后，西藏的代表仍拒绝将班禅的问题纳入谈判的范畴，因为噶厦与堪布厅的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谈班禅问题，也容易引起达赖、噶厦当局的忐忑和疑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孙志远在休会间隙，单独与噶厦和谈代表们晤谈。这次晤谈持续了十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进入本世纪后的龃龉纠葛，通过班禅条款的难度。

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难题似乎迎刃而解。

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西藏代表们不再抵制把班禅的问题写入谈判协议。

平措汪杰把李维汉的气话，翻译成：“暂停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地休息。”

军政委员会的最高首脑会是谁呢
李维汉立即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关于和平协议的条款大部分都讨论通过了，相对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李维汉在与阿沛·阿旺晋美晤面时，提出只需再将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一款讨论通过，谈判就可告结束了，请阿沛·阿旺晋美先和西藏的其他代表打个招呼。

这次谈判，实在是太难为阿沛·阿旺晋美了，许多难度大、敏感性强的问题，都是通过先说服他，然后再做其余西藏代表的工作的。但他毕竟是噶厦政权的首席代表，有些问题他想通了，要劝说其他人，还必须等适当的时机，并且得从各方面思虑周全了。所以他在同李维汉晤谈后，一直考虑着找个合适的时候扯出这一话题。

两天过去了，李维汉估计阿沛·阿旺晋美已与西藏代表们打过招呼，便在谈判时提出要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不料平措汪杰刚刚把他的话说翻译出来，竟如一石激起轩然大波，除了阿沛·阿旺晋美外，其他西藏代表均艳然恚色。

他们高声质问：“你们中央代表怎么总是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强加给我们？”有的甚至揎袖捋臂嚷道：“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

李维汉不知阿沛·阿旺晋美尚未商量妥当此事，见西藏代表们吵吵嚷嚷有些纳闷。经翻译明白了吵嚷的内容后，他未免也有些怒形于色，说道：“不是早打招呼了吗，怎么是一会儿一个新想法？在谈判初始，申明我们的五点基本态度的时候，就提到了‘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的内容。你们

这样吵闹，哪里是诚心谈判的样子？”

这前所未有的对立，几乎使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到在这种气氛下，是无法继续谈下去，就把李维汉的气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地休息。”

平措汪杰随西藏代表团一起回到他们的住地北京饭店。回到住地后，多数代表的怒气仍没缓和。直等到他们的吵嚷渐渐平息，平措汪杰才开始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他告诉代表们，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

但西藏的代表们一再咬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是在我们脖子上又骑个人”不放。平措汪杰思忖了一下，发问道：“又骑个人？那你们说说看，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会是谁呢？还不是达赖喇嘛吗？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

平措汪杰冷不丁的自问自答，使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细细一琢磨，觉得如果由达赖出任军政委员会最高首脑的话，的确不存在谁骑脖子的问题，不禁相觑自窘。一消除抵触情绪，事情就好商量了。凯墨·索安旺堆对他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感到你确实是在为西藏民族的利益尽力。散会时你没有按李代表的原话翻译，他的气话我听懂了。”

在平措汪杰反复解释了他们提出的种种疑虑后，西藏代表终于同意恢复中断了的和谈。

从西藏代表团住地出来，平措汪杰直奔李维汉办公室，此时已是晚上。李维汉一见他就问：“西藏代表团是不是在卷铺盖卷，准备走啦？”“不，在反复说服后，他们同意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条款，谈判明天可以恢复了。”“是吗？”李维汉喜上眉梢，平措汪杰遂简要叙说了经过。

听罢他的叙述，李维汉立即拨通了电话：“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汪杰同志来了，现西藏代表已被说服，在协议中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已经没有异议了。”

电话听筒里传出了毛泽东的声音，平措汪杰回顾说：“那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声音，听到他刚刚做出的指示，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由此我知道了，我们的整个谈判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注和指导下进行的。”

李维汉说：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

班禅和噶厦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都被安排在和毛泽东同一桌

毛泽东说：历史上你们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到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印。

《协议》共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

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自清代末期以来，西藏同内地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尔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了。

在谈判的二十多个日日夜夜，平措汪杰是最忙碌的人之一。不论是全体代表的谈判，还是中央人民政府个别代表同噶厦和谈代表的单独交谈，他都必须在侧翻译和做必要的解释。在没有谈判的间歇里，他既要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人在一起商讨有关事宜，又要去做西藏代表的说服工作；还要将西藏代表们在会谈外的意见、看法，转告给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

在《协议》签字当晚李维汉主持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首先举杯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 他为和谈的成功立了大功。”这时 噶厦的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也来到平措汪杰身边，对他说：“我也认为第一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而酒会刚结束平措汪杰就因极度疲惫突然虚脱晕倒了。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

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一百八十余人出席作陪。

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十世班禅及堪布厅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宴会。平措汪杰说：“这是噶厦的官员和十世班禅的第一次会面。虽然噶厦的代表们在有关班禅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但达赖、噶厦当局尚未对此表态，所以他们还是回避同班禅的接触，但这次回避不了了。”

“据有些回顾这段历史的书籍和文章记载，说是在谈判期间，噶厦的代表就拜望过班禅和堪布厅的官员；有的则更详细说是在讨论班禅的条款通过后，噶厦的代表在李维汉敦促下，拜望了班禅及堪布厅的人。”

“我印象是此前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如果见面，我应该记得。这是第一次，中央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安排与毛泽东同在一桌。毛泽东以他的伟人魅力，消弥了近代历史给达赖和班禅间遗留的芥蒂。宴会充满喜庆的气氛，毛泽东围绕西藏，谈古论今。我第一次领略了时代巨人磅礴恢宏的襟怀和经天纬地的学识。”

毛泽东对班禅、阿沛·阿旺晋美说：你们西藏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你们的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地跑了。唐朝有个常胜将军叫薛仁贵，他“征西”进入东部藏区青海附近，吃了大败仗的……

这信手拈来的一段历史，寓庄重于诙谐，既融洽了气氛，又紧紧扣住眼前的政治斗争主题，毛泽东挥洒得如行云流水。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

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当与宴者们为《协议》的签订干杯后，平措汪杰举杯转向毛泽东说：“我代表解放前在藏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藏族同志向您敬一杯酒，祝您健康长寿！”毛泽东说：“谢谢，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毛泽东对平措汪杰说：你的名字我早听说了

童小鹏送来毛泽东的赠书

文殊菩萨化身、观世音菩萨化身、无量佛化身在中南海会聚

陈毅对汪锋说：请平措汪杰同志来当顾问

在怀仁堂宴会开宴前，平措汪杰因身体不适，在乐于泓陪伴下到院子里透透空气，看到院中有一身材魁伟的人，正在伸臂活动。乐于泓告诉平措汪杰，那就是毛泽东。他们走上前，乐于泓给毛泽东敬礼后，介绍了平措汪杰。毛泽东与平措汪杰握手时说：“你的名字我早听说了，可一直没见过面。年轻人，长得好健壮呵……。”

据说毛泽东在访苏时，斯大林曾提起过西藏有两位较早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一位是平措汪杰，一位是昂旺格桑。因为他们在重庆时与苏联大使馆多次联系，所以斯大林也听到过有关汇报。从那时毛泽东就记住了平措汪杰。他在解放西藏和谈中的

出色工作，使毛泽东对他印象更深了。此后毛泽东同西藏地方最高层人士会面，平措汪杰都以翻译或顾问的身分出席。毛泽东还将自己著的《实践论》，专门委托童小鹏给他送了一本。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毛泽东题写了“平措汪杰同志毛泽东”。这本书平措汪杰至今珍藏着。

和谈结束后，平措汪杰陪阿沛·阿旺晋美返回昌都。八月，入藏的解放军开始向拉萨进军。王其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平措汪杰任党委委员。当九月初，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市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王其梅和平措汪杰。

十月二十六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主力部队到拉萨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九成员中，平措汪杰是唯一的藏族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一九五四年春季，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平措汪杰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充任翻译而置身在侧。一年前，他在陪西藏佛教代表团赴内地参观访问后，因就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留在了北京。

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聚首一处，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圣事。毛泽东勉励两位年轻的佛王加强学习，站稳反帝爱国立场，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一九五五年春季，国务院决定在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担任主任，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任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组成

由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和指导工作。

行前，周恩来对陈毅反复叮嘱：到西藏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勤于请教；不要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

陈毅觉得自己不太熟悉民族工作，不太了解西藏习俗，就问担任副团长的汪锋：“北京有没有熟悉西藏情况、又懂民族政策的藏族同志？”汪锋说：“有一位平措汪杰同志。”你赶紧找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说，请平措汪杰同志来给我们当顾问。”

一年后，平措汪杰随代表团出发。陈毅专门安排了一个大型报告会，请他给代表团成员们讲西藏的宗教、历史以及藏民族的风俗习惯。陈毅也坐在台下，认真地听，认真地记。他还单独找平措汪杰来询问讨教：如何给达赖、班禅献哈达，送礼品，怎样给其他喇嘛、活佛、贵族官员献哈达，怎样敬青稞酒；别人献哈达、敬酒时，怎样接受，如何答谢；代表团的女同志、女团员，能不能同喇嘛、活佛握手，见面怎么办等等，周详备至。他还向平措汪杰征求意见说：“喇嘛、活佛、上层贵族、普通群众和藏族干部，最关心什么？希望我讲些什么？会向我提出什么问题？我回答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请你列个详细提纲，并多帮我出出主意。”看着陈毅诚挚的脸，平措汪杰深为他那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所感动，便尽其所想，全力辅助陈毅的工作。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平措汪杰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他留西藏，是毛泽东当面征求达赖、班禅的意见，达赖和班禅都表示欢迎后决定的。除了就任副秘书长，与阿沛·阿旺晋美一同主持筹委会的日常工作外，他还担任着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之职。

进了特殊的“超级党校”
把《矛盾论》读了五十遍
自制“墨水”
向印度人学习
数十万字的哲学手稿

返藏后的平措汪杰，工作分外忙碌。在这一时期，中央和西藏工委的指示和决定，几乎都是通过阿沛·阿旺晋美和他，向达赖和噶厦政府转达的；达赖和噶厦政府的意见、要求以及反映的情况，也由他俩向中央和西藏工委转述、汇报。

此时的平措汪杰年富力强，且刚刚经过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政治上也日趋成熟，他感到从他踏上革命征程，就渴望的幸福繁荣新西藏的理想，正在付诸建设。他为自己能在实现理想的构建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分外兴奋和不辞劳苦。

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九五八年，继反右运动遍及全国而起的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浪潮，使他遭受不公正的冲击时，他无法理解甚至有些愤懑。两年后，在他三十八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迎接他的竟是囹圄牢笼。

最初的冤屈和义愤感，驱使他以激烈的形式表示抗议；他绝食，他写血书，以剖陈心迹，辩白诬辞，但在那种大背景和气候下，一切都归于无用，一个“反革命嫌疑”的罪名，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这在他人，也许是难以承受的，然而平措汪杰毕竟是二十多年前就开始追寻真理之旅的人。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愁苦和焦躁都于事无补，事实的澄清、沉冤的昭雪尚待时日，在不知何日能结束的囚禁生涯中，不应该消沉和无所事事。

二十多年前，他是从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的；他在西藏地区传播革命薪火，最先做的，就是把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运入雪域。此后，他一直以阅读马列经典为乐事，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他还在中央党校经过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成为藏族高级干部中，颇具理论素养的佼佼者。

于是，他把十八年的单身囚禁，当作一所特殊的超级党校，用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等经典著作的理解和思辨，填满了自己的思维。监狱中一切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费尔巴哈、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毛泽东、刘少奇著的书籍，他都通读了数遍。毛泽东的《矛盾论》，他读了不下五十遍；他把列宁的《哲学笔记》，同黑格尔的著述对照着阅读。

读得多了，思考得久了，就会迸发出理念的火花，把一些散乱的现象，归纳推绎成理性的规律，再以之反观迷离混沌困惑难解的事物，便于山重水复中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平措汪杰从阅读和思索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起初，他每有新的体会和发现，就高兴得引吭高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继而则萌发了把思考的结果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强烈欲望。他用让他写交代材料的纸笔，偷偷地写起来。狱中的学术创作，就这样开始了。

可一九六九年后，逼他写材料的人们，大概遗忘了这个老囚犯、“死老虎”，再也不要他交代什么了，自然也再没有寸纸支笔落到他手中了。此时没有纸笔的滋味，仿佛比当初蒙冤投入牢笼时还痛苦。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办法。

一次，他在洗囚服时偶然发现水变蓝了，把洗囚服的水沉淀一下当墨水的念头一闪而出。结果他自制出了“墨水”。有了一

项发明，就会生出一串联想，他从床铺下抽出稻草，把一头弄尖，笔也诞生了。

接下来就是解决纸的问题了。他去过印度，依照印度人的习惯，解手之后不用手纸擦，而是用水冲洗，模仿一下印度人，纸不就省出来了吗？万事俱备，他又可以继续他的哲学研究和写作了。此刻的喜悦心境，也许是他终生抹不去的！

乌兰夫说：平措汪杰是少数民族干部中
受迫害时间最长的

邓小平说：“你可吃大苦头了……”

班禅副委员长谦虚地说：我不懂哲学

哲学的研究和写作，为研究和写作而进行的创造，使身陷囹圄的平措汪杰，没有让时光白白流逝。他后来又用一段铁丝磨尖，取代了稻草。为了使一些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他从棉絮里抽捻出线，摆成图，用米粒粘在纸上……

十八个寒暑过去了，当平措汪杰终于从秦城监狱中走出时，他已经写下了厚厚一摞几十万字的哲学手稿。由于在监禁期间除了回答专案人员审讯，几乎没有和人说话，这位参与谈判，并屡次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与西藏政教领袖交谈充当翻译的人，居然因发音器官退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话都说不利索。

只是在摆脱囹圄后，他才知道他的发妻已因受迫害而去世，他的亲属们也受到株连；他的案子还牵涉到一大批藏族干部，他领导的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打成反动组织，有六人被逼致死，这个案子成为藏族地区的最大冤案。

平措汪杰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但由于一些成念的桎梏还未能立即打破，他的冤案，一直拖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领导人的过问和关注下，才彻底得到平反昭雪。正如乌兰夫同志所说的那样：“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平措汪杰同志是受迫害时间最长、最典型的一个。”

一九八〇年八月，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平措汪杰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又一次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面。邓小平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你吃大苦头了……”在旁边的胡耀邦告诉邓小平说：“现在已经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

虽然监狱的生活，对平措汪杰的身心有很大的摧残，但他仍然惦记着他的哲学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在拨乱反正中，在看到新历史环境中有些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迷失了信仰和方向的时候，他更感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意义，因而更加紧了研究和写作。

他向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们讨教切磋，他还把他已经写好的篇章，读给曾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班禅大师听。班禅大师听后曾谦虚地对他说：“我不懂哲学，看来你研究得很深。这本书写好了，可以给藏族人民争光。”

一九八八年，集十余年研究之大成的《辩证法新探》一书终于问世了。在《辩证法新探》一书座谈会上，当时的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费孝通、严济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都对这部八十余万言的哲学巨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继此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月球存有液态》、五十万字的《自然辩证法新探》等著作。这些结于八九十年代的哲学思辨硕果，均萌芽在他身陷囹圄之际。

一九九二年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平措汪杰和人大常委、中科院院士、上海天文学会会长叶叔华坐在一起，他把《月球存有液态》的手稿给了叶叔华，希望得到天文学家的指教。叶浏览后对他说：这绝对不可能，月球上绝对不会有液态。当时他们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时隔两年，“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发现月球上储存着数以十亿吨计的冰。”这则发自德国《图片报》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消息说：“月球探测器‘克莱门坦’号发现了月球南极上的冰层，将雷达信号发回美国航天中心。”

当平措汪杰运用辩证法的逻辑公式推算出的结论，陆续被一些科学探测所证实后，他收到了叶叔华的来信。叶叔华诚恳地说：“您所提出的看法都很有启发，但与我们习用的方法不同，我还要更多地学习领悟。近年来天文探测的新发现，逐日有所增加，想必能更为先生的理论，提供更多的验证。”

这是在笔者采访的人物中，第二次听到哲学家对某一自然现象论述的精确度，超越了该领域专门学者研究的事例了。第一次是毛泽东对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见解，这次是平措汪杰对月球上有液态的推测。

当我们的言谈从哲学命题又回到他的生平时，平措汪杰说：“我一生为祖国和藏族人民做了一些事情，但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功劳，只能算是苦劳。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点什么功劳的话，那就是我这些哲学研究的成果。”

如今，曾是全国人大五、六、七届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平措汪杰，虽然只担任顾问之职，可他仍然孜孜矻矻地求索和笔耕不辍，在政务之余，应邀在国内外讲学。笔者也未曾想到，为撰写本文的采访，就是经过了二三个月的联系，才在

他繁忙的公务和讲学的间隙中抽空进行的。

十二年前，他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茨丹央珍女士组建了新的家庭。最近，他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哲学教授，成为第一位带博士生的藏族博士生导师。